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六卷

宗志文 严如平 主编

中华书局

中 华 民 国 史 资 料 丛 稿

民 国 人 物 传

第 六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宗志文 主编
严如平

孙思白 校阅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吴广义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六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宗志文 主编
严如平

孙思白 校阅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 12 1/8印张 • 244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册

统一书号：11018·1405 定价：2.00元

ISBN 7 101—00036-3/K·13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不写，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

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刘复基	周学舜 (1)
施从云	吕乃澄 (5)
黄泽霖	杜文铎 (10)
程家桢	潘 荣 (14)
张百麟	周春元 (19)
张开儒	孙代兴 (25)
吕志伊	叶祖荫 (32)
李德全	郭 焘 (37)
邓宝珊	王 劲 (43)
陈绍宽	陈贞寿 (50)
马鸿宾	马启成 (57)
汤寿潜	郑云山 (63)
王文华	熊宗仁 (69)
王家襄	夏高阳 (76)
夏 超	魏 桥 (82)
吴景濂	张树勇 张黎辉 (87)
陈 诚	严如平 (93)
靳云鹏	汪仁泽 (102)

徐永昌	汪仁泽	(109)
马福祥	马启成	(115)
杨 森	吴银铨	(121)
袁祖铭	李德芳 刘毅翔	(128)
周西成	范同寿	(134)
王天培	熊宗仁	(140)
李 弥	荆德新	(145)
刘显潜	熊宗仁	(151)
憨玉琨	庞守信	(156)
王 振	庞守信	(161)
陈宝琛	陈贞寿	(166)
赵尔丰	张 力	(173)
汤尔和	婆献阁	(181)
林柏生	黄美真 张 云	(188)
张岚峰	邢汉三	(194)
范旭东	熊尚厚	(200)
黄延芳	汪仁泽	(207)
秦润卿	陆书臣 吾新民 程庸畴	(212)
黄奕住	汪仁泽	(218)
徐新六	汪仁泽	(223)
胡 筠	汪仁泽	(228)

王性尧·····	罗允和	(232)
滕虎忱·····	王家鼎	(237)
高星桥·····	熊尚厚	(244)
康心如·····	周本渊 熊尚厚	(249)
华之鸿·····	周春元 林国忠	(255)
黄焕南·····	汪仁泽	(259)
谈荔孙·····	汪仁泽	(264)
孙衡甫·····	冯伯准 宋紫云	(270)
陈朵如·····	郑叔屏	(275)
关伟林·····	汪仁泽	(280)
沙彦楷·····	汪仁泽 陈光贻	(284)
唐拾义·····	汪仁泽	(287)
黄锡滋 黄明安·····	张钧陶	(291)
潘吕猷·····	肖宇柱	(296)
刘航琛·····	伍志安	(302)
王伯元·····	董建侯 宋紫云	(308)
袁履登·····	汪仁泽	(312)
茅 盾·····	林 印	(316)
马 衡·····	汪仁泽	(324)
王造时·····	江绍贞	(330)
潘光旦·····	金慰天	(337)

柯劭忞	姜献阁	(344)
丁福保	陆柏年	(348)
傅斯年	熊尚厚	(352)
荀慧生	文 曦	(359)
张石川	陈 野	(364)
汪逢春	寿祝衡	(371)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选

录草案	(374)
-----	-------

刘 复 基

周学舜

刘复基字尧澂，后易名汝夔，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①，湖南常德人。少年时曾就读于常德县立高等小学堂，成绩优异。他幼读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书，感受民族主义思想，深恨清廷统治腐朽黑暗，慨然有推翻清廷之志。这时，他认识了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黄兴，两人常在一起议论反清革命。

1904年秋，黄兴等密谋于11月16日西太后七十岁生日当天在长沙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举事。刘复基积极投入了这次行动。10月，他受黄兴的派遣，与宋教仁一道负责主持常德一路。他们在常德筹措经费，聚集同志，联络会党，颇著成效。不意事机泄漏，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刘复基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11月，参与起义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又潜回湘西洪江，图谋再举，刘复基毅然前往参加。不料起义前马福益被捕，于1905年4月就义于长沙。刘复基悲愤交集，但斗志弥坚。不久，他东渡日本探索革命道路。同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06年春，刘复基受同盟会派遣，回湘开展工作。他在长沙筹设报刊代派所，运销《民报》及各种革命宣传书册，同时还负责湘鄂两省的联络工作。同年夏，他积极参与禹之谟倡导

公葬留日革命青年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的活动。事后，清吏竟将禹之谟逮捕下狱。刘复基无比愤懑，乃与蒋翊武奔走沅、澧之间，招纳会党，以民族大义相号召，得敢死之士数百人，准备起义。他们设革命机关于常德祇园寺，不料又被清吏侦破。刘复基避走上海，在那里与杨卓林创办《竞业旬报》，以通俗文体宣传反清革命。1907年3月，杨卓林被捕下狱，《竞业旬报》被迫停刊。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澂函召，与蒋翊武赴汉口办《商务报》。12月，他们得知武昌成立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便以报社采访员名义前往联络，结识了新军中的群治学社负责人蔡大辅。通过蔡的介绍，又与武昌群治学社负责人李六如取得了联系。此后，《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进行革命宣传，反清色彩十分鲜明，被视为“汉口报界革命之急先锋”^②。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决定乘机发动起义，嗣因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下去而作罢。但风声已经外露，《商务报》被清政府封闭。不久，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这时，刘复基深感革命的胜利非发动军队不易成功，便毅然投笔从戎，入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

1911年1月，振武学社因革命活动暴露，改名为文学社，刘复基被推为评议部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③它的组织发展很快，3月15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社员达四百余人。7月，文学社社员猛增到近三千人。这时，它的机关报《大江报》因连续发表激烈的反清言论，被湖北反动当局查封。刘复

基不断奔赴各营报告情况，告诫同志加倍慎重，保守秘密，准备革命时机到来。

刘复基很重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问题，一再在代表会上提出。他说：“我们两团体宗旨、目的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有什么不可商议？”^④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一起在武昌发难的计划，决定建立统一行动的机构，刘复基被推为军事筹备处常驻筹备员。

9月下旬，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24日，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举行会议，预定10月6日（中秋节）起义，制订了总动员计划，推举了起义负责人。正在这时，传来了南湖炮八标士兵于前晚（23日）发生了暴动的消息；暴动士兵要求立即起义。刘复基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说如果仓促起义，由于“百无一备”，“功亦难幸成”，反而打乱了原定起义的整个部署^⑤。根据他的正确意见，会议坚持原来的起义计划。但原起义日期因准备不及，要往后推，一时又定不下来。

10月9日上午，孙武等在汉口总机关制造炸弹失事，总机关被破获，党人名册被抄走，并有多人被捕。在严讯下，有人畏刑吐实，于是武昌革命机关及领导人均被暴露，军警大肆搜捕，形势十分危急。当天下午刘复基与蒋翊武等正在武昌机关聚议发难日期，听说孙武失事的消息，刘复基愤然倡议：“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奴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⑥ 蒋翊武问：“炸弹制就否？”“地图若何？”“方略已定否？”刘复基说：“炸弹制就

者,已分发各营。”⑦他又将地图和方略交蒋翊武。蒋阅后,以总指挥名义,草命令一道,派人分送各标营,约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台鸣炮为号,各营同时并举。

9日晚10时,刘复基等正在机关等候南湖发动起义的炮声,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手持炸弹,下楼拒敌。他连掷数弹,仅第一枚爆炸,爆炸力不大。敌人一拥而进,将刘复基等人逮捕,漏夜提审。刘复基步入公堂时毫无惧色,敌人问他何故造反,他厉声道:“吾矢志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复扬州十日仇,雪嘉定三屠恨,何谓造反?今既被执,夫复何言,请速予死。”⑧

次日清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刘复基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外,年仅二十八岁。临刑前,群众闻讯拥至,填街塞巷,他向悲愤的群众大呼:“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⑨

注:

- ① 刘复基生年无准确记载,此系按其牺牲时的年龄推算的。
- ②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页。
- ③ 万鸣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集第123页。
- ④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 ⑤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集第24页。
- ⑥ 同④,第55页。
- ⑦ 同②,第32页。
- ⑧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册第1405—1406页。
- ⑨ 同④,第58页。

施 从 云

吕乃澄

施从云，字燮卿，1880年4月25日（清光绪六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亲施志宽，以农为业，兼做豆腐买卖，有七个子女，家境贫寒。施从云少时入塾读书，稍长助父业农，仍勤勉好学，喜读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反帝反清的书籍。他性格豪爽，见义勇为。

1900年，施从云不堪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背井离乡弃农从戎，经同乡介绍，入天津镇台吴化纯部。1904年入保定将弁学堂，次年毕业后，在北洋第五镇中任排长，继升队官，再升任督队官，驻奉天新民府。1909年春，他回家安葬母亲，誓言：“从此双亲归净土，头颅便可造山河！”^①决心投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斗争。由于他从军以后，多与思想进步的官兵交游，逐渐成为第五镇中的活跃人物。他与王金铭、冯玉祥等结交，联合六名下级军官，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秘密鼓吹革命，互相传阅《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施经常向官兵宣传满清王朝屠杀汉人的残酷情景，激发大家的革命情绪。经过施从云等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武学研究会的组织发展很快，许多士兵纷纷加入。

同年9月，施从云被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十镇，由队官提升

为第七十九标第一营管带。他与营副王金铭等继续在士兵中发展武学研究会组织,广泛开展活动,二十镇的同盟会员也参加该会活动。不久一部分下级军官也陆续入会,王化东所训练的学兵一千五百余人则几乎全部加入。武学研究会的活动日益扩大,受到二十镇的反动将领潘榘楹等人的疑忌和监视。正在这时,同盟会员在东北秘密组织“山东同乡会”以联络同志,于是山东籍的王金铭、孙谏声等发起在二十镇组织山东同乡会,聘潘榘楹为会长以遮人耳目,王金铭为副会长实际负责。施从云虽非鲁籍,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被吸收为“名誉会员”,担任会外干事,实际上成为该会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成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秋,第二十镇奉命入关参加永平(今河北卢龙)秋操,10月10日行军到昌黎,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电令秋操停止,二十镇暂驻滦州待命,继而下令该镇赴武汉前线攻打民军。29日,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要求清廷立宪。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等人力劝张绍曾率部起义,进攻北京,推翻满清王朝。张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又不愿到武汉攻打民军,决定在滦州按兵不动。11月6日清廷下令张绍曾的第二十镇统制职务由潘榘楹接任,另给张一宣抚大臣并赏加侍郎衔的空名,削去了他的兵权。清廷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第二十镇革命官兵的愤怒,施从云与王金铭等在滦州文庙召开七十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挽留张绍曾。施等力劝张绍曾说:“君主立宪并非我们最后的目的,为解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一条道路。武昌首义后,全国革命胜利,指日可期,不必再有所顾虑。”^②张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已经遇害,自己

的力量单薄，遂借口养病，避居天津。

潘桀楹接任第二十镇统制以后，奉袁世凯之命，把全镇部队拆散分驻于葫芦岛、海阳镇、锦州、临榆等地，并严密监视，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为了冲破敌人设置的障碍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爱国士兵共同推举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出来主持革命工作。他们三人毅然任之，召集革命同志开会，施说：“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不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我亦云然。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③他们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施、王随即与到滦州来运动新军起义的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取得了联系，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钺、王葆真等人密切合作，共策进行。12月下旬，他们研究决定由王金铭潜赴海阳镇，与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等秘密商议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当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时，白毓昆已携带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率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从天津来到滦州，积极发动武装起义。12月30日，施从云和王金铭等在北关师范学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并拟推举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以造声势。散会以后，施与王去见岳兆麟，告以推举他为大都督之事，岳借口兵力单薄推辞。施、王为了争取岳，进一步把去海阳镇与冯玉祥密商起义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当天晚上，他们即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的名义，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署

名，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但岳兆麟是一个反动军官，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密。王奉袁世凯之命，于第三天（1912年1月1日）赶到滦州，想用恐吓的手段“顺机消弭”起义，被起义军监视了起来。当晚，凌钺、张振甲率领官兵逼王怀庆起义担任北军大都督。王假装接受，暗中却与第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于1月2日早晨入滦州城的途中逃走。

王金铭、施从云等闻悉王怀庆逃走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推举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当天宣誓就职。在滦州城里张贴独立布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当时天津八国领事团推代表到滦州来与军政府谈判，承认滦州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允许起义军通过天津。

王怀庆到了开平，伪造一份从秦皇岛登陆民军的电报发给王金铭、施从云，要他们按兵待援；同时，他又急电袁世凯从石家庄调第三镇第十二标，于1月4日下午五时开到雷庄附近布防，并拆掉一段铁轨。这时，其他各地配合起义的部队，被袁世凯的爪牙监视，不能自由行动，冯玉祥也被拘禁在海阳镇。

王金铭、施从云原计划起义军于1月3日直取天津，因误信伪电而等待秦皇岛登陆的民军，迟未出发，直到4日才明白是中了敌人缓兵之计，乃于当天誓师出发。下午五时施等准备登车之际，忽然捕获了张建功派向王怀庆密报军情的奸细。张建功图穷匕见，率领第三营官兵踞城顽抗，与第一、二

营展开激战，相持两小时不下。王金铭欲下令猛攻张部，施从云说：“建功无能为也，若必攻之，旷日持久。海阳军及关外民军方盛，业已约定以劲旅直趋天津，会攻北京，大事可立就也。”^④遂决定放弃滦州，率第一、二营官兵约七百余入登车出发。晚十二时许，火车开到雷庄附近脱轨，并遭到炮火袭击，王、施指挥官兵下车奋勇杀敌。敌方炮火猛烈，且众寡悬殊，势难支撑。司书瞿胜耻和马弁龚某劝施从云换掉衣服往东后撤，施说：“见危授命，古训昭然，予自从军之日，即思以死报国，死得其所幸也，已矣毋复言！”^⑤依然奋勇督战，与敌军血战数小时。此时清军鸣号停战，诈称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议和。王、施应允，众官兵谓王怀庆诡计多端，恐遭毒手，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⑥遂率领一百多官兵前往，到了雷庄，即全部被伏兵包围。次日施从云惨遭杀害，临刑时庄然挺立，大义凛然。时为1912年1月5日。

注：

- ① 潘祭野：《施公燮卿烈士传》，稿存安徽省桐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 ②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69页。
- ③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页。
- ④ 罗正纬编：《施从云》，《辛亥革命》（6）第366页。
- ⑤ 同④。
- ⑥ 刘骥：《滦州起义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59页。

黄 泽 霖

杜文铎

黄泽霖字茆卿，号思明，原籍浙江会稽，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贵州。他的祖父曾在贵州任知府，父亦就幕于黔。青年时期的黄泽霖曾习刑名，义和团运动后，他愤于清廷的腐败，以为非从事根本改造不足以救危亡，乃改治法政。黄泽霖同张百麟系戚谊，感情很好，往来密切。

1907年12月，张百麟等在贵阳成立自治学社，黄泽霖积极支持，为发起人之一。1908年，自治学社筹备出版报纸，黄泽霖入股资助，又亲赴上海购置印刷机等，使《西南日报》得顺利出刊。1909年，他被聘为贵州法政学堂现行律教员。黄泽霖还支持其妻黄烈诚在贵阳创办光懿女子师范、光懿女子两等小学，在妇女界宣传反清爱国思想。1910年，黄泽霖入提法公所任科员，翌年又兼教职于法官养成所。不久，奉自治学社命，充新军标统袁义保的书记官。这样，黄泽霖与学界、政界、军界都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1908年以来，黄泽霖不断阅读《民报》及其他革命刊物，受到很大启发，逐渐成为一个急进主义者。他对君主立宪说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极为不满，常在授课时甚至公开集会上揭露其愚弄国民的诡计，语多激烈。因此，贵州立宪派对他十分仇恨。

辛亥武昌首义，鼓舞了贵州革命党人。自治学社立即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总机关筹划起义，黄泽霖是总机关的成员之一，负责军事部和争取袁义保的工作。他废寝忘食，日夜奔走于军界和学界。其时贵州有新军一标，陆军小学一所，士兵和学员中有不少人同情革命。此外，各州县的自治学社社员还以组织乡兵为名，招收会党（哥老会）分子，编制成军，待命而动。湖南光复后，黄泽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主张发动新军和陆小即日起义，由于意见分歧，没有被采纳。10月下旬，贵州巡抚沈瑜庆接受宪政预备会任可澄的建议，电召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率防军来贵阳镇压党人。不久，又见新军不稳，下令收缴士兵子弹。黄泽霖认为情势紧迫，再不举事就要身临大祸，于是致书袁义保，晓以大义，劝其率众起事，为袁拒绝。10月底，云南起义消息传至贵阳，群情激动。黄泽霖派人购买南药局守兵，得子弹数箱，秘密散发给新军。11月3日夜，陆军小学学员率先发难，新军响应，黄泽霖等开城门迎新军入城。4日，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

贵州光复后，自治学社在各地招募的会党群众，陆续来贵阳，除一小部分为军政府收编外，大部分没有得到安置，人心浮动，黄泽霖奉命将他们收编为东南西北中五路新巡防营，并任五路巡防总统。12月，新军一、二、三标先后出省援川、援鄂，黄泽霖统率的五路巡防营便成了贵州军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

黄泽霖在成立军政府时，不同意张百麟采取“共执政权，尽弛敌意”^①的方针，反对立宪派旧官僚任可澄、刘显世入枢密院任职。立宪派人怀恨在心，必欲置黄于死地而后快。军政

府成立不久，立宪派旧官僚就造谣说黄有野心，想取代都督！又组成所谓尚武社，公然宣称黄揽权营私，已由该社宣告死刑。清朝道员、耆老会头目郭重光为瓦解巡防营，制造混乱，到处游说，鼓动广开“公口”（哥老会），声称：“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②在他的煽动下，各地“公口”纷纷建立，社会秩序混乱。

其时，黄泽霖原准备率军援川，“公口”出现后，所部果然发生动摇。黄“恐难制驭，乃徇众请，开光汉公以约束之”^③。可是这个办法并没有制止混乱，反而使“公口”愈来愈多。一贯杀人越货的遵义巨匪罗魁也乘机来贵阳，声称要当标统，否则将杀都督，人心更加不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黄下令严禁“公口”不法活动。12月15日，他在四川会馆设宴，机智果断地将罗魁当场枪决。与此同时，对其部众也严加约束，规定“扰民者刑于市，违抗长官命令者杀无赦”^④。接着又将违抗军纪，借端敲索的东路巡防营目兵七人绳之以法，社会秩序才逐渐稳定下来。

黄泽霖对不法分子的严厉制裁，是对立宪派旧官僚利用“公口”制造混乱的有力回击，但也因此而与其部众产生了矛盾。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惮泽霖方严，亦震栗不自安”^⑤。刘显世、郭重光趁机用重金收买谭德骥部唐灿章等，唆其伺机杀害黄泽霖。

1912年1月30日，自治学社干部商讨改组军政府事，黄泽霖力主将任可澄、刘显世等清除出军政府。立宪派旧官僚深恐日后军政府改组时被踢开，决定对黄下毒手。当时有人提醒黄提高警觉，加强防范，他回答说：“刘如周（显世）一乡团

首,敢尔耶?”^⑥ 2月2日上午十时左右,唐灿章指使部卒十余人到巡防总统署,谎称已捕获逃逸犯,请黄泽霖亲自审讯。黄泽霖刚进大堂,叛卒立即开枪将他击倒,复一拥而上,断其头、手,黄惨遭杀害。

注:

- ① 周培艺:《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63页。
- ② 《贵州血泪通告书》,《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14页。
- ③ 黄烈诚:《贵州起义首功黄泽霖被害略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11页。
- ④ 同①,第69页。
- ⑤ 同①,第69页。
- ⑥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黄泽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78页。

其他参考资料:

- ① 张百麟:《黄泽霖传》。
- ② 张友栋:《为刘显世等惨杀黔人上参议院书》。
-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
- ④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程 家 桧

潘 荣

程家桧，字韵孙，又作润生、润森或韵笙。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出生于安徽休宁县一个地主家庭。父程牧园，系光绪初年举人，母早亡。程家桧少年时在家乡跟随徽州著名学者胡卓峰读书，1897年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他愤于清政府丧权辱国，屡与同学谈论“满汉种族之别”^①，产生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情绪。

1899年程家桧被两湖书院选送去日本留学，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农科。他到东京后，即到处寻访孙中山。时孙中山主要在横滨华侨中秘密活动，行踪不定，程“百计求之，不克一见”^②。后经侨居东京的广东香山人郑可平介绍，始得相见。第一次见面，程家桧聆听了孙中山关于革命纲领和目标的讲述，深受鼓舞，表示要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树党全国，以传播之”^③。以后，程家桧就经常带领留学生去见孙中山。纽永建、刘道仁、万廷献等都是经他引见，与孙中山相晤，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程家桧积极参加中国革命者在日本的各项革命活动。1901年，他协助秦力山、戢翼翬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宣传颠覆清王朝的革命思想。次年，他赞助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4月，拒俄运动爆

发，程家桢被留日学生推举为拒俄学生军（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归国运动员。清政府获悉程在日本的活动，将其从两湖书院除名。1905年华兴会重要成员宋教仁创办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程任编辑长，专司事务工作。

革命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程家桢为实现革命派的联合，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多次向宋教仁等阐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以促成其与孙中山合作。是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抵日本，程专程从东京赶往横滨迎接。随后，又将此消息遍告东京留学生。孙中山至东京后，程即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晤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向宋教仁、程家桢等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④。30日，孙中山、黄兴召集在东京的各省革命人士共同协商，决定成立同盟会，程家桢应邀参加。当天，程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程并与孙中山、黄兴等七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等演说之后，程家桢倡议设革命本部于东京，并设分部于国内各通商口岸，得到与会者的赞同。20日，同盟会成立后选举了领导机构，程家桢被推选为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中日反动当局的恐惧。11月，日本文部省徇清政府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留学生的活动进行限制。在如何对待《取缔规则》问题上，留学生一时分成两派：以胡瑛、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人，成立“联合会”，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一部分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

另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面对两派的对立，程家桢唯恐引起更大的分裂，力主调和，组织“学界调停会”，终于使两派互相谅解。

程家桢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准备回国开展活动，曾规划三策：一、运动清政府和军队大员，“一举推倒政府”；二、在国内各地普遍发展革命党人，“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三、在粤滇边境起义，震动腹地，振奋人心^⑤。为此，1906年2月，他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回国，任农科教授。程到北京后，利用担任肃亲王善耆家庭教师的机会，一面秘密进行革命宣传，一面多次掩护和营救革命党人。1907年，胡瑛在武汉被捕，经程说项，得免死刑；白逾桓在沈阳谋举事被徐世昌拘捕，程也大力营救。为避清政府迫害，不久，程再度赴日。

此时，正值同盟会经费告急，以至《民报》无法刊行。程家桢曾设法找清政府陆军部尚书铁良拿到一万两银子充作经费。但是，程的这一举动却为许多革命党人所误解。内奸刘师培见有机可乘，通过日人北一辉等策动程家桢，许“以十万金鬻孙文之首”^⑥。程未为所动，并即以此情报告刘揆一、宋教仁等，使刘师培的阴谋未能得逞，程家桢因此遭到刘师培所策动的日人殴打。

1909年程家桢复返北京活动。时熊成基、孙竹丹企图将所获日本秘密图籍售与俄国，以充革命经费，得到程家桢的支持。不幸事泄，程家桢冒险掩护孙竹丹走避^⑦。次年，汪精卫、黄复生因谋杀摄政王载沣被捕，程又通过善耆向载沣进言，使汪、黄得免于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张绍曾与蓝天蔚秘密策

划围攻北京，程家桢居中联络，并准备在北京城内接应。后因吴禄贞被暗杀，计划落空。嗣后，他协助白逾桓、汪精卫等人创京津同盟会于天津。他与白逾桓等人不顾经费匮乏和保皇党恐吓，坚持印行《国风日报》，大力鼓吹民主共和。程的革命党人身份公开后，善耆、铁良极为忌恨，曾派人行刺，但未得逞。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程家桢为幽燕招讨使。程婉辞未就。后应安徽军政府之召，充该省高等顾问。由于程家桢长期在北京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经常出入于善耆门下，南京革命党人多对其表示怀疑，有人甚至视其为变节分子，不准他出席革命先烈追悼会。黄兴、宋教仁为其多方辩白，宋还特地撰写近万字长文，历述程家桢的革命活动。宋就任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后，拟以程为次长，程婉言谢绝。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程家桢一度返回家乡休宁，“欲效黄梨洲之隐南雷，收辑故人之遗迹，尽力表彰，以付后世”^⑧。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程闻耗痛哭，发誓报仇。嗣后，他奉黄兴之命赴皖赣两省，协助柏文蔚、李烈钧布置讨袁军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但程家桢决心留在国内，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并表示“不能屠彼，则为彼屠耳”^⑨。为揭露袁世凯称帝阴谋，程撰写了《袁世凯黄粱梦》一文，公开揭诸报端，痛斥袁世凯的狼子野心。1914年初，程与熊世贞等人组织“铁血团”，图谋暗杀袁世凯。不久熊世贞在津被捕，计划泄露，程也被捕。审讯时，程家桢大义凛然，历数

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致使“问官失色”^⑩。9月23日,终被袁世凯政府以“逆谋”罪名,杀害于北京。

注:

- ① 宋教仁:《程家桢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
- ② 同①。
- ③ 同①,第435页。
- ④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 ⑤ 同①,第438页。
- ⑥ 白逾桓:《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记跋》,台北《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225页。
- ⑦ 冯自由:《孙竹丹事略》,《革命逸史》第5集,第176页。并参见《熊成基被捕案》(件3,《录呈熊成基供词》)。《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 ⑧ 同①,第445页。
- ⑨ 景定成:《程家桢革命事略书后》,台北《革命人物志》第6集第221页。
- ⑩ 同⑨。

其它参考资料:

- ① 吴彩玉(程家桢儿媳)口述记录(1983年1月)。

张 百 麟

厍春元

张百麟，字石麒，1878年（清光绪四年）生^①。原籍湖南长沙。父张翰宦游至黔，历任贵州坡脚（安龙县属）与百层河（贞丰县属）厘金总办、开州（今开阳）知州。

张百麟十五岁为贵阳府诸生。他性情豪爽，怀有大志，喜爱交游，常接近秘密会党，受反清思想影响。至十八、九岁始发愤读书，涉猎儒家经典、佛老学说以及兵刑等书，嗣拜湖南同乡吴嘉瑞为师，研究新学。二十四岁时，其父死于任所，张百麟至贵阳，阅读翻译的法政书籍及《民报》、《复报》、《云南》、《四川》等杂志，思想日益激进，逐渐由信仰维新发展为主张民主革命。约蒲藏锋、陈守廉、锺振玉等发起组织自新学社，暗地开始革命活动。

1907年，张百麟考入贵州法政学堂，结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和同学。他们在自新学社的基础上，于12月成立自治学社。其宗旨是：“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行，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②。并选张鸿藻（安龙人，留日学生）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自治学社的活动分两部分：一为干部会，又名政交部，是主管议事的决策机构，由《黔报》主笔

周培艺任主席；一为社务部，主管行政，即发展组织、宣传、联络等工作，由张百麟负责。

自治学社成立后，张百麟放弃学业，专心工作。他常在《黔报》上撰文，以扩大影响。文章富于鼓动性，而且千言立就，不加修饰。他还公开演说，讲外侮形势，唤起民众挽救危亡。组织发展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社员日渐增加。各县成立分社五十多个，社员有三万多名。彭述文等组织的科学会，也是暗中宣传革命的科学团体，集体加入自治学社。彭并将自治学社的情况，写信告诉日本东京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经孙中山批准，自治学社由同盟会领导。

1909年，自治学社社长张鸿藻辞职，适逢留日学生鍾昌祚回到贵阳，被推为社长，朱焯、龚文柱二人为副社长，实际责任仍由张百麟继续承担。

张百麟除负责编印《自治杂志》外，并筹办《西南日报》，以团结西南各省人士，促进川滇黔的革命。他集银二千五百余两，派人赴沪购得印报机，聘杨寿箴为主笔，用别名张景福向政府备案，于6月出版发行。

自《西南日报》出刊后，以唐尔镛、任可澄为首的贵州宪政预备会（习称宪政党）就以《贵州公报》和《黔报》为阵地，与自治学社展开论争。宪政党为了压制自治学社，打击张百麟、周培艺等，以密谋革命罪加以陷害。唐尔镛并游说旅京的黔籍人士，函请黔籍的直隶总督陈夔龙谋害张百麟。陈转托即将赴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将张逮捕法办。宪政党又派人在李赴任的途中，控告张百麟等图谋不轨。自治学社得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多数主张暂避，免遭毒手。张认为这样正

中宪政党之计，无异证明自治学社是革命党，还可能株连其他社员，决定静观动向。同年秋，李经羲到贵阳后，多方讯问，皆告以两党相争，未闻密谋革命。张连夜写万言书，大胆求见。李认为张是个人才，未予加害，并向巡抚庞鸿书推荐。1910年8月，贵州谘议局第一次大会上，张百麟被选为议员（议员共三十九人，自治学社占三十三名）。张并任审判厅筹办处科长，兼提法公所科长、禁烟局文案等差使^③。

辛亥武昌首义，自治学社获悉后，急谋响应。张百麟与周培艺等分别派人联络会党、新军、巡防营和陆军小学学生。他们一面筹划组织乡兵，吸收会党分子编练成军，准备发动。但同时又希望与宪政预备会分子谋取妥协，避免流血。云南独立消息传来，风声更紧。宪政党侦知自治学社的秘密活动，向巡抚沈瑜庆告密，并建议由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速率防军兼程来省，沈纳其议。但张百麟等人为了实现“不流血革命”，仍主动与宪政党人协商合作，宪政党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协力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张百麟与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蔡嶽、周培艺等冒死入巡抚署，开陈意见，要求和平独立，但沈瑜庆拒不接受。3日，官僚政客组织耆老会的郭子华向沈瑜庆献策，谓采取半独立形式，借以拖延时间，候刘显世兵到，然后按册逮捕革命党人。沈立即应允，并成立保安营，发给枪械，准备应变。当天下午，郭子华在谘议局召开自保筹备会，张百麟等应邀出席。任可澄发表演说，阐明自保会宗旨是“不保清，不革命，只图自保”，还宣布次日开成立大会，请沈瑜庆讲话。张百麟识破宪政党搞假独立的骗局，决心夺取政权。当晚检查起义计划准备情况后，下达了4日凌晨起

事的命令。这时，陆军小学首先举起义旗。沈瑜庆得报，宣布戒严，派兵包围陆小。张百麟闻陆小已发动，立即派人携弹药前往接济，又派人赴新军军营联络。新军即鸣号集合，教官杨苾诚表示赞成革命。沈瑜庆迫于形势，不得不“通飭文武官员正式离职，交政于民”^④。

4日黎明，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各方代表一致推张百麟为都督，他坚辞不就，乃推杨苾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政务，推张百麟任院长，任可澄为副。时刘显世已率兵行至中途，闻军政府成立，即上书赞成革命。张百麟采取“共执政权，尽弛敌意”^⑤的方针，任命刘显世以枢密院军事股长的要职，而没有采取措施加强革命派的地位。时军政府正值草创时期，人心未安。张亲率兵巡视各地，宣传军政府法令，解决官绅纠纷，平息金融风潮，维持纸币信用，安定市面；并安抚郎岱、镇宁间扁担山布依族十多万人，优礼其首领，赠送自治学社徽章，以示亲密无间。经过一番努力，局面暂时缓和下来。

张百麟积极工作，声望日高，愈为敌党所嫉。任可澄、刘显世害怕三个月后军政府改组时张正位都督，因而阴谋越急。他们迫使杨苾诚率兵离省北伐；并电促张百麟速归，因为任可澄等已经勾结了滇军唐继尧来黔扑灭自治党人。1912年1月29日，张返贵阳，觉察宪政党人的阴谋迹象，采取消极的态度，宣布辞职。2月2日，宪政党人等杀害了负责省城治安的自治学社领袖黄泽霖，同时派出刺杀队攻入张百麟住宅，张闻枪声，急避上屋顶。南路巡防统领陈守廉闻警赶来，护张往见赵德全，请发兵讨贼。赵已中离间，心存观望，劝张暂往外省，待

疏通后再迎回省。张愤而离去，退至安顺。本欲设行营讨贼，闻任、刘勾结滇军，恐滇军到来以贵州为战场，殃及人民，乃作罢。及退至贞丰，又受刘显世堂兄刘显潜袭击，幸为陈守廉兵击败。张百麟率陈部往广西百色，无所依据，不得已乃资遣官兵，带领陈守廉等数人经香港到上海。旅沪黔人谴责张百麟“招哥老，失黔疆”，拒绝为其引见孙中山、黄兴。经过一番激辩，平刚才引他去谒见孙、黄，陈述黔变经过。

是年5月，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曾以浙江省长职位诱张百麟，张未接受^①。张约贵州逃亡在外的同志，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创办《惧报》，佐编《民权报》，继续反对唐继尧、刘显世等。

8月，张百麟参加国民党，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胜利。其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擅借外债，国人大愤，张曾赴京请国会制裁。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形势恶劣，仍返上海。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张百麟一度任秘书长，运动隶属袁世凯的军队反正，未能成功。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百麟出任内务部参事，兼高等警官学校副校长。1917年7月，黎元洪被迫下台，张随即离去，再回上海。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张百麟为司法部长。张因病未行，在沪撰《约法战争纪要》一书，带病完稿。1919年病卒于上海。

注：

① 根据贵州法政学堂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上报学生名册（贵州省档案

馆藏)载,张百麟当时是二十九岁,应是清光绪四年生。又据胡刚《自治学社与哥老会》一文,说张百麟在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二十三岁,应是清光绪五年生。本文以名册为准。

- ②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6)第464页。
- ③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71页。
- ④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1页。
- ⑤ 同②,第464页。
- ⑥ 王宇高:《张百麟传》,《国史馆馆刊》第1卷4号(1948年)。

张 开 儒

孙代兴

张开儒，字藻林，云南巧家人，1869年6月1日（清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一个小商贩家中。十岁入塾读书。

1885年，张开儒欲考秀才，当地豪绅阻挠他应考，他被迫叩头求情，并从伯父家借田契一张，表明他是家有田产并交纳皇粮的读书人，方获准参加“院试”。中秀才后，他在家设馆教书，受当地大地主甘氏家族殴打凌辱，被迫离乡背井，在亲友资助下，于1901年长途跋涉到昆明。

张开儒到昆明后，举目无亲，得到五华书院山长罗瑞图的同情，进了五华书院，是院中最贫困而又最勤奋的学生。时值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张“见所习文艺，无裨世用，慨然入武备学堂，习兵学”^①。1904年秋，他和李根源、唐继尧等被选送日本学陆军，先后入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肄业。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同盟会，张开儒即入会为同盟会员，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思潮熏陶下，他热心参加民主革命活动，积极参加《民报》、《云南》等革命刊物的发行工作。

1908年冬，张开儒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和提调。张在讲武堂期间，积极从事同盟会革命活动，深入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

1911年10月30日，昆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辛亥重九起义”。张开儒奉起义司令部之命，率领讲武堂学生打开小西门，迎起义新军七十四标罗佩金部入城，并率学生占领总督署西辕门附近地带，配合七十四标围攻督署，擒巡警道郭灿，兵备总办王振畿。“重九起义”成功后，云南都督府于11月中旬组成“援蜀军”两个梯团入川，张开儒被派任第一梯团副梯团长兼联队（团）长。援蜀滇军进入四川时，四川的革命政权尚未统一，各地反清“同志军”互不统属，哥老会武装和土匪乘机蜂起。张开儒奉命率领邓泰中大队和机关枪队，围攻叙州（宜宾）地区的“同志军”，进驻五通桥^②。

1912年5月，张开儒随援蜀滇军撤回云南。由于他在援蜀进军途中擅自撤换了恩安（今昭通）、永善两县县令，并下令收缴援川巡按使郭灿、副使陈先源的关防，派兵搜捕郭、陈二人，云南都督蔡锷将其罢职。1913年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张被任命为云南陆军迤南边防第一旅上校旅长，驻防滇东南边境的开化（今文山）。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张开儒即曾考虑到袁世凯素有野心。有可能帝制自为^③。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后，迤南边防第一旅被编为云南护国军第二军第一梯团，张为梯团长，在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指挥下，向广西、广东进军。

1916年2月，张开儒部尚在集结待命之际，“滇黔招抚使”龙觐光（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广惠镇守使）从广东率军进袭云南，越过桂、滇边境，窜至滇东南。张指挥所部于3月上旬在滇、桂接界的剥隘、皈朝、龙潭一线，对两倍于护国军的龙

军李文富、黄恩锡两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护国第二军第二梯团方声涛部的配合下，终于将龙军主力李文富旅全部击溃。护国第二军乘胜进攻广西百色的龙觐光军大本营，在广西将军陆荣廷配合下，将龙觐光军全部缴械。

护国第二军奉命继续东进，计划经湘、粤北伐。死心塌地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广东将军龙济光，虽已被迫于4月6日宣布“独立”，但顽固阻挠护国军进军广东。张开儒部奉命沿粤汉铁路北进，进至韶关，遇到龙济光军朱福全部的抵抗，张指挥炮兵连进击韶关，龙军一触即溃。张部控制了韶关和粤北地区。6月，袁世凯身死，护国战争结束，张奉命驻防韶关。同年冬，护国第二军改编为滇军第三、四两师，张开儒任第三师师长，并被任命为南（雄）韶（州）连（县）镇守使。

1917年6月以后，孙中山号召进行“护法”斗争，张开儒积极响应，连发通电主张西南各省“以全力维护国会”^④，宜召集国会议员到广东开非常紧急会议，“组织最高等之军事机关，推举讨逆军大元帅”^⑤。张的通电，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一方面受北洋军阀的严重威胁，另方面受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抵制和排斥。护法所依靠的武装力量，除二十余艘舰艇外，其陆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实只张、方两师可资号召”^⑥。8月，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张开儒由非常国会选举，经孙中山特任为军政府陆军部

总长。他对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军阀本质认识不足，把完善和加强军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唐继尧身上。唐继尧、陆荣廷不就元帅职，他反复向唐致电恳求，严词规劝，指出：“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利之争，何有此徘徊携贰之行？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⑦当陆、唐等人企图用“西南各省联合会”取代护法军政府时，张从维护军政府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联合会”，他密电唐继尧说：“绝不能再立一非法之联体机关，以自纷扰。”^⑧

1917年底和1918年初，广东督军莫荣新（桂系军阀）以武力威胁军政府，军政府处于南、北军阀的围困之中。张开儒临危不惧，毅然于1918年2月6日通电宣布就军政府陆军总长职。接着又宣布：“国会及军政府在此，不能不有重兵镇慑。开儒窃以国会之所在，即民国正统之所在，故屯兵于此，以资保护。”^⑨

张开儒坚定地捍卫护法军政府的行动，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4月1日给他的复电中说：“来电读竟，令人起舞，老同志究非别人所及也。”^⑩莫荣新则极其仇视张开儒，电唐继尧说，张“自任军政府陆军总长以来，举动莫测，不惟反对协和（李烈钧字），侮蔑荣新，即我公（指唐继尧）命令，亦视若弁髦”^⑪。张曾派兵监督广东地方当局向军政府提供财政经费，桂系和政学系即攻击他说：“藻林举动如此，势且激成大变。”^⑫

桂系军阀为了长期割据两广，加紧和直系军阀勾结，打击、排斥孙中山，瓦解护法军政府及其所依靠的滇军，2至5月间，一再密电唐继尧，攻击张开儒“在在与粤挑衅”，“务恳将

藻林问题，迅为处置妥协”^⑤，同时又把政学系的李根源请到广东取代张开儒。唐继尧接密电后，乃改组驻粤滇军，撤去张的师长职务，撤销由张兼任军长的“靖国军”第五军建制，合三、四两师为第六军，任命李根源为军长，统一指挥驻粤滇军。

正当滇、桂军阀宣布撤去张开儒的军职之际，北洋军由赣南潜越大庾岭，偷袭粤北南雄等地。张开儒所部驻南雄、韶关、连县等地，兵力分散，应援不及，致使南雄失守。莫荣新、李根源等人乘机诬陷张开儒临敌撤退，并假唐继尧之命，派李天保强行接管张部第三师。5月12日，张从韶关返回广州，莫荣新派兵包围广州黄沙车站，将张逮捕，关押于督署所在地观音山。同时，莫荣新又逮捕张的助手、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并立即加以枪杀。军阀、政客们在瓦解护法军政府武装力量的同时，操纵非常国会改组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职离粤，使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到挫折。

1920年10月，粤军陈炯明部奉孙中山命从闽南回师广东，驱逐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军队。11月，张开儒从莫荣新的囚禁中获释。驻粤滇军重新组成“护法滇军”三个旅，张开儒为总司令。但是，陈炯明部突然袭击并解除了“护法滇军”的武装，张开儒又失去了兵权。

1921年2月，驻川滇军在四川和川军混战失败后，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师回云南驱逐唐继尧，控制了云南军政权力。张开儒返回昆明活动。不久，孙中山委任顾品珍为“云南北伐军”总司令，张开儒为副总司令。1922年3月，唐继尧率军回云南争夺统治权，顾品珍战死，张开儒即率领顾部滇军经贵州转移到广西柳州、芦寨一带。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

号召讨伐陈炯明，并派邹鲁联络张开儒部滇军。张百麟响应孙中山号召，率领滇军向广东进军。进至广西桂平时，滇军内部发生争权斗争，旅长杨希闵、杨如轩、范石生等人夺取了张开儒的总司令职权，通电宣布张“解职就医”，推举金汉鼎为总司令，金未到任以前，由杨希闵代理。张受排挤后，颇为消沉，意欲引退，孙中山及时给予鼓励，复函称：“国难未已，兄何能退，容当仍共天下事也。”^④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张开儒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同年10月，李烈钧回到广州任参谋总长，孙中山委派张开儒为大本营参军长，仍为陆军上将衔。但此时张身体多病，革命意志渐趋消沉，遂带家眷去澳门闲居养病。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被推翻，并于同年5月死去，张开儒即于当年秋天由澳门回到昆明定居。执掌了云南军政大权的龙云，屡邀张出山，张都谢绝，最后只挂了一个云南省政府高等顾问的空衔。此后，张开儒闭门潜修佛典，吃斋拜佛。1935年7月7日病逝于昆明。

注：

-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张君开儒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305—306页。
- ② 周钟岳编纂、蔡锷订正：《云南光复纪要·援蜀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6—247页。
- ③ 由云龙：《护国史稿·张开儒传》，昆明启文印刷所1950年版第63页。
- ④ 张开儒1917年6月12日通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4辑第28页。
- ⑤ 《张开儒通电》(1917年7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

书处档案》。

- ⑥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41页。
- ⑦ 《张开儒再劝唐继尧就元帅职密电》（1918年2月25日），同⑤。
- ⑧ 《张开儒为反对联合会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1月20），同⑤。
- ⑨ 《张开儒为保卫国会及军政府致唐继尧等电》（1918年3月15日），同⑤。
- ⑩ 《孙中山复张开儒盼出师攻闽电》（1918年4月1日），张其成编《国父全书》第695页。
- ⑪ 《莫荣新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5月5日），同⑤。
- ⑫ 《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19日），同⑤。
- ⑬ 《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25日），同⑤。
- ⑭ 《孙中山复张开儒勉勿引退并告艰难情况函》（1923年2月9日），同⑩，第834页。

吕 志 伊

叶祖荫

吕志伊字天民，1881年5月17日（清光绪七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云南思茅。其父吕佐侯“以耕读世其家”。吕志伊“幼承庭训，习闻春秋内夏外夷之大义”^①。十五岁起先后就读于普洱宏远书院、昆明经正书院。1900年乡试中举。他曾赋诗立志：“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②

1904年，吕志伊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后肄业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在日本学习研究近代各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接触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又参加集会，讨论时事，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志同道合之士，民主革命思想日渐发展。1905年7月30日，吕志伊参加了同盟会筹备会议。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他被选为评议部评议。1906年初，被推举为同盟会云南分会主盟人，办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增刊《天讨》中，他以“金马”的笔名发表了《云南讨满洲檄》一文。同年4月，他参与创办出版了《云南》杂志，以“侠少”为笔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了《云南之将来》、《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滇缅疆界谈判》、《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国民主义》、《国民的国家》、《国会问题真相》等文章，介绍近代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学说，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云

南的侵略及清政府腐败的内外政策，批驳宣扬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论调，鼓吹进行反清革命。

1908年以后，吕志伊的主要活动转入了同盟会所领导的一系列反清实际斗争。当年4月，河口起义爆发，他即与杨振鸿、赵伸、李根源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云南独立大会”，揭露清政府密议借驻越法兵镇压革命的阴谋，宣布全滇人民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并于会后派杨振鸿、黄毓英率一批滇籍同盟会员返滇助战。这次集会在当时颇有影响。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宣布取消他及杨振鸿、赵伸等人的官费，予以通缉。年底，他离日赴新加坡谒孙中山，后抵仰光，与居正、杨振鸿等创办同盟会仰光分会机关报《光华日报》。他曾以光绪、慈禧毙命，宣统及摄政王载沣上台，保皇党人为之欢欣鼓舞的内容，在该报撰一联语：“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发起征对，一时轰动，连美洲华侨报刊也予以转载。他在对广大华侨进行宣传组织的同时，经常与在滇西坚持反清活动的黄毓英等革命党人联系，并积极购买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起义。1910年冬，他电约黄兴来缅商议滇西起义事宜。正在这时，英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云南片马，革命党人从国外秘密运送武器入滇的行动受到挫折。黄兴随即和他商议决定，滇西起义暂缓，以便集中同盟会人力财力，先在广东发动大规模起义。不久，吕志伊赴香港。1911年4月，他参加广州起义，担任撰拟法令、檄文和保管印信、密件等工作。起义失败后，他到上海，担任《民立报》撰述，同时加入“南社”，进行革命的文学活动。7月，他参加发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举为候补干事。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筹划在武汉地区发动起义，推吕志

伊赴香港请黄兴回国主持其事。9月29日，他在香港和黄兴洽谈后，黄兴同意即赴武汉，并要南方各省同时发动，互为声援。吕又向云南的同志传达了黄兴的意见，嘱加速起义的准备。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赶赴云南。刚入滇境，昆明革命党人已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

云南光复后，吕志伊担任都督府参议，旋即被推举为云南代表，赴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被任命为司法部次长。当时，司法部总长伍廷芳在上海担任议和代表，司法部事务悉由吕志伊代理主持。在短短三个月中，他协助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文告。4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吕志伊亦随同赴沪，任同盟会上海分会机关部副部长、《民国新闻》总编辑。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即奉孙中山之命，赴南洋及缅甸筹设国民党海外各支分部。由于他在海外华侨中有一定影响，蔡锷曾请他广劝华侨集资开发云南实业。1913年初，他被选为国会参议员，旋到北京。“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南下上海从事反袁活动，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初，他取得孙中山同意，回云南运动军队，发动反袁斗争。这时，云南巡按使署已接到袁世凯“统率办事处”发来“拿办党首吕志伊就地正法”的密电，乃将他扣押，幸被滇军团长邓泰中、杨蓁救出。以后，他仍继续在滇军中进行反袁活动，与各级军官多次秘密集会，并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党员。9月，他与掌握滇军驻昆部队实际兵权的一部分中高级军官，商议在云南发动讨袁的领导、筹款、时机及出兵计划等重大问题，并积极开展争取云南都督唐继尧反袁的活动。唐被迫同意反袁后，10月派吕志

伊赴南洋，约请逃居海外的革命党人入滇相助。吕在海外向华侨宣传反袁，并募集了十余万元。同时，寄函在日本的孙中山报告云南情况。不久，李烈钧、方声涛及蔡锷等先后到昆明，12月25日云南通电独立，发动“护国运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为总统，重开国会，吕志伊曾到北京参加会议。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树起护法旗帜。吕志伊随到广州，参加了国会非常会议。1918年8月，由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回上海致力于整理党务，吕志伊到沪协助。1920年8月，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吕志伊被任为司法部次长，并于次年1月与张继一起筹设了中国国民党驻粤特设办事处。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吕志伊又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8月孙中山再次离粤，9月在上海开始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吕志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会员，后被任为国民党中央参议。1923年2月，滇桂联军驱逐了陈炯明，孙中山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4月，吕志伊被任命为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6月，曹锟贿选总统，吕志伊以国会参议员身份坚决反对，曾受其他拒贿议员推举，与章士钊、褚辅成、田桐赴沪，筹备召开国会两院会议。以后，拒贿议员陆续南下，与在北京的受贿议员形成鲜明对立，得到了全国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吕志伊保持了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追随于孙中山左右,赞助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憧憬在中国建立“劳力劳心工并读,互助互敬生不已,各尽所能取所需,不劳而食斯可耻”^③的崭新制度。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广州大元帅府的领导权由胡汉民等主持。6月,吕志伊被免去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本兼各职,从此离开了政坛。1928年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他担任云南省党务指导员、省府委员、建设厅长等职,他均坚辞不就。同年冬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以病老疏散回到昆明。1940年3月4日,因病在昆明逝世。

注:

- ①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3第1页。
- ②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1第1页。
- ③ 吕志伊:《偶得诗集》卷4第4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
- ② 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
- ③ 李文汉:《云南护国亲历记》。

李 德 全

郭 洛

李德全，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家庭。父亲当过运河码头工人。她出生刚三个月，即受洗礼入教。1904年由教会资助进通州私立富育小学，1911年升入北京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15年入北京私立协和女子大学（即燕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

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李德全都是学生领袖，曾被选为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会长，是校内外宗教团体的学生代表。她具有讲演的口才，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巴黎传来一句污辱中国人的话，说“中国不值二毛五”，她十分气愤，就和其他同学一起写了大幅抗议书：“中国不值二毛五，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值0.0000000005！”摊在美国校长的桌面上。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是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母校贝满女中，担任代数、西洋史等课程的教师。1922年1月，她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1924年初，李德全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冯玉祥。当时，冯在京担任陆军检阅使职务，夫人刘氏于1923年12月病逝。一时军政界人物争欲为他作媒，大总统曹锟亦欲将女儿许配于

他。但冯选择了李德全，两人于1924年2月24日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婚后，李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兼顾冯玉祥所属西北军官佐眷属的教育及伤兵的慰劳等事宜。冯对部下要求极为严格，犯了错误的人必加严惩，李往往为之缓颊，所以冯部官兵很敬重她。李生活俭朴，平易近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并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当孙中山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时，冯玉祥因北京政局为奉皖军阀所把持，已辞去陆军检阅使职务，在京西天台山休养，由李德全代表冯到北京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时，李又带着冯玉祥的亲笔信前往看望。孙送冯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由李带回，发给国民军官兵当作教材。李曾亲自为国民军教导团讲解三民主义。

1926年初，奉、直、鲁、晋诸系军阀联合围攻国民军，冯玉祥下野出国赴苏联访问，李德全随往，于1926年5月9日抵莫斯科。这次访问，对李德全的思想影响很大，她对苏联男女平等，人人自食其力，很为赞赏。她随冯玉祥受到苏联领导人和第三国际负责人的接见，并看望了列宁的夫人和妹妹。她在苏联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冯玉祥于8月17日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李德全继续留在苏联参观访问，直到1927年7月才回国。有人说她“游俄归来，信仰忽移”^①，“赤化”了冯玉祥。1929年冯反蒋失败后，带着李德全和女儿入晋，被阎锡山囚禁于五台县建安村。1930年阎联冯倒蒋，李德全被留在太原作为人质。

冯玉祥在1930年中原大战和1933年察哈尔抗日失败后，两度退隐泰山读书，邀请许多学者为他讲课，李德全经常随同听课，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并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

李德全早年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之一，是人民缺乏文化，竭力从事普及教育工作。1925年她曾在北京创办求知中学，附设小学和幼儿园，自任董事长。在泰山期间，李德全变卖了结婚时的首饰，创办了十五所小学，使附近的农民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1936年1月冯玉祥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德全随冯离泰山到南京，投身于妇女运动。5月2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妇女代表名额。李德全带头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要求在按区域、职业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规定男女代表的比例，妇女至少应占三分之一。先曾持拒绝态度的张继等被迫答应代为转达^②。李德全在一次会上演讲说：“女子结婚以后，即从事家庭琐事；而男子仍在社会工作，时时有进步。这样女子如何能和男子竞争呢？”^③为了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她联络南京知识界妇女组织“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担任该会的常务委员。她们开展学习和研究活动，开办俄文补习班，举行演讲会，组织参观工厂、天文台，学习驾驶汽车和实弹射击等，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上层妇女的联系和团结。李德全还曾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救国会领袖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全团结各界妇女，投入支援抗战前线的慰劳、救护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后，李德全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副理事长。国民政府迁

到重庆后，她与邓颖超、曹孟君、刘清扬等人时相往还，继续从事妇女和儿童工作。至1939年秋，战时儿童保育会已设有保育院四十六所，收容儿童二万余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德全联络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被推选为主席。该会广泛团结各阶层妇女，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是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李德全代表冯玉祥到机场欢迎。她与刘王立明联名致电美国教会联合会主席波尔夫人，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李被选为军事考察团成员。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重庆各界人士和有关团体，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李被选为理事。政协会议进行期间，“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召集各界民众大会，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但她不畏强暴，出席主持第五次民众大会，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怒揭露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罪行。2月10日，“协进会”与中国妇女联谊会等二十余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李德全为大会总主席。国民党特务又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李与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等六十多人被打伤。李于当天下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在此期间，她与冯玉祥的行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为此，她见到蒋介石时，当面提出了抗议。

1946年9月，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率考察小组赴美，李德全随行。在沪候船出国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

登门看望他们，邓颖超并委托李代表她出席于10月中旬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李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愤怒控诉了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提出“联合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及“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提案。

李德全和冯玉祥在美国的两年中，到处公开演讲，谴责蒋介石集团屠杀人民的罪行，反对美国政府援蒋，要求撤退在华美军。蒋介石为此十分恼怒，下令冯玉祥回国。当时李德全在柏克莱写信给在纽约的冯玉祥说：“老蒋召你回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④蒋介石召冯回国不成，便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于1947年12月撤销冯的“考察水利专使”职务，断绝其经济来源，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境。李担任旅美华侨开办的国语班教员，以薪给补贴家用。在美国期间，由冯口述，李记录，写成《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寄给在香港的翦伯赞出版。

1948年7月31日，李德全随冯玉祥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美，绕道苏联回国。9月1日，当“胜利号”航行至黑海北岸敖德萨附近时，突然发生火灾，冯玉祥及其十九岁的女儿冯晓达遇难身亡。李受伤脱险后，强忍丧失丈夫和爱女的悲痛，抱着冯玉祥的骨灰盒，于11月回到祖国东北解放区。她在哈尔滨发表广播演说，敦促原西北军官兵弃暗投明，起义反蒋。

1949年2月，李德全到达北平，把冯玉祥遗留的房产无偿地交给国家。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3月，她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妇联副

主席；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德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以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各项工作。1958年12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72年4月23日，李德全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张之江先生致冯玉祥夫人函》，《女铎》第18卷第5册（1929年10月）。
- ② 《世界日报》1936年7月17日。
- ③ 先，见《从群众中成长的——李德全女士》，《现代妇女》第7卷第1期（1946年1月）。
- ④ 见冯洪达、余华心：《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邓 宝 珊

王 劲

邓宝珊，名瑜，甘肃天水人，生于1894年1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父亲邓尚贤原是一位穷书生，后改习商。邓宝珊童年读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生活贫困，即辍学到兰州谋生，在一家制造水烟的烟房当学徒约一年半。时值湖北新军协统杨缵绪部调驻新疆伊犁，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报名应募入伍，旋被提升为司书。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打下了自学的基础。后来戎马之间不废读书，被人称为“儒将”。

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邓的同乡）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于7月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新疆，11月28日发生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因准备仓促旋遭失败。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推冯特民、李辅黄等为指挥。时已升任署协统的杨缵绪这时也参加起义。邓宝珊当时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了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的局面，1月10日正式组成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2月初，邓又随杨缵绪所率部队开往伊犁以东，在精河、沙泉子一带与清军激战，战斗中指挥不幸阵亡，邓宝珊

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坚守住了阵地。接着他又率队绕道包抄敌左翼后路，终将敌军一举击溃。此役结束，邓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被送到将弁学堂学习。

新疆光复后，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1913年，杨增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肆残杀革命党人，邓宝珊亦在被通缉之列。邓潜往宁远的俄国领事馆，取得护照，假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1914年邓宝珊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等人相聚于华山，组成“共学团”，结识了孙岳、何遂、续西峰、李岐山、续范亭、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等人。他们以“讲学”为名，共同策划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行动，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一度进攻山西，遭到失败。1916年5月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取代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邓宝珊在陈部胡景翼团为连长。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掌握大权，陈树藩投靠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又发动“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陕西民党起而响应。9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靖国军，与陈树藩相对抗。靖国军分为六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第四路之下。

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直系控制下北洋政府的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该师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邓对胡接受改编是不同意的，1922年3、4月间，他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希望邓“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

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①。

同年4月直奉之战爆发，胡景翼奉命出潼关攻打与奉系有联系的河南军阀赵倜。6月，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大破赵倜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景翼联络冯玉祥、孙岳。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接着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与此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并依据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冯要求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人帮助训练国民军。邓宝珊对此皆极表赞成。这时他任国民二军七师师长。

1925年初，胡景翼到河南任督办，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在河南击溃陕西督军刘镇华之憨玉琨部。此后邓驻陕县，在所部开办军官传习所，以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部担任秘书长，另外聘用了三位苏联顾问。不久，奉系与国民军之间发生矛盾。8月，邓宝珊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参加国民军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任总指挥。邓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②。邓率国民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第二师一旅，并高桂滋一个团，会同三军一部，攻占了马厂，迫使奉系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逃往山东。在激战中，邓亦负伤。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邓为帮办。

1926年春，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先后放弃开封、郑州、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由岳维峻统率的国民

二军^③，在河南被吴佩孚军战败，溃退陕西。邓宝珊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二军余部。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广东北伐军。邓宝珊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采纳了李大钊来函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主张^④，挥师入陕。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10月下旬，援陕部队将领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邓建议以迂回战术切断刘镇华军退路。结果刘军在内外夹击下溃败，被围八个月的西安于11月27日解围。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战时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合作和支持，与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邓宝珊时为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属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第二集团军经商洛、荆紫关，于5月底到达河南。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岳维峻率南路军也投靠了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率部撤至驻马店。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部队往上海暂住，并于此时由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

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热心予以掩护和帮助。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4月，邓宝珊应冯玉祥之邀回河南，被派往许昌协助樊鍾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于作战中被蒋军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投蒋，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11月抵上海，住法租界，声言隐退，秘密从事反蒋活动。国民党特务曾勾结租界巡捕房将邓逮捕，拟引渡解往南京，后经友人保释出狱。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邓宝珊于1932年3月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当时甘肃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与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协力整顿省政，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邻省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代理甘肃省主席一年多，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1934年，驻甘行署撤销，邓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宝珊由衷拥护，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域时，邓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消极敷衍，新一军所部始终未与红军接火。

1937年抗战军兴，邓宝珊奉命驰赴前线。始任二十一军团

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陕西榆林，直至抗战胜利。整个抗战时期，邓与延安往还频繁。在蒋介石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中，邓均表示沉默。其间，他还数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晤谈。1943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蒋电召去重庆。经过延安时，毛泽东与邓晤谈，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邓给予合作。7月，邓经过西安时遇周恩来，又进行了晤谈。邓到重庆，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深感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时直率向蒋进言：“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⑥邓返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致邓信中又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⑦

1946年2月，邓宝珊参加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即住在三原家中，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避免卷入内战漩涡。后在胡宗南再三催促下返回。邓到榆林后，相继发生一系列事件：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二十二军李含芳团在高家堡被解放军歼灭。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调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刘绍庭^⑧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至榆林见邓，要邓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⑨

1948年8月，时已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邀邓宝

珊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为了及早达成协议，傅作义于12月下旬派董其武到绥远陕坝接邓到北平主持会谈。1949年1月13日，邓代表傅作义至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经过五天的协商，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全权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北平的一家报纸称邓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原信影印件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插页。
- ② 通电全文见《国民军革命史》第88页。
- ③ 胡景翼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国民二军由岳维峻继任军长。
- ④ 见1981年6月15日《陕西日报》连载文章：《创业三秦》。
- ⑤ 见刘伯坚《家书》，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⑥ 石佩久：《邓宝珊在榆林》，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 ⑦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 ⑧ 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曾任井岳秀的参议，抗战时为邓宝珊派驻绥德的办事处主任，同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刘经常往返于延安、榆林之间，传达信件和意见。
- ⑨ 甄载明：《榆林两次战役及和平解放经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陈 绍 宽

陈贞寿

陈绍宽，字厚甫，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生于1889年10月7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其父陈伊黎，在晚清海军中任中士管轮。陈绍宽童年在乡劳动，十岁入私塾读书，十五岁考入福州格致书院，十七岁入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平日以勤学见称，成绩优异，深得教习器重。

1908年，陈绍宽在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通济”舰见习，授海军少尉。1911年任“联鲸”炮艇二副兼教习，升海军中尉。民国成立后，充“镜清”练习舰驾驶大副，授海军上尉。1913年，他先后任“江亨”舰副长、“肇和”舰驾驶大副、“应瑞”舰航海正、“湖鹏”鱼雷艇艇长等职。翌年，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副官，升海军少校。

1915年春，陈绍宽被派往美国学习，时欧战已发生。次年他被派赴欧洲观战。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后，他奉派赴英调查英国战时实用飞机、潜艇状况。次年春，又赴法、意调查海军。5月，他参加英国海军潜艇队作战，受到英国海军当局的赏识，战后英政府特赠他欧战纪念勋章。

1918年秋，陈绍宽任驻英使馆中校海军武官兼留学生监督。翌年2月兼任巴黎和议中国代表团海军委员，4月参加伦敦国际海道会议。10月，陈卸任回国，就任“通济”练习舰

舰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陈绍宽以助直有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授海军上校。次年调任“应瑞”舰长，升海军少将。1926年9月升任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驻泊南京，指挥长江各舰艇。不久，北伐军推进到江西，陈曾派舰溯江而上，协助孙传芳与北伐军作战，并派舰供孙传芳设统帅部之用。北伐军逼近上海时，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已暗中联络北伐军，曾征求陈的意见，陈表示反对。后来，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在福建首先发难，陈迫于形势，才跟随倒戈。1927年4月10日，他率舰截击孙传芳部，将渡江孙部两团悉数歼灭，为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立了一功。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6月，唐生智回师武汉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令陈绍宽率舰封锁长江上游马当等处，昼夜梭巡。8月底，投靠奉系的孙传芳部渡江反扑，先后占栖霞山、龙潭时，陈绍宽率舰在龙潭、栖霞山间沿江防守，配合蒋桂军力捣孙部阵地，并率舰截断其归路。10月，李宗仁等下令讨伐唐生智，陈绍宽奉派率“楚有”等舰西进攻唐军，于次年1月攻克城陵矶，占领岳州，收降“楚振”舰，奠定了湖南的局面。

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设立海军署，委陈绍宽为署长，晋升中将。次年1月，蒋介石为削弱其他军阀的武力，在南京召开军事缩编会议，成立编遣委员会，3月设海军编遣办事处，陈为编遣委员会委员。他秉承蒋的意旨提出海军收支统一，人事统一，图并吞其它杂牌舰队。但是后来蒋介石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只做到形式上统一了番号，属奉系的第三舰队（原称渤海舰队）和粤系的第四舰队仍雄据一方，各自

为政。1929年3月，蒋桂之间因争夺两湖地盘发生战争，陈绍宽率“楚有”、“咸宁”两舰护送蒋介石赴武穴，先后攻破郝穴、马家寨、观音寺三道防线。蒋占领两湖后，任命陈兼湘鄂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湖南省政府委员。

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海军部正式成立，陈绍宽任政务次长兼代部务，次年又兼任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1932年1月，就任海军部长，晋升海军上将。1935年7月陈兼任国防会议委员，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3月作为副使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

陈绍宽居官廉洁。他在出任海军要职的几年中，对建设旧海军，争回祖国版图、测量权、引水权以及造就海军人才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旧中国从晚清到北洋军阀的覆灭，海军总吨位仅有三万多吨，陈任内新造和改造的大小舰艇三十艘，吨位增至五万多吨，添造了“宁海”、“平海”等新舰。他派军舰分段测绘我国江海领域，出版自己的出海图、航海指南等，不再向英国控制的海关购买出海图。1930年海军部正式接管淤澄水道测务，争回测量权，还接收东沙群岛灯塔等。对于引港业务，陈认为事关国家主权和军事机密，遂创设引港传习所，培植引水人才，逐步收回了引水权。

陈绍宽主持海军部工作后，把我国西沙群岛划为海军军事区域，派出海军人员管理。1931年底，法国殖民主义者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机，公然向我国照会声称七洲岛属越南政府，应注意越南对该岛之“先有权”。1932年3月，我国海军部会同外交部严辞驳斥，严正指出“七洲岛即华语所称西沙群岛，确属我国领土”^①，并指出：“民国二十年四月，香港远

东气象会议开议时，安南观象台台长法人勃鲁逊及徐家汇法国天文台主任劳积勋亦向我国代表声请，由中国建筑西沙观象台，依法律上之解释，该地为我国领土，毫无疑义。”^②陈指示海军部着手筹建气象台，于1936年在该岛建成，进一步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九一八”事变后，陈绍宽执行蒋介石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海陆空三军协同行动的立体战进攻上海，陈绍宽却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密令各舰队“应守镇静”^③。2月3日日舰炮击吴淞各地，中国海军均奉命“不准还击”。有一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三日之久，陈也未派舰前往袭击。高昌庙海军哨所在执行戒严任务时，对强闯我江防警界线的一艘日船下令停航未果，开枪击中其船长福田（重伤而死），日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向我方提出最后通牒，经双方秘密谈判，我国海军承诺赔偿抚恤费二万元了结。由于陈在淞沪抗战中按兵不动，受到了各方爱国人士的责难。1932年4月，李根源等四十二人在“国难会议”上指责海军各舰“除鸣礼炮外，别无其他效用”^④，要求把海军部及所属海军机关学校工厂一律取消，把海军高级负责人员一律罢斥，并要求冻结海军经费。陈对提案人反唇相讥，一时纷纭不休，后经国民党政府从中调处，不了了之。后来，又由于他打算聘请日本教官，创办海军大学，遭到“应瑞”舰长林元铨等人的联名控告，指控其把海军军事教育权委诸敌人。陈虽未因此而丢官，但说明在这段期间内他奉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是自堕其声誉的。

“七七”事变时，陈绍宽正在欧洲考察海军。中国抗战形

势既定，他立即迅速回国。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单薄，无法向优势的日本海军进行主动出击，他执行单纯防御战略，将长江舰艇集中于江阴附近，冀配合要塞阻遏敌舰深入，以拱卫京畿。他下令破除航行目标后，即以军舰、商轮、趸船以及民船、盐船等堵塞海道，实行封锁。日本侵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因江阴封锁，军舰暂时受阻，不能一鼓而下南京。但日军一面由陆路迂回，一面派大批飞机向守卫江阴封锁线的我国舰艇轰炸，不久就突破江阴阻塞线。南京沦陷后，陈又在马当构筑第二道阻塞线，以保卫武汉。这时，已没有什么军舰和商船可资阻塞，只在江流湍急的马当用“投石填江”的办法垒成一个个石塔，并施放水雷八百枚，添设武汉区炮队，安装拆下的舰炮十尊，以黄陵矶白浒山为阵地，阻碍敌舰前进。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迂回前进，逼近马当，要塞司令传令毁除炮件退却，第二道阻塞线拆除。敌攫取九江后，又窥伺田家镇，陈遂决定利用长江水流下趋之势，布放漂留水雷向敌舰展开游击战，并亲临葛店督战，但力量有限，收效不大。不久武汉陷落，陈随即撤至长沙，奉命负责封锁湘阴阻塞线。1940年6月，敌避开我雷区，迂回攻击宜昌，荆宜失陷，我残存的舰艇无法西上，相继被炸沉没。陈绍宽惨淡经营的海军全部被毁。

1938年1月，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部，改组为海军总司令部，陈为海军总司令，隶属军政部。何应钦、陈诚相继任军政部部长时，排除异己，对海军在经费、人事等方面处处掣肘，使陈绍宽奈何不得。1945年4月，陈奉命随宋子文赴纽约参加筹组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海军顾问。此时军委会下令撤销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及第二旅第三团番号，人员就地由军管区收

编。陈回国后呈请恢复，蒋介石非但不准，又令撤销第二旅番号。7月，陈绍宽以抗战胜利在望，请求拨款整修留在后方的舰艇，蒋介石未予批准。至此，陈一筹莫展，更加被轻视了。日本投降后，陈被派随何应钦赴南京参加9月3日受降典礼，但委派的海军总接收员却不是陈绍宽而是曾以鼎。陈气愤之余，自己命令曾国晟为接收海军大员。当时，日本长江舰队旗舰“安宅”号乘隙偷驶出吴淞口，被美国第七舰队截获押驶返沪，陈亲自接收，改名“安东”号；并接收日本“宇治”炮舰，改名为“长治”号。这时，八路军从烟台渡向辽东半岛，蒋介石命陈率“长治”号前往渤海堵截，陈借口舰只需要修理，拒不奉命。蒋遂决心去陈，于同年12月26日下令裁撤海军总司令部，免去陈海军总司令职，在军政部下设立海军处，由陈诚兼处长，负责接收海军总司令部，还派陆军中将冷欣为监交员，派陆军警卫连代替海军警卫站岗，迫陈去官。1946年1月31日，陈被迫交接。2月，陈闻蒋来南京的当日，决然离宁，归隐福建家乡。

陈绍宽解甲归田后，既无妻室，又无家产，孑然一身。虽然国民党政府仍给他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虚衔，他从未就职。他在乡种植蔬菜、花果，粗衣淡饭，悠游林下。解放战争后期，陈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并策动海军一部分官兵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福州解放前夕，他不顾蒋介石的胁迫，断然拒绝前往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绍宽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二、三届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1969年7月30日，陈绍宽在福州病逝。

注：

- ① 《海军大事记》，福建省政协翻印本第73页。
- ② 同①，第99页。
- ③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4236，目录号1，机关代号二。

其他参考资料：

- ① 曾国晟口述、林勋贻笔记：《我所知道的陈绍宽的资料》，（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 ②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510—512页。
- ③ 张日章：《旧海军的时代有关陈绍宽的一些轶事》（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马 鸿 宾

马启成

马鸿宾字子寅，回族，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生于 1884 年（清光绪十年）。其父马福祿，系清末武进士，1900 年率部入卫京师，与八国联军作战阵亡，被清廷追封为“振威将军”。

马鸿宾从十一岁起，即随侍叔父马福祥，得马福祥的不断提携而步步高升。1904 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时，他在镇台衙内当“戈什哈”（满语，即侍从武弁）；1908 年升任西宁矿务马队队官，并“兼理蒙番事宜”。时藏族的一支刚察部聚众抗官，马鸿宾“出而为之解和”。1910 年以炮兵营长随马福祥的“昭武军”由西宁移驻兰州。辛亥革命时马福祥通电拥护共和，1912 年底调任宁夏镇总兵，马鸿宾任管带，率部驻银川。

马氏叔侄初入宁夏时，北有后套卢占魁的“独立队”，南有陇东张九才起义民军，东有退居陕北的原宁夏民军高士秀部，各股势力互争雄长。马福祥以马鸿宾为后套统领，令他率部前往围剿。1915 年，马鸿宾率部在绥西科布尔地方消灭了哥老会头目弓占元、包永祥；在绥西东大沟、白家地击败后套“独立队”卢占魁、同心县金占魁和白彦公等股民军。在宁夏灵武南部崇兴寨伏击金占魁部时，杀俘戮尸，极为野蛮。时袁世凯政府批准马福祥的扩军报告，允许添募新兵七个营，号“甘肃新军”，以马鸿宾为司令兼炮兵营长。他再次击败卢占魁。后

又于1917年率新军在宁夏和绥西磴口一带追剿高士秀及冒充清裔称帝的达尔六吉，在贺兰山俘虏了达尔六吉以下二百多人。后北洋政府称马鸿宾“勇略无前，忠谋自备”，授予他陆军少将、勋五位。1921年初，马福祥离宁夏赴绥远任都统，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职，兼新军司令。这时他已羽翼丰满，所部步、骑十二个营，使署卫兵马队一个营。后又新扩编步兵七个营。

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不久，在开放烟禁问题上与甘督陆洪涛发生矛盾。民国初年，甘肃全境已禁绝种植鸦片。1921年陆洪涛督甘后，陇东、陇南开禁，遍种鸦片，波及宁夏。马鸿宾以开禁种烟影响军队粮饷，攻击陆洪涛。后经马福祥从中调解，马鸿宾便与陆洪涛同流合污，开放烟禁。为了欺骗舆论，掩人耳目，马鸿宾成立了所谓“宁夏道属禁烟罚办处”，专办“烟亩罚款事宜”，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实则乘机搜刮民财。1923年夏，马鸿宾以“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向宁夏所属八县提出借款八万元的要求，以低价折收鸦片烟，运往京、津地区高价出售，获得暴利三十余万元。宁夏回、汉人民在开放烟禁之下，备受剥削与毒害。

1925年春，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李鸣钟接替马福祥任绥远都统，要马福祥之子马鸿逵部从绥远退往甘、宁交界驻扎。但马鸿宾以宁夏为自己的地盘，拒马鸿逵入境，一时大有兵戎相见之势。后经马福祥向冯玉祥多次斡旋，冯准马鸿逵部扩编为第七师移驻宁夏金积、灵武，马鸿宾答应每月给两万元协饷，才暂时平息。

1926年9月，分据陇南、陇东的孔繁锦和张兆钾，不甘心于

国民军取得甘肃地盘，在吴佩孚的策动下，挑起了对国民军驻甘军副总司令刘郁芬的战争。马鸿宾为平息战火，在甘肃各界的支持下，发出召开“平番会议”的倡议，要求各方派出代表前来平番（甘肃永登县）谈判协商。后马鸿宾认为张兆钾对刘郁芬的条件苛刻，难以调解成功，“平番会议”一直没有开成。马从此投靠冯玉祥。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后，于1927年4月宣布取消“宁夏镇守使”建制，改马鸿宾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委马为师长。又委马为甘肃剿匪司令，调马部至甘肃宁县、正宁地区追剿张兆钾残部。起初马鸿宾不愿离开宁夏，因出动迟缓，曾受到冯的记过处分。后马率部配合陕西宋哲元部攻克泾阳，击溃张兆钾残部。9月，冯玉祥将马鸿宾部和郑大章的骑兵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由马任军长。但郑大章师远在河南，实际马鸿宾只有他的第二十二师。经过整顿和补充以后，分驻陕西西安、渭南、朝邑、大荔、韩城、郃阳等地。此时，陕西的原国民二军李云新部与河南的樊钟秀部联合倒冯，于1928年春、夏之际包围渭北各县。马鸿宾奉命进剿李云新部，他采取“以兵力迫之，围而不撤”、进行分化瓦解的办法，杀戮甚少而成功，为人所称道。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为稳定后方，派马鸿宾任宁夏主席。马抵宁后，先后收编了韩进禄、单有才、杨老二、马存良、杨子福等杂牌部队，遣散了不愿改编的马谦部一部分；在中宁迫走了苏玉生的部队，控制了宁夏局势。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马鸿宾便投靠了蒋介石。由于其叔马福祥多次斡旋，蒋介石也需要笼络西北回族军阀，

马鸿宾被委为暂编第七师师长、甘凉肃边防司令、甘肃省代理主席，不久又正式任主席。这期间，土著军阀各霸一方，横征暴敛；甘肃全省又连年大旱，民不聊生。马鸿宾由于裁减军饷，与驻兰州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的矛盾日趋尖锐；驻兰州国民党特派员马文车从中挑拨，雷中田于1931年8月25日发动政变，将马鸿宾软禁了三个月。后经调解，恢复自由，马即率部赴银川，企图主政宁夏，但国民党政府未予任命。1932年冬，马鸿宾为取得正式任命，致电蒋介石试探，佯称要当时在河南的马鸿逵前来宁夏任主席，自己愿率部去南京“拱卫中央”。不料弄巧成拙，蒋介石立即发表马鸿逵为宁夏主席，要马鸿宾把部队仍留宁夏，与马鸿逵留在河南的三十五师互换番号，前往河南任师长。马鸿宾大失所望，又企图阻止马鸿逵前来。1933年春，马鸿逵率部到宁夏任省主席，马鸿宾部移往金积、灵武一带驻扎。同年冬，蒋介石为使地方杂牌军在火拼中消灭，坐收渔利，一面命令驻绥远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道经宁夏赴青海任边区屯垦督办，一面又暗命马鸿逵、马鸿宾堵击孙殿英。1934年春，“二马”联合青海的马步芳，与孙部大战于银川以北地区，马鸿逵初战失利，后赖蒋介石协助，才将孙部驱出宁夏。

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徐海东部北上抗日，经过甘肃陇东地区。马鸿宾奉蒋介石命率第三十五师主力进行堵击，在固原的三关口、平凉马莲铺和泾川的王田宫等战斗中，遭到红二十五军沉重打击。1936年春，马部在甘肃西峰镇、曲子、环县、庆阳等地再次遭到红军西征部队的歼击，所属一〇五旅被歼，旅长冶成章等被俘。是年冬，红四方面军的前锋组成西

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连续苦战后遭到失败，“二马”派出许多支骑兵分队，从酒泉到武威，沿整个河西走廊，到处搜捕红军，不少人惨遭杀害。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西北划为第八战区，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以马鸿逵为集团军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1938年5月，马鸿宾又兼任绥西防守司令，进驻今内蒙临河一带。1939年冬，日军进犯绥西，马率部在狼山、乌拉山一带与日军激战；1940年冬，马部移驻内蒙伊克昭盟一带，其先头部队在包头附近曾多次与日军激战。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马鸿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原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接任。马部奉命多次向陕、甘解放区进犯，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在蒋介石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之时，1949年春、夏，马部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靖为司令，希图配合马步芳、马鸿逵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同年9月，在解放军强大攻势和起义政策的感召下，八十一军在中卫宣告起义，马鸿宾幡然改悔，也参加起义。

宁夏解放后，马鸿宾任宁夏军管会副主任、宁夏省副主席。1950年以后，历任甘肃省省长、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60年10月20日因患胃癌在兰州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马鸿逵：《马氏宗谱》，原件存宁夏公安局。
- ② 陈泌淮：《朔方道志》卷28。
- ③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35。
- ④ 《甘肃人物志》卷13。
- ⑤ 《中央周报》（总第171期），1931年9月14、10月4日。
- ⑥ 《甘肃民国日报》1930年8月号。
- ⑦ 卞得云：《伪三十五师1935年在陇东被红二十五军击败的回忆》，《宁夏文史资料选稿》第2期。

汤 寿 潜

郑云山

汤寿潜原名震，字蛰先（一作蛰仙），浙江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今属萧山县）人，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生。其父汤沛恩以塾师为业，同治年间曾在陕西武功、盩厔（今周至）等县充任幕僚。

汤寿潜少年时在家乡读书，“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①。青年时入山东巡抚张曜幕。1890年，他有感于国势江河日下，内外危机日深，作《危言》一书，共四卷，计四十篇。他在书中揭露了厘金、捐纳等制度及官场的种种弊端，对日益严重的外祸深感忧虑，提出了迁都长安，设置宰相职，成立类似谘询机构的“议院”，改革科举考试和任官用人制度，遣汰冗员，推广学校和西学，鼓励商民开发矿藏和修建铁路，提高关税税率，兴修水利，加强海军等主张，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2年汤寿潜得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894年散馆后以知县归部铨选，授安徽青阳知县，到任仅三月，即“以亲老不乐就养”而辞官回籍^②。

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维新运动。汤寿潜在籍曾赞助地方推行新政。因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先后向光绪帝推荐其《危言》一书，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两次传

令浙江巡抚廖寿丰，要汤入京，“由部带领引见”^③。汤适因母病，请求缓行。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汤北京之行因而中止，遂往金华，担任丽正书院山长，在师生中提倡讲求实用之学。

1903年，汤寿潜被擢为两淮盐运使，但他仍以养亲为由，不愿赴任。翌年，他就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并将书院改名龙门师范学堂，此即后来上海中学之前身。

从1905年起，汤寿潜参加了苏、浙两省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的斗争。先是，1898年11月，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订立《苏杭甬铁路草约》，夺取了该路的修筑权，但一直没有动工。1905年3、4月间，美商培兹到上海活动，又企图攫取浙赣铁路修筑权。汤寿潜与张元济、夏曾佑等浙籍士绅得知消息，立即发动旅沪浙江同乡起来抵制。同年7月，他们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决议集股自办全省铁路，并要求清政府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汤被举为公司总理。他们通过活动同乡京官、争取舆论支持等办法，终于使清政府允诺浙江全省铁路由商民集股自筑。清政府还授予汤寿潜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同时责成盛宣怀与英方交涉收回苏杭甬铁路路权。翌年，又批准江苏省绅商自办铁路。1907年，苏、浙两省绅商分头开工建筑苏杭之间的铁路。汤在主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兴筑浙江境内铁路期间，“刻苦经营，不辞劳苦，不支薪水”^④，博得绅商好评。

但是，英国银公司拒不接受废除《苏杭甬铁路草约》，反而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与银公司订立苏杭甬铁路正式合同。清政府既慑于舆情，又不敢得罪英

方，乃玩弄花招，将借款、办路“分为两事”，即由它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苏、浙两省铁路公司。1907年8月，清政府与英方商订苏杭甬铁路借款办法，拟借一百五十万英镑，规定总工程师聘用英人，银公司可派员查帐等等，表面上铁路仍由两省自造，实际上路权将控制于英国人之手。消息传出，两省绅商强烈反对。10月，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⑤；并成立“拒款会”，公举汤寿潜等人赴京，力争拒借英款，仍由商民自建。但清政府坚持卖路政策，1908年3月，与银公司订立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旋又相继任命经办出卖苏杭甬路权的盛宣怀和汪大燮为邮传部侍郎。汤寿潜即以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名义，致电军机处弹劾盛、汪，但不为清廷采纳。这时沪杭间铁路加紧施工，1909年8月全段竣工通车，经邮传部考核，其质量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同月，清政府为了破坏浙江争路运动，授汤云南按察使之职，以便把他调离浙江。随即邮传部通知浙江铁路公司改选总理。该公司股东会致电清政府反对调离汤，汤本人亦上京向摄政王载沣面陈不赴云南原因。不久，清政府改授汤为江西提学使，汤仍辞不赴任，留浙继续主持杭甬段铁路的施工。

1910年8月22日，因盛宣怀回任邮传部侍郎，汤寿潜再次致电清廷军机处，请罢黜盛宣怀。其时清廷正推行“借款筑路”政策，对汤的言行颇为不满，为压制争路运动，即于次日下令革除汤浙江铁路公司总理职，不准再干预路政。

汤寿潜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先是，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缓和舆情，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汤对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抱很大期望，即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苏、浙、闽绅商人士共二百多人，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声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⑥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张謇、汤寿潜被举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地立宪团体，积极敦促清廷早日实行立宪。1908年7月，他们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要求清政府“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⑦。但清政府不顾立宪派的请求，一再玩弄花招，拖延实行之期。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汤寿潜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联名致电载沣，请求改组这个皇族内阁，而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⑧。清廷置之不理。至此，汤对清政府完全失望。

辛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1月5日，革命党人光复杭州，浙江全省各地在几天之内相继光复。浙江革命党人鉴于当时在党人中缺少一位足资号令全局的人物，因而尽管汤寿潜并非革命党人，也从未赞同过革命活动，但因他早年写过《危言》，颇著声名，尤其在收回路权运动中出过力，受浙江绅商拥戴，杭州驻防旗营中人也对他有所信赖，故特派代表赴上海，邀当时息影沪上的汤来杭任都督，以尽早稳定浙江局势。汤初不愿回浙出任官职，经代表们力劝，乃于7日回杭州，即被举为浙江军政府首任正式都督。汤就任后，任命周承蒺为浙江水陆军总司令，朱瑞为协统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并发布命令，免征全省钱粮、厘金一年；派员慰问在杭外国人，等等。旋又批准朱瑞等人率领浙军，前去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之役。

随着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光复或独立，迫切需要成立中

央革命政权。11月11日，汤寿潜与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合通电起义各省，倡议召开各省代表会议。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汤即赴上海，与到沪各省代表共商成立临时政府和选举大元帅事。当时孙中山尚在国外，各省代表对于黄兴、黎元洪二人由谁出任大元帅一职争持不下，汤便“通情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⑨。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元月3日，孙中山公布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15日，汤交卸浙江都督之职，但以“不忍徇禄以忘亲”^⑩为由，停留上海，不肯去南京就职，并在上海参加了由章炳麟、张謇组织的“统一党”，任该党参事。2月9日，汤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即离沪出国。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北洋军阀统治，把汤寿潜排除在内阁之外。5月，汤自南洋回国，此后“唯以优游晦迹，不欲复闻世事”^⑪。6月9日，浙江铁路公司开股东年会，请汤复任总理，他辞不获允，8月1日复职，改称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不久，浙省铁路改归国有，政府论汤以往劳绩，赠给他二十万银元。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卒。临终遗嘱以二十万银元捐办浙江文化教育事业。

遗著除《危言》外，尚有《三通考辑要》行世。

注：

① 张謇：《汤君蜚先先生家传》，《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第16册“人物类”

传”，1937年印。

② 同①。

③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0。

④ 《浙路总理汤寿潜革职后余闻》，《东方杂志》第7卷第9号。

⑤ 《汇报》1907年10月26日。

⑥ 《预备立宪公会章程题名表》，《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 《东方杂志》第5卷第7号：《宪政篇》。

⑧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第66页。

⑨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⑩ 同①。

⑪ 同①。

王 文 华

熊宗仁

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县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祖、父辈均为地主，清朝咸同年間曾参与组织团练，镇压黔西南回民起义，在当地颇有影响。外祖父刘官礼系兴义知府，与其子刘显世等办团练起家，称霸兴义一方。王文华幼年丧父，与兄王伯群多得舅父刘显世资助。

1895年王文华入私塾。稍长，值刘官礼聘贵阳维新名士姚华等人到兴义执教，王与刘氏宗族子弟皆从姚受业。1906年王文华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次年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卒業即转入优级选科师范文科。在校期间，与爱国团体贵阳科学会负责人张恣结为忘年交，深受其爱国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濡染。当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传播贵州，以张百麟、钟昌祚为首的贵州自治学社与东京同盟会发生联系，宣传反清爱国思想。王文华通过张恣与自治学社成员有较多的接触。他剪去发辫，常常阅读《民报》等革命书刊，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崇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活动。

1910年王文华辍学，受聘为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监，兼历史、地理和体操教员。后经人辗转介绍，注册于美国三藩市同盟会支部。次年王任高等小学堂堂长，与窦居仁、何辑五创办体育学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派联合新军、陆军小学和会党群众，在贵阳策划武装起义。王文华在兴义以体育学会名义向团防局借枪，想有所行动，因官方警觉，计划受阻。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止贵阳发生武装起义，电召巡防营管带刘显世速率部来省护卫。当时王文华在刘部当前队队官。军次安顺，11月4日以杨蔭诚为都督的贵州军政府已宣告成立。刘显世为投机革命，派王文华到贵阳与革命派联络。由于革命派失去警惕，宪政派又极力怂恿，枢密院长张百麟等迎刘显世到省，授予枢密院军政股股长兼第四标标统职，王文华在该标当了管带。

贵州辛亥革命应时而起，兵不血刃取得成功。为了夺取政权，代表官僚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政派、耆老会和地方团练势力公开合流，引滇军唐继尧部入黔。滇军入据贵阳后，在唐继尧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王文华列席陈述意见，“力言滇军人地生疏，作战困难，前敌之事以身任之……滇军司令唐继尧深器之，拨士兵二大队归其指挥”^①。1912年3月3日凌晨，王文华奉唐继尧之命，率领部分滇、黔军，援城先登，直扑都督府，逼走代都督赵德全^②。旋唐继尧任贵州都督，于1913年任王文华为省城警察厅厅长。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晋京，唐继尧回滇继任滇督，刘显世就任贵州护军使。为了稳固刘显世的统治，王文华建议改旧巡防营为陆军，共编练六个团，以德、日军事教程进行训练。王文华自任黔军精锐第一团团团长，以卢焘、胡瑛、李雁宾等为辅佐，确立了自己在黔军中的领导地位。

1914年3月，王文华辞去省城警察厅厅长职务，全力抓军

队。6月，王文华任护军使署副官长。是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现端倪。王伯群在京、津参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密谋反袁，函告其弟王文华“秣马厉兵，应时起事”^③。次年4月，王文华在贵阳设立模范营，抽调各团下级官佐轮流来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并劝说刘显世参加武装反袁。12月21日，北京政府突然任命王文华为陆军步兵上校，以示笼络，王未为所动。25日，云南起义爆发，在蔡锷、唐继尧等发表的讨袁通电中，刘显世亦列名其中。贵州耆老会主张降袁，刘显世因黔军已表示讨袁，依违两可，犹豫不决。王文华向刘显世陈词：“吾志与民国同命，舅氏不谓然，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京。吾自驰助蔡君，灭家亡身吾独任之，事成则归舅氏。”^④并将黔军两个团集中镇远、铜仁，准备作战。

1916年1月中旬，护国第一军先遣支队进抵贵州，24日支队司令戴戡抵贵阳，贵州人民和黔军将士热烈响应护国讨袁。此时，北洋军马继增的近畿第六师和卢金山的第十八混成旅约三万余人进逼源陵。刘显世在内促外迫之下，于27日宣布贵州独立，任王文华为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领黔军三个团入湘迎击北洋军。时黔军以数千之兵抗敌数万，兵员伤亡甚大，加之刘显世、熊范舆等扣饷扣械，王文华曾迭电辞职，以示抗议。由于湘西人民大力支持，黔军士兵英勇奋战，王文华亲临前敌指挥，战局得以稳定。激战至5月中旬，卢金山全旅被歼，马继增兵败自戕，北洋军退出湘境，湘西、湘南均为护国黔军控制。王文华被贵州报纸誉为“黔中第一伟人”。

护国之役胜利后，贵州组建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他罗致了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浦、王纯祖、李毓华等

一伙留日士官生，形成了握有军权的少壮派集团。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被称为“新派”。刘显世因列名参与护国运动，当上贵州督军兼省长。他以省长行署秘书长熊范舆、顾问郭重光、政务厅长何麟书和财政厅长张协陆四人为台柱，掌握全省政治、经济大权。因这帮人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被称为“旧派”。从此便开始了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之间的内部斗争。

1917年4月，王文华以贵州军事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为对德宣战问题而举行的督军团会议。在段祺瑞操纵下，5月19日督军团要求改正宪法草案和解散国会，王文华不赞成干涉制宪和胁迫国会，拒绝签字，愤而赴沪，拜谒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王文华兼程返黔，表示愿“竭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孙先生后盾”^⑤。

是年8月，王文华响应孙中山组织三省联军入川的号召，率黔军两个团出川东。11月，同北洋政府新任四川查办使吴光新部激战二十余日，于12月4日攻克重庆，正式组成三省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王自任靖国黔军总司令。1918年1月，王文华又任命袁祖铭为纵队长，率部参加联军对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刘存厚部作战。联军1月20日攻下成都，黔军立了首功。袁祖铭自恃战功显赫，乃活动所部团、营长联电刘显世，请委为黔军第二师师长。这正投合了旧派以袁制王的心意，刘显世立表赞同。王文华认为袁要求任第二师师长，是同他争权，便以归还建制为借口^⑥，调袁为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剥夺其兵权。

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后，主张地方自治，联省自治。

孙中山对熊很不满意，一度把解决川事的希望寄托于王文华身上。3月25日，孙中山致电王文华：“欲达护法救国之初心，唯有根本解决一途耳”^⑦，希望他率领联军北伐。27日，王文华与黄复生、叶荃等誓师东出援鄂，以图会师武汉，北定中原，但因陷入四川混乱局面，不能自拔。5月，王文华就任重庆镇守使职，旋因熊克武等人反对而辞职。

1919年5、6月间，贵州发生“柳渝铁路借款案”^⑧，旧派借机攻击王文华、王伯群弟兄不顾贵州财政困难，妄借外债，新派与旧派之间斗争激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贵阳的学生运动也发展起来。王文华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亲往讲武学校演说，又支持其妹夫、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创办“少年贵州会”，发行《少年贵州报》，演出话剧，办补习学校，抵制日货^⑨。讲武学校学生成了贵阳学生运动的主力。新派利用学生运动向旧派猛攻，政局大乱。政务厅长陈廷策被刺受伤，财政厅长张协陆服毒自杀，省议会推王伯群长黔，刘显世被迫应允“统一后正式与伯群长黔”^⑩。

1920年初，熊克武以“川人治川”为号召，掀起排斥滇、黔军的高潮。王文华再度由贵阳赴重庆，指挥黔军加入川战，并开始军中策划取代刘显世的活动。唐继尧以王文华倒刘，有碍其对贵州的控制，曾与刘显世谋划以韩建铎取代王为黔军总司令。刘为此部署其堂兄贵州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和驻湖南洪江的黔军清乡司令王华裔密谋倒王，并由其胞弟刘显治草拟了讨王通电。驻川黔军中也出现了以薛尚铭为司令的“靖难军”，拥刘反王。这些动向，加速了新派向旧派夺权的步伐。

同年8月，川、滇、黔拟设联军司令部于重庆，王文华被推为筹备员，实际负责重庆一带防务。10月，熊克武联合各路川军大败滇、黔军，王文华部被迫退离重庆。此时刘显世准备撤王，王为先发制人，在离渝前，以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部署黔军以“清君侧”为名，回黔向旧派夺权；自己则为甥舅关系，避免舆论谴责，先于10月15日赴沪就医。11月11日夜，以旅长谷正伦、何应钦和警卫营长孙剑峰为指挥，在贵阳发动“民九事变”，杀死了耆老会头目郭重光、督署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何麟书逃跑，其子侄三人被杀。刘显世被迫于13日通电解除贵州军、民两政职务，避难云南。

“民九事变”后，贵州各界电请在上海的王文华兼贵州省长。王为避“以甥逐舅”之嫌，借病辞谢。12月，王文华赴广州谒孙中山，被委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一度奉命往浙江劝说卢永祥参加讨伐徐世昌、段祺瑞。

王文华在上海还联络辛亥革命后流亡沪上的周素园等贵州革命派人士，与他们弃嫌修好，动员他们一同回黔执政。王的行动，遭到北洋军阀和贵州旧派的仇恨。他们利用王文华与袁祖铭的矛盾，唆使袁收买何厚光、张克明，于1921年3月16日下午五时，在上海一品香旅馆门前将王文华刺杀身死。193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王文华为陆军上将。

注：

① 庾恩赐：《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

② 都督杨森城率军北伐援鄂，副都督赵德全代之。

③ 《王文华传》（初稿），《革命人物志》第1集第89页，台北版。

- ④ 汪兆铭：《勋三位陆军中将王君文华神道碑》。
- ⑤ 王建安：《王电轮先生教学时期的革命思想和他的几点轶事》，《兴义文史资料》第1辑。
- ⑥ 当时黔军的编制是以团为单位，共十个团，直属总司令王文华调遣。
- ⑦ 《总理全集》下册第151页。
- ⑧ 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资格同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甄在上海签订了借款修筑由柳州经贵阳至重庆的铁路合同草约，其中牵涉以贵州路、矿作抵押和利息偿付等问题，王文华亦想从借款中支取军费，引起元老派对少壮派的猛烈攻击，时人称为“柳渝铁路借款案”。
- ⑨ 徐廷栋：《贵州“五四”运动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 ⑩ 1919年12月4日和9日刘亚休致熊克武密电，四川文史研究馆藏。

王 家 襄

夏高阳

王家襄，字幼山，浙江会稽（今绍兴）人，1872年10月27日（清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其父王官亮，举人出身，曾署河南怀庆知府。王家襄幼失怙恃，由伯叔抚养成人。少时有志于学，用功甚勤，但屡试均未考中，以后改读法律。

1904年，王家襄以县丞分江苏，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学警政，毕业于东京警视厅特设警察专科。1906年回国，任浙江全省巡警参议，旋调任绍兴府巡警总理，后转任浙江高等巡警学堂提调，兼法制教习。1909年9月浙江谘议局成立，王家襄当选为议员，多所建白，在第一次常年会议上，被选为谘议局常驻议员和资政院议员，参与君主立宪活动甚力。

1911年，王家襄应友人之招，赴吉林任巡警道。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吉林巡警多为满、蒙人，对革命扞格不入，王联络官吏，“阳示镇定，阴调护之”^①。不久，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吉林未经动乱，王家襄颇获赞誉。旋南归，任浙江杭县知事。1912年4月，他被浙江省议会推选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赴京就职。

民国初年，政团纷起，分合迭变。王家襄先为民国公会会员，继为共和党员；后来共和党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王又为进步党党务部长。

1913年初,袁世凯下令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王家襄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起,张继辞参议院议长职,王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及理事,参与起草宪法。王自居于国民党与北洋派以外,以“独立自主”的中间派人士面目出现;其实进步党为袁世凯所用,已成为在国会中打击和对抗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势颓力衰,袁世凯为所欲为,不等宪法的制定,急于当正式总统,王家襄在国会为之奔走。是年9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案;10月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了匆匆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6日,国会在袁世凯党徒唆使的“公民团”包围下,演了一场逼选总统的闹剧。10日,袁在清宫太和殿就大总统职,王家襄以选举会主席身份向袁授大总统证书,并去武昌向黎元洪授副总统证书。

不久,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欲变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当时王家襄及其他进步党议员,正在草订一部既可以维持国会的表面尊严和议员的个人地位、同时也可供袁利用的宪法,已进入到三读会。不料袁竟派出八名代表强行“列席”宪法会议,直接干涉制宪。在国会最后一点面子亦难以维系的情况下,议员们拒不接待八代表,使袁大为恼怒。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指责宪法起草委员会为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取消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势必亡国灭种不止”,号召各省“共抒说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②。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等群起应和,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

之声喧嚣一时。曾为袁效命的王家襄等进步党议员，到这时也不得不为维护所谓国会尊严，宣称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

11月4日，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派出大批军警彻夜追缴国民党议员之证书、徽章，连跨党者、脱党者亦被追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一手扼杀了国会的活动。王家襄等进步党议员震惊之余，以参、众两院名义分别向政府提出质问书，限期答复，袁党置若罔闻。拖延了很多日子，内阁总理熊希龄才函复两院议长王家襄、汤化龙略称：“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③接着，袁指派专人召集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权。一个半月后，1914年1月10日，袁竟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正式宣告解散国会，王家襄等进步党人也被撇在了一旁。

袁世凯在实现了总统独裁制后，于5月设立参政院，自行指定当朝显宦、前清官僚、进步党名流等七十人为参政，王家襄亦列名于中。参政院名曰“以备大总统之谘询，审议重要政务”^④，实为筹备帝制之专设机关。接着，袁又下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以便明目张胆地变更国体。在筹安会鼓吹帝制的喧嚣声中，参政院于9月1日开会，要求变更国体、实行君宪的“请愿书”犹如雪片飞来，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接踵而至。在讨论请愿事件的参政院会议上，王家襄发言表示反对，谓：“今日之事，除将一切请愿书却下外，无他办法。”^⑤次日王知如此表态必为袁党所不容，在友人促使下托故离京，未再参与其后参政院上书拥戴袁世凯称帝的丑事。

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下令裁撤参议院，恢复约法、国会。8月1日国会重开，不久宪法起草会议亦续开，王家襄回到北京，仍任参议院议长。

1917年2月间，由于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政策封锁海上，北京段祺瑞政府抗议无效，提出对德绝交问题。王家襄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的主张甚力，在参、众两院议员中为段游说，遂获得国会通过。但到进一步对德宣战问题上，各派意见分歧甚剧，议员中袒护黎元洪者颇不乏人。5月10日，段之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同时唆使几个所谓“请愿团”二千余人包围国会，殴辱议员，企图胁迫国会通过。议员愤懑不已，停止会议，不予讨论，遂使段之国务院与国会间冲突激化，王家襄虽欲竭力斡旋，亦难挽回。时段指使“督军团”出而干预，联名呈请黎元洪改正宪法草案，解散国会；而国会则断然主张内阁改组、迫段去职。23日，黎下令免段职，督军团遂宣告反叛，张勋以调停为名要黎限期解散国会，接着张勋更演出复辟丑剧。王家襄得到黎被迫下解散国会令的消息，便携带参议院印信微服出京，在天津以参议院名义通电声讨。

段祺瑞讨伐张勋竟功后，重掌北京政府大权，有意任王家襄为总长或省长，王未受，而力主恢复国会。段不愿尊重约法、恢复国会，下令另组参议院，于1918年8月另立第二届国会，世称“安福国会”。王家襄拒绝与他们往来。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败北，安福国会于8月解散后，王家襄与吴景濂等人积极筹划恢复旧国会，向直系首领曹錕等人游说恢复国会之诸多好处，建议恢复法统。1922年5月，王等在天津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6月1日，召集国会议员一百

五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继续行使职权，同时宣布徐世昌是非法总统。王家襄与吴景濂、熊炳琦等人秉承吴佩孚之意，环请黎元洪复大总统职。6月11日，黎复出，随即下令恢复旧国会。8月1日起，国会开第二次常会，王家襄仍为参议院议长。王联络同志，主张此次国会应专事制宪，暂时停止行使其他一切职权。他们力陈民国成立已十一年，仍无宪法，前此责任或可诿为外力干涉；“此次开会，若不专力制宪，或因政争阻碍制宪通行，则国会咎无旁贷”^⑥。但另有一批议员在曹锟唆使下，提议讨论黎元洪复职是否合法，谋作政治买卖另举曹锟为总统。10月，国会开第三次常会，参议员第一班任满，王家襄依法退议长职，仍当选为参议员。王热心于制宪，想继任议长，但是杨永泰的呼声也很高，重选议长之举竞争激烈。由于双方各有研究系和政学系为后台，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初则彼此以不出席相抵制，继则以武力相对待。屡开选会，屡次斗哄，均无结果而散。遂有行政委员会之组织代理执行会务”^⑦。

曹锟为了急于登上总统宝座，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贿，黎元洪被迫于1923年6月离职去津，行前将总统印章交王家襄，王不受。国会议员被直系操纵、受贿者越来越多，王乃托故出京，不再视事。旋曹锟命杨永泰以五十万元巨贿要王家襄赞助贿选，王拒不受。

此后，王家襄不问政事，专任中英合办的福中矿务公司督办，寓居北京，不与在位者相通，仅时与一二知己文酒聚会。1928年6月16日病逝。

注:

- ① 张寿镛:《王幼山先生传》,《风云》第1期,上海风云出版社1943年9月刊印。
- ②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年10月版,第150至152页。
- ③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193页。
- ④ 顾敦铎:《中国议会史》,苏州心正堂1931年2月版,第211页。
- ⑤ 同①。
- ⑥ 同③,第351页。
- ⑦ 同④,第357页。

夏 超

魏 桥

夏超，字定侯，浙江青田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父亲夏贡九是秀才，以教馆为业。夏超幼时随父在蒙馆读书。

1903年，夏超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在此期间，经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1905年毕业后留武备学堂任学生队队长。1906年蒋尊簋任广西督练公所总参议，要求浙江挑选得力人员前往协助，夏超膺选而往，去广西督练公所任职。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浙江于11月5日宣告独立，夏超由广西回杭州，为都督汤寿潜的幕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调任交通总长，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夏超任警察督练公所主办，1913年任省会警察厅长。

当时浙江的警政是个冷衙门，无权少势，又缺经费。夏超采取人弃我取的态度，经过几年努力，警察事务渐具规模。1916年12月起夏又任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这时各县都设立警察所，重要乡镇设立分所，人数逾万，而且一切人事任免，经费核发，均归省警务处管辖，夏权势日大。

袁世凯于1915年进行帝制活动时，浙江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上劝进表为之捧场，12月21日袁特封朱瑞为侯爵，屈映光为伯爵。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后，各地响

应。夏超和四十九旅旅长周凤岐等人联络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密谋驱逐朱瑞。夏超设法取得第六师叶颂清部驻省垣营长陈肇英的支持，又贿通了将军署卫队长陈炳垣，于1916年4月11日黎明时发动，夏超率敢死队为先锋，陈炳垣作内应，一举冲入将军署，朱瑞闻警逃逸，浙江遂宣布独立。

浙江独立后，吕公望就任督军兼省长。吕属“保定派”，夏超、周凤岐为“武备派”，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夏超与周凤岐企图把持浙江，密谋推翻吕公望，取而代之。吕公望有所察觉，决定先发制人，乃向北京政府密保其亲信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呈请总统黎元洪明令发表，以夺取夏超的实力。夏超闻讯，一面约傅其永于12月26日办理移交，一面加紧策划逐傅之阴谋。在办理交接设宴迎傅之时，夏唆使几名暴徒持枪闯入，把傅其永从席间拖出，当众予以殴辱。夏超又指使全城警察罢岗，声称反对傅就厅长职。傅被殴回寓后，夏派人送去五万元支票一张，迫傅离职回金华老家。同时，夏串通督署参谋长周凤岐、第二旅长李炜章、混成旅长俞炜、宁波镇守使顾乃斌等，联名向吕公望提出辞职，对吕施加压力。夏另外又炮制了一篇攻击吕公望的文稿，胁迫各报刊登。吕公望无可奈何，只得电请北京政府辞职。

1917年1月，北京段祺瑞政府批准吕公望辞职，派皖系的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一任命，大出夏超意外，于是夏超急忙召开会议，推汤寿潜等四十余人致电副总统冯国璋，表示“浙人治浙”，吁请北京收回成命；同时，又以浙江全体军官名义电京，挽留吕公望。但这一切均已无济于事。1月11日杨善德带兵入浙，不

久齐耀珊亦到省接事，控制了浙江政局。到此夏超只好改变态度，转而千方百计奉承他们，让妻子拜杨妻为干妈，命部属亲信笼络杨、齐的随从人员，从而保住了全省警务处处长之职。同时，夏还派人去北京恳求段祺瑞恢复他省会警察厅长的职位，也终于如愿以偿。

1924年9月，直皖两系爆发了齐（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浙江都督卢永祥）之战，直系闽督孙传芳出兵援助齐燮元，自闽北袭击浙江衢州，卢永祥不敌，以“浙江还诸浙人”为辞，仓促退沪。浙江省长张载阳亦宣布卸职离杭赴沪，临行时将省长印信交夏超保管。夏超当夜召集会议，进行人事调动，宣布代行省长职务。

夏超代行省务，并非正式任命，于是他积极活动，以“卢去张随，省事无人负责”^①等语电吴佩孚。9月22日，夏超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省长。不久任闽浙巡阅使兼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之职的孙传芳到达杭州，夏超百般奉迎，取得了孙传芳的欢心，稳住省长宝座。

此后，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坐镇南京，浙江总司令由第二师师长卢香亭升任，夏超与卢香亭面和心不和。夏超力图扩张警察总队，积蓄实力。他担任省长后，全省警务处长之职已交由同乡叶焕华担任，但他仍直接控制警察力量，将全省保安警察扩编为三个总队，达八千人，派亲信吴殿扬、章燮、章培分任总队长，由自己总揽指挥大权。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少，但出身正式军校的骨干很少，缺乏军事参谋人才，由于平日缺乏训练，枪枝陈旧，加上三个总队之间互相猜忌，战斗力很差。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9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亲临九江督战，并调第二师卢香亭部和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援赣”。其时，广东国民政府派马叙伦、许宝驹到浙江与夏超联系，促其宣布独立。10月初，夏超派人备银三万元，赴九江犒赠孙传芳部，以取信于孙，孙以特制景德镇磁器回赠。10月15日，夏超在杭州召集部属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即日宣布浙江自立，翌日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长职。同时，夏超将卢香亭留在杭垣的卫队宪兵三百余人缴械遣散。孙传芳在前方闻悉大为恼怒，于18日委第八师师长兼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主持浙事，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出兵浙江。夏超急命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章燮率部开赴嘉兴前线布防，并拆毁莘庄至新桥间的铁路。后又增派第三、第一总队迎敌，并亲临嘉兴督战。但是，所部兵无斗志，大炮失灵，只抵挡了两个半天，就被宋梅村部击溃。21日夏超在指挥战斗中咯血晕倒，经人抢救逃回杭州。

夏超逃回杭州后交出省长印信，请张载阳暂时维持地方秩序，自己准备去富阳、桐庐一带搜集残部，以谋东山再起。这时宋梅村部已进入杭州，由宋代理浙江总司令之职，悬赏五万元缉拿夏超。22日清晨，夏超偕亲信数人，由杭州江干雇舟而上，到达富阳，午后天气转劣，大风骤至，船无法上行，被迫折回江干，被宋军逮捕。孙传芳急电宋梅村立即将夏超首级送九江，宋派人将夏击毙，割下首级，专送九江，经孙传芳验明无误后，抛入江中^②。

夏超死后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发褒恤令，依上将阵

亡例抚恤。

注：

- ① 李净通：《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 ② 同①，第15页。夏超之死，一时传说纷纭。另一种比较多的说法是：“二十三日，孙军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上发现了‘便衣队’数十人，双方开枪互击，夏超中弹毙命。”（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82年版，下册第1563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杜伟：《回忆夏超的独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 ② 许炳堃：《夏超死的经过》，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 ③ 黄元秀：《浙江夏军长殉职经过》，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 ④ 刘劲持：《回忆夏超》，未刊稿，藏浙江省政协。

吴 景 濂

张树勇 张黎辉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别署晦庐，晚年又自称“抱冰老人”，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县）人，1873年3月18日（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生。父吴大祥，在乡经商。吴景濂于1882年入塾读书，1894年考取秀才。1898年参加乡试，中第六名副车。后在家设馆授徒。戊戌变法时，吴同情维新派主张。

1902年冬，吴景濂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四年后毕业，学部奏请给举人出身，并授给候补内阁中书，加五品衔。1907年春回籍，经奉天提学使张鹤龄聘为奉天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吴在奉天创办全省教育总会，被举为会长。1908年，他又在教育总会内设立宪政讲习所，鼓吹立宪，从而获得一些声望。是年夏，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资助下，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09年10月，奉天省谘议局成立，吴被选为谘议局议长。其时，他极力主张编练全省预警（后改称“保安团”），兴建全省水陆交通网，并想通过向英美借款，开发东北资源。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奉天的一些革命志士曾要求吴景濂宣布该省独立，但吴借口“事关重大”，予以拒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吴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乃极力拉拢革命党人，谋议通过和平方式逼走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然后宣布独立。赵尔巽闻讯，立即调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部进省镇慑，使宣布独立的计划告吹。11月12日，赵尔巽操纵下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赵被推为会长，吴景濂任副会长。这时，吴看到巡防营张作霖军队调省益多，形势日恶，又接到驻奉天巡防营另一统领冯德麟关于“省城保安局面恐生变化”^①的密告，预感到自己在奉天处境有危险。时苏浙有召集各省代表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之议，吴作为奉天谘议局选出的省代表，于11月24日潜出沈阳，南下赴沪，参加会议。12月29日，他在选举会上投了孙中山的票，并参加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工作。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吴景濂当选为参议员。这时政党林立，吴急谋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乃在南京参与筹组统一共和党的活动。4月11日该党开成立大会，吴被举为参议。统一共和党介于同盟会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之间，是当时重要的第三党，举足轻重。4月底临时政府北迁，参议院重选议长、副议长。共和党为了削弱同盟会的势力，与统一共和党“暗相提携”，愿以正议长相许让。吴善于钻营，被统一共和党提为议长候选人。5月1日吴景濂被选为正议长。继而统一共和党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选举中夺取选票，决定与同盟会联合。8月25日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吴景濂被选为理事。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采参、众两院制，吴景濂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并被国民党推举为众议院议长的候选人。但袁世凯不愿国民党人当众议院议长，授意选进

步党人汤化龙为议长，吴遂落选。国民党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孙中山曾派人至京要吴景濂南下讨袁，吴竟然拒绝南下。7月31日，袁世凯悍然传讯在京的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员，令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开除出党，并自行宣布“不与逆谋”。8月3日，吴景濂以国民党北京支部长的身份前往警备司令部，公然申明遵令将黄兴等五人开除出党。吴对袁这般恭顺，所以10月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吴被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8月间，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帝制活动大力鼓噪时，孙曾请吴景濂加入。吴善于观察形势，他对袁称帝之能否成功，心存怀疑，遂谢绝参加。1916年3月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攻击下被迫取消帝制后，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吴景濂当时躲在天津，他看出袁之败局已定，乃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反对袁继续任总统，袁十分恼火，当即下令予以通缉。吴潜往大连，联合东北革命党人杨大实、顾人宜、赵忠鹄等发起“三省公民讨袁协会”，促袁世凯尽快下台。他的这一行动，又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

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而掌握实权。8月1日国会复会，吴景濂回北京参加国会。复会后的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互相抗衡。吴景濂和张继、王正廷等又挂出“宪政商榷会”的招牌，同进步党的宪法研究会进行斗争。不久商榷会又分裂为四派，吴景濂归入“益友社”一派。这些派系虽然各立门户，但无助于大局。因为这时的政局，既有南北的区界，又有直皖的分化，复有府院之争。国会中的党派，只不过在一系列政潮中推波助澜而已。1917年

5月28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在府院之争中辞职，吴景濂继任议长。6月12日，黎元洪被迫非法解散国会，19日吴景濂赴天津。张勋复辟后，吴与在津的六十五名国会议员一起通电讨伐复辟。

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揭起护法旗帜，吴景濂赴粤参加护法运动。8月25日，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吴景濂仍被选为议长。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建立护法军政府，吴被聘为军政府高等顾问。不久，国会决定继续审议未完成的宪法草案。吴景濂派议员分赴京津沪等地，联络各省议员来广州开会，到1918年9月，以候补议员递补方法凑足法定人数，国会正式开会，吴再次被众议院举为议长，主持宪法会议。到1919年2月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议员星散，宪法会议告中断。吴景濂亦离广州到上海去了。1921年5月孙中山第二次回广州，重组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吴正在上海办交易所。孙中山电吴“盼速偕留沪议员来粤开会”^②。但此时已在直皖战后，吴景濂默察全国形势，不愿再回广州，旋即借口母丧回籍，闲居天津，等待时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吴景濂见时机已到，便设法接近直系。曹锟想当总统，吴景濂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等向曹、吴献策，在驱逐徐世昌后，以“恢复法统”的办法（指民六国会）作为“过渡”，然后“名正言顺”地扶曹上台。曹、吴同意后，吴景濂从保定回到天津，积极进行倒徐世昌的活动。5月16日，吴与王家襄打出了“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的招牌，6月1日在

津召集一些国会议员开会并发表宣言，宣称即日行使职权，同时宣布徐世昌为“非法总统”。曹、吴暗示各省直系军阀立即通电响应。吴佩孚并出面号召，为使“法统重光”应召集民国六年旧国会，并愿拥黎元洪复职。吴景濂与王家襄当即前往黎宅敦请黎元洪复出。11日，吴从天津亲送黎元洪赴京就职。次日，吴在京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到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次正式宣布复会了。黎元洪也深知自己地位的危险性，便竭力拉拢吴景濂。10月10日，授给吴景濂勋一位及一等文虎章。

曹锟把复会的旧国会看成自己手中的工具，为迅速完成“过渡”，必须利用国会把黎扶起后，再把他赶走。11月18日，在曹锟授意下，吴景濂等出面，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的金佛郎一案中有“受贿”情事，迫使黎下令逮捕罗入狱。此举目的在于推倒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好人内阁”，为曹锟篡夺总统职位扫清道路。与此同时，吴景濂等人与曹家兄弟在国会内外加紧活动，收买议员，做“驱黎拥曹”的准备。经过他们一番紧张活动，1923年6月，终于把黎元洪赶下了台。然后以五千元乃至万余元一张选票的高价，贿买大批议员，在这年的10月5日，把曹锟选为“大总统”。8日，吴景濂亲赴保定，向曹锟呈送总统当选证书。随后，吴等又匆匆地搞了一部“宪法”，以图掩盖他们的贿选丑行。

曹锟登上总统的宝座后，吴景濂满以为自己包办贿选有功，一定会被曹锟派作内阁总理。“詎知曹锟甫得当选，即背义食言”^③，准备把内阁总理许给自己的亲信、当时暂代总理的高凌蔚。吴深感自己受骗，痛恨曹锟，并与高凌蔚成为水

火。12月，众议院内有一派拥高的议员提出吴景濂任期届满，应改选议长。同时，吴又听到高凌蔚有不利于己的消息，便于同月21日携带众议院印信潜逃天津日租界匿居。北京地方检察厅以吴毁坏文书罪提起公诉。吴闻讯乃秘密东渡日本暂避。

吴景濂隔年后回国，闲居天津，虽企图东山再起，终无所获。随后便以皈依佛法为名，无所事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翌年，“国联”李顿调查团经过天津时访问吴景濂，吴如实向李顿陈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及东北民众的真实心愿。“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企图拉吴下水当汉奸，吴以老病托词拒绝。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在天津病死。

注：

- ① 《吴景濂生前口述自传》(未刊稿)。
- ② 《吴景濂日记片断》(未刊稿)。
- ③ 《吴公莲伯行述》(未刊稿)。

陈 诚

严如平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青田县人。父陈希文，清末诸生，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陈诚九岁入小学，1912年赴丽水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读第十一师范。1918年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由其父执、众议院议员杜持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炮科生。

陈诚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当见习官，驻绍兴，旋补为排长。1922年，陈到上海投考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入粤军第一师，在邓的第三团充任连长。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创立，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陈诚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1925年两次东征，陈诚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任炮兵营连长，在淡水之战、棉湖之战与攻惠州城诸役中，均立战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诚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前进；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1月成立第二十一师，陈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在师长严重率领下，由韶关经赣州、南昌入浙至衢州。1927年1月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在桐庐西北浪

石埠过江后，又与孟昭月部苦战数日，后夜袭孙军司令部，迫使孙军后撤。2月15日，第二十一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陈诚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嗣后攻平望，薄苏州，下松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不满蒋介石所为，挂冠而去，陈诚继任师长。嗣后，陈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军务署长、军政厅副厅长。翌年初蒋介石复任“北伐全军总司令”，陈诚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出征奉天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与蒋介石关系日趋密切。

1928年9月，蒋介石借“编遣”之名扩充自己的武力，命陈诚率两个警卫团与曹万顺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副，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翌年7月，升充师长。陈诚将第十一师重要人员全部调换，代以清一色的“黄埔生”，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1929年蒋先后与李宗仁、唐生智混战，陈竭力为蒋效命。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陈诚被蒋派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沿陇海路西进，守归德附近阵地。时阎锡山军沿津浦线南下，入济南，占泰安，徐州吃紧。陈诚奉命东调，率十一师以日行一百二十里之速度昼夜趲行，赶到兖州，协同第十九路军解曲阜之围，继又抢先攻入济南城。8月，不足三十三岁的陈诚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十一师师长。嗣后，陈诚又奉调转赴平汉线，自济南抵周家口，率部向中牟推进，直趋郑州，蒋介石奖给十八军三十万元。

陈诚仿效邓演达、严重治军，标榜“人事公开”、“经济公

开”、“意见公开”，注重军规；对蒋介石则唯命是从，每战皆敢打敢拼，坚定，苦干，日益取得蒋的宠信。宋美龄将自己的干女儿谭祥（谭延闿之三女）许陈。1932年1月1日陈与谭在上海结婚。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更成为蒋之心腹。在蒋介石发动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中，陈被派为“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率十四师第十一师作为主力，长驱直入，先后侵占黎川、广昌、雩都（今于都）等革命根据地，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避实击虚，灵活机动，使陈部劳师辗转，疲于奔命。在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率十二个师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广昌进攻。他自恃兵多将广，指挥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东南的东黄陂地区，被红军大兵团伏击，两师师长李明和陈时骥均被生擒。接着，第十一师和第九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又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陈诚于丧师之后跑回南昌，羞愧沮丧，不敢见蒋。但蒋介石不仅未予追究，反为其补充兵械，仍加重用，1933年7月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由陈任教育长，负责训练“围剿”将领。在第五次“围剿”时，陈又被任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他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步稳进、乘虚突进”^①的战法，向红军江西中央根据地步步逼进。此时红军正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错误地采用了阵地战，陈诚得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于9月27日占黎川，为蒋介石打赢了第一仗；次年4月又以优势兵力攻占广昌；接着分兵六路向兴国、古龙岗、石城步步推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诚所部先后

进占石城、宁都、长汀、瑞金。他历年在江西收集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大量文件资料，时与红军“之行动措施相质证，以验其说之是否可行，其法之是否有当，其言行表里之是否一致”^②，并于1935年6月编印了六册《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研究和对付人民革命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国民党军官中，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③。

陈诚因为在反革命“围剿”战争中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进一步受到蒋的重用。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兼任处长；6月蒋又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兵均归陈督导整理；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又命陈实际负责。1936年3月，陈奉派去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渡越黄河，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6月又在太原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正值此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发表“冬电”宣称抗日反蒋。陈诚被蒋介石临时召回。他以武昌行营参谋长名义，急调所部三个师进占衡阳，防杜两广。不久，两广事件平息，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捕蒋介石的同时，也扣捕了蒋方要人，陈诚亦在其中。后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获得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运用剿抚并举方式”^④威慑镇压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八一三”日

军又进攻上海，全国军民奋起抗日。陈诚奉命到上海视察后，主张在上海利用碉堡和水网地障，牵制住日军主力对华北的攻势。蒋介石采纳陈诚意见，组织淞沪会战，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打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激励下，参战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只是陈在指挥上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⑤，是失着之处。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金山卫后，我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淞沪遂告陷落。但淞沪战役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⑥，其意义是积极的。国民党人称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⑦。

1938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被任为武汉卫戍总司令。6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自为团长，任陈诚为中央团部书记长。6月14日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又任命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担负保卫当时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武汉之全责。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于8月以三十五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分兵五路西侵，并以海军溯江而上，目标在夺取武汉。陈诚指挥第九战区各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一道，以三倍于敌的兵力展开武汉保卫战。陈遵照蒋介石指令，以“战而不决”的消耗战术御敌。我抗日军队先后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在星

子、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冶等地，也都与日军有激烈的战斗。10月，日军次第侵占信阳、大冶、鄂城和黄陂，25日汉口弃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一百余万我国军队迎战日军十二个师团，杀伤日本侵略军逾十万人^⑧，对于抗日军队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撤守后，国民党转入消极抗战阶段。这时陈诚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交严立三代，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交薛岳代，自己去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之职。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威胁四川。为加强重庆外围的防御，陈诚于9月奉蒋介石命赴鄂西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再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他以“建设新湖北”、推行“新政”相号召，如“二五减租”^⑨、田赋改征稻谷、用物物交换来对付通货膨胀、凭证分配日用品等等。但在执行中许多官吏贪污中饱，湖北人民仍难免于沉重的负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联合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为统帅，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2月陈诚奉派为指挥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5月又奉命回恩施，指挥所部抗御日军西犯。翌年7月，陈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2月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进一步重用陈诚，任命他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以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⑩，竭力安插亲信，扩充自己的势力，企图独揽国民党军事大权，因而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陈诚跟着喊“三

个月内消灭共军”，辅蒋调兵遣将，并先后去郑州、徐州、济南、北平、张家口及苏北等地督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一百一十二万人，陈受到各方责难。蒋介石被迫自己出面指挥战局，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1947年9月，陈诚飞抵沈阳就职。此时，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南新开岭地区、临江地区、四平地区大量被歼，已被迫困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几座城市。陈诚到东北本是想创造个奇迹以挽回名声，到职后即声言“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⑩。为此他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由九个军增加到十四个军，又新增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但从10月起，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陈诚指挥频频失误，五十天内被歼六万九千余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他吓得胆战心惊，然为安定军心计，仍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⑪。翌年1月6日，他下令新五军向沈阳集结，结果这支号称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新五军7日一个晚上即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活捉。陈诚闻讯，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第二天亲飞沈阳，陈不得不向蒋承认“自己指挥无方”^⑫。这时，他嘴上给各将领打气，说自己“决心同沈阳共存亡”^⑬，实际上却让谭祥去南京，求宋美龄要蒋介石将他调离东北。2月5日陈诚悄然飞回南京。为躲避舆论，他借口胃疾，去上海求医。国民党反动派在4月召

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①，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闻讯，急忙躲进陆军医院。5月20日，他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半年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在退居幕后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②。陈于1月5日到台湾就职，收容从大陆撤退去台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和残余部队，锐意经营。7月9日，陈又被委兼“东南军政长官”，辖台、苏、浙、闽和潮、汕沿海区域。

1950年3月，陈诚在台湾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翌年1月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3月任“副总统”，11月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任国民党“副总裁”。1963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在台湾主政期间，注意到应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曾推行了一套“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的办法^③。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死去。

注：

① 《陈故副总统纪念集》，见台湾《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218页。

② 陈诚：《赤匪反动文件汇编·序》（1935年5月），1935年版，第1页。

③ 周恩来1936年7月9日在陕西白家坪接见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美〕埃德加·斯诺：《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张岑华译文稿见《党

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 ④ 吴相湘：《陈诚遗爱鲲海》，《民国百人传》第2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96页。
- ⑤ 这是张发奎及前线伤员指责陈诚的语句，见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37页。
- ⑥ 陈诚对抗日战争的回忆资料，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总长办公室记录，国防部资料室编。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25) 28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⑦ 同①，第224页。
- ⑧ 张其昀：《抗日战史》，台湾版，第83页。
- ⑨ 陈诚的“二五减租”，是规定农民佃租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其计算方法是：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从年总收获量中先提留二成五，偿付种籽、肥料等，其余七成五和地主对分，即三七五交地主。
- ⑩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155页。
- ⑪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4页。
- ⑫ 陈诚：《告东北军民书》，同⑪，第5页。
- ⑬ 同⑪，第6页。
- ⑭ 同⑪，第6页。
- ⑮ 朱克勤：《出席国民大会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50页。
- ⑯ 同④，第218页。
- ⑰ 沈宗瀚：《陈故副总统与农业》，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第31页。

靳 云 鹏

汪仁泽

靳云鹏，字翼青，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山东邹县，后因久居济宁，落籍该地。父早亡，靳有两弟（云鹗、云鹤）及三个姊妹，皆依靠母邱氏卖煎饼为生，靳氏兄弟幼时也上街叫卖。邱氏曾在富户潘家帮佣，当过后来成为北洋要人潘复的乳母。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建陆军”，靳云鹏应募入营当兵，升至排长。1898年4月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同学有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张树元、马良等人，靳毕业后留任教习。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参谋处总办为段祺瑞，靳与段朝夕相处，关系渐密。

1909年云贵总督李经羲请段祺瑞推荐军事人才，段举荐靳云鹏，靳遂赴昆明任第十九镇总参议。靳不断将云南边情向袁世凯、段祺瑞密报。1911年武昌起义后，10月30日夜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举兵发难。靳云鹏随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抗拒革命，在昆明五华山战败，靳化装轿夫逃出，经越南北返，投奔段祺瑞。此时段任第二军军统，在湖北镇压革命，保荐靳赴京向袁世凯面陈滇中局势，并特电袁称：“靳能生还，不禁狂喜。已令上谒崇阶，面陈一切。钧处如无驱策，千乞飭赴

前敌。”^①靳返鄂后，受段重用，参与机要。

1913年春，靳云鹏经段祺瑞保荐，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8月代理、9月署理山东都督，1914年6月晋升将军。靳在鲁秉承袁、段旨意，镇压革命力量，并搜括资财，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田宅。他与人合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在临清设分厂，共有纱锭三万余枚；又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厂、面粉厂等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扩张在华势力，强占胶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山东首当其冲，靳大多依顺日本的要求。袁世凯帝制自为，靳参加十四省将军联名电请袁“登基”，袁授以伯爵。同时，靳对鲁地反袁民军势力也虚与委蛇。1916年3月初，袁称帝败局已定，靳在冯国璋策动下，与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芑铭一起，拟联名各省通电迫袁取消帝制，密电征求各地将军意见。直隶将军朱家宝接电后，向袁告密。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职位。各地反袁怒潮继续高涨，鲁境反袁民军力量逐渐逼近济南，靳在强大压力之下，4月29日通电劝袁辞职。5月29日袁佯召靳入京议事，突然将其撤职，派察哈尔都统张怀芝继任山东将军。靳虽丢官，却博得“反对帝制”的虚名。

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控制政府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任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职，忠实执行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被段倚之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成为段手下四大金刚之首。“府、院之争”勃起后，段与靳等密谋对策；1917年7月，在讨伐复辟之役中段自任总司令，靳任总参议，打垮了张勋。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借参战之名扩建“边防军”（即“参战军”），靳与徐树铮

同主其事，但靳与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开始。徐年少气盛，常仗势凌人，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段从中调和无效，转而利用他是曹锟的把兄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冯国璋是老同学、老同事等各方面的关系，派他至各处联络，借以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

1918年靳云鹏任参战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其时，日本为干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并图谋侵占我东北边境，以防德、奥为名，要求北洋政府“合作”。经章宗祥按段祺瑞的旨意，多次与日方密谈后，5月靳会同徐树铮、曲同丰等人，衔段命代表北洋政府与日方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军在对外作战期间驻兵我国，并向日方供应军需物资等；后又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这三个卖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与冯国璋代表的皖、直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9月，皖系以冯代理总统期满为由，指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亦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徐上台后，标榜“偃武修文”，以“文治总统”自命，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与段（在幕后操纵）扩充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相左。靳云鹏因嫉忌段宠信主战的徐树铮，转而倾向徐世昌，于1919年初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徐世昌进一步谋将段的“参战军”置于靳云鹏主掌的陆军部管辖之下，遭到段和徐树铮的强硬抵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替各军索讨欠饷，与段的另一亲信、财政部长龚心湛发生齟齬，在互讦中泄露了“参战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段闻讯大怒，对靳严厉训

斥，靳与段的裂痕加深。6月段指使徐树铮倒阁，并进而逼靳退出内阁。靳暗中联络直、奉两系，谋组新阁。此时徐世昌采纳张志潭的献策：“利用徐（树铮）、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祺瑞），由靳挟段以制徐，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②9月24日靳云鹏代署国务总理。11月，在直、奉通电支持下，经众、参两院通过，靳正式受命组阁，并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企图阻挠靳组阁失败。

靳云鹏上台后不甘居人篱下，很想有所作为，站住脚跟。他借机撤换了山东督军张树元^③，还想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等人，以表示力图摆脱段祺瑞的羁縻而独树一帜。段的御用工具安福系曾拉靳加入，靳以“军人不入党”而拒之。但他对段仍不敢怠慢，表面上十分恭顺，而段则以老上司自居，段的属员常在行文上直书“奉督（段时任边防督办）谕交总理办理”，不将靳放在眼里。靳阁阁员，皖系人物已有田文烈、陆徵祥、曾毓隽、朱深分长内务、外交、交通、司法等部，但段尚不满意，又增李思浩长财政。这些总长处处与靳为难，内阁会议往往因人数不足而流产。加以段的亲信从中挑拨，段动辄对靳训斥申饬，警告靳“不要挟外援以自重”^④，甚至暗中加以监视，使靳极为难堪，忿懑不平。

靳云鹏在段祺瑞的控制之下极力挣扎，力图自主政局。在南北和议问题上，他打算撇开上海和会，召集南北“名流”组成“和平联席会议”，直接达成协议，但因遭到段的反对而成画饼。在外交问题上，日本公使于1920年4月27日提出照会，胁迫北洋政府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靳内阁原拟予以回绝，但安福系阻挠，致被搁置。在财政问题上，由于列强外交使团声

明在中国未统一前停止一切对华贷款，也使其面临困境。此时直奉与皖系角逐日趋激烈，靳在徐（世昌）段之间、直皖之间周旋，与段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遭到安福系的激烈攻击。靳处境困难，遂于5月上旬辞职。

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败北，引咎辞去边防督办等职，安福系也散了伙。8月，靳云鹏在张作霖推荐下再度受命组阁。他根据事前与直、奉在天津的协议，先后办了取消安福国会、撤销“中日军事协定”和“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等几件大事，又提出了促进南北议和、裁兵、整饬纲纪、整理财政四点主张。但他主张的议和是南北军阀之间的议和，背地里却用饷械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反对孙中山。他打算勾结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势力，以形成独立于各系之外的军事力量。他派自己的亲信潘复打入财政部为次长，并想任用张弧、李士伟等人组成新的财政班底，以谋取代一贯控制北洋财政的交通系人物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等。1921年4月25日，靳邀集曹錕、张作霖及各省督军、护军使二十余人在天津开会，逼使财政总长周自齐辞职；5月14日又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重新组阁，将交通总长叶恭绰排挤出阁，因而与交通系结了怨恨。交通系人物向张作霖、徐世昌挑拨、攻击，离间靳与各派系的关系。

当初张作霖支持靳云鹏组阁，原是希望靳能为己用。但靳对张的企求多不能满足。直奉两系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等方面奉系常处劣势，张因而归罪于靳，逐渐萌念倒阁。靳云鹏与徐世昌的关系，也由于双方亲信为了争夺财税及人事等问题时生矛盾，而渐趋对立以至恶化。靳在奉系、徐世昌和交

通系的三面围攻下内外交困，终于12月17日辞职下野。

靳云鹏下野后，寓居天津日租界，从事经济活动。他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勾搭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代表中方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上他仅出面顶名，公司权益被日方控制^⑤。同时他又担任济南鲁丰纱厂董事长职务。此时有人估计靳的私人财产约二千万两^⑥。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控制北京政权后，靳云鹏自恃与张为儿女亲家，其弟靳云鹗又系吴手下第一员大将，意图再次组阁，张亦有此意；但吴坚持要恢复颜惠庆摄政内阁，使靳的梦想成了泡影。12月，张作霖召集亲信商议组阁人选，曾内定靳为内阁总理。靳闻讯兴高采烈，连夜赶至北京，草拟就职宣言。但吴佩孚因靳云鹗心怀异志，以“贻误戎机”罪名而免去其军职，仍反对靳云鹏组阁。靳再度组阁不成，颓然返津，意志消沉，从此参加佛教徒的“居士林”活动，诵经念佛。但是他并不安于古佛青灯下的生活。“九一八”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关内，华北局势日趋严重。1933年靳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数次，回津后为蒋拟了一个以华北作为“中日经济合作”基地的方案，企图重新出山主持华北政局。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即占据平津，靳云鹏又活跃起来，他和下台闲居的徐世昌商量，又拟就一个“议和”方案，前提为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军撤出华北。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不同意，靳的梦想又一次落空。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到北平，曾派戴笠接靳到平，面询华北政局。但此时靳已年迈体衰，无能为力。1951年1月3日病死于天津。

注:

- ① 电文原件存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卷。
- ②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閣篇》,《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207页。张志潭因曾受徐树铮侮辱,思图报复,故作此举。
- ③ 张树元曾是靳云鹏1916年督鲁时所属第五师师长,驻潍县。民军进逼济南时,靳曾迭电张驰援,张见危不救。后靳被袁世凯撤职时,张又先受袁的收买。靳当总理后,借济南戒严司令马良枪杀回教爱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的惨案,将张撤换,以报私仇。
- ④ 谭志清:《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 ⑤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嫉视日本独占山东特权,联英、法等国,强迫日本归还青岛及胶东一带特权,并规定由中日协商成立“鲁案协定”。根据该协定,双方合资设立鲁大矿业公司,中国方面由靳云鹏任理事长兼总经理,表面上中日合营,胶东矿业实际上全由日本大仓系财阀控制。靳甘为日方效劳,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鲁大总管理处的招牌始终悬挂在天津日租界靳宅门旁。
- ⑥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纪念汇刊。

徐永昌

汪仁泽

徐永昌，字次辰，1887年12月15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一）生于山西崞县。其父徐庆，初务农，后携带家眷迁居大同经商。徐永昌七岁起在私塾读书，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病故，生活无着，执役于父友曹氏所设旅店。后被清军武卫左军某营书记官徐椿龄带入军营充当杂差，曾随军去晋、陕、豫、冀等地，备尝艰辛。1906年，徐正式列名毅军军籍，生活始较安定，业余发愤自学文化。1908年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三年毕业，以成绩优异，派任左军左路前营副哨长，驻北京琉璃河。

1911年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左军左路前营奉命派赴大同镇压革命党人，徐永昌不愿回乡作战，留京改任毅军新兵营哨长，不久进入陆军部所设将校讲习所学习。1913年冬，学习期满，成绩出众。为求继续深造，先后辞去所派连长、团附等职，于次年考入陆军大学为第四期学员。1916年春，曾辍学赴沪转鲁，参加居正等人组织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6月，袁死后，重回陆大学习。是年冬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他与革命党人孙岳、续桐溪等人交谊甚厚，辞去外调的任命，留北京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

1917年冬，孙岳创办直隶军官教育团于廊坊（后迁保

定)，邀徐永昌任教官主持教学工作。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的骨干。1920年7月，孙岳组成直隶保卫团，徐永昌任参谋长。1922年直奉战起，孙岳任直军西路军司令，派徐督队作战。战后，徐调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1924年5月，调任该旅第一团团长，驻河北定县。

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孙岳、胡景翼在北京举行政变，组成国民军，孙岳就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徐永昌升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保定。1925年1月，孙岳被委为陕豫甘剿匪总司令，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率部从保定南下，经潼关，7月抵达渭南，遇新任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北洋军第七师在临潼一带布防抗阻。徐以所部多为新兵，且后无退路，乃决死猛攻，速战而胜，进据西安。8月，孙岳兼任陕西督办，徐升任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1月，国民军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倒奉，孙岳命徐永昌率部经郑州直入保定，猛扑任邱、大城，与张之江部会师天津。孙岳遂于12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徐率部驻盐山、沧州。

1926年1月，李景林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反攻国民军。3月，各系反动军阀反对国民军的大联合形成，国民军四面受敌，于21日退出天津，退守北京附近。徐永昌率所部出居庸关，退集包头。时孙岳病，委徐代理第三军军长职，率部移驻五原。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五原誓师。徐因反对冯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返归包头，旋赴山西访阎锡山，受到礼遇。11月冯玉祥率部进陕，徐即率第三军从榆林间道入晋，被阎锡山以客军名义留驻汾阳、榆林一带。

1927年6月，阎锡山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9月对

奉系作战。徐永昌部被编为南路军，计划自井陘取石家庄再攻保定，但被奉系戢翼翹部夺取定县受阻，遂退集获鹿、平山，构筑工事，固守井陘山地。10月，徐部阻击奉军于井陘一带，使其无法南下。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委徐永昌为第十二军司令、右路军总指挥。5月，徐率部与第四集团军南路军配合反攻奉军，出石家庄循京汉路北进，5月底攻克保定。此时孙岳病死，徐辞去第三军代理军长之职，将该部移交阎锡山，正式归阎统率。6月，徐永昌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协助该省主席商震处理省务。10月12日，绥远设省，徐任省政府主席。1929年8月10日，徐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0年5月，蒋阎冯三方爆发中原大战，阎锡山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兼陇海路司令。鹿、徐率部东进，在考城、兰封一带与蒋军对峙，双方拉锯激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驻考城的冯部石友三倒戈投蒋，使阎、冯方面受到严重打击，战局急转直下，迅即以阎、冯失败而告终。徐永昌率领阎部晋绥残军退入山西境内，被阎任命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阎于下野前委托徐主持晋绥军政。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办理晋绥善后事宜，张将晋绥军缩编为四个军。1931年1月，徐永昌任缩编后的第卅三军军长、山西省政府副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阎、蒋重新合流，在此契机下，徐永昌被蒋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懂得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自己又非阎系，故任省主席后力求韬晦。每届省府例会，徐纵然

出席，亦任凭阎派诸厅委自行其是，以避疑忌。即使如此，徐仍不能久假省主席名义，1933年被阎以“照顾”徐的“肺疾操劳”而免去省主席职，由阎之亲信赵戴文继任。徐仅留下三十三军军长空衔，从未到过司令部视事。

1934年7月，徐永昌受蒋介石电召，经武汉至江西反共前线视察。次年春，徐献策组织参谋团入陕，指挥反共军事，并监督省政，为蒋所采纳。此时日本侵华势力日渐南浸，影响华北一带。徐劝说各派军政人士共同维持国民党政权，拥护蒋介石；同时拟就对日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意见，向蒋进言，得到蒋的赏识，复电中有所谓“一鞭一条痕，针针见血”等语。

徐永昌与蒋介石的关系日趋密切，阎锡山对之颇具戒心。1936年5月，在阎的暗示下，徐被迫辞去三十三军军长职务。6月阎复畀徐以山西清乡督办的空衔，徐以病辞，随即以就医为名离晋，至南京活动。阎一面假意挽留，一面电请蒋径予重任。1937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病故，3月6日蒋宣布由徐继任办公厅主任职。“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徐被委为保定行营主任，协同指挥第一战区抗日军事。1938年1月，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任徐为军令部部长，主管作战参谋、对敌情报及审定各战区作战大纲等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被任命为中国全权代表，参加盟国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代表中国政府与苏、美、英、荷等国代表共同签署了受降书。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徐永昌为陆军大学校长。

1948年12月22日孙科接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委徐为国防部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机成熟。1月21日，徐永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名义，携带蒋的亲笔长函，飞平面见傅作义，要傅部分海陆两路南撤青岛，遭傅拒绝。7月29日，国民党绥远驻军酝酿起义之际，徐永昌再度奉派与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携带代总统李宗仁信件，飞往绥远临河陕坝镇游说，约见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等人阻挠起义，力图劝说董将主力西撤，联合马鸿逵、马步芳负隅顽抗，复遭董等拒绝。8月，傅作义为促成绥远和平起义，前往包头。9月15日，徐永昌第三次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三人的亲笔信前往包头游说，妄图对起义作最后阻拦，并邀傅作义南下，又遭傅回绝。徐见无法回去复命，竟装病赖着不走。傅等识破诡计，晓以民族大义，要徐领衔一起参加起义。徐只得于9月19日绥远宣布起义的当天早晨，“铩羽而归”。徐回广州后不久，即仓皇逃离大陆飞往台北。

徐永昌在台湾被蒋介石任为“总统府”资政院资政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7月12日病殁于台北。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徐永昌先生纪念集》。
- ②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册第293至300页。
- ③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1年

3月版。

- ④ 陈长捷:《徐永昌依附阎锡山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 ⑤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
- ⑥ 樊真:《北平和平解放杂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
- ⑦ 董其昌:《绥远“九·一·九”起义回顾》,《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
- ⑧ 刘万春:《绥远“九·一·九”起义的亲身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

马 福 祥

马启成

马福祥字云亭，回族，生于1876年2月4日（清光绪二年正月初十），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其父马千岭，早年以农商为业，清同治时，与河州摩尼沟阿訇马占鳌由反清转向降清，调转枪口屠杀回民，曾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优厚赏赐，遂发展为河州韩家集一带的巨富。马福祥自幼在私塾读书。十六岁时学习弓马枪箭，寒暑不辍。越年与三兄马福寿同进兰州武备学堂。十九岁应试武闱，获中乡试第二。

马福祥的兵戎生涯，是从清末参加镇压甘肃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开始的。1894年，今青海循化地区撒拉族因教派之争转为反清斗争，河州等地的回族也纷纷揭竿而起，一时“烽火遍河、湟”。时因甲午战争，甘军精锐多调防京畿，所剩“防军无多，且又未经训练”，官府准当地豪绅招兵买马，“练土勇以资防卫”^①。马福祥与二兄马福禄即招募乡勇，组织团练，名“安宁军”，对起义者进行围剿。起义军以他们兄弟“助官军，戮同教”，将其家焚毁，“住宅以及亲族庐舍荡然无一存”^②。次年10月，他兄弟二人率队配合清军在河州外围攻打起义军，并向前来镇压回民起义的清军将领董福祥“力陈剿抚方略”。他们对义军余部“剿抚兼施”，并亲率土勇拆毁穆斯林清真寺，强立“乡约”，严禁诵经礼拜。董福祥信赖马氏兄弟，“倚之若左右手”，

授马福禄总兵之职，并将“安宁军”编入简练军，马福祥当了骑兵管带。

1898年春，马福祥和马福禄率部随董福祥的甘军奉调驻戍蓟州（今天津蓟县），山海关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氏兄弟又奉调入卫京都。这年7月，与敌军战于正阳门，马福禄力战阵亡，马福祥督战打败侵略军夺获城楼。8月14日，那拉氏和光绪帝逃奔西安时，他随扈警卫宫舆。《辛丑条约》缔结后，1902年那拉氏和光绪帝回京，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勤劳，先后积功，得以提督记名”^③。不久，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1904年升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陕西立即响应。时马福祥以巡防统领率部驻兰州，同陕甘总督长庚为首的地方官绅，视革命如洪水猛兽，力主派兵前往陕西“助剿”革命军。当长庚召募回军提督马安良率部前往陕西乾州镇压革命时，马福祥则留守省城遏制革命。但革命潮流已不可阻挡，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3月18日马福祥与原甘肃布政使赵惟熙、谘议局议长张林焱三人联名通电袁世凯，代表全甘承认共和。北洋政府任命赵惟熙为甘肃临时都督，马福祥为青海办事长官兼西宁镇总兵。马在西宁并无实力，迟迟没有到任。

同年底，马福祥调任宁夏镇总兵。时值沙俄导演外蒙“独立”，绥西活佛旺德尼玛受其煽动，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地组织“独立大队”，占据河套，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袁世凯令马福祥前往调解。1913年7月，马福祥会同阿拉善旗亲王塔

旺布里甲拉，以计谋将旺德尼玛及其参谋彭索格那等人擒拿，解送北京。袁世凯政府嘉马福祥“智勇兼备”，“消弭边患”，授陆军中将衔、二等文虎章，以宁夏护军使兼旧满营将军，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④。袁世凯还为他亲书“护国春永”四字。

1915年，袁世凯令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借机请准添练新军，以其侄马鸿宾为新军司令，下辖步、骑兵七营。当时，宁夏、内蒙有些地方不靖，马福祥派马鸿宾率部将肇事者扑灭。1916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对马福祥嘉奖授勋。1917年夏，马福祥继派马鸿宾追剿冒充清裔、被拥为皇帝的达尔六吉，在贺兰山俘虏达尔六吉以下二百多人，并将其为首的十八人解送银川处死。为此，大总统冯国璋又为马福祥授上将衔^⑤。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站在直系一边。安福系垮台后，马福祥认为自己督甘时机成熟，便策动甘肃回族军人在银川召开大会，声讨皖系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并向北洋政府发出“拥马督甘”的通电。但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也垂涎甘督一职，嗾使其部下张兆钾等向北洋政府发出“拒马督甘”的通电，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在京甘绅秦望澜、水梓等以陆洪涛在甘多年，势力较大，向徐世昌全力保荐，徐遂于1921年春发表陆洪涛为甘肃督军，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晋勋二位”，“易督风潮”才暂告结束。

马福祥赴任绥远时，以其侄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将其嫡系“昭武军”编为第五混成旅，由其子马鸿逵为旅长，前往绥远。但该旅仅有五个营，马福祥又从西宁镇守使马麒那里拉来马步青一个骑兵团，从河州、民和等地拉来马斌一个步兵团

及数股地主武装，共扩大兵额三、四千人。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马福祥由于有曹锟作后台，又收编了绥远王英和苏雨生两部，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马福祥在绥远扩军的同时，还依靠地主豪强对各族人民横征暴敛。他强征的土地，从内蒙昭君墓到宁夏陶乐县将近两千里的地区，不计其数，仅后套兰锁一带就有数十万亩，还搜刮了大量财宝。他到处招兵买马，任部属抢劫。他的儿子马鸿逵率部驻扎包头一带，更是为非作歹。当时绥远人民流传着“宁叫土匪过三遍，不叫西军（指马军）站一站”的话。马福祥还借助宗教，加强自己的统治，曾大量刊印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如《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大化总归》等，广为散发。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福祥站在直系一边，发出“讨张”（作霖）通电，向曹锟、吴佩孚请缨出战，以马鸿逵为“讨逆军”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出兵热河对奉军作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吴失利，马福祥见风转舵，一度依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第七师，由马鸿逵任师长，开往绥西磴口一带驻扎。1925年春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为绥远都统，马福祥被段祺瑞执政府委以“西北边防会办”，退出了绥远地盘。

1928年春，国民党新军阀与张作霖的“安国军”相持于黄河南北之际，马福祥见张宗昌、褚玉璞节节败退，张作霖败北已成定局，乃秘密南下投靠蒋介石。他以“国民领袖”为进身阶，向蒋进言：“非团结各族无以立国，而团结民族在疏通意见，俾瞭然于主义之所在，乃可图功。”^⑥蒋介石当时正谋统一全国，遂任马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笼络西北各回族

军阀。

马福祥是个久经世故的官僚，为维护其地位，在各派新军阀间，常以“调和者”的姿态出现。他自投靠蒋介石以后，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开封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赈务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他身兼多职，奔走各方军阀之间，一时被国民党政界称为“和事佬”。

1929年4月，马福祥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青岛市特别市长。这一年西北各地大旱，饥民日死数千，马福祥为笼络人心，自己拿出一小部分钱及向各方劝募的捐款共二、三十万，陆续寄往西北各地救济。在这前后，他还以“振兴回民教育”为号召，在北平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和西北公学，招收回族子弟免费入学，自兼董事长。

同年11月马福祥赴青岛任职。这时，青岛工人群众正在为反对日本纱厂无理开除工人、日本领事干涉中国内政而掀起罢工运动。他一面派员与日领事交涉谈判复工条件，一面向工人群众施加压力，将各厂二百五十多名罢工骨干无理开除。不到半月的时间，便将各厂工潮镇压下去。

1930年初，蒋介石升任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七个月后，又改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时他健康状况不佳，便将多年来写的书札及所著《观澜亭记并诗》、《龙珠山云亭记并诗》等加以整理，由其妻录书、订正后刊出。1932年春，马因心脏病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北上天津休养。6月他前往汉口见蒋介石，在武汉染疾，8月19日北上治疗时，病死途中。

注:

- ① 《甘宁青史略》卷24。
- ② 《朔方道志》卷28。
- ③ 《现代西北》杂志卷2，第6期。
- ④ 《朔方道志》卷26第38—40页。
- ⑤ 《朔方道志》卷首。
- ⑥ 同③。

杨 森

吴银铨

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县人，祖籍湖南衡阳。1884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杨延安系前清典史。

杨森幼年就读广安紫荇书院，后入顺庆府联合中学堂。张澜先后在两校任教，与杨森有师生之谊。1906年杨森在联中毕业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弁目队。1908年升入该堂受军官教育。这时由同学秦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介绍，参加了同盟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驻成都的新军第十七镇六十五标中任排长。1910年晋升为陆军三十三混成协第一营右队队官。

辛亥革命后，杨森编属四川陆军第一师，任营长，时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杨森营为使署警卫。后到成都四川陆军第三师任军士队教育长。1913年“二次革命”发动后，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响应反袁，宣布独立。杨森赴渝投奔熊克武，被任为少校营长。袁世凯令贵州都督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出兵入川讨熊，唐派贵州第三师师长叶荃、混成旅旅长黄毓成率滇黔联军围攻重庆，击溃熊克武部，杨森被俘。当黄毓成清点俘虏时，杨森率先自称系熊部少校营长，黄见其态度直率，乃留杨任司令部少校副官。

1913年底，滇黔联军在渝与川军第一师发生冲突，联军败回云南。杨森到昆明后，离开联军，在安宁温泉开设茶馆营生，同时与滇军军官伙营鸦片烟，遂染上了烟癖。

1915年12月护国军起，杨森经黄毓成推荐，被任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赵又新部少校参谋，入川作战。在川南安福街、牛背石等地与北军作战中，以寡胜众，得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奖勉。时黄毓成任护国军挺进军司令援川，委杨森为叙府城防司令。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知杨森有烟癖，拟当众加以羞辱。黄毓成遂将杨调回赵又新部任参谋处长。杨森从此戒烟。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云南都督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出师四川，将赵又新部编为“靖国军”第二军，杨森任第二军参谋处长。年底杨森任第二军第四混成团团长，参加争夺泸州之役，占领泸州。时川南匪风甚炽，杨森被赵任为泸州清乡司令，他招抚了永宁土匪关子久、王凤岗两部，此后即成为他的基本力量。

1920年3月，川滇战事爆发，杨森宣布脱离滇军，投川军第二师师长刘湘，被编为第二师第一混成旅旅长。8月，刘湘任第二军军长，杨森被擢升为第九师师长，并任“靖川军”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由川北向驻成都的滇军进攻，滇军败走，杨森占成都。9月下旬杨森进驻泸州，自兼永宁道尹。杨离成都时，将所部十七旅旅长王兆奎留驻成都控制兵工厂，专事监收武器弹药，以备扩充实力。

1921年2月，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杨森升为第二军军长，移驻重庆。同年夏，刘湘调一、二两军部分兵力

出川援鄂，声援湖北倒王（占元）运动。杨率第二军东下。9月，正当川军围攻宜昌之际，吴佩孚挥师西上，川军败撤至朱家坪，杨森赴宜昌向吴佩孚请罪，吴嘱杨暂驻恩施、建始一带整训。杨率军于12月回川。

滇黔军被逐出四川后，川军内部各派争权夺利斗争纷起。1922年，第一军与川北边防军赖心辉、第三师邓锡侯、第三军刘成勋等组成“省联军”，联合对付第二军。5月，赖、邓相继派兵逼走杨森留驻成都的王兆奎旅，占领了兵工厂。杨森随即向下川东一军攻击，在渠县杜家岩被一军混成团团长刘伯承出奇兵伏击，杨军惨败。7月省联军分兵三路进攻重庆，杨森求吴佩孚派北军第七师入川援助，但为时已晚。8月，杨率残部逃宜昌投靠吴佩孚。吴委杨为北洋政府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在宜昌收集残部。

1923年2月，四川一、三军之间又爆发了邓锡侯、陈国栋、田頌尧等同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之间的战争。吴佩孚乘川军内讧之机，援助杨森回川。3月上旬，杨森率部回到万县，与熊克武部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熊部发生内讧，杨森4月6日乘虚攻入重庆，继续尾追熊部西进。熊克武向唐继尧乞援，在滇军协助下大举反攻。杨森回师重庆，但通道已被滇军切断，只得绕道退回万县。在吴佩孚支持下筹集弹械饷款准备反攻。

同年冬，杨森、刘湘联络入川黔军袁祖铭会攻重庆，第一军败退潼川，滇军退贵州，杨森等再次进占重庆。1924年1月，杨森率部直插潼川第一军总部，熊克武、但懋辛措手不及，绕城而逃，继而放弃成都退出四川，杨等又进入成都。杨森于

2月19日被刘湘、袁祖铭等公推为省长。同年5月，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发表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兼中央军十六师师长及川军第二军军长，驻成都。邓锡侯任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均驻重庆。

杨森任督理后，独占成都兵工厂，将部队扩充到十万左右，于1925年2月发动“统一之战”，力图以武力统一全川。他以保定系驻绵阳的第十师师长刘斌“称兵犯上”为词，下令将刘斌撤职，并派兵攻占绵阳等县。接着驱走了简阳的田颂尧部及自流井刘文辉部。4月，又将驻遂宁的陈国栋、资内的赖心辉、新津的刘成勋击败。5月，将驻乐山的陈洪范赶往川滇边境，把川南的刘文辉赶到宜宾。杨森在两个月内攻占了七十二县，部队增至十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

杨森威势日增，咄咄逼人，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乃联名请执政府段祺瑞下令罢免杨森。北洋政府于5月免去杨森督办（2月由督理改为督办）职务，调北京署参谋总长，命刘湘以川康督办兼署四川督办。杨森拒不从命。刘湘联络邓锡侯、袁祖铭结成反杨同盟，组成川黔联军。

7月，杨森与刘湘之间爆发了争夺四川霸主的战争。杨森先败于荣昌三溪镇，继而在战斗方酣之际，主将王缙绪临阵倒戈投向刘湘，川黔联军全线反攻，杨军大败，残部为刘湘等收编。10月，杨森逃宜宾转往汉口。当时正值吴佩孚在汉自封为讨伐张作霖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森被委为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

川黔联军逐走杨森后，由于分赃不均，致起内哄，袁祖铭、邓锡侯通过吴佩孚与杨森秘密结成了反刘（湘）三角同盟。刘

湘见袁祖铭积极活动,也不得不与杨森言和,并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关系竭力拉拢,订立“丙寅公约”,支持杨森收回在“统一之战”中失去的旧部。杨森在吴佩孚的援助下,于1926年3月回到万县,将驻上川东的旧部移驻忠州、万县,并就任了吴佩孚所委派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5月,杨、刘通电讨袁祖铭,分路进击黔军,袁祖铭被迫退往川黔边境。自此刘驻重庆,杨驻万县。8月杨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长。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万流”轮在云阳撞沉杨森部木船。9月5日,英舰又悍然炮击万县沿江两岸及省长行署,致使民房、商店被焚千余家,人民死伤四千余,酿成“万县惨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下,杨森不敢贸然与英方妥协,乃迫使英国轮船在川江断航。

这时,正值北伐军胜利进军武汉,杨森见风使舵,也要求参加北伐,被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但杨森对吴佩孚仍抱幻想,暗中勾结孙传芳,10月上旬致孙的密电中说:“拟合力恢复汉阳,夹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①北伐军在鄂西扫荡北洋军残部时,杨森竟以“援鄂”为名,派兵与北洋军合谋进犯武汉。在北伐军痛击下,杨森才于11月21日在宜昌通电就第二十军军长职。但在同一天,却又接受吴佩孚所委“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援鄂军总司令”头衔。后以北伐军迅即进占宜昌,杨森才狼狈窜回万县。1927年7月,吴佩孚由鄂西败退入川,杨森极力加以庇护,并对南京国民党政政府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南京政府于1928年1月7日免去杨森本兼各职。3月,蒋介石为要利用川军蹙桂系之背,下令复杨森职,并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左翼总指

挥。杨部仍驻下川东一带。

杨森对刘湘、刘文辉联成一气很有戒心，加之与刘湘夙怨很深，此时乃与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组成倒刘（湘）同盟军，合力进攻重庆。结果杨森败北，防地尽失，被迫退至渠县罗泽洲防地。后罗部内哄，杨森于1930年冬乘机占据广安。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蒋介石命杨森在川北堵击，杨森败。7月杨森受任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围攻红军，又被击溃。1935年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令杨森开赴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胜利通过川滇边境后，杨森率部尾追，先后在川西北懋功、抚边被打败，死伤甚众，后奉命撤往洪雅整编。次年奉调入黔“清乡”。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森奉命于9月初率部由贵州开往淞沪前线。在收复陈家行阵地的战斗中，所部英勇作战，伤亡惨重。后奉命撤往南京，杨森擢升为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二十军军长，旋调安庆补充整训。后移驻湖南浏阳、醴陵一带。

1939年6月12日，杨森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并逮捕杀害该处干部及家属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同年10月，日军进攻长沙，杨森率部退入铁路、公路两侧山区，以夜袭和侧击与敌周旋，打退日军三次进攻。杨森被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虽然参加了三次湘北会战，但士气远不如参加淞沪抗战时高昂。1944年5月，第四次湘北会战中，衡阳失守。8月中旬，杨森

的总司令部在茶陵地区被围，杨森率部撤向广西柳州。不久，开赴黔东榕江、黎平一带整训。是年12月，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大肆搜刮，黔人大呼“亡黔”，群起反对。1947年5月调任重庆市长，仍控制二十军。

解放战争期间，二十军先后在鲁、豫、鄂等地与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在芜湖、广德间被全歼。蒋介石以二十军“反共有功”，仍保留其番号，令杨森在重庆纠集残部，重组部队。

8月，蒋介石逃川，提出“党政军一元化”，杨森兼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11月解放军入川，杨又兼重庆卫戍总司令，尚图顽抗。下旬，解放军进逼重庆，杨森逃成都。12月中旬，解放军向川西进围，杨森乃于18日逃往台湾。二十军于26日在金堂起义。

杨森到台湾后，被任为“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由于杨森爱好体育，又任台湾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台湾省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

1977年5月15日杨森在台北病死。

注：

- ① 转引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册第47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杨森：《八十自述》，台北版。
- ②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杨森战场球场》，台北版。
- ③ 马宜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④ 《四川辛亥革命资料》。

袁 祖 铭

李德芳 刘毅翔

袁祖铭，字鼎卿，1889年6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他的祖先在“咸同苗回汉农民起义”之际，以办“团”为业，明团暗匪，为地方一霸。他的父亲袁干臣为团总，属下团丁有两三千人。袁祖铭从小在家读私塾，1907年3月到贵阳进入陆军小学堂学习。

袁祖铭于1909年在贵州陆军小学堂毕业后，去武汉报考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因目力近视落选。回到家乡后，应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监王文华约请，任该学堂体操教员。1911年初，改任该县团防局附设将弁班教练。

10月，贵州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奉黔抚沈瑜庆电召，率部赴贵阳护卫府衙，袁祖铭随军担任哨官。11月初军次安顺，4日贵阳光复，刘显世迫于形势，作“赞成”共和的表示，遂得进驻贵阳。但他随后勾结宪政党人，迎唐继尧入黔，颠覆了贵州革命政权。袁祖铭曾随刘显世进攻新成立的都督府。

1913年10月贵州陆军改编为六个团，王文华任第一团团长，袁祖铭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1915年12月护国运动中，王文华以护国军第一路军右翼东路司令的身份，率黔军三个团出师湘西，袁祖铭随军出征。次年2月初，黔军向北洋军发起进攻，第一团攻湖南晃县，袁祖铭率一营在蜈蚣关、大关战

胜北军，占领晃县。接着，袁祖铭奉命配合第三团吴传声部猛攻芷江敌军，突破了江西桥阵地，2月8日占领了芷江。袁祖铭以勇敢善战初露头角。护国之役后，贵州组建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袁祖铭以功升任第一团团长。王文华在黔军是新派领袖，袁祖铭虽隶属王下，但与宪政派联系较深，倾向旧派。

1917年7月，孙中山揭起“护法”大旗。8月，袁祖铭随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所率黔军入川响应“护法”。12月，黔军联合滇军和川军熊克武部，大败北军吴光新部，占领了重庆。次年1月，袁祖铭被王文华任命为纵队长，率黔军配合滇军，赶走川督刘存厚，占领了成都。袁在川战中指挥得力，英勇善战，受到部份黔军将领的拥戴。他便授意其部属联名电请黔督刘显世升任他为黔军第二师师长。刘显世为了用袁祖铭牵制王文华，表示赞同。但王文华反对升袁，不久便以整顿为名，下令赴成都黔军回渝归还建制，调袁任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袁对此极为不满，与王文华关系日渐不和。

1920年5月，川战又起，熊克武以武力驱逐滇黔军，进逼重庆，袁祖铭被王文华任命为黔军前敌总指挥，与熊部川军余际唐的江防军作战。10月，黔军在四川立足不住，王文华令卢焘、何应钦和谷正伦等五旅长率部回黔，发动政变，推翻旧势力代表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王担心袁祖铭从中作梗，便胁迫袁和自己一道赴上海。袁到上海后，因受到王文华监视，行动不得自由。11月，他摆脱王的监视，逃到北京，往谒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和财政总长潘复，诉说贵州政局混乱，人心不安，请求中央政府援助，安定贵州，并自称可以运动黔军归

附中央。靳即拨款二十万元，并电令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归袁指挥，组织“定黔军”。

1921年3月16日，袁祖铭指使人在上海暗杀了王文华。4月，在武昌成立了“定黔军”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定黔军”欲假道湖南、四川回黔，因两省宣布实行“自治”被拒。8月，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通过靳云鹏的关系，袁祖铭得到吴佩孚拨给汉阳枪六千支。从此，他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刘显世被驱逐后，何应钦等五旅长互相争夺贵州政权，卢焘虽被推为黔军代总司令，但徒有虚名，对黔军五个旅既不能统率更不能指挥，贵州政局陷入极度混乱状态。这就为袁祖铭“定黔”创造了有利条件。袁祖铭放弃了假道川、湘回黔的计划，凭其往日在黔军中的威信，加上私人感情，用种种手段分化黔军五个旅。结果黔军的精锐谷正伦旅的王天培、彭汉章两团，首先投入袁部；接着窦居仁旅的毛以宽团、张春浦旅全部亦尽归袁掌握。驻扎在湖南洪江的游击司令王华裔，也早就和袁通了声气。1922年1月，袁未带一兵一卒来到洪江，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天培命王天锡率一营兵前往迎接。袁即以这一营为卫队，取道镇远与毛以宽团会合，是为中路军；王天培、彭汉章部为左路军，由榕江、独山向贵阳挺进；王华裔部为右路军，趋铜仁方面。三路军浩荡前进，于4月9日顺利进入贵阳。8月，袁祖铭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受北洋政府任命为贵州省长。

袁祖铭任省长后，打着“用人不分党派、政权向社会公开”的旗子，任命原宪政党人张彭年为总参议，丁宜中为秘书长。接着解散了省议会，改组了省公署，以原自治党人周素园为政

务厅长，原宪政党人陈幼苏为财政厅长。其他如国民党员平刚，原进步党人任可澄、何季刚，也都分别予以任用。经济方面，为了筹饷扩军，袁把原属财政厅的筹饷局改为定黔军总司令部直轄。筹饷局是专门负责征收鸦片烟税的，袁命该局直接掌握鸦片烟税，加倍征收，还实行食盐官运商销。袁在军事上进行了扩编，对“定黔”有功的军人都分别予以提升：王天培升为第二师师长，彭汉章、吴传心被分别任命为第一、二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是他的亲信何厚光。对袁祖铭的这些措施，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加以概括：“无乱偏戡乱，君休说定黔，三千散议会①，八万赎家严②。人材龟兔鳖，政策运烟盐……。”

袁祖铭入黔当政后，顾盼自雄，大有不可一世之慨。他既看不起往日的老上司刘显世，不欢迎刘回省主政；也不受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指挥，拒绝唐恢复滇川黔靖国联军的通电。这就大大触犯了唐继尧向外扩张的野心。1923年2月，唐继尧以滇军胡国琇旅假道贵州被王天培缴械为借口，自行恢复滇川黔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翼、吴学显部拥联军“副帅”刘显世回黔复职。滇军进入黔境，袁祖铭事前毫无准备，仓皇应战，力难与敌。为保存实力，袁率部退出贵阳。3月12日滇军占领贵阳后，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刘显世又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

袁祖铭撤离贵阳后，由铜仁退到四川秀山。这时，四川省内的一、二军之战正打得难分难解。吴佩孚派人与袁接洽，要袁助刘湘、杨森的二军作战。7月，袁祖铭被刘湘、杨森等共推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因他指挥的范围扩大到川黔鄂陕

甘五省的军队，所以又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了称霸西南，也派胡若愚等率部入川，参加一军熊克武一方助战。双方混战逾年。1924年2月9日，袁祖铭指挥的联军攻克成都。3月，北京政府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还授予他陆军上将。所部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四师，袁任师长。这时他在重庆设立督办公署，所辖军队并不是一个师，而实际有三个师、三个独立旅和两个警卫团，达五万之众。此为袁祖铭一生的鼎盛时期。

袁祖铭在川战中大显身手，声名大噪。唐继尧怕他回师南下，对己不利。加之唐继虞在贵州的一年多中，弄得民穷财尽，遭到舆论的谴责。因此，唐继尧不得不要唐继虞退出贵州。1925年1月23日，袁祖铭派彭汉章为贵州清乡总司令回黔接收政权。不久北洋政府任命彭为贵州省长，王天培为军务督办，周西成为会办。贵州又一次回到了袁祖铭的统治之下。

同年2月，杨森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川，袁祖铭与刘湘组成川黔联军相拒，袁为总司令。9月下旬，杨森兵败出川。12月，袁祖铭和刘湘、赖心辉等川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因饷械补充问题，袁与刘发生矛盾。刘湘等欲以助袁军饷四十万元为条件，礼送黔军出境。但袁祖铭久不开拔。1926年2月，杨森得到吴佩孚的支持，打回四川。刘湘、赖心辉便联合杨森出兵驱逐黔军出境。袁祖铭顶不住刘、杨的夹攻，5月退出重庆，撤回黔北。袁本拟回贵阳，但因贵州无法解决他庞大的军费开支，遂决心率部出湘鄂向外发展。

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

袁祖铭见风使舵，决定投靠北伐军。8月中旬北伐军部署进攻岳州时，任袁祖铭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接着，袁自行改编军队，将所部大为扩充。袁军大本营驻扎湘西，他的部队仍然象在四川、贵州一样，所到之处自委官吏，强取赋税，而且大张旗鼓招收散兵游勇。唐生智曾电请袁祖铭移驻鄂西，交还湘西防地，但袁不予理会。

1927年1月31日晚，驻常德的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受唐生智指使，摆下“鸿门宴”，请袁祖铭“欢度除夕”，袁带着他的参谋长朱崧、亲信师长何厚光及几个亲兵赴宴，被伏兵枪杀于宴会上。

注:

- ① 袁祖铭解散省议会，给每个议员发放三千元的遣散费。
- ② 袁祖铭“定黔”伊始，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在贵州兴义一带引进广西匪兵，收为己用，企图与袁争夺贵州。袁干臣也想把这股匪兵改编，为袁祖铭效力。结果这些匪兵在安龙城大肆抢劫，连袁干臣也被掳到广西山中。匪方高价勒索，袁祖铭不得已，出八万赎金将其父赎回。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兴义县志》。
- ② 庾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
- ③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1。
- ④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周 西 成

范同寿

周西成，字继斌，号世杰，贵州桐梓县人，1893年4月11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生。祖籍江西，其父周廷燊为地主。

周西成十六岁进入桐梓县公立明德小学堂，但他对学业毫无兴趣，1911年从该校毕业后，一心想弃文就武。适逢同乡赵文彬从保定军校毕业，到黔北一带募兵，周与妹夫毛光翔等相约入伍。

辛亥武昌首义后，11月4日贵州光复，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旧军队被改编，周西成转入军政府都督杨蔭诚的卫队部，任副目。12月随杨蔭诚所率北伐黔军出征，师至常德，因南北议和，暂驻常德待命。次年3月滇军据黔，驻常德黔军遭到遣散，周乃于1913年进贵州讲武学堂。第二年，被分派到驻防毕节的李嘉勋巡防营充哨官。其后，被调至贵州陆军第六团第三营任连长。1916年初护国战争中，周西成在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率领下，出师四川。1917年7月，入川黔军与川军发生川黔之战，黔军战败，戴戡战死，周率领全营突围回黔。1918年春，周西成拨归贵州陆军第一混成旅，曾先后驻防湖南沅陵、芷江、洪江等地。1920年督军刘显世被逐，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擢升周为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

1921年7月，黔军响应孙中山号召，派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率兵四团援桂，周西成营拨归谷直接指挥。至柳州后，周因不同意谷将其改编为警卫营，率队返回铜仁，仍归属第一混成旅。1922年1月，第一混成旅内部在是否拥袁祖铭回军定黔主政问题上发生分歧，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周西成趁机以全旅粮饷无着为辞，逼走参谋长徐朝光，控制了该旅，随即自称旅长。4月，孙中山组织第二次北伐，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派人与周西成联系，时回黔主政的袁祖铭正迫周放弃旅长头衔，周即于6月率队入川，进驻彭水，受石青阳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并经石介绍加入国民党。

周西成善于以同乡、戚族关系网罗亲信，周旋于西南各军阀势力之间。早在1920年被提升为营长时，即利用职权将既是同乡又是戚族的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提升为连长；当上旅长后，又将上述诸人晋升为团、营长。1923年2月唐继尧派唐继虞率滇军护送刘显世回黔主政，袁祖铭退入四川，周西成乘机与遵义、桐梓一带巨匪罗成三相勾结，于四川涪陵向黔北推进。中途，罗成三受滇军委为旅长，反戈伏击周军，周遂将罗部击溃，杀罗成三，占领遵义。

周西成占据遵义后，贵州军务督办唐继虞恐其进袭贵阳，派张汝骥部绕攻遵义，周为保全实力，暂退綦江。此时，袁祖铭已在川战中获胜，坐镇重庆。周曾多次向袁输诚，但袁怀疑他与支持熊克武部的滇军有勾结，不予理采。周仍与石青阳联系，被石委为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同年7、8月，周西成利用川军内讧的机会，三次攻占重庆铜元局，掳获大批钱财。10月，熊克武攻占重庆，改委周西成为四川讨贼军第三

师师长。1924年2月，杨森、袁祖铭攻占成都，熊克武退走黔境，周西成在四川立足不住，回师向黔，驻赤水一带。

是年底，唐继尧因唐继虞在贵州弄得民穷财尽，遭到舆论谴责，不得不令滇军放弃遵义，周西成迅即派犹国材部占领遵义，并分兵驻守绥阳、桐梓、湄潭、余庆各县，1925年初又占据毕节等黔西北诸县。于是，东起湄潭、西至威宁的广大地区，皆为周西成所控制。周以赤水、习水、仁怀为中心，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自设兵工厂、造币厂，广积粮款，实力日益壮大，逐渐形成虎踞黔北和黔西北、进而窥视贵州全省的局面。

此时袁祖铭已受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势力甚强。他见周西成野心勃勃，恐成大患，乘击败熊克武的机会，竭力将周拉入其部。周此时对袁虽然心怀疑惧，但很想借助袁的支持夺取贵州军政大权，遂与袁重修旧好，并结为儿女亲家，逐渐博得袁的信任和器重，被委为黔军第三师师长。

1925年2月17日，北洋政府特任王天培为贵州军务督办，周西成为会办，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彭汉章手下仅有三旅一团兵力，黔北和黔西北的广大地区在周西成的控制之下，黔东南十余县则为王天培部所占，地方税款常为驻军截留，彭无力控制；加上彭部军纪败坏，民怨沸腾。袁祖铭看到彭汉章无力理好黔事，又恐彭、周发生冲突，决定将二人的职务对调。1926年1月，袁通过北洋政府改委周西成为贵州省省长，彭汉章任军务会办，驻防黔东。周上台后，竭力安插大批同乡、同学和戚友担任军政要职，非桐梓系的政治势力或个人则加以排挤，以致当时有“有官皆桐梓”之说。

5月，四川杨森、刘湘联合驱逐袁祖铭，袁不能敌，撤回黔

北。周西成恐袁夺取贵州的统治权，他一面朝夕趋承于袁的左右，博取袁的信任，一面对袁的部下进行种种拉笼，共同促袁部向外发展。时逢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袁祖铭考虑到贵州无法解决他庞大的军费开支，遂受委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采纳周西成“问鼎中原”的建议，经黔东出兵湘西。

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李益之等人到贵州筹办建党事宜，周西成虽然早已加入国民党，却不愿国民党势力插足贵州。1927年春，周寻找借口，将张、李二人逮捕，并将李益之暗杀。事后，周以李有“共党嫌疑”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又派王度、黄乾瑩等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但王、黄在贵州同样遭到周的冷遇，无法开展工作。

周西成虽然拒绝国民党染指贵州，但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却与蒋介石配合默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派代表赴南京活动，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当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指使粤、桂、川、黔四省军阀出兵进攻两湖。周西成欣然响应，除派人在上海发“讨共”代电外，并委其第二师师长犹国材为“讨共总指挥”，出兵湘西，企图乘机开拓地盘，扩充个人实力。后犹部因与当地军阀争地盘而发生冲突，为湘军击退回黔。

周西成统治贵州后，竭力加强对进步思想的钳制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黄齐生，因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并在校刊上发表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文章，一直为周所忌恨。1927年夏，周下令将黄齐生解职，旋以“接近共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为名加以通缉，迫使黄逃往四川。同年8月，又因贵阳达德中学师生与共产党员王若飞及黄齐生

等时有书信往来，对他的封建反动统治不满，周便以“达德学校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共产党，捣乱贵州”为名，将该校查封解散。

周西成的封建迷信和专制思想都很浓厚，他的军署大堂设有“三军司令”牌位，经日香烟不断；每月望朔，必亲赴贵阳八大庙敬香祈祷；凡新委任的文武官员，必须到城隍庙跪拜敬香，宣誓效忠，才准上任。在他统治贵州的几年里，任何对现政权的不满和反抗，都遭到严厉镇压，甚至在外地报刊上著文反对过他的贵州人，回到家乡就遭杀害。

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三年中，在整顿吏治、清除匪患、整理财政、兴办实业方面，曾作过一些努力，并收到一定效果。早在1926年8月，周就下令成立“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对贵州历届军阀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同年，成立贵州路政局，着手兴建公路。此外，还兴办了发电、造纸、采矿等一些实业项目。因而在他统治期间，财政状况较前略好。

1927年冬，云南胡若愚、张汝骥与龙云之间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周西成与胡、张联合，委毛光翔为“援滇总司令”率部出战，企图趁机扩大地盘。但黔军在滇境连战皆败，受到很大损失。营长顾万武被围后投降滇军，周将其全家二十七人悉数枪杀。

1928年春，蒋介石加委周西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总指挥”，令其率部“讨桂”。周对蒋一向存有戒心，此时又与云南龙云交恶，恐其攻黔，故不愿再与桂系结怨。他不仅拒绝出师讨桂，反与桂系串通，秘密签订“黔桂联盟协议”，联合反蒋。

与此同时，原黔军师长、国民党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欲打

回贵州，派人到南京与何应钦、王伯群联系，获得一批军械，于10月中旬由鄂西来凤誓师回黔。周西成闻讯，命王家烈率部抵御。11月9日，李燊部进占酉阳，19日，铜仁被围，王家烈师屡战不利，周亲赴驰援，方将李部击退。是时，蒋桂之争激化，蒋介石为将四十三军留驻湘鄂边境牵制桂系，电令双方停战，李军退走，战事始歇。

1929年3月，蒋介石以讨桂为由，委龙云为“第十路讨逆总指挥”，电令驻滇黔军归入龙云所部，假道黔境入桂。接着蒋又电周，声称“中央决心讨桂，势在必行”，令周“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大计，勿稍犹豫”。周认为滇军仅两师兵力，不足为惧，断然拒绝蒋的电命，扬言誓与胡若愚、张汝骥并力消灭龙云，结成云贵联军，东下与蒋一决胜负。随即率教导师偕同毛光翔、黄道彬师迎击滇军。此时，滇军两师与李燊部由盘县攻入黔境，周军因指挥混乱，中路被突破，盘县、普安相继失守。5月22日，周西成亲率留守安顺的总预备队驰援镇宁，被李燊部袭其后，全线溃败。激战中，周中弹负伤身死。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周西成墓志铭》。
- ② 《周西成年表》。
- ③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
- ④ 《桐梓县志·卷8·军务志》。
- ⑤ 《军事杂志》第13期。
- ⑥ 刘其贤：《黔东战记》。
- ⑦ 黄乾堃：《贵州军阀桐梓系》（未刊稿）。
- ⑧ 谢孝思：《黄齐生传略》。
- ⑨ 贵州省档案全宗2、全宗39、全宗60有关案卷，贵州省档案馆藏。

王 天 培

熊宗仁

王天培，字植之，号东侠，侗族，贵州天柱县人。1889年1月5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四）出生于一个兼营商业的地主家庭。其父王伯登，曾任清军绿营都司，得清政府授予振威将军封号。

王天培幼时在本地北乡学堂就读，1906年转入县城高等小学堂。次年毕业，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1909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辛亥革命爆发时，王天培与同学一道，参加了武昌起义。1912年，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初，因母逝世，告假回乡奔丧，曾纠合乡绅谭毓坤、李世荣等组织乡兵，查禁会党。

1914年，王天培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经陆军部委派回贵州，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团任见习排长，奉命“视察南防，协助清乡”^①。不久，升任连长，并在王文华创设的集训黔军的模范营任教官。

护国战争时期，王天培随同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王文华出湘西。在与北洋军马继增部争夺晃州、芷江之间的杀牛坪战斗中，王天培率领的连队英勇顽强，立下了功劳。护国战争结束后，王天培晋升为营长。

1917年8月，王天培随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入川作战，驻军

綦江。12月，王天培所部第二营与北洋政府委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的军队激战于巴县土桥、三百梯，为黔军顺利攻克重庆开辟了道路，得到王文华和纵队长袁祖铭的赏识，不久升任黔军第二团团长。

1918年3、4月间，王文华与袁祖铭争夺黔军领导权的斗争公开化，王天培因与袁为贵州陆军小学同学，又是换谱兄弟，站在袁祖铭一方，成为拥袁派的得力人物之一。在黔军军官中逐渐形成的“士官系”和“保定系”^②两大派系斗争中，王天培是“保定系”中有影响的实力人物。1920年10月袁祖铭被王文华解除兵权，准备赴上海之前，曾与王天培密谈数次。袁走后，王天培与袁时常有函电往来，因而成了以后袁祖铭“定黔”时拥袁派的首领。

1920年11月10日，贵州发生“民九事变”。贵州军阀中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推翻了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统治，军政大权落入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浦和何应钦五个旅长手中，黔军代总司令卢焘和代省长任可澄都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接着出现“五旅争权”的局面，各旅长竞相争夺对团的控制。王天培的第二团隶属于谷正伦的第二旅，但王一向对谷怀有二心。而第五旅旅长何应钦为了压倒谷正伦，极力拉拢王天培。王两面讨好，坐收渔利。黔军总司令部为了调和五旅之间的矛盾，将全省划分为五大防区，分别由五旅所属的十个团割据。王天培的第二团驻锦屏一带。本来二团只有两个营，在由贵阳赴锦屏途经镇远时，他收编了刘显潜等人的游击军四百余人，编为第三营。

1921年夏，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兵援桂，谷正伦乘机将

王天培因带到广西。王天培到柳州后，又收编了张廷光等人的游击军武装二千余人，实力已经超过一旅。黔军在广西并没有参加什么战斗，因为陆荣廷等已经退出了广西，战事告一段落。但谷正伦、王天培等部以此标榜自己支持孙中山，援桂有功。1922年1月19日，孙中山调黔军到桂林、柳州，改编为中央直辖黔军，以谷正伦为总司令，王天培为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并于此时加入了国民党。

这时，贵州政局混乱，袁祖铭想乘机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率部回黔。王天培先派其弟王天锡率第二营到湘西去迎袁，随后自己率部由榕江、独山到达贵阳，扶持袁祖铭上台。袁先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8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省长。王天培在“定黔”中立下了首功，被袁祖铭委为定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省公署军务处长。王此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定黔军的半数。

同年12月，滇军胡国琇旅假道贵州自桂返滇时，王天培与袁祖铭合谋，在剑河县的瑶光河口将其一千六百多支步枪、四挺机关枪全部缴械，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唐继尧大为愤恨，于1923年2月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万余人，以护送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回黔主政为名（袁发动“定黔”时，曾允拥刘回黔，成功后背约拒刘），大举侵黔。袁祖铭兵力不足，一触即溃。王天培随袁祖铭退到川东，进驻重庆，加入了四川军阀的混战。

袁祖铭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扩充了实力，1924年底重新组编黔军，把王天培部编为第九师，下辖王天锡的第十七旅、牟银洲的第十八旅和牟守光的独立旅。1925年2月，袁祖铭请

北洋政府任命王天培为贵州军务督办，目的在于削弱王天培对在川黔军的控制权。王天培识破了袁祖铭的计谋，不回黔就职，仍然驻在重庆。

1926年夏，四川军阀刘湘、杨森联合驱逐黔军，王天培的第十八旅大部投降川军。王在四川站不住脚，要回贵州也有困难，时值北伐战争起，便转而依附于国民革命军。7月中旬，王在綦江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职，这支军阀队伍摇身一变就成了北伐军。当时，袁祖铭也投入北伐军，受委为左翼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彭汉章两部由袁祖铭节制率领进抵湘西。由于他们行动迟滞，一度引起蒋介石的怀疑。8月6日，蒋介石“电催王天培、彭汉章迅速集中津澧，与正面齐头并进，以便会攻武汉”^③，王天培的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的助攻任务，配合其他部队，击溃了吴佩孚军卢金山部，解除了长江上游的军阀势力对武汉的威胁，立了战功。同时他收编了卢金山的残余队伍，使第十军扩大为六个师、四个直属团，官兵达九万余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出兵讨蒋，派吴玉章等人到宜昌慰劳第十军将士，劝说王天培支持革命的武汉政权。但王天培执意投靠蒋介石，阻止武汉北伐军东下讨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时，王天培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1日，蒋介石委王天培担任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指挥第十军的“枵腹”士兵，与奉鲁白俄军的铁甲肉搏^④，先后攻下安庆、徐州，占领鲁南。7月，津浦线上战事逆转，孙传芳、张宗昌的联军反攻，李宗仁、白崇禧等部全面溃退，第十军孤军突出，寡不敌众，致使临城、徐州相

继失陷。为了重新控制战略要地徐州，蒋介石自兼总指挥督师反攻，7月26日电令王天培为他火中取栗。王天培在“兵疲弹竭，伤亡众多……兵心涣散、士气颓丧异常”的情况下，驱赶着在徐州陷落时就“伤亡逾三分之一”^⑤的第十军投入战斗，节节溃败，直到淮河边。上。蒋介石在遭到失败后，以退为进，于8月13日通电下野，并将王天培当作替罪羊，以擅自撤退、克扣军饷等罪名将其逮捕下狱，于9月2日在杭州秘密处死。

注：

- ① 《王永泓、王永明哀启》。
- ② “士官系”是黔军军官中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何应钦等为首的一派，基本立场是站在王文华一边；“保定系”是以袁祖铭、王天培等为首的贵州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基本立场倾向袁祖铭。
- ③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2第65页。
- ④ 王天培在被蒋介石枪毙以前所作的《宁归歌》中有“哀我将士，万里从征，枵腹从公兮，惨惨无人知……白俄铁甲兮，搏以肉体”的句子。
- ⑤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3第122页、第140—141页、第108页。

李 弥

荆德新

李弥名炳仁，号文卿，云南莲山（今盈江）人，1902年11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就学于莲山太平镇两级小学堂，继去腾冲县城举人王承谟私馆受业。

1924年，李弥离家去广州，在驻粤滇军第七师师长李根源处当勤务兵。李见他精明能干，有一定文化，甚为喜爱，提拔为副官，接着又送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10月，李弥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往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任职。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李弥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排长，团长朱德多次劝其认清大局，跟随起义，李执意不从，只身离赣去南京，任总司令部警卫团连长。不久被派入川，到第二十二军赖心辉部，先后任营特派员、营长、副团长等职，曾参与四川军阀混战。1930年后，李弥随五十一师师长张英在鄂西、赣南多次参与国民党的“剿共”战争。1932年秋，陈诚借口驻防江西永丰的张部“纪律太坏”^①，将该部包围缴械改编。李弥拒不受命，带领该团官兵冲出重围，到南昌见何应钦。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李弥，问他为何不服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答称，过去校长只教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

故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李弥此举深得蒋的赏识，遂被编属熊式辉部周浑元第五师任团长，继续与红军作战。1936年，李弥到南昌江西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受训一月，后出任江西瑞昌县长，继调宁都任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十六团团长。

1938年，李弥先后调升三十六军九十六师二六八旅副旅长、旅长。次年，晋升该军第五师副师长，驻防重庆。1940年李弥调任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1941年4月奉命增援宜昌，在天皇寺、雨台山一线与日本侵略军对峙，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以山炮轰击日军宜昌机场，命中油库，击毁敌机二十一架。同年秋，鄂西国民党军败退，荣誉第一师撤往湖南澧县。1942年李弥擢升第八军副军长兼湖南芷（江）绥（宁）师管区司令。同年，日军有从越南直犯云南的迹象，第八军移防云南河口、马关。1944年1月，史迪威指挥北缅战役，3月要求蒋军增援。第八军被编为远征军直属预备军，6月奉命开赴龙陵增援。部队渡过怒江，进至松山，山峦叠嶂，地势高耸，日军侵占此地后多次加强工事，因而易守难攻。7月，第八军攻击松山，与日军五十六师团二三联队反复争夺两月余。李弥亲临前线，针对日军的坚固工事，集中火炮近距离轰击，与美军飞机低空投弹配合，遂将敌人工事摧毁。10月，第八军克复松山，全歼守敌，李弥晋升第八军军长。1945年1月，第八军由于伤亡过重，调回滇东的陆良、路南、师宗等地整补训练。8月日本投降，第八军调离云南，开往两广。在南宁和九龙，李弥派人与美军联系，获得汽油、被服、汽车和通讯器材的补给。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蓄意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1月，第八军由九龙乘美军第七舰队船只抵青岛。李弥在胶东借

“受降”之名，接收日军鱼船数十艘，并大量收编伪军和地主武装。他指挥第八军多次向胶济线的八路军进行挑衅。1946年1月，李弥率第八军侵占潍县、昌乐等地。国共停战协定于10日公布后，人民解放军胶东军区代表会见李弥，义正词严地指出，胶东是八路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的，蒋军无权进入。但李弥拒不撤兵停战，还向部下示意：“打打再说吧。”②

7月，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李弥指挥第八军先后向淄博、益都、平度、掖县等地进犯。在平度，掖县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两个营。12月，奉令回守潍县，并将该军分别配置在沙河、昌邑等地。

1947年5月，第八军改为整编第八师，李弥任师长。他将第八军到山东时收编的伪军编成独立旅、独立团。7月，蒋军发动“南麻战役”，李弥率领该部六个团在临朐阻击解放军被围。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三次派人送信，促其弃暗投明。李弥拒不作答，负隅顽抗。这次战役，整编八师死伤五千余人。蒋介石为了嘉奖李弥和整编八师的“忠诚”，派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到山东慰劳，授李弥“青天白日”勋章。李弥被蒋介石召见后，踌躇满志地说：“这回算是通了天了。”③9月，李弥的整编八师配合整编二十五师、五十四师沿烟台、潍县再犯胶东。整编八师沿线设防，兵力分散，在昌邑、掖县又被解放军消灭两个团。11月，整编八师扩编为整编第八军（兵团编制），李弥再任军长。

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迫使蒋军处于战役防御地位，蒋介石不得不调整部署。1948年7月，整编第

八军开往徐州，李弥升任第十三兵团司令。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首先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受命解围。李兵团的第八、九两军进至八义集、大许家等地时，受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阻击，集中力量打了七天多，一村一庄地争夺苦战，仍无法前进。李弥抱怨蒋介石不听他的建议，不在淮河而在徐州决战，是战略上的失策。到这时他丧失信心，经常大叫：“该死，该死！”“完了，完了！”^④11月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南逃跑，12月4日被围于永城东北。6日孙元良兵团突围被解放军歼灭，15日黄维兵团被歼于宿县双堆集，李弥、邱清泉两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在陈官庄附近地区，已成瓮中之鳖。但李弥仍然执迷不悟，再次拒绝陈毅派人送去的劝降信，杀害带信的蒋军排长，枪毙丢失阵地的团长，下令射杀向解放军投诚的蒋军官兵。1949年1月10日，拒不投降的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被全部歼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李弥只身化装潜逃。

李弥判断直接南逃可能凶多吉少，遂北走已获解放的徐州、济南，取道青岛南下。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召见他，决定重建第十三兵团，李弥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十三兵团调至衡阳，改称第六编练司令部，奉令开云南。6月，李弥经广州到昆明，向云南地方当局和各界人士疏通，欲驻昆明，遭到拒绝，只得改移重庆。蒋介石为了控制云南，在大陆上作最后顽抗，又令第六编练司令部所辖第八军开入云南。9月，李弥率领所部经泸州移驻沾益、曲靖，原驻滇东南的第二十六军亦投归他指挥。

李弥依照蒋介石的意图，到滇后大肆活动，笼络地方人士，借以站住脚跟，伺机赶云南省主席卢汉下台。对于云南各界人士劝其投归人民的忠告，李弥充耳不闻，甚至公然叫嚣说：与共产党水火不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⑤。

12月9日，卢汉及其军政人员率部起义，李弥等人在昆明被扣。为了争取在滇蒋军参加起义，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李弥等人为委员。李弥在被扣留期间，经过多次劝导，被迫口头上表示愿意参加起义。为了解除蒋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将李弥放回。但李弥回部后，率残部去滇南，图谋反攻。

1950年1月，李弥离部去台湾。9月，李弥奉蒋介石之命潜至缅甸北部，纠集外逃蒋军残部和部分土顽武装，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游击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蒋派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1年5至7月，逃缅蒋军残部两次窜扰云南边境，解放军边防部队在耿马、沧源、孟连等地给予迎头痛击。1953年1月，李弥残部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活动于中缅边境一带。在缅甸政府的武装进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将逃缅蒋军改称“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于年底至1954年将残部主力陆续撤往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先后充任“国民大会”代表、“中央评议会”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12月8日在台湾死去。

注:

- ① 李心武:《回忆叔父李弥》(未刊稿)。
- ② 同①。
- ③ 同①。
- ④ 《全军覆没的杜匪部“将军”们》,《淮海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第 403 页。
- ⑤ 李镜天访问记录。

刘 显 潜

熊宗仁

刘显潜，字如渊，别号井陆，贵州兴义县人。1865年1月25日（清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85年他补县学生员，次年食廪，后屡试不中，居家赋闲。1900年曾随人至重庆寻觅进身之阶，不久返回。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分三路进攻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潜的叔父刘官礼奉命在滇、黔、桂边一带集中地主武装，组织靖边团营，镇压起义军。刘显潜被委任为中哨，与其堂弟刘显世集结团防兵夺回县城，迫使会党起义军退回广西。刘显潜因功被清政府升为管带。

1911年春，刘显潜被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命为广西边防军管带，率兵驻防黔桂边界，先后镇压了上岩、基马、茶溪等地群众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被擢升为广西省防军统带。

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贵州、广西相继宣告独立。刘显世当上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为对抗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他要刘显潜速返兴义，建立团防，为自己经营后方。

1912年3月，唐继尧率滇军以“假道北伐”为名，颠覆了贵州的革命政权。刘显潜在兴义一带扩充民团，成立“保卫军”四个营，配合滇军镇压革命群众。不久，贵州革命派首领

张百麟和贵州巡防军南防统领陈守廉被以刘显世为首的贵州反动势力追捕，由安顺退至兴仁、贞丰，刘显潜派保卫军前往包围，张百麟等被迫退走广西。兴义地区各县的革命群众，都被刘显潜当作“匪”和“哥老会”而进行镇压。刘显潜因此被唐继尧擢升为兴义总兵兼西防统领。他帮助唐继尧、刘显世稳定贵州局势，镇压汉、苗、回、彝各族人民的反抗，十分出力。当时威宁、水城一带有以安桂林、安鹤翔、安三妹为首的彝、苗人民群起反抗滇军暴行，刘显潜“督饬军队，驰往剿办”^①，俘获安三妹处死。唐继尧为了加强对与云南毗邻的黔西南地区的控制和便于征收丁粮，命令刘显潜在兴义府六属划拨插花地段，健全行政机构，委派官吏，使盘江一带成为唐、刘政权统治下最稳固的后方。

1914年5月23日，刘显潜被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黔西道尹兼上游清乡督办；7月29日被授予四等文虎章。唐继尧、刘显世认为刘显潜跟随自己“几乎无役不从”，“任劳任怨”，曾先后呈请北洋政府授以陆军少将军职，只因“已授文秩，未便准补军官”^②。1915年6月20日袁世凯又赏给他四等嘉禾章。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蔡锷和戴戡由天津向贵州发出策划武装反袁的密电。刘显潜见局势动荡，以省亲为名，由贵阳返回兴义募集旧部，又组成四个营，准备应付时局变化。其堂弟刘显治当时任刘显世的驻京代表，屡来函电，认为“滇黔如真反袁，十九无成”，要刘显潜“从速安顿家小”^③，作好两手准备。到云南起义后，袁世凯于1916年1月15日提升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授予他男爵封号，设行署于兴义，企图利

用他阻止贵州参加护国运动。当戴戡率领护国军由云南向贵州进发时，刘显潜函令游击军管带易荣黔率部阻止戴戡过境。易荣黔迫于各方讨袁压力，不敢遽行阻止，乃亲往会见戴戡协商，双方未交手，戴于1月24日率部进入贵阳。

1月27日，刘显世被迫宣布贵州独立。但刘显潜受刘显世密囑，仍向袁世凯密电输诚，为自己留后路。到护国战争在川、湘境内激烈展开后，刘显潜才迫于大势所趋，开始表示反袁。他驻兵在南盘江一线，防堵由广西进攻滇、黔的北洋军。北洋军进攻云南邱北县时，刘显潜曾派兵威逼广西西隆，迫使北洋军溃退。2月下旬，刘显潜回驻兴义，着意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久护国军在四川战场告急，总司令部调刘显潜任护国军黔军援川总司令，但他有意迟滞，于3月中旬开始出师，5月下旬才到达四川边界，而四川已于5月22日宣布独立。刘显潜在四川战场未放一枪，便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授予刘显潜陆军中将衔和一等文虎章。

护国战争前后，贵州军阀内部逐步形成了以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和以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刘显世曾拟以刘显潜取代王文华，因黔军官兵反对，未能实现。护国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委刘显潜为全省游击军总司令。刘显世为牵制王文华的力量，令刘显潜回兴义扩大游击军，编成三路，共一万多人。

1920年11月，贵州发生“民九事变”，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取代了“旧派”的统治，刘显世被迫下野。刘显潜见大势已去，于12月宣布撤销游击军司令部，同刘显世一道赴云南，投

靠唐继尧。他的游击军如鸟兽散，有的投靠了袁祖铭，有的占山为王当了土匪。1921年初刘显潜一度由昆明赴上海，再转至香港，先后与袁祖铭、唐继尧密谋回黔之策。时王文华已被暗杀，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拟回黔夺权，袁与刘显潜约定“定黔”成功后，由刘显世任省长。刘显潜率两个连的武装，于1922年2月由昆明回黔，在兴义宣布成立定黔军西路总指挥部，抢夺黔西南和黔西北的地盘。为了扩充军队，霸占与滇、桂交界的南、北盘江流域，刘显潜和袁祖铭之父袁干臣不惜网罗广西土匪入黔，导致4月16日广西土匪洗劫南笼县（今安龙县），使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千多妇女被掳掠至广西，造成了贵州历史上罕见的匪祸。

袁祖铭“定黔”成功后，背弃前约，没有把省长一职让给刘显世，刘氏弟兄决定重整旗鼓，驱袁夺权，又乞助于云南军阀。同年11月，北京政府委任刘显潜为滇黔边防督办，他将军队扩充到四个团，设督办署于兴义，与袁祖铭分庭抗礼，并策应滇军入黔。1923年2月初，刘派两个团进据关岭。2月13日，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一万余人侵入贵州；刘显潜在兴义与唐继虞召开秘密会议，宣布驱逐袁祖铭，拥护刘显世回黔主政。袁祖铭军败退走四川，刘显世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刘显潜为会办，安顺以西复为其所控制。是年冬，刘显世病，刘显潜一度代理贵州省长。

1925年初，袁祖铭在川势大，有回黔意图。唐继尧一面向袁让步，自动从贵州撤退；一面趁孙中山在北方病重，向两广伸手。他派滇、黔“建国军”六万余人假道广西入粤。刘显潜被唐继尧委为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官，由黔东南入广西

进攻柳州，结果被李宗仁所部桂军击败，退回贵州。不久，滇军侵桂失败退回云南，同时袁祖铭部回黔，在兴义、兴仁、安龙迫使刘显潜的武装大部缴械，小部溃散。刘显潜不得不宣布下野。从此，兴义刘氏武力全部瓦解，一蹶不振。

刘显潜于 1938 年病死于兴义县。

注：

- ① 《政府公报》，民国元年 12 月 12 日，第 225 号。
- ② 《政府公报》，民国 4 年 6 月，第 1111 号、第 1112 号。
- ③ 张彭年：《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续 1）》，《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第 44 页。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严油华：《滇军第二次侵黔实录》，《文史资料选辑》第 30 辑。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

③ 《贵州政报》。

阳城，但因清兵骤增，力量悬殊，遭到失败，退至宜阳县。12月，王天纵、憨玉琨等率所部三千余人到达潼关，加入革命党人张钫所统率的“秦陇复汉军”。张钫任命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憨玉琨、柴云升、张治公等为标统，出潼关东征河南。次年1月初，东征军进抵灵宝，激战四昼夜，清军大败东逃。憨玉琨等率部猛追二百余里，直抵渑池县，中原为之震动。袁世凯急调重兵堵击，憨玉琨等败退，经潼关撤至雒南、商州一带。王天纵率部走南阳。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兵。憨玉琨等部四千余人被张钫编为三标一营，开回豫西“剿匪”，分驻于河南府、汝州、陕州所属之二十二县，豫西观察使刘镇华兼该军统领。因其靠近嵩山，故名为“镇嵩军”。憨玉琨任镇嵩军第三标标统，所部六百余人，有马二百余匹，称为马标。

1913年初，镇嵩军在豫西饷项无着，处境困难。豫督张镇芳因其部多系“刀客”出身，欲相机消灭之。刘镇华遂率部积极为张“剿匪”，以取得信任。憨玉琨有胞弟憨玉林，系一“杆首”，憨玉琨回到家乡亲将其杀死；张治公、柴云升也将自己的堂兄或亲信“杆匪”处决。因此得到张镇芳的鼓励，表扬他们“大义灭亲”。镇嵩军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法，将豫西一带大股绿林武装剿除，自身得以保存。

不久，白朗农民起义军开到豫西，高举反袁旗帜，声势浩大。袁世凯下令刘镇华镇嵩军配合赵倜“毅军”等会剿白朗军。憨玉琨奉命率队在豫陕边境追剿，屡立“战功”，得到了袁世凯的嘉奖。袁世凯复辟称帝，憨玉琨追随刘镇华竭诚拥护。

憨玉琨以骁勇善战著称，是镇嵩军的重要悍将。1918年2

月，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张义安等带领靖国军围攻西安，皖系陕督陈树藩不支，急电刘镇华入陕相助。刘率所部三千余人攻下潼关后，命憨玉琨为先锋，向西安急进。憨部经渭南、零口、临潼、灞桥、十里铺几次战斗，击溃了靖国军，直抵西安城下。不久，镇嵩军扩编为七路，达万余人。憨玉琨升任第三路统领，驻防商州、山阳一带，深得陈树藩的垂青。

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为直系所控制，陕督陈树藩被撤职。镇嵩军投靠直系，憨玉琨积极接应直军入陕，为直系立下了功劳，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头衔。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憨玉琨被任命为援直镇嵩军前方总司令，率部进出豫西。他的任务是以剿匪、维持地方治安来稳定直系的后方。憨玉琨借此机会招匪扩军，他先招抚了王振部千余人，编为补充团；后又收编了豫西绿林万选才、孙殿英等部数千人。同时，憨玉琨使用放、收外队^①的惯技，“迭次将豫西土匪、流氓一律招来，月有数起”^②，并收编陈树藩旧部及民间武力，因之实力扩展甚速，到1923年冬他的部队达三、四万人。

憨玉琨自己虽少文化，但他颇注意“招贤纳士”。他请陕西知名人士谢阴南为高等顾问，学者党晴帆为秘书长，同时对部众严加整训。因之所部的教育、训练、军纪方面，在镇嵩军中算是首屈一指，得到了吴佩孚的重视，于1923年冬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憨任师长。憨向吴表示，仍愿归老长官刘镇华指挥，吴予以批准。

1924年春夏间，憨玉琨奉令征剿渭东郃阳、澄城、白水、朝邑、大荔、蒲城六县的非直系武装以及靖国军高峻残部有

功，得到吴佩孚的嘉奖，被北京政府授为肇威将军。刘镇华还电请北京政府给憨加上将军衔，酬其劳绩。

憨玉琨随着实力的增长，野心益大。他目睹刘镇华靠武力扶摇直上，便产生了“有为者亦若是”的思想。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成立了国民军。刘镇华一面通电拥护国民军，拥护段祺瑞执政府，一面密电憨玉琨：“段可捧，吴不能背，冯、胡要讨。”^④并令憨玉琨率部东出潼关，阻止南下中原的国民军。憨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后，采取“捧段、背吴”之策，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先到洛阳逼走铩羽归来的吴佩孚，进兵郑、汴，然后出兵豫北，准备抗拒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南下，夺取河南地盘。此亦符合刘镇华统一豫陕的谋划，因而得到刘的暗中支持。不久，北京政府任命胡景翼督豫。胡率部进入河南，憨大失所望，被迫暂时撤至荥阳、巩县、洛阳、陕县一带，控制豫西地盘。

憨玉琨盘踞豫西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他为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国民三军军长孙岳为总司令）。但他决心以武力驱胡，夺取河南督军地位。在刘镇华的指使、协助下，憨玉琨大收直系旧部，强编民团、武警，广招溃兵、土匪及其外队，迅速扩大至三十六旅之众。同时，他截留田赋、厘税，擅自任免道尹、知事、局长等，扩展其势力至二十余县。

1925年1月23日，憨玉琨指使所部王振密派部队突然袭击驻禹县之国民二军曹士英旅，禹城居民牵连被杀者二、三千人。憨反诬“陕人擅杀豫人”，借机煽动驱胡。从此胡、憨两军矛盾日趋尖锐。

2、3月间，胡景翼所部国民二军与憨玉琨所部镇嵩军共

约二十余万，在豫西展开大战。两军精锐部队集结于陇海线荥阳、巩县之间，猛烈厮杀。憨军不支，节节败退。驻陕之镇嵩军倾巢出动入豫驰援，张治公师亦来参战，刘镇华并亲自到洛阳直接指挥，但终不能扭转战局。在胡军正面勇猛进攻、侧面不断奇袭下，憨军内部混乱，前线倒戈，后方哗变，腹背受敌。憨不得不逃出洛阳，后又组织浞东之役，仍然遭到惨败。至此，祸陕七年，扰豫数载，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六万多人缴械投降。憨玉琨逃回嵩县老家，企图收拾残部，进行反攻。但大势已去，连他的亲信旅长杨景荣也闭门不见他。憨玉琨羞愤、懊丧至极，于当年4月2日服毒自杀。

注：

- ① 外队：系被收抚后又被暗放的土匪。官军让其继续拉杆为匪，二者互相为用。外队给抚军暗送金钱，抚军给外队暗送枪弹；抚军不能自安时，则有所归，外队不能自安时，则有所靠。此为招抚土匪以来暗行之惯例。许多官军亦循此例，放出外队，等到杆子拉大了，予以招抚，借以扩大实力。
- ② 陕西《新秦日报》1925年3月26日。
- ③ 吴沧洲：《胡憨战争回忆录》。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
- ② 张飏：《辛亥革命中潼关的三次攻守战》，《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 ③ 尹文堂：《镇嵩军始末》，《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 ④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

王 振

庞守信

王振，原名耀堂，字荣轩，因兄弟五人行五，人称王老五，河南宝丰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作过长工。王振没上过学，年轻时以务农为主，兼开小煤窑。清末豫西一带灾荒频仍，兵匪横行，民不聊生。王振铤而走险，投身绿林。

辛亥武昌首义后，河南革命党人组织民间武力会攻洛阳失败，一部分溃散的学生队路过宝丰西乡，王振等乘机围缴了他们的枪弹，自此聚众数百人，活动于宝丰、鲁山、郟县等地。1913年，白朗军起事，王振投白朗军。次年白朗军失败，王振重新为匪。1920年王振率匪众三百余人，与杆匪刘占标等会合。因王善于谋略，被推为头目，遂有众二千余人，活动于临汝、登封、宝丰、鲁山、郟县、禹县一带，绑票，截款，烧杀掳掠，人民惨遭蹂躏。河南督军赵倜屡派官军追剿，均告失败。

1921年，王振潜至开封，向官府疏通，请求招抚。时值赵倜扩充宏威军之际，同意收抚，委王振为巡缉营营长，所部五百人，驻防于宝丰、鲁山、郟县一带。王振摇身一变而为营长，骄横异常，勒派敲诈，鱼肉乡里，当地居民一提起王老五，无不切齿痛恨。王振为了准备高升的资本，不断放出“外队”^①，扩大势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赵倜败北，宏威军瓦解，王振失去了靠山，重新落草。同年秋，王振与悍匪张庆（老洋人）等合伙，形成数万之众，西窜陕县、洛阳等地，声势浩大。吴佩孚急调刘镇华之镇嵩军往剿，将其击溃。王振所部匪众千余人流窜陕西商雒地区，又被镇嵩军第三路统领憨玉琨收抚，编为补充团，王振为团长，仍驻防商雒地区。

王振在驻地烧杀，绑架，无所不为，乡民苦不得已，纷纷组设民团自卫，抗拒王部劫掠。但刘镇华竟然指商雒民团为反叛，添派郭金榜等协同王振“围剿”。王、郭“奉令洗杀，男女老幼不留，放火烧杀七十余村，祸延六百余里”^②。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败归洛阳，镇嵩军叛吴拥段（祺瑞）。刘镇华命憨玉琨师出潼关，抢占河南地盘。1924年12月初，憨命其参谋长吴沧洲率王振等部进兵洛阳，赶跑了吴佩孚；接着进兵郑、汴。王振为憨玉琨争夺河南立了首功，被升为第一混成旅旅长，驻军登封一带。

1925年初，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所部国民二军进入河南，憨师被迫撤至豫西，自此，胡、憨两军时有冲突。1月23日凌晨，王振在憨玉琨的授意下，派部队勾结禹县民团，偷袭驻禹县之国民二军曹世英旅，殃及无辜人民被杀者两三千人，造成重大惨案。同年2、3月间，爆发了胡憨战争，憨玉琨失败而自杀身亡。王振等率残部西窜，盘踞豫陕边界熊耳山、伏牛山一带，收集余部，重组力量。后转入陕南武关、安康一带，依附驻陕南之皖系军阀吴新田，伺机待动。

1926年春，吴佩孚派军攻入河南，击败国民二军。此时，王振率部八团，约万余人，由灵宝出山，抢占了函谷关一带险要

阵地，凭险阻击，切断了国民二军入陕的通道。这时，刘镇华率后续部队赶到，击败国民二军，在陕县、灵宝整编部队。王振首立战功，实力猛增，被刘镇华委为镇嵩军第四师师长，辖四个旅和三个直属营，所部三万余人，成为镇嵩军的王牌部队。

刘镇华为了夺回陕西的统治权，于4月初率镇嵩军围攻西安，与杨虎城、李云龙所部国民军作战。王振野心勃勃，梦想再立首功，以取得陕西省长高位。他亲临阵前督师，组织敢死队反复冲杀，致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王振久攻西安城不下，便把怨恨倾泻到支持国民军的民众身上，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万亩即将成熟的麦田。11月，冯玉祥为解西安之围下令国民军入陕，与镇嵩军激战，杨虎城、李云龙部亦猛烈反攻。镇嵩军大败东逃，退至豫西。刘镇华在败军之后，将残部整编为两个军，任王振为第二军军长。

王振及其亲信骨干张得胜、姜明玉等，大都是豫西府十处、州五处^③的山大王。他们败归河南后，在豫西各县及南阳一带，任意搜刮，烧杀抢掠，闹得农民耕种失时，无法生活。1927年3月底至4月上旬，新安县红枪会进行武装反抗，遭到王振部的血腥镇压，新安铁门、辛庄一带，十七个村庄被焚烧一空，附近村庄人民纷纷逃避。

同年5月，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入河南，6月初占领郑州、开封等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盘踞豫西的刘镇华见奉军大势已去，转而投向冯玉祥，被编为第八方面军。王振坚不投冯，只身投奉。他到太原经阎锡山疏通，在北京与张作霖见面，后被派往济南与张宗昌配合，专做分化镇嵩军的工作。同

年10月,直鲁联军与冯玉祥部在豫东大战,由于王振暗中策动,刘镇华部军长姜明玉叛冯投奉,致使冯军遭受重创。1928年6月,蒋介石、冯玉祥等部占领平津,奉军败退东北。王振随同逃往关外,久居大连;后又移居天津等地。

1929年夏,国民党政府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为利用土匪势力,扩充军队,特召王振回汴,委以豫西警卫团总指挥名义,到豫西招抚土匪。王振先后在洛阳、临汝、郟县、宝丰、禹县等地,广招杆匪,滥委师旅,号称九师,约三万余众。先驻郟县,后移禹县,1930年4月全部开入鄢陵县,分驻城乡。这支名为官军实为土匪的部队,到处占民房,抓壮丁,勒索巨款,强缴民团枪械,致使鄢陵广大人民纷纷外逃。

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王振所部隶属阎、冯一方,被编在第八方面军中,同蒋军作战。9月中旬,蒋军肖之楚十四师攻占鄢陵县城,王振退守城西冈底、张寨等地,遣人乞和,希图保住官位。肖与王虽有旧交,但深恨其曾缴过部下枪支,乃将王诱入城内扣押,将所部包围缴械。10月13日肖之楚以绅民控告王振祸豫之名,杀王振于鄢陵县城。

注:

- ① 外队:系被收抚后又被暗放的土匪。官军让其继续拉杆为匪,二者互相为用。外队给抚军暗送金钱,抚军给外队暗送枪弹;抚军不能自安时则有所归,外队不能自安时则有所靠。此为招抚土匪以来暗行之惯例。
- ② 陕西《新秦日报》1925年3月24日。
- ③ 府十处:即河南府所辖的洛阳、偃师、巩县、孟县、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洛宁)、嵩县;州五处,即临汝州所辖的临汝、鲁山、宝丰、郟县、伊阳。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 ② 《鄢陵县志》卷1。
- ③ 尹文堂:《镇嵩军始末》,《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 ④ 王凌云:《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况》,《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 ⑤ 长沙《大公报》1925年2月、1926年5月。

陈 宝 琛

陈贞寿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生于1848年10月19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家“世代簪缨”，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曾任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进士出身，候选郎中，曾分发刑部浙江司行走。

陈宝琛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一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曾两次派充顺天乡试同考官，1879年任甘肃乡试正考官。1880年7月，陈升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8月授右春坊右庶子，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功臣馆协修、纂修。1881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1882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陈宝琛自入翰林院后，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宗室侍郎宝廷交谊甚厚。他们四人岸岸自高，不避权贵，敢言敢谏，被称为“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陈以敢于上谏慈禧太后出名。他对边防、御侮、进退大臣等曾先后上疏数十章，甚得慈禧、光绪的宠信，其奉章往往不交部议，即蒙飭令迅办。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掠夺我国领土,沙俄占领我国新疆伊犁九城,日本派兵侵扰台湾,公然吞并琉球;法国大规模侵略越南,矛头亦指向我国。这时,清廷内部曾引起了一场关于“海防”(防日)和“塞防”(防俄)的争论,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作为“清流党”健将的陈宝琛,当时对内主张弹劾权贵,对外则力主抗战。1879年,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擅自签订丧失领土和主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引起舆论的谴责。陈与张之洞等交章论劾,请诛崇厚、毁俄约。但清廷在沙俄的压力下,将崇厚开释。陈上疏主张将崇厚“服人臣不赦之极刑”^①。对于总理衙门采纳主和派提出“联日防俄”之说,拟允许日本商民在中国内地通商,陈上疏指出,“联日交即以分俄势”之说是“懵于事理”,其流弊必“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患更亟矣”^②。他认为,俄国屯兵数千于喀什噶尔西南之阿来,是沙俄的“恫吓要挟”,其劳师在远,不足害怕,应海防与塞防并重,“俄事既可以坚持,日事益无庸迁就”^③。

1882年4月法国侵略者再陷河内后,步步北侵,直窥云南。陈宝琛认为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一再上疏奏陈,主张“举义师以平其难”。陈认为清廷由于和战不定所采取的“旋战旋和”策略是招祸之源,上疏指出,“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他建议“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扰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表示“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④。1884年5月清廷下旨派陈宝琛为钦差会办南洋大臣,并授他

“专折奏事”之权。

七月，在江西典试的陈宝琛奉旨后，启程赴抗法前线。行抵南康之时，一日之间接到三道谕旨，要他北上天津会同李鸿章妥筹中法和议细目。原来，当法兵于3月间进犯山西、北宁我军驻地时，慈禧太后恐战争将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曾授权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议订了简明和约五款（即《天津专约》）。当时陈宝琛曾上疏对所拟五款和约加以驳斥。后因法军不遵定约，于6月23日进犯谅山，被清军击败，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调停下，清廷允将条约重议，适见到陈宝琛的奏折，就派他会同李鸿章详细妥筹。7月18日，陈赶抵上海，正拟附轮北上，恰遇祖父病死，按例报请在行馆持服二十一日。此时，法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逗留上海不肯赴津。清廷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在沪与法使议约，并派陈宝琛为和谈会办。陈不愿参与议和，乃以“拙于辞令，不习洋情，筹防义不容辞，议和才实不逮”^⑤电辞，但未获准。由于奕劻与李鸿章总想力保“和局”，以致清廷和战不定，陈在和谈中遂亦感进退两难。但他认为拖延不是办法，会使“和战两误”，曾密电要求或战或和“此时宜决”^⑥。不久，法将孤拔率法国舰队占据台北基隆，清政府乃于8月17日电陈“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并令“即回江宁办防”^⑦。陈遂离沪至南京。23日法国侵略者聚泊在马江的舰队突然向我发动袭击，福建水师战败，陈宝琛请旨“派江西援军速进”，清廷即电令曾国荃拨江西振武五营赴援，但曾复电拒援。陈宝琛奏请准他自己募勇教练，并称：如“成效毫无，将臣从重治罪”^⑧；但清廷只复他“就现在各军设法整顿”^⑨。陈悻悻而罢。

陈宝琛练兵不成，遂沿江出巡。10月他将巡阅情形上奏，弹劾曾国荃“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南琛”、“开济”管带玩忽职守，各军总统陈湜“虚额蚀饷”^⑩。清廷下旨曾国荃整饬处理。但曾国荃原是湘军名将，挟功骄傲，不但对陈宝琛纸上谈兵瞧不起，反于10月29日上疏指责陈在沪时“不顾议约之难，好为高远之论，事事与臣齟齬，臣以其言难行，恐与外人在沪决裂，贻误大局，委曲斡旋”；并说陈弹劾陈湜等纯是“蜚语中伤”^⑪。后清廷派人查明陈湜确有“游宴妓馆情事”，“有玷官箴”，著“交（吏）部严加议处”^⑫。然而，陈宝琛已失欢于主帅曾国荃。10月陈母病逝，奔丧回籍。

1885年2月，陈宝琛因前力荐云南、广西布政使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而唐、徐相率溃败，已被定斩监候，遂以“荐人失察”之过，被降五级调用处分。自是以后，陈闲居林下二十余年之久。

陈宝琛罢官归里后，于1895年出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1900年创设东文学堂。1902年鳌峰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翌年11月又改称福建高等学堂，陈曾任该学堂监督；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陈亦任该学堂监督。

1905年，光禄寺卿张亨嘉等发起设立福建铁路公司，陈宝琛被举为总理。1906年11月，陈赴南洋各埠募股一百七十余万元，拟先筑漳厦之间九十华里，次年7月开工，1909年5月嵩屿与江东桥间七十六里铁轨铺成。后因经营不善，无法维持，终于连路轨也被拆除殆尽。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死后，溥仪登极，“清流党”“四谏”之一的张之洞任军机大臣。经张推荐，陈宝琛1909年3

月赴京，4月被派为总理礼学馆事宜。次年4月开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原官，6月以硕学通儒充资政院钦选议员。1911年1月以原衔充补汉经筵讲官、实录馆副总裁。6月清廷补授他为山西巡抚，未上任又开缺，以侍郎候补派他在毓庆宫任皇帝授读，并赐在紫禁城骑马；8月改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和奕劻内阁的弼德顾问大臣，授读如故。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溥仪根据“优待条约”保留帝号。六十五岁的陈宝琛效忠清室，仍在故宫就任“帝师”。陈宝琛在溥仪眼中是“最忠于大清”、“最称稳健谨慎”^⑩的人。陈宝琛向溥仪经常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的复辟思想。1913年小朝廷给陈赏戴花翎，次年又赏给他文职头品顶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宝琛骂袁是“元凶大憝，自作孽，必不得善终”，但又为溥仪安全忧虑，暗中为溥仪求神问卦。1916年底，他撰《德宗本纪》完稿，晋升“太保”。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陈出任“内阁议政大臣”，位同首辅。他劝溥仪禁止亲贵干政。不过十几天，复辟濒临失败，陈和张勋等商议拟了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张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未成事实，希望破灭。从此，陈对复辟之举十分谨慎。

1922年1月，他撰成《德宗实录》，溥仪又赏以“太傅”衔，次年升“实录馆正总裁”。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溥仪赠送“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的“御书”对联。

1923年夏，陈宝琛引荐郑孝胥、罗振玉入宫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北府。罗振玉主张溥仪溜出北府，借外力谋取“复辟”；陈则主张争取恢复优待条件，“还宫复原”。后来，罗振玉

和庄士敦说冯军将对废帝有不利行动，陈着了慌，同意罗、庄等人的主张。在他和庄的陪同下，溥仪移住日本使馆“避难”。次年2月，溥仪又出走天津，居日租界“静园”，陈等亦随往。

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由直奉两系联合当权，陈宝琛曾于7月间亲自到京活动，企图使废帝“复原还宫”。后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吴佩孚自顾不暇，“还宫”的希望再次破灭。陈主张“静待观变”。当时有人主张向张宗昌军队支援饷银，以换取代为“规复京津”；也有人主张向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提供活动费，以换取由溥仪统治满蒙地区，陈一概反对。当时郑孝胥和这些人往来，并送钱给他们，陈对郑极为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罗振玉带着日本关东军坂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引溥仪去东北，陈宝琛斥责罗振玉“鲁莽乖戾”。溥仪不以为然，他便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⑭溥仪格于种种因素“暂不出行”，但不久又背着陈采纳郑孝胥的意见派人去日本活动。后来关东军派土肥原至津诱引溥仪去东北，陈适在北平，见报立即赶回天津，在“静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和郑孝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溥仪去东北。溥仪虽未对他斥责，但已认为陈“忠心可嘉，迂腐不堪”^⑮，不足与图大事。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潜去东北。陈虽不满，但他仍于两个月后赶到大连，在旅顺肃王府再三劝告溥仪“等候时机”，“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⑯。当时日本关东军与郑孝胥等拟让溥仪出任伪满蒙共和国“总统”，陈劝溥仪复辟就要复“大清帝国”之

辟。他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①当他知道溥仪在郑孝胥等人的挟持之下，已成为日本关东军笼中之鸟，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之时，这个梦寐恢复“大清帝国”的八十四岁的“帝师”，最后向溥仪洒泪告别说：“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②陈匆匆回到天津，随后迁回北平，离开了二十三年相随的废帝。后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皇帝”，陈始终未去伪满任职。晚年常哀叹“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

1935年3月5日，陈宝琛在北平寓所病逝。

注：

- ① 《陈文忠公奏议》卷上第28页。
- ② 同①，第8页。
-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23第23页。
- ④ 《陈文忠公奏议》卷下第22页。
- ⑤ 同③，卷12第21页。
- ⑥ 《中法战争》(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472页。
- ⑦ 同⑥，第503页。
- ⑧ 同④，第50页。
- ⑨ 同④，第55页。
- ⑩ 同④，第56页。
- ⑪ 《中法战争》(6)，第15页。
- ⑫ 《光绪朝东华录》(2)，总第1852页。
- ⑬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 ⑭ 同⑬，第269页。
- ⑮ 同⑬，第283页。
- ⑯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70页。
- ⑰ 同⑬，第300页。
- ⑱ 同⑬，第300页。

赵尔丰

张 力

赵尔丰，字季和，生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祖籍山东蓬莱，先世为汉军正蓝旗。父赵文颖，令山东阳谷县时，为北征太平军所杀。兄赵尔震、尔巽、弟尔萃皆成进士，独赵尔丰屡试不举。1875年乡试落榜后，任誊录，发愤职事，善处同僚，未几，以盐大使分发广东盐引批验所，后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器重。时盐运使英绩惜赵职微，代捐知县。旋于1884年由部选分发山西静乐县知县，因捐献赈款，奖戴花翎。1888年调署永济县令，适该县南乡飞蝗入境，赵督饬围捕，驻乡数月，歼除净尽，事为绛州知州锡良所赏识。

1898年，赵尔丰经山西臬司锡良保荐，送部引见，授河东河道监制同知，护河东道，次年丁母忧去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为逼迫清廷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分兵两路，欲犯山西，威胁关中。9月，锡良委尚在服阕中的赵尔丰掌东路防军营务处，协助大同镇总兵刘光才坚守固关。赵“朝夕周历各营，明示激励，暗实羁勒，是以敌军无可借口”^①，实现了锡良守晋固秦，拒联军于晋省之外的思想。同时，由于赵尔丰“措置合宜”，多次力抗法军挑衅及全权大臣下令撤军的压力^②，使晋东地区未受法军滋扰，因此更得锡良信任。锡良多次保举，嘉其“朴实耐劳”，“勇于任事”。清廷下旨，将赵“交军机处存记”。

1901年6月,锡良接篆河东河道总督,即专折奏调赵尔丰随任,委办稽查黄河两岸各厅州县防汛准备工作,成为总督的最高代表,指挥豫、鲁两省黄河两岸防汛工程设计、施工诸事宜。此时,黄河上游暴雨,水位陡涨,致使河南境内两岸“迭出险工”,赵尔丰“于炎天暑雨之中,波涛汹涌之际,或乘舟迅渡,或策骑奔驰”^③,督率开归、河北两道各厅州县组织抢险,未出决堤事件。锡良为其请得候选道衔。1902年2月,锡良署豫抚,又专折推举赵尔丰会同开归、河北两道,“总办河工一切事宜”。夏初,大刀会首领韩明义、李汶钰在归德府被捕,锡良委赵前往“研鞫”,赵将他们问成死罪。5月底,锡良调篆热河都统,10月赴任,又奏准赵尔丰同行,并与豫抚约定,“俟明年伏汛届期”,即飭赵“回工办事”。赵尔丰在治理黄河方面,颇得清廷和锡良的信赖。

1903年5月,锡良调署四川总督,疏荐赵尔丰之才,清廷允其一同入川,成为锡良宦蜀智囊之一。四川自1902年义和团大起义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受到了削弱。前督臣奎俊、岑春煊虽以武力镇压了四川人民的起义,但是义和团、红灯教、哥老会、咽噜、孝义会在全川的继续活动,使清廷及地方官吏惴惴不安。锡良入川后,即委赵尔丰署成绵龙茂道,欲肃清省垣附近“伏莽”。旋因川南会党活动频起,锡良将赵尔丰派往该地,署永宁道,“督察叙、永等处捕务,兼防滇黔各边”^④。1904年春,贵州仁怀县红灯教首领袁清芬率众起事,攻占温水厅,川边邻近各州县一夕数惊。赵尔丰受锡良之命,率部会同黔军前往镇压,杀害袁清芬及其信徒数十人。叙永小商贩、农民等组成“平会”(又称龙会),对抗当地豪绅富商组织的“成会”,互相

械斗不已，尤以苗沟^⑤为最，当地历任官吏束手无策。3月，赵尔丰进驻封溪^⑥，设置行辕，派兵进入苗沟，杀“平会”成员数百人，并宣称“不得匪首，不停剿杀”。“赵屠户”的绰号源溯于此，他因此获得头品顶戴。

1905年4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行五十余人在巴塘被当地人士所杀，川藏南大路各土司纷纷撤站，拒纳乌拉，袭击清军，驱逐粮员。清廷急命四川提督马维骥率大军进剿，并委赵尔丰为建昌道，“办理炉边军务”，以为声援。赵尔丰不顾肇事首领对凤全事件的陈说^⑦，一意主剿。清军攻入巴塘后，诛杀起事喇嘛及藏民多人，焚毁丁零寺，拘捕巴塘正副土司。马维骥部撤回成都后，留赵尔丰任边务善后督办，赵将历年戕官、撤站之喇嘛、土司一一惩处。冬，派兵进入巴楚曲河两岸，杀“七村”藏民四、五十人，并将巴塘正副土司处死。

次年3月，赵又派兵攻打与里塘土司关系密切的桑披寺，杀喇嘛、藏民四百余人，里塘土司四郎占兑亦被击杀。进藏南大路复被打通，各地粮台、驿站次第恢复。锡良为此专折密保赵尔丰，清廷赏赵侍郎衔，加武勇巴图鲁号，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赵尔丰即将巴、里二塘改土归流，设巴安、盐井、三坝、理化、定乡、稻城、贡噶岭、河口等八县^⑧，以巴安府统辖之，并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

1907年2月，锡良调补云贵总督，清廷命赵尔丰护理四川总督。赵秉承锡良“新政”措施，诸凡练新军，劝工艺，奖农桑，兴学校，倡轮船，开矿藏等方面，继续前任未了事业。他要求各属推广蚕桑业，又同意璧山县改良宽织布机，说：“使闲邑机坊一律改用新机，更当省人工而广货品，即此一端，亦系工业

进步萌芽。”^⑨在赵尔丰的提倡下，不少州县都取得改良织布机的成功，对于发展四川棉织业有一定影响。他还奏请设立实业学堂，开设理化、算学课程，自己培养技术力量，“然后旧者可图进步，新者可望发明，否则模仿一场，必假技师（指外国人），而所得有限”^⑩。同时，赵又积极经营川边，招徕垦夫，委吴嘉谟办理学务，设医药局、制革厂，延外国技师勘探金矿等。

同年5月，开县普里河流域各场镇人民在红灯教的组织下，打着义和团的旗帜，掀起反对“土药统税”、反对传教士借办新学勒捐派款的武装起义，在开县、万县、新宁（今开江）三县接壤地区捣毁所有教堂、土行、税卡，伤毙清军团丁，惩办富室豪强，势力发展近万人，川东为之震动。赵尔丰调集数千清军前往镇压，起事首领韩洪顺等二十余人暨群众数百人被杀。事后，传教士强索赔款三万两，赵尔丰飭令地方官“就地筹款”，除籍没肇事者家产变卖外，不敷之数，皆向开县人民摊派，差役胥吏从中苛扰，人民饱受其害，时有民谚云：“宁赴东海死，勿为今日开县民。”^⑪

1908年3月，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并兼领边务大臣，以加强西藏防务。西藏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策动三大寺及巴塘等地寺庙喇嘛、贵族、头人，联名向清廷具禀，坚决反对赵尔丰进藏，并唆使沿途各土司撤站、兵阻。清廷怕开罪外人，开去赵尔丰驻藏大臣职，专任川滇边务大臣，但将察木多（昌都）、乍丫（察雅）划归川边管辖，“遥为藏中声援”。赵尔丰对此决定甚为不满，他在给军机处的电文中说：“若再不及早图，维藏必终为他人所有。”^⑫因此，他一面积极支援川军入藏，一面将丹达山以东，察木多、八宿以西诸部落改流，三十

九族^⑩亦内附,稳定了今昌都地区。

川军由察木多抵达嘉玉桥时,即遭到藏军的阻击。赵尔丰派边军前往支援,护送川军,一直打到工布江达。赵尔丰又排除重重阻力和干扰,与察木多等地呼图克图达成协议,将江卡、贡觉、桑昂(科麦)、杂瑜(察隅)等地改流,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北进的阴谋。1910年春,川军陆续进入拉萨,达赖逃亡印度,赵尔丰随即奏请以工布江达为川藏分界线,以东地区全归川滇边务大臣管辖,为筹建西康奠定了基础。

此时,清政府自身已是朝不保夕,对于赵尔丰筹藏诸议皆未采纳。1911年春,赵率亲兵返回巴塘,专事经营川边改土归流诸务。3月,平定得荣浪藏寺喇嘛的叛乱,设得荣委员。4月,赵尔丰奉旨署理四川总督。5月,经北大路回打箭炉,至7月下旬,已将沿途各土司印信收缴,改任流官,设甘孜委员、瞻对委员、道坞委员等。在回雅州途中,又将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改流,设泸定桥委员。至此,自今泸定县西至工布江达纵横数千里,除明正土司外,均改流完毕。

赵尔丰接任川督之前,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7月底,赵接篆视事后,对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采取静观和令其“就范”的态度。8月4日,他出席了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代奏川绅纠劾盛宣怀“卖路夺款”、李稷勋“不商股东,竟以商款交部”等罪行。此后,保路同志会发起罢市罢课、抗粮抗税运动,全川革命形势十分高涨。赵尔丰一面开导,一面致电清廷,恳请总理大臣奕劻、徐世昌“筹商转圜之策”,并陈说:“况川省以本省之款,修他省境内之路,亦系为顾全公益。乃不待股东议决,竟行收去,不惟有负川人初心,且与

附股与否任民自便之旨更复相背”^⑭。清廷电令仍遵前旨，瑞澂、端方奏请派重臣赴川查办，撤换川督。9月4日，清廷下了一道严厉的电旨，并飭令“赵尔丰懍遵迭次谕旨，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倘听其借端滋事，以致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署督之罪”^⑮。在这为民为君的抉择时刻，赵尔丰决定镇压保路运动，于9月7日诱捕谘议局正副议长及川汉铁路公司董事等九人，封闭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办事处所，加紧调兵守城，一片恐怖气氛笼罩省垣。此时，成都数千人赶往督署门前示威，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死者数十人，伤者无算。附垣十余州县同志军遂围攻成都，全川响应。清廷一面令赵尔丰“迅速查拿……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⑯，一面令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又调岑春煊督蜀，以兹“宣抚”，并派湘、黔、滇三省清军入川助剿。

此时，赵尔丰乃拿出他在川南、川边杀人的绝招，派出巡防军分路捕杀同志军数十人，并拟处死被押立宪派首领。后因川绅多方营救，内阁大臣谕令“勿伤其命”，赵尔丰才勉强“谨遵”。但他还认为：“此事无论如何转圜，若此数人不诛，必贻国家后患”。^⑰

10月武昌起义后，端方在资州被杀，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赵尔丰被清廷撤职，准备拿问治罪。数十年善处宦场的赵尔丰，看到清朝“将倾之大厦”再也“扶持”不住了，一面将被捕九人全部释放，并与之签订《四川独立条约》；一面解除了提督田振邦兵权，为向立宪派让权扫清道路。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原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原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尔丰也于同日宣布“四川地方自治文”，并随唱“徐

图良善共和政治”^⑧。

12月8日,原成都巡防军发动兵变,省垣公私财物、军需武器被抢劫一空,蒲、朱无法弹压,旋自请去职。成都士绅复请赵尔丰出面维持,赵即以“总督部堂”的名义发表文告,召集散卒,并电调边兵统领傅华封、凤山率部急速进省,冀图观变。此时同志军陆续开进成都,平定了叛乱,原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就任都督,原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副都督,成立四川军政府。12月22日,尹昌衡以“纵其部曲……谋为凶逆”罪^⑨,杀赵尔丰于成都贡院。

注:

- ① 《锡良遗稿》第一册第303页。
-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06、910、920、970—972、975、981—983、1003诸页。时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多次命令锡良撤掉在直、晋布防的清军。
- ③ 《锡良遗稿》第一册第133页。
- ④ 《锡良遗稿》第一册第386页。
- ⑤ 苗沟在今古蔺县东一百里。
- ⑥ 今古蔺县金屋公社。
- ⑦ 吴锡珍,《不平鸣》,《巴塘圣众公禀》。
- ⑧ 《边务大臣奏设巴里两塘府厅州县由》,刘赞廷,《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卷1,北京民族文化宫油印本,第39页。
- ⑨ 《护督宪批璧山县职商刘龙骧等运货赴会禀》,同⑧。
- ⑩ 《护督宪奏设川省实业学堂酌拟章程折》,《四川官报》丁未(1907年)六月下旬第16册。
- ⑪ 《开县拳匪续闻》,《广益丛报》清光绪33年(1907)第24期。
- ⑫ 刘赞廷,《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卷14第32页。
- ⑬ 今那曲地区东部及昌都地区西部诸县。
- ⑭ 《赵尔丰致内阁电》,《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77页。

- ⑮ 《宣统政纪》第38卷第12—13页。
- ⑯ 《宣统政纪》第59卷第1页。
- ⑰ 《赵尔丰致赵尔萃电》，《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87页。
- ⑱ 彭芬兰：《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第78页。
- ⑲ 《四川军政府捕杀赵尔丰通告》，《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16页。

汤 尔 和

娄献阁

汤尔和原名鼐，字调鼎，又字尔和，晚年自号六松老人，称其住所为六松堂。浙江杭州人，1878年6月30日（清光绪四年六月初一）生。其父本姓沙，名成亮，因过继给姑父为嗣，改姓汤。

汤尔和幼年父母双亡，靠祖母抚养长大。祖母有文化，从小教他读书识字。汤六岁那年，由于生活困难，随祖母到江苏淮安，寄居于姑父魏平甫家。1888年，祖母病故，汤继续留在魏家学古文，又自读了些医书。

1896年，汤尔和往清江浦（今淮阴）武劭斋家任塾师。教学之余常练拳棒，并与隐士杨玉农、皇甫硕等往来，结为文字之交。

1900年，汤尔和回到杭州，就读于养正书院。他学习努力，又得名师陈介石的指点，进步很快。1902年，受留学热潮的影响，筹得旅费去日本，考入东京成城学校，与钱稻孙等同学。他除学日语、普通科学常识及受军事训练外，尤关心时事政治。

1903年，中俄关于归还东北问题交涉决裂的消息传到日本，汤尔和十分愤慨，他与钱稻孙等连夜赶印宣言，并邀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会。会上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决定组

织拒俄义勇队。后来他与钮永建被选派回国请愿，在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递交了请愿书，结果清政府不但不接受，反而要逮捕他们，他们只好逃回日本。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汤尔和离日回国，在杭州任浙江高等学堂音乐教员。1907年他再留学日本，入金泽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这时他已不再关心政治，全力钻研医学，以求得一技之长。他的生活很艰苦，但不愿意请官费，常以翻译小说和给报纸投稿等补贴食宿，有时还要借债。1910年6月，汤毕业回国。

汤回到杭州，受到浙江巡抚增韞的器重，不久即“任谘议局谘议”^①。他颇为尽职，在会上总是侃侃而谈。时值浙人反对将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他与马叙伦等积极支持路局股东保护路权。当局又让汤擘划浙江病院，他以韩士渥为院长，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将医院筹备就绪，于翌年春开诊。此外，他还兼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工作十分繁忙。

1911年武昌起义后，汤尔和与浙江部分立宪派人士欲将浙江政权拿到手中，以“加强防卫”的名义，发起组织省城民团，汤主持起草民团总局开办大纲十数条，结果未成。革命党人于11月5日起义成功，杭州光复，很快成立军政府。此时，汤一方面拥护革命；另一方面又很同情已被推翻的浙抚增韞，暗中接济衣物，以报答“知遇之恩”。

同年12月，汤尔和作为浙江军政府的代表到武汉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旋该会议移南京，他被推选为临时议长。12月29日，与会之

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受会议派遣，同王宠惠等至沪恭迎孙中山一行。

1912年初，汤尔和重回浙江病院工作，被浙江都督蒋尊簋聘为民政司金事。不久，被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为中央教育会议员，8月，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他对专门学校暂行计划案把法政学校列为“最急”开办，提出异议，反对滥倡法校，主张多办医校。会后教育总长范源灏请他在北京办一所模范医学校，他欣然同意。10月，汤着手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他主张“要办就得专门西医，不可中西合璧”^②，以原北京医学馆为校址，汤任校长，本科四年，不设预科。从聘请教员到招收学生，他都亲自动手，很快于翌年1月开学。开学典礼上他致词说：“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藉医学为前驱。……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③当时教职员仅有九人，他兼教授组织学。他的讲义，年年换材料，还亲自用水彩画成组织示教图约三、四百张。该校曾聘日人石川喜直、中野铸太郎等来校任教。

汤尔和十分重视解剖学，多次呈请施行，说“医学基础以人体解剖为不二之根据”^④，但受到一般人的反对。经过反复交涉与论辩，终于得内务部同意，于1913和1914年先后公布了解剖条例和解剖细则，是为中国医校有解剖学之开端。

1915年2月，汤尔和主持医校附设的诊疗所（即后来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诊。4月，他被聘为协和医校干事会学术部主任。9月，为促进医学研究，他又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

研究成果。同时汤还代表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医学名词审查会，集合国内专家共同解决医学名词的科学性和统一问题，他负责草拟解剖、组织、胎生部分的名词。

同年12月，鉴于袁世凯称帝在即，汤不愿意在皇帝轲之下当医专校长，赶在袁登极之前辞职南行，居上海替商务印书馆译书。1916年夏袁世凯死后，汤回北京重掌医校。1917年张勋复辟时，汤再次南下，后仍回医校任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为反对北洋政府无理逮捕学生，北京各大专校长均辞职，汤尔和亦辞职。但他并不赞成学生游行罢课等举动，认为这些学生有的带着政治色彩，有的贪玩，白白耽误功课，非常可惜。他写了《现行学制根本改革的意见》一文，提出学校应当让人们自由听讲，不考试，也不发文凭，不负责安置就业。

1920年冬，北洋政府教育部派汤尔和赴欧考察。汤正想摆脱教育界的是非，便欣然出国。他先后参观了英、法、荷、比诸国医学研究机关，然后呆在德国柏林大学，跟生物学和解剖学教授克鲁采从事研究工作。出国前汤就写有《蝎之毒腺》、《猪十二指肠之黄色细胞》等论文，颇有价值。这时他更利用显微镜认真观察实验，发现猪、羊、鸽、鹅心脏普顷氏(Purkinje)纤维之线粒体及猪、羊等动物的内网器，取得了成果。

1922年初，汤尔和回到北京，仍任医校校长。旋辞校长职，从事译著。5月，胡适联合蔡元培、王宠惠等十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鼓吹改革政治，建立“好政府”，汤亦列名其中。7月，经人推荐，汤出任教育部次长。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王宠惠组阁，汤当上了教

育总长。两个月后内阁改组，他亦离职，复去医校教书。

1924年，汤尔和应吴佩孚之邀至洛阳晤谈，受到吴的赏识。汤也很佩服吴，但不愿入其幕，因为他标榜自己是无党派，力图同各方面保持等距离的关系。1926年10月，汤尔和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内务总长，1927年初改任财政总长，曾以实施二五附税等在财政上替张作霖效劳，6月，即随顾维钧内阁的垮台而辞职。

此后，汤尔和仍继续译书，除译日人著的医药书外，还有满铁特务机关编的有关我国东北地理、物产、人事方面的资料，数年内出版了《组织学》、《生物学精义》、《精神病学》、《寄生虫病学》以及《东省刮目论》、《满铁外交论》等多种。这期间他多次到沈阳，成了奉系的座上客。

汤尔和常去日本活动。1929年3月，他第七次至日游历，稍后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汤有心缓和日本当局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曾代表张向日方朝野疏通，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绝不肯放弃侵略，汤虽竭力游说，也无法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年11月，他任“接收东北各地事宜委员会”委员，又被张学良聘为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议。

1933年，日本侵略军大肆侵略热河，进而侵入华北，汤尔和看不到正义与群众的力量，充满恐惧和亡国的思想。当时他写了三首诗给朋友，其中之一说：“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瞞(颡)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⑤

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进行妥协谈判，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汤尔和等一些亲日派人物为委员，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蒋介石进一步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完全承认了华北的“特殊”地位，派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汤是得到日方认可的委员之一。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后赶回北平。不久平津沦陷，汤甘为汉奸，替日本侵略军奔走效劳，“维持秩序”。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12月在北平扶植成立了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与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同为该伪政府的三巨头。伪临时政府初开张，汤尔和即以对外代表的身份发表宣言，接见新闻记者谈施政问题。以后他主要负责奴化教育，处处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1938年春，他曾召集中小学教师训话，大讲“中日亲善”；又特设编审会，严格检查中小学课本，生怕有所谓排外思想编入教材。同时他也很注意“整顿”大专院校，先后派汉奸鲍鉴清、周作人等分长各学院，1939年更亲自兼任北大总监督。此外他还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曾率会员去日本东京开会，深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此时他已患肺癌，署务由别人代理。同年11月8日，汤尔和在北平死去。

注：

- ① 幼松：《汤尔和先生》，金华印书局 1942 年 10 月版，第 32 页。
- ② 同上，第 51 页。
- ③ 同上，第 53 页。
- ④ 汤尔和：《呈请提出法案准予解剖》，同上，第 61 页。
- ⑤ 汤尔和：《哀热河寄黄任之上海》，《哀哉热河》，1933 年版，第 4 页。

林 柏 生

黄美真 张 云

林柏生，号石泉，广东信宜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课余向一美国神父学习英语。1920年赴广州，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

1923年初，林柏生在岭南大学积极参加革命学生的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旋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①。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从此，他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10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与陈春圃^②同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学员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联络人。1926年9月，林柏生离苏返穗，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1927年12月，汪精卫因国民党内部分派系争斗，被迫宣布“引退”去法国，林柏生随同前往。在旅法期间，林创办《留欧通讯》（后改称《欧美通讯》），这是他编办刊物之始。其时，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林柏生于1928年5月在一封信中提出应当使国民党“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既非代表

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③，深得汪精卫的赞赏，说这是“反共以后清厘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④。同年底，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所属之两大机关报——旧金山的《美洲民国日报》与纽约的《民气报》要求派人指导宣传，林柏生即衔汪精卫之命而往，在美洲华侨中宣传汪的政治主张。1929年冬，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任社长，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政治影响。

1932年1月，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拨款二十万元交林柏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由于汪精卫的提携，1933年林柏生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日报》被迫停刊。林柏生带了报社主要成员到香港，除主持《南华日报》外，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1938年2月，国民党内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艺文研究会”，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林柏生即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编译社”和一个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叛国降日的“艳电”，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林将电文在12月29日《南华日报》上刊出^⑤。接着，《南华日报》又连篇累牍发表社论，为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谬论张目，说“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汪之“艳电”是出于“爱护国家之苦心”^⑥，是为中国“打出一条光明而充满希望之生路”^⑦。林由于积极参加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活动，被汪指定为汪伪集团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1939年5月9日，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开展所谓“和平

运动”。不久，林柏生也带了《南华日报》、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的朱朴之、古咏今、胡兰成等一帮人到上海，为汪精卫摇旗呐喊。8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⑧。9月10日，上海《中华日报》复刊，林柏生仍任社长，并派穆时英出版《民族日报》、古咏今出版《国际晚报》，共同为汪精卫筹建伪中央政权制造舆论。然而，《中华日报》等一出版，立即为抗日民众所识破，报贩拒绝售卖，人们将这类报纸撕成碎片。连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也不得不哀叹：《中华日报》在市场上“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⑨。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任政治委员会委员。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林当上了伪行政院宣传部长。

林柏生上任后，接管了沦陷区文化宣传机构，先后成立了伪“中央电讯社”、“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局”等机构，钳制沦陷区舆论，鼓吹“抗战没有把握，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⑩，应“强化中日和平轴心”^⑪，“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⑫等等。林还创办“宣传干部讲习所”，诱骗青年学生受训。

1941年初，汪伪决定对其统治地区进行所谓政治、军事、思想三位一体的“清乡”运动，林柏生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随着“清乡”向苏、浙、皖等省展开，“清乡”宣传活动也逐步加紧。在林主持下，伪宣传部特设“清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采用流动剧团、电影队、书报流通队、歌咏队等组织形式向“清乡”地

区民众进行欺骗宣传，“告以清乡必定成功”^⑬。他曾多次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强化汪政权是“现阶段和平运动的中心任务”，扬言要把“清乡”运动扩展到汪伪“力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⑭。

同年冬，汪伪发动了一个所谓“新国民运动”，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林柏生任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他向汪精卫献策：“新国民运动”应从青少年入手，然后推广到社会上去。在汪精卫支持下，林先后成立“模范青少年干部学校”，组织“青少年团”，举办“青少年集训营”，自任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汪精卫）、“青少年团”总监、集训营营长，把争夺和毒害青少年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对英美的《宣战布告》，并决定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同年11月，林控制的伪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自此以后，林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作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共”、“反蒋”和“反英美”的思想决战，“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⑮，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⑯。

林柏生是汪伪集团中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⑰的“中坚人物”，他凭借汪精卫夫妇的信任，极力在汪伪集团内部扩展自己的势力，特别想插手特工工作。他先是拉拢原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办了一个“东方通讯社”，由苏任社长。该社表面上是一个新闻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关。不久，林又勾结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伪中央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秘密组织一个“政治工作局”，以苏成德为局长，下设情报、组织、训练、侦查、行动各股，并设有看守所，与李士群为首的伪特工总部分庭抗礼。“政治工作局”以宣传、情报工作名义出现，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反共”。它假造共产党的《新路东报》，散发于苏北解放区；又编写《关于第三国际之解散》、《苏北黄桥事变》、《山子头事件》等十几种小册子，分发给汪伪政府各级军政伪官及各地党部，“以增加反共情绪”^⑩。

1944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汪精卫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南京伪政权面临树倒猢猻散的局面，大小汉奸纷纷准备后路。林柏生于1945年1月辞去伪宣传部长之职，带了一批亲信出任伪安徽省长，兼任伪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企图占据一个实力地盘，待价而沽。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林柏生于19日发表《告全省父老书》，诡称“六年以来，吾人所含辛茹苦效命是间者，其本愿在真正永久之和平”，并令“全省军警保安队及公务人员，务必严守纪律，尽忠职务，确保防地，候命交替”^⑪，向国民党政府大献殷勤。但是到了24日，林还是随陈公博等同机逃往日本，躲藏于京都金阁寺，妄图逃避历史的惩罚。这时，全国人民掀起了惩办汉奸的怒潮，林柏生于10月13日被解送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犯罪行为”^⑫，判处林柏生死刑，同年10月8日处决。

注:

- ① 执信中学是为纪念朱执信而创办的。
- ② 陈春圃是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堂侄。
- ③ 《林柏生先生致汪精卫先生函》，《汪精卫文集》卷2。
- ④ 《汪精卫先生复林柏生先生函》，《汪精卫文集》卷2。
- ⑤ 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夺“儿皇帝”的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未刊稿）。
- ⑥ 《南华日报》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南华日报》1939年1月3日。
- ⑦ 《南华日报》社论：《我们的立场》，《南华日报》1939年1月5日。
- ⑧ 部长为陶希圣。1940年1月10日陶逃离上海去香港，林柏生即升任部长。
- ⑨ 〔日〕野村：《在上海的汪精卫一派的活动》，《日中战争（5）》（《现代史资料》13）第246页。
- ⑩ 《林柏生谈话》，《中华日报》1941年7月21日。
- ⑪ 林柏生：《对重庆广播》，《中华日报》1941年6月21日。
- ⑫ 林柏生：《对日广播讲话》，《中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
- ⑬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工作报告》，1941年10月11日。
- ⑭ 林柏生：《扫除复兴建设的障碍》，《中华日报》1941年10月11日。
- ⑮ 《中华日报》1944年1月9日。
- ⑯ 《中华日报》1943年11月23日。
- ⑰ “公馆派”是指经常出入于汪精卫之门的大汉奸，以广东籍为最多。其中与汪精卫夫妇有亲属关系的为“正统派”，无亲属关系的则为非正统派。
- ⑱ 苏成德：《自白书》（1945年9月）。
- ⑲ 《中华日报》1945年8月19日。
- ⑳ 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决》（1946年5月31日）。

张 岚 峰

邢汉三

张岚峰，字腾霄，河南柘城县人，1905年1月（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父张映宿是秀才，以行医为业。兄张云峰，曾任县商会会长。

1918年7月，张岚峰在本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河南省立淮阳第四中学。在校学习时，体格健壮，喜爱运动，尤爱足球。1922年冯玉祥督豫时，派人到各地招募学兵，张岚峰报名参军，考入学兵团。他勤学苦练，每次术科考试，均名列前茅，为冯玉祥所赏识。一年学习期满结业后任班长，以后两年中，升为排长、连长。

1925年冬，冯玉祥为了培养国民军骨干，选拔文化水平较高、军事技术基础较好的四十人出国学习军事，张岚峰被选送去日本。1926年春，入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1929年毕业回国，在冯玉祥部任炮兵团团长。冯夫人李德全以张岚峰青年有为，以甥女相许。此后，张更得到冯玉祥的信任。1930年春，冯部军官学校由开封迁往郑州，张升任军官学校校长，成为冯部重要骨干。

同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入晋，张岚峰亦随而失去军职，乃于1931年夏携眷去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此时，张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队长松室孝良专门搜集我国

情报，为日本大举侵华作准备。张岚峰受松室拉拢，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

1936年秋，张岚峰回到北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是张的旧长官。张利用旧关系，加上日本人的推荐，得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1936年冬至1937年春，张经常到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各军防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作宣传，并刺探军事情报。张自忠有所觉察，曾对其部下团长张宗衡说：“张岚峰当了汉奸，对他应严加防范。”^①张岚峰企图拉拢宋部将领胁迫宋哲元投降日本，他没想到宋哲元及所部官兵，在“七七”事变发生后，都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毅然决然高举抗日大旗，使其为敌人效劳的阴谋诡计化为泡影。

1938年春，张岚峰以探亲为名，回河南柘城原籍，充当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拉拢土豪劣绅，扩充私人势力。同年6月日军侵占开封后，张潜赴北平投拜华北日军头目，被派为豫东招抚使。9月初，他偕同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曹大中、李忠毅和日本派给他的联络员松室正宪回到河南，在商邱城内挂起了豫东招抚使署的招牌。他利用过去在西北军中的旧关系，将徐州会战后溃退的豫籍散兵招募起来，不数月即集结近万人，乞得当地日本侵略军头目的许可，编为一军三师。张任军长兼一师师长，其余两师师长由曹大中、李忠毅分任。他们带兵有一定经验，所收官兵稍加整顿，即有相当战斗力，为敌人巩固了对占领区的统治。1939年华北日军头目见张岚峰效劳日伪著有成绩，擢升张为豫皖招抚使，并拨给军用卡车数十辆和大批武器弹药，令其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日酋将张部编为“剿共军”，任张为军长。到1941年初，张部扩至近两万人，

步、马、炮、工、辎各兵种应有尽有，宪兵队、军官队、学兵队、军械厂、被服厂、面粉厂样样俱备，超过华北其他各省所成立之伪军及华北“治安军”，成为华北伪军的一面黑旗。

张岚峰受到日军青睐后，得意忘形，飞扬拔扈。他遇事独断专行，引起曹大中、李忠毅的不满。他安插在曹、李两部军官中的亲友，仗势为非作歹，不听曹、李指挥，他反多方袒护，致使他与曹、李的矛盾日益激化。同年6月29日，曹、李率所部携械投靠国民党，致使张部实力损失过半。张无可奈何，向驻在商邱的日军旅团长佐久间报告，出乎意外地反而受到日酋的慰勉。张感激涕零，下决心重整旗鼓。

张岚峰为了报效日本侵略军，决心首先整饬军纪，亲故中有违法乱纪者也不姑宽；对曹、李两部官兵家属优予保护，不予株连；官兵重新归来者还加官晋级。华北日军为表示对张岚峰的信任和支持，又给张拨发弹械被服。经过一段时间，张部又恢复旧观。

这时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已一年多，驻南京日军总头目基于汪精卫的要求，将张岚峰部拨归汪伪政权指挥，番号改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任命张为军长。从此张成为汪伪政权的红人。1942年春，汪伪政权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队时，张任总队长。汪精卫亲笔为张题写“中流砥柱”条幅以示倚重，张将其悬挂在会客室中，引以为荣。张在南京时，用请客贿赂的方法，结识汪精卫亲信周佛海、陈春圃等人。张妻也到南京以金银珍宝和陈璧君结纳，受到陈的款待。1943年春，汪伪政权参谋总长叶蓬到商邱点验张岚峰部队，查明张部实有人数近五万，即将其扩编为第二集团军，辖两个军，张岚峰为第二

集团军总司令，大部官佐均加官晋级。

1944年春，汪伪政权为虚张声势，再令张部扩大编制，改第二集团军为第四方面军，任张岚峰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所部由两军六师扩编为三军九师，另有不少特种部队，实有人数不下七八万。驻防地区扩大到豫东的淮阳、鹿邑、永城和安徽的亳县、涡阳。所属各县内用人行政，全由张岚峰总部主管；县中一切收入，全供军用。张部的兵工厂，不仅能造步枪、手枪、轻重机枪、地雷、手榴弹，而且能造掷弹筒、小钢炮和各种炮弹，除供本部使用外，还大批出卖牟利。

为了促成日蒋合作反共，张岚峰曾大卖力气。1944年春，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王毓文、师长张文心，经过张的牵线，先后到商邱，与日酋洽商达成协议；二十八军所部北犯冀鲁豫边区，日军派骑兵大队数百人协同张岚峰部，在商邱以东予以保护通过。同年6月，日军师团长樱井在皖北亳县和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商谈由涡阳北进协力“剿共”，也是由张岚峰勾通的。1943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张岚峰干了不少这样的坏事。

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张岚峰利用各种渠道和蒋介石集团拉关系。他通过他的小同乡牛朗初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挂上钩。戴派出爪牙到商邱作联络员，戴本人亦曾亲自到商邱和张进一步勾结。张和驻在豫中的汤恩伯打得火热，1944年冬和1945年春曾两次去见汤。汤的二十八军副军长聂松溪曾到商邱，通过张取得日军“谅解”，派所部进驻商邱东北部协助日军“剿共”。汤部高参施仲达，是张的连襟，按照汤的意图到张部任第二路司令。汤部的军需人员利用官僚资本开设的各种公司、商行、银号，和张岚峰开设的怡和号、大中

银行关系异常密切，双方负责人员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张岚峰还把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作为勾结国民党集团的另一个依靠力量。张设在商邱的贵宾招待所里，经常住着刘茂恩的代表。1944年春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由蒋管区到北平就医，路过商邱，张取得日军头目的“谅解”，派人到皖北亳县迎接，并派人护送到北平。刘镇华住院期间，张曾亲往探视，并送去珍贵礼品。张岚峰对他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经常自鸣得意，曾对他的朋友和部下说：“你们不用担心时局变化，一切我有办法，你们听我的话就行了。”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岚峰的伪第四方面军的番号马上变为国民党的第三路军，张由汪伪的方面军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第三路军司令。由于戴笠、汤恩伯、刘茂恩等在蒋介石面前为张说项，1946年春，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张，并同他合影。张返防后，对部下大事吹嘘，鼓励他的部下为蒋介石卖命。

同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豫东地区战场上，张岚峰督率所部与人民解放军反复拼杀。在豫东的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1947年1月初，张岚峰奉命率所部三个团，配合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开往豫鲁边区金乡，于1月7日行抵成武、定陶交界地区，受到人民解放军打援部队的截击。经过两昼夜激战，张部被全歼，张仅带卫士数人夤夜南逃。13日抵商邱北二十里之刘口镇，被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陇海支队俘获，转送石家庄，不久即病死。

注:

- ① 据张宗衡提供材料。张宗衡是张岚峰幼年同学,现任河南省政府参事、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 ② 1944年7月初张对笔者说的。张对其部下、旧同学尚立鸣等也有过类似的谈话。

范 旭 东

熊尚厚

范旭东名锐，字旭东，以字行，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湖南湘阴县人。其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旭东六岁入塾，是年丧父，靠母亲做针线活糊口，家境贫寒。他的长兄范源濂1897年冬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范旭东也受到熏陶。翌年春，他在范源濂帮助下也进时务学堂就读，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摈弃了“当时作官发财的旧套，立志要作救国救民的大事”^①。

1900年秋，范旭东随其兄范源濂赴日留学，初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考取东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1902年末，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在东京创办《游学译编》月刊，范参与编辑地理一栏；同时因学习费用受到梁启超的帮助，和康梁派颇接近，曾向梁主编的《清议报》投稿。1910年在东京都帝大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返回祖国。

1912年春，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局任总稽核，负责检验银元成色，两个月后辞职，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石墨坩锅制造厂。1913年7月，范源濂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经其兄推荐在农商部任职，不久被派往欧洲考察盐务。他在西欧兼考察化工制碱，但在比利时考察苏维尔制碱法时处处碰壁，参观英国卜内门公司也只让看了锅炉房。这次考察给他很大刺

激，立志从制盐业着手，自己钻研创办化工制碱业。

1914年春范旭东回国，针对当时外盐输入及国内引岸^②的垄断，向当局条陈改革盐政建议。3月，他根据《盐业特许条例》，与在北京办《盐政杂志》的景本白共同集资五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次年6月在塘沽设厂，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1916年8月久大正式投产，在天津设久大盐业总公司，上海设发行所，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不久，又有黎元洪等投资，资本扩大为一百万元，规模逐年增大，产量逐年上升。1918年秋增设第二、第三两厂，年产精盐三万担，获利丰厚。范旭东在工商界初露头角。以后，久大获得更大发展。

范旭东在创办制盐业的同时，即开始筹谋创办制碱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民族工业大量兴起，而一向依赖进口的酸、碱等产品奇缺。范旭东与景本白、盐务署长张弧、长芦盐运使李穆等人，于1916年7月筹办永利碱厂。翌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此为中国盐政史上的首举），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厂。永利在塘沽设厂，资金四十万元，于天津设永利制碱公司，范任总经理。范从金城银行透支数十万元，派人在美国订购机器设备，企望引进技术。那时各国用盐制碱的技术都保守秘密，外国资本家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范旭东根据苏维尔制碱法自行装置一套小型设备，经过反复试验，仅制成了几公斤的产品。由于缺乏建造大厂设计所需的数据与资料，技术上未能完全解决，以至安装和设计一改再改，长期不能正常运转。范坚持不懈，不惜以高价购买机器和技术。由于耗用大量资金，引起部分股东不满，

景本白甚至在董事会上对范弹劾，终以相持不下，景本白退出久大、永利。经过改组，久大、永利改董事会制为总经理负责制，范旭东以总经理掌管两公司全权。

范旭东在创办永利碱厂过程中，越来越认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断然以高薪聘请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Gilmer T. Lee)来厂指导，经过数年的钻研，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永利碱产量由日产五吨增至一百吨，质量也赶上了卜内门公司。在1928年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览会上，永利碱品获奖，从而打开了国外的销路。1929年永利获利甚巨，资金积至五百万元。

永利公司的崛起，使英商卜内门公司十分嫉恨。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吞并永利，曾提出合办、技术协助、高价收买等要求，均为范旭东断然拒绝；他们又使用削价倾销和收买间谍打入永利等手段，也被范采取措施击破。当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前来中国要求会见范时，范避而不见，只让来人参观了永利的锅炉房了事。

1930年，范旭东又进一步扩建碱厂，新建日产三十吨的烧碱车间。1932年，设立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加强管理，扩充资金，又于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分设营业机构，于芜湖、南昌、重庆增设经理处，在全国各地设三十一家特约分销处，并用赊销办法争取用户。这一年永利日产量增至九百余吨，职工近千人，次年获纯利二百万元。永利成了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与上海天原化工厂吴蕴初齐名，为全国最著名的化工资本家，时称“北范南吴”。

范旭东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早在1922年8月，他不顾

重重困难，以久大实验室为基础，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他聘博士孙颖川任社长，并先后将久大、永利两公司提给自己的“创办人酬劳金”全部移作科研经费。该社主要协助久大、永利进行技术研究，并调查和分析资源，试验长芦盐卤的利用；还研究轻重金属之于国防工业、肥料之于农作物、菌学之于农产制造，水溶性盐类之于化工医药等。该社科研设备完善，为久大、永利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也帮助国内一些工业部门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1928年9月，范创办了《海王》旬刊，时常刊布久大、永利和黄海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1934年3月，范旭东将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添招股本二百万元，资本总额达一千一百万元，于上海设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同年10月，范获准硫酸产品三十年免税，并可发行公司债，五年内保息七厘。范获得这一奖掖后，在金融界通过周作民、吴鼎昌、陈光甫、徐新六、张嘉璈、钱新之等人帮助下，发行了五百五十万元公司债券（以永利全部固定资产作抵押）；同时又自筹资金三百万元，合计八百五十万元，在南京下游六合县卸甲甸筹办永利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吸取创办永利碱厂的经验教训，决定引进美国设备和技术，组织国内人力、物力施工安装配套设备。1937年2月建成投产，日产硫酸铔一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给国内化工工业填补了一大空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型的化肥，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铔厂。

范旭东的声誉日隆，除任金城银行董事、四行储蓄会监察、中华书局董事、全华化学工业社常务董事、中华造船厂董

事、中国工业服务社社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化学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及南开大学校董等职外，还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但他热心于“实业救国”，全力倾注于自己的事业，无意作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京先后沦陷，久大、永利受到很大摧残，但范旭东坚决表示宁可工厂被炸毁，也决不屈身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与敌合作。由于范在事前已有内迁准备，先已派李烛尘在重庆设下了永利、久大华西办事处，永利公司各厂均得顺利搬迁。

1938年，范旭东赴汉口。途经香港时，拒绝了日本资本家和汉奸的引诱。到汉口后他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为迁川工厂联谊会发起人。是年秋，他进入四川，在华西建立新的化工基地，先后在自流井复建久大盐厂，在犍为县五通桥复建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于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和全华酒精厂；同时还计划在湖南创办永利株洲厂。久大以自流井卤水炼制精盐及硼酸，长年运销湘西；永利在五通桥除碱厂外，尚有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器厂、动力厂、煤矿、侯氏试验工厂及土木工程处、深井工程处等企业，总计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为战时民族工业规模最大的联合企业。此外，范还于1941年3月与金城银行合资一百万元创办中国化学企业公司，分别在重庆和五通桥设厂，制造食盐副产品和颜料；1943年6月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名义，与孙颖川等创设三一化学制品公司，资本额一百万元，在自贡设厂，从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硼酸。

范旭东在抗战期间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其

“实业救国”的抱负而艰苦奋斗，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却一再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作诱饵，企图变贷款为官股，打入永利公司进行控制。1938年4月财政部拨款四十万元“帮助”建设株洲厂，不久财政部和经济部给“补助费”三百万元在五通桥建厂，1939年冬，中、中、交、农四行以“复兴化学工业专款”名义贷款二千万元，“协助”建立铔、焦两厂，但国民党政府要求把这些“补助费”贷款变为官股，都为范旭东所拒绝。永利公司虽然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但在官僚资本压迫下负债甚重，加之战时机械设备的添置、更新及原料采购、市场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惨淡经营。

战时的范旭东，仍然十分重视科研与技术。他说：在工厂方面开支“必负责俭省，在学术方面，应多用几文”^⑨，视科研技术为工业发展的“生命”。1938年，他派侯德榜等在美国纽约设一小型化验室研究联碱法，一年后迁香港继续实验。1941年11月，他亲自前往美国考察，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雇一美国人到四川传授技术。随后他将香港的小型化验室迁入四川扩大试验，设一联碱法试验中心，由侯德榜主持，前后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获得成功，成为驰名国际的侯氏制碱法，进入了世界化工技术先进行列。1944年初，联碱法工业性中间试验投产，深井勘探也发现了天然气和黑卤，辛勤科研结出了硕果。

1944年9月，范旭东赴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商洽订了一系列技术设备进口合同，并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美元。但是国民党政府因官僚资本不能插足而加以刁难，使他极为失望。

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其姨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④其后，与共产党人龚饮冰（化名龚再僧）结识，在重庆共同开办建业银行。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立志“担起创造中国化工新生命的责任”，“为祖国争光”^⑤。当他正准备派员分赴天津、南京接管久大、永利企业之际，突然患了急性肝炎，于10月4日病逝于重庆。

注：

- ① 《范旭东先生及所经营的三大事业》，《新世界》杂志1944年7月号。
- ② 古时制盐以引计（如清时淮盐大引为栈秤六百斤，小引为岸秤六百斤），引盐商认缴某一定地带的引税，而获得该地区专卖权，其地谓之引岸，亦称引地。辛亥革命后仍袭用。
- ③ 《海王》旬刊第20年第17期（1948年3月）。
- ④ 章执中：《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湖南文史资料》第17辑。
- ⑤ 同①。

黄 延 芳

汪仁泽

黄延芳,1883年5月22日(清光绪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黄祚德早年务农,后在上海某煤炭店当出店(送货杂务工)。黄延芳少年时读书不多,十四岁时随表兄到山东胶州,当行栈学徒。

1902年,黄延芳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德商亨宝轮船公司当职员。由于他办事干练,恪守信用,深受客户直隶井陉矿务局负责人的赏识,1907年被聘为该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1910年,黄辞职,进入上海中华捷运公司任职,工作勤劳认真,1918年被提升为该公司总稽核。1920年经董事会推派,赴欧洲各国考察运输事业。他深感我国经济落后,其主要症结之一在于交通运输的阻塞。归国后升任该公司总经理,积极为发展国内铁路、轮船、长途汽车的客货联营业务而努力。

1925年,黄延芳为使托运客户的货物免在途中受损,主张把保险业务与运输业务连结起来。他独资开设了信平保险公司,承接客户投保,然后再向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转保,这一经营方式,深受客户欢迎。此时黄以经营运输业为主,兼谋他事的发展。1927年独资开设了源大行,经营进出口业务。适值苏联商务代表来沪,黄与之签订合同,组织海轮三艘,赴海参崴进口大批萨门咸鱼。货甫到沪入栈,即遭国民党官吏勾结商会

败类用“反日会”名义，诬指为日货，予以封存，谋求敲诈。黄不为所屈，一面延请律师申辩，一面将苏联出口及中国海关进口的凭证制版刊于报端。但待事实澄清启封，货栈咸鱼已经大半霉烂，损失甚重。此后黄继续经营萨门鱼的进口和国内销售业务，在十六铺开设大成、源昌等八家鱼行，任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中国渔业公司董事等职。1929年黄应友人所邀，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部经理。地产部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黄一面吸收储蓄存款，进行分红；一面做了几笔大的房地产生意，获得厚利。此时他兼任上海市房地产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府土地估价委员会主席、公共租界工部局房租公断委员等职。

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战起，黄延芳为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爱国行为所鼓舞，担任抗敌后援会工作，负责支援前线物资和在后方安排、遣返难民等事项。1933年，比国银公司派代表来华推销五金、钢材，黄与该代表在旅欧时已相识，遂被聘任该公司顾问兼五金部华经理，代理比利时钢业联合社在华销售业务，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黄接任新裕纱厂总经理。后因经营失当，亏损累累；又与杜月笙在业务上发生法律纠纷，经调解解决后，黄脱离新裕纱厂。此后，他又与人合伙开设捷成杂粮行；1937年起经销加拿大进口的青鲑咸鱼。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黄延芳激于抗日爱国热情，与计健南等人共同建立第十一伤兵医院，热心救护抗日受伤的士兵。不久，日本侵占我江南大片国土，肆意烧杀掳掠，大量难民流入上海租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黄投入难民

救济协会工作，任总务组长；该会主任潘公展逃离上海后，黄代理主任。难民救济协会开办了不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达四十余万人，黄奔走安排难民衣、食、住宿等事，后又遣送部分难民回乡生产^①，并设置留沪难民生产自救工场、难童学校等。直至1941年底日军进占租界，该会被迫解散，黄仍将难胞妥善安置定当。1939年国际难民救济会成立，他也是创办人之一。在此前后，他担任源大行总经理，光中造纸厂、中华毛纺织公司董事长，美伦毛纺织厂、中国国货公司等企业董事。并历任四明公所董事、四明医院及济民医院董事长、上海市商会副理事长兼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英协会常务理事、位育中小学校董会主席、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理事长等职。他慷慨豪爽，凡教育、慈善等事业，无不奔走效劳，捐募垫款，悉尽义务。八年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坚决不事敌伪，保持了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李铭、厉树雄等人以美金六十万元买进英商汇德丰洋行的扬子江拖驳公司，聘黄延芳任总经理，由浙江实业银行垫款美金五万元，作为黄入股股金。黄受任后，业务颇有起色。此后厉树雄将自己的很多企业交由黄负责经营，黄相继担任了和新纱厂总经理、云飞汽车公司董事长、四明电话公司董事长、宁穿（宁波到穿山）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等职。

1946年，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纷起抗议。黄延芳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亦经常参加民主人士集会，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是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马歇尔三方面呼吁和平。工商界推选代表时，大家认为黄延芳社会

声誉甚好，推他为代表，黄慨然应允。此时有人以此去必有险阻，劝其取消此行，他说：“我既已答应人家，岂能食言。”^②并表示为万民求和平，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态度坚决。6月23日晚代表乘车到达南京时，发生“下关车站事件”，代表马叙伦等竟遭国民党特务殴打；黄因在另一节车厢，未被殃及。后来蒋介石拒绝接见全体代表，只允黄延芳一人往见。黄见蒋时，表达了上海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但蒋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仅仅谈了几分钟，即告结束^③。通过这次事件，使他受到一次现实教育。黄回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亲自来访，黄陪同他们参观了自己所办的事业，包括学校和医院，周对此甚予嘉勉。这件事对他晚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此后他经常参加盛丕华等进步人士组织的红棉酒家聚餐会，进一步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反蒋、要求民主和靠拢进步势力的倾向。

1948年12月4日，满载三千多乘客的招商局江亚轮，从上海驶往宁波途中，遭遇国民党飞机脱钩炸弹而被炸沉，二千多名旅客遇难。黄延芳等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组织“江亚轮惨案善后处理委员会”，与招商局进行交涉，拨款救济，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由于黄延芳一贯热心公益，主持正义，且敢于直言抨击时局，多次在公开场合痛斥蒋介石及国民党弊政，因而招致反动当局忌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将其列入黑名单中。黄被迫避居英国友人家中，直到解放。

1949年9月，黄延芳在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兼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内河航运局局长等职。他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常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灾区视察,了解生产救灾工作情况。此外,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扬子江拖驳公司经申请批准公私合营后,兼任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董事长。1957年8月8日,黄延芳因病在沪逝世。

注:

- ① 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4期。
- ② 《关于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1960年盛丕华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编号31—130)。
- ③ 吴耀宗:《下关事件日记一页》,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

秦 润 卿

陆书臣 吾新民 程庸畴

秦润卿，名祖泽，字润卿，以字行，浙江慈溪县人。1877年9月27日（清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生。父亲秦九龄在上海一家洋行当门房，收入菲薄。秦少时入塾，十五岁时因家贫辍学，由表叔林韶斋带到上海，进协源钱庄当学徒。秦办事勤恳，颇得店东程觐岳的赏识。满师后，先任信房（文书），后为外场^①。后来协源钱庄先后改名为协大、延源、豫源。秦在担任豫源外场时，放款很有魄力，同业中有人想聘请他到别的钱庄任职，程觐岳知道后就叮嘱经理罗樾卿说：“润卿是个人才，一定要留住他。”秦遂于1909年被破格擢升为副理，1917年又被提升为经理。1919年5月豫源又改名福源钱庄，秦仍任经理。

秦润卿尝讲：“乐群以敬业为先，博利以止贪为要”^②，业务经营必须采取稳健方针。当时各钱庄因资金不足，大多做“缺单”，而福源则坚持做“多单”^③，历年存放同业的款项均超过同业存入款项，从不向洋商银行拆款。福源钱庄放款也逐步从以信用为主转为以抵押为主，据统计自1925年至1935年抵押放款常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它的投资以房地产与公债为主，不搞金钞、股票投机。此外，秦润卿还规定钱庄股东和负责人不得向本企业借款。由于经营稳健，福源钱庄业务日益发展。1933年福源在宁波路七十号自建营业大楼^④后，业务更加发

达,年底存款从三百三十八万两骤增至五百三十四万两,跃为同业最前列。

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的店东程觐岳于1923年去世前,召集程氏子弟及三庄负责人嘱咐,将店事家事全部托付与秦润卿,并叮嘱程氏子弟今后不得干预店务。从此,秦除继续担任福源经理外,并兼任福康和顺康钱庄督理,三店大事均听命于秦。几年之间福源、福康、顺康三庄业务不断发展,资力日益雄厚,秦亦逐步成为上海钱庄业的头面人物。

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之时,秦润卿即被选举为副会长。1920年1月会长朱五楼去世,秦被公推为会长。此后历次连任,直到1935年11月,前后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近二十年,历经上海钱庄业盛极而衰的大部过程。秦自担任钱业公会会长起,大力整顿会务,制定公会章程,修订钱业业规,热心指导同业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上海钱庄获得发展,到1920年底从四十家增加到七十一家。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我国经济动荡不定。秦通过钱业公会,一再劝告同业稳健经营,审慎放款。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⑤,由于钱业公会事先采取防杜措施,劝告会员钱庄不去交易所投机,并督促同业慎重签发银票,所以在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时,钱业没有受到重大损失。钱业公会初成立时会址十分狭小,秦设法筹款建造四层新屋一所,于1922年落成。1921年2月创办《钱业月报》,除报导钱业动态、金融商情外,并改变过去钱庄股东资本向外保密的习惯,公布会员钱庄的股东、经副理姓名和资本金额,以昭信誉。此外,还创办修能学社、钱业中小学^⑥,以培养钱业职工子弟。秦的社会地位

日高，除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外，还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工部局华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以及华人纳税会、四明公所、华洋义赈会董事或理事等职。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金融资本家借款三百万元予以支持，计银行业二百万元，钱庄业一百万元。以后蒋介石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以筹集军政费用，委派陈其采、虞洽卿等十五人为委员，秦润卿作为钱庄业代表亦列名其中。此项借款后由国民党政府发行“二五库券”抵偿。此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筹措军费，曾不断发行各种公债，1927至1935年间上海钱庄业先后承购各种债券或承借垫款达二千九百余万元，从经济上支持了国民党政府，而江浙资产阶级也从公债的折扣和利息中获得厚利。秦作为钱庄业领袖，总是以各钱庄生存为立足点，每次金融风潮来临，他辛勤奔波，与政府当局折冲，来平息钱庄业的危机。此时，秦除继续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和总商会副会长外，还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市银行董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和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中国币制原以银两为本位，后来外国银元输入，本国又先后铸造银元，形成银两和银元并用的局面。1932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提出“废两改元”，钱业公会曾提出异议，发表《为废两改元问题告国人书》，秦润卿并发表谈话要求延期实行，均无效，终于1933年3月实施，钱庄业因取消洋拆，失去了银洋兑换的收入。1935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先后宣布废除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自此，钱庄对本国银行的优越地位完全丧失，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钱庄本身业务经营和管理制度上

的封建性更加不能适应形势。1935年金融风潮中，上海各钱庄资金周转普遍困难，全市六十五家钱庄中有十家歇业倒闭。钱业公会一再集议，公推秦润卿去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政府救济。秦代表钱庄界向孔祥熙力争，经一再磋商，决定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由各大银行承垫，对钱庄发放抵押放款，才使钱业渡过这一难关。财政部为此指派徐堪、杜月笙、王晓籁、顾贻穀、秦润卿为委员，组成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此项贷款，并责令借款钱庄缴验押品证件，缴呈资产负债表，对钱庄业务进行监督。

秦润卿主持上海钱业公会期间，对于国内发生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同情与支持的。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领导上海各钱庄自6月4日起停市至11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各钱庄自6月3日起停市至26日，与各界人民共同表示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领导上海各钱庄一致与日本厂商绝交，并摒除与经销日货商行的经济往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陷落，租界沦为孤岛。秦润卿不愿事敌，辞去各种社会职务，另觅秘密住处，深居简出，蓄须明志，除担任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督理外，不再参与社会活动。但事实上他仍是上海钱庄业首领人物，同业间遇有大事必与他商量。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秦仍被推选为理事长。

秦润卿虽然身为上海钱庄业领袖，但个人生活不尚奢华，平日在钱庄里和职工一起吃饭。他自己不做生意，在钱庄里不多宕账^⑦。秦一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所得各项董监酬劳，颇

多捐赠社会福利事业。除在上海创办钱业中小学等事业外，并在故乡慈溪创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普迪小学^⑤、慈溪中学、云华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和保黎医院等。此外，还在慈溪故居宅旁营建“抹云楼”，收集各种藏书四万册，解放后连同房屋设备悉数捐献给国家，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喜见国家欣欣向荣，极为兴奋，对私营金融业联营联管积极支持。1952年私营金融业全行业改造，秦所领导的福源、福康、顺康三家钱庄以及秦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垦业银行和鸿祥钱庄，都顺利地参加公私合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秦被推选为副董事长，时虽已年逾七旬，仍每日坚持到银行办公。1966年7月5日因病在沪去世。

注：

- ① 钱庄职员有内场、外场、信房、库房等职务。联络客户、经管放款的称外场，俗称跑街。
- ② 见上海钱业公会“劝告同业稳健经营”函，载《银行周报》第9卷第25期第37页。据原福源钱庄职员称，该函虽由公会出面，实出秦意，能代表秦的一贯经营思想。
- ③ 钱庄依靠同业借入款经营投放的，称“缺单”，反之，经常有余款存放同业的，称“多单”。
- ④ 钱庄营业用房屋素不讲究，大多设在一般里弄中。福源钱庄自建沿街营业大楼，在上海钱庄中属于首举。
- ⑤ 1920年，西方信托公司和交易所事业传入我国，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设立，各项投机活动盛行，后因投机失败，又纷纷倒闭，造成市场混乱，称为“信交风潮”。
- ⑥ 修能学社开办时间较短，学生不多。钱业中小学开办时间较长，解放时学生达一千七百余人，1950年由上海市教育局接办，后改名为“新中中

学”与“塘沽路第二小学”。

- ⑦ 钱庄职工平时工资较低，有急需时可以宕帐，不计利息，于年终分红时扣还。钱庄高级人员往往利用职权，大量宕帐，投机囤积，图谋私利。
- ⑧ 普迪小学有一小与二小两所，均吸收贫苦儿童入学，免收学费，还赠送书籍和笔墨纸张。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
- ② 马积祚：《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
- ③ 秦祖泽：《抹云楼家言》。
- ④ 秦省如：《秦公润卿年表》。（以上均见秦省如、秦纯如、秦耿如编印之《秦润卿先生史料集》（1983年4月）。）
- ⑤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 ⑥ 俞佐庭：《慈溪秦润卿先生七十祝辞》。

黄奕住

汪仁泽

黄奕住又名住，1868年1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生，福建南安人。父亲黄则赏，务农。由于家境贫困，黄奕住自幼失学，稍长助父农耕，兼学剃头，聊补家计。

黄奕住二十岁时，为谋出路，只身随亲友渡海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三宝垄。初时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日间为码头华工剃头谋生，夜宿妈祖庙僧人处，逐渐学习当地方言，熟悉乡俗。二十二岁时得侨胞资助，改操肩挑小贩，深入土著村落，贩卖杂货。逾两年积有小本，在三宝垄美商花旗银行门前设一咖啡茶摊，兼售食品，起早落夜十分勤劳。1892年，他与华侨同乡合伙做糖栈生意。不久退伙，独资设立日兴行，专营蔗糖、土产买卖。由于苦心经营，营业渐盛，1907年已拥资十余万元，逐渐由零售转营批发趸销。在此前后，黄曾在爪哇接待孙中山，并几次资助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1910年，黄奕住随着营业扩展，将日兴行迁入三宝垄闹市中心的街新址，雇佣中、英文书记，进行大宗批发业务。此后数年内，在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泗水（今苏腊巴亚）、棉兰、巨港、北加浪岸以及新加坡等地遍设分行；并在纽约、伦敦等地设特约通讯机构，远及主要产糖国古巴等地，每日都有糖市行情报价专电。黄有其子黄钦书作助手，由于消息灵通，

运筹自如，经营得法，获利丰厚。至1914年估计，资产已在荷币三百万盾以上。

1917年秋，爪哇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荷等国船只被征集回国，货运阻滞，糖价猛跌，加以日兴行在运输途中的货物遭到巨大损失，黄奕住一时陷于困境。有人劝黄匿居他地暂避，但黄坚守信誉，力谋应付债款，将不动产抵押，并得银行的贷款和糖厂的支持，得以渡过难关。不久日本正金银行在该地设立分行，主动向黄放款，黄运用大量资金囤储蔗糖；大战结束后，货运畅通，糖价一日数涨，获利倍蓰。他又以低价标得当地大货仓失火后的蔗糖数万包，该批蔗糖外表虽遭水渍烟熏，内部质量未变，经整理改装后转销香港、新加坡等地，大获其利。此时估计其财产已超过三千万盾。

战后荷印殖民政府对华侨课征重税，黄奕住怀着振兴祖国实业的宏愿，将巨额资金约二千三百余万美元陆续汇回祖国，自己亦于1919年4月回国，定居厦门鼓浪屿。途经新加坡时，投资华侨银行，认股新加坡币四十万元。1920年又应李清泉等邀，去菲律宾马尼拉合资创办中兴银行，投资菲币一百万元，约占该行资本总额的五分之一。其后又到上海，经友人黄炎培的介绍，结识《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商谈投资国内实业事。史认为可先筹设银行，然后再投资其他实业。黄深以为然。又经史介绍结识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筠，委托胡筹组中南银行。黄认股三百五十万元，占该行资本总额七成，自任董事长，胡任总经理。1921年6月中南银行在上海开业后，业务迅速发展。不久又在厦门及鼓浪屿设分支行，收兑侨汇及吸收侨眷存款，营业收入一度超过京、沪各行。此时，黄

并在厦门独资开设日兴钱庄。黄在印度尼西亚的日兴行，由于荷印殖民政府向黄追缴税款一千五百余万盾而被迫全部收歇。当时荷印当局曾拉黄改入印尼国籍，表示既可减税，又能保存企业；日本领事也邀黄挂籍日本。但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表示即使放弃全部产业也不能改变国籍，均予断然拒绝。

黄奕住在厦门鼓浪屿定居后，鉴于厦门居民饮水皆靠水船从九龙江运来，再由水贩肩挑供售，既不卫生又甚不便，遂于1920年与友人黄世金等发起筹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出资四十万元，邀请专家勘察水源，选择厂址。1924年开始募股，1925年招标投标建造，到1926年7月开始供水，为当地居民解决了饮水这一大问题。与此同时，黄奕住于1921年以二十万元独资承盘林菽庄办的厦门德律风公司，改名为厦门电话公司，增资至一百万元，更新全部器材设施，并招工敷设厦门与鼓浪屿间的海底电线，次年厦鼓通话。黄又于1925年创办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接通了厦漳两地的电话线，方便了广大用户。此外黄奕住还投资上海普益纱厂、益中磁电厂、天津永利化工厂、南京肥皂厂等企业，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号，在上海开设昌兴行经营土特产进出口贸易，以及开发龙岩煤、铁矿。

黄奕住自幼失学，常引为终身憾事，因此甚为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20年他在家乡兴办斗南小学，不久增设师范班，重金聘请名师为教员，免费供给师范生膳宿。1927年黄为纪念其母，在鼓浪屿创办慈勤女子中学。此外多次捐资给岭南、南开、暨南、震旦、复旦、厦门等大学，厦门同文、英华中学，以

及新加坡爱同、华侨中学等校。他并热心地方公益，除捐助慈善机关外，并独资助修泉州开元寺东塔古迹、泉州顺济桥等。北伐战争期间，曾资助在福建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放款不慎，倒帐损失达二百二十万元，一时信誉大受影响，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就商于黄奕住。黄再向中南增资二百五十万元，并对外宣称尚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元资金作后备，恢复了中南的信誉。黄在董事会上提议由其三子黄浴沂担任该行协理，名义上向胡筠学习经营管理，实则借此机会从大权独揽的胡筠手中分掌部分实权。1931年中南、大陆、交通、国华、金城五银行联合经营原由金城创办的太平保险公司，黄奕住被推为董事长。1938年胡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黄浴沂任中南银行总经理，黄奕住及其家族开始掌握该行的总管理权。

黄奕住于1936年迁居香港，因已患中风而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其全部事业由黄钦书、黄浴沂继续经营。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厦门沦于敌手，日方派人赴港见黄，以没收黄的企业胁迫黄入日本国籍或出任伪职。黄表示“宁可破产，决不事敌”，结果在厦门的企业被日方全部侵占。为避免日伪相扰，黄于年底移居上海法租界养病，杜门谢客。1945年6月5日在沪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黄奕住自叙归国后大事年记》（未刊稿）。
- ② 黄晓沧：《黄奕住先生》，《菲列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5月版，第157页。

- ③ 黄则盘:《著名华侨黄奕住事迹》,《泉州文史资料》第10辑。
- ④ 《中华现代名人传·黄奕住》,1925年版,第117页。
- ⑤ 杨周之、谈在唐:《中南银行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 ⑥ 黄奕住在沪部份亲友的访问记录。

徐 新 六

汪仁泽

徐新六，字振飞，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浙江余杭县人。父亲徐珂，晚清举人，国学名儒，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徐新六幼年时在私塾读书，后进杭州养正学堂求学，1902年入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1908年毕业后，考取浙江省公费留学生赴英，进伯明翰大学学习冶金专业四年，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又在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学，次年获得商学士学位。再至法国，入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14年徐回国，参加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分派在财政部任金事，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

徐新六幼年即闻康、梁之名，稍长与梁启超结识。1917年7月，段祺瑞组阁，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徐任财政部秘书，曾两次协助梁向日本商借贷款。11月，梁启超因在四川内战问题上与段祺瑞意见相左而辞职，徐也随之离开财政部，进中国银行，先任金库监事，后任北京分行协理。其间曾一度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

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半官方身份赴欧洲考察，邀徐新六、张君勱、蒋百里、丁文江等作为随员同行。1919年到达巴黎时，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徐被委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

1920年3月,徐新六随同梁启超回国,在上海经营新通贸易公司;次年应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之聘,任该行董事会秘书。该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其时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放款及储蓄业务外,并发行银元券,办理外汇,经营仓库等业务。徐新六的才干深为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揆初所赏识。1923年徐任该行副总经理;1925年起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徐新六主持浙江兴业银行后,积极以新的管理方法改进经营,推动和促进了该行业务的发展。对外通过代理汇兑、合放贷款、互相开户和清算票据等业务,使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旧中国南方的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集团,被称为“南四行”。同时,对内部也进行整顿,延揽人才。他用人一秉公开,采取考试制度,选拔富有朝气、懂得新型管理的人员担任各分支行、部门的负责人。对原有在职人员,给予业务技术训练的机会,提高工作效率,逐步淘汰老弱冗员,精简机构。浙江兴业银行由于叶揆初、徐新六的精心擘划,经营得法,信用昭著,1921年到1927年间的存款总额,在各商业银行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26年底的定、活期存款共达三千三百十二万余元^①。

1927年后,上海市面一度不景气,工商业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弱。浙江兴业银行在徐新六主持下,除了继续对民族工业如刘鸿生所办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大量放款外,又另谋出路。它增设“经营国外证券委员会”,调集资金,委托外商银行购入北洋政府期间在国外发行的以外币为

单位、由关税和盐税作担保的“中法美金五厘公债”、“日金九六公债”券,以及外国企业的股票。到1930年,该行有价证券的投资额高达一千四百九十三万余元,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十四。此外又成立地产信托部,徐新六延聘龚延芳任该部经理,经营第一年即盈余百余万元。以后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获利更厚^②,1931年年终存款总额在全国同业中居第四位。但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沪地受到战争影响,市面萧条,地产市场一蹶不振,价格一落千丈。1934年初,浙江兴业银行帐面上尚有价值八百七十余万元的房地产乏人问津。徐新六通过董事会作出决议:“与其产业荒置坐耗利息,不若赶快施工建筑,收取相当之孳息为得计。”于是破土造屋,先后在施高脱路(今山阴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等处建造了“兴业坊”、“兴业里”、“浙兴里”,以出租房屋收取房租,弥补投资收益。同时,在徐新六的筹划下,浙江兴业银行在江苏无锡、常熟、苏州、新浦,浙江湖州,河南陕县、信阳、驻马店,安徽蚌埠等地增设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扩大了金融网和投放范围。1932年,徐新六又以浙江兴业银行名义与美商斯达莱公司合组泰山保险公司,投资一百万元,徐兼任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随着浙江兴业银行业务的发展,徐新六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1927年12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徐还任复旦大学校董(曾一度兼任校长),时事新报、大晚报馆、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交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大陆报、上海毛绒纺织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十余个单

位的董事,以及上海市商会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委员长等职。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宋自任董事长,聘徐任常务董事。徐勤于治事,注重实干,作风平易近人。

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以后,曾多次拟委徐新六以财政金融方面的官职,徐皆婉拒,但政府当局每遇有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时,常向徐咨询。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执行对日妥协方针,配合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由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组成经济考察团,赴日进行所谓“亲善活动”,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实施“法币”改革这一重大决策前,曾征询徐的意见。徐草拟的币制改革方案,后来在实行“改革”时被采纳甚多。

1937年抗战军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徐新六和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皆被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指派,以民间金融界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组织代表团,赴美国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在香港的徐新六参加。8月24日徐新六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相偕搭飞机从香港起飞,拟赴桂林再转重庆。日本军部获得情报,误以为是孙科座机,即派日本军用飞机截击。结果在广东上空被击落,机坠人亡,国民党政府给予阵亡烈士称号。徐遗有《币法考》等著作。

注:

① 摘自浙江兴业银行1927年资产负债表。活期存款为一千二百四十六

万九千元；定期存款为二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元。

- ② 上海“公共租界”历年地价上升的统计：以 1903 年每亩平均价格指数为一百，1924 年为三百五十二，1927 年为四百零五，1930 年高达五百八十四。

胡 筠

汪仁泽

胡筠字笔江，1881年4月27日（清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江苏江都县，祖籍江苏镇江。父亲是当地钱庄店员。胡筠少年时就读私塾，学习勤奋，练得一手颜体好字。十七岁时，在江苏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到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1910年到北京公益银号任职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北京交通银行为行员。

1912年5月，身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胡筠由于头脑灵活，善于随机应变，逐渐博得梁的赏识，不到两年便被逐级提升为总行稽核、分行副经理、经理之职。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然继续筹措军饷，通过梁士诒控制的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引起京津挤兑风潮。5月12日段祺瑞内阁悍然下令停止中、交两行纸币兑现，更引起慌乱。上海等地中国银行拒不奉行，照旧兑现付存。在此期间，胡筠消息灵通，曾与财政当局以及银号经理人等相互勾结，利用市面上兑换率的时高时低，从中获取暴利，使中小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受害非浅。京、津金融界纷加指责，胡难以存身，遂辞去交通银行职务，挟资南下。

胡筠到上海后，经史量才介绍，结识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

富商黄奕住。当时，黄怀着振兴祖国实业的宏愿，拟在上海开办银行，经与胡筠晤谈，十分投机，遂委托胡筠代为筹组。黄初拟出资一千万元独资经营，胡告以国内商业银行一般资金皆在五百万元以内，且以股份有限公司责任有限为宜，黄欣然同意，遂定资本额为五百万元，黄认股三百五十万元，余股由胡筠招募，史量才等也参加投资。不久，向北洋政府登记注册，因系中国金融、工商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营，故定名为“中南银行”。胡筠以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为辞，经多方疏通，使中南银行获得了钞票发行权。1921年6月正式开业，总行设上海。黄奕住、胡筠、史量才等七人组成董事会，黄任董事长、胡任总经理。翌年增设天津分行及北京办事处，由胡在北京交通银行时的亲信旧友分任经理。为了吸收南洋一带华侨汇款及侨眷存款，中南银行又增设厦门分行和鼓浪屿办事处，每年的盈利额竟超过了京、沪各行。胡筠又以高薪聘用英籍雇员，开办对外汇兑业务，盈利颇丰。此后中南银行在胡的筹划下，分别在汉口、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重庆、香港等地增设分、支行。由于中南银行资力雄厚，且发行纸币，在胡筠的积极经营下，资金运用灵活，营业扶摇直上，声誉在私营商业银行中列于前茅。

胡筠为使中南银行扩大社会信誉，于1921年冬与金城、盐业、大陆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①；1922年又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承担以中南名义发行钞票的兑现责任，因有华侨股东为后盾，中南发行的钞票深具社会信用。1923年，胡又发起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各投资二十五万元，组成“四行储蓄会”，总会设上海，京、津等

地设分会，以“保付利息”和“存储者得分红利”相号召，招揽储户存款，吸收社会游资，扩大业务。在四行联营机构中，由四行总经理胡筠、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四人任执行董事，逐年轮值主持会务。为取信社会，四行准备库设特大水泥库房，存储每箱五千枚银元的大量现洋，供人参观，以示储备充足。后来还出资五百万元在上海市中心建造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为远东当时最高的大厦，很受国内外人士的注目。

1927年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发放给协和贸易公司的巨额贷款二百二十万元发生倒帐，原领总行的全部资金一百五十万元亏赔尚不足数，谣诼随之而起，几濒于危。胡筠得讯后，急命沪、厦两行筹款接济，稳定了危局。但中南银行经此打击，一时声誉大落，沪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业务随之衰退。胡筠遂商请黄奕住增资二百五十万元，并对外声称华侨股东尚有资金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备用。从而使中南重振信誉，业务逐步得到恢复。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胡筠曾参加江浙资产阶级一伙予蒋以财政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胡筠设法结交党政大员，每遇财政要员来沪，胡辄殷勤招待，曲意奉迎。后经钱永铭等人介绍，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拉上关系，凭其善于应酬、手腕灵活，关系渐趋密切。1931年，胡特意提拔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交谊甚笃的该行职员张质夫为汉口分行副经理，对何进行笼络。1933年交通银行总行改组，胡筠得到宋子文的支持，接任该行董事长。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改订章程，将原章程规定总经理“商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务”改为“秉承董事长，综理全行行

务”。一字之易，总经理权力削弱，董事长权力大为加强。从此，胡筠成为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的当权人物。

此后，胡筠在金融界的地位日益显赫。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私营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胡筠在收回中南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时，勾结财政大员，上下其手，获取厚利^②。1936年宋子文系官僚资本的中国建设银行联合中国、交通、金城、上海等银行投资成立“中国棉业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控制花纱布的产销及储运。宋子文自任董事长，胡筠等人分任常务董事。此时胡还兼任新华、金城、江苏典业等银行董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战事激烈，胡筠于1937年10月离沪赴香港。1938年8月，胡筠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出席有关会议，24日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由港乘飞机赴重庆。胡、徐所乘客机被日方误为孙科座机，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上空遭遇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

注：

- ① 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联营后，因属于北方金融集团，故被称为“北四行”。
- ②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外，其他银行已发行或已印未发行的钞票，统由财政部限期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停止流通；并饬各行将法定准备金按现金六成、公债券（或房地产）四成的比例上缴。由于后者系照市价计，胡筠在作价时勾结财政当局大员，获取大笔钱财。

王 性 尧

罗允和

王性尧，原名师伦，1905年1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浙江镇海。其祖辈为嵎泗列岛的渔民，后移居镇海。其父王栋臣是镇海恒丰山货行的“阿大先生”（即资方代理人）。

王性尧自幼聪慧好学，入塾开蒙，兼习珠算。九岁入本地时中小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去汉口亲戚家塾馆附读。他学习刻苦，两年后便达到了相当于高中的文化程度。

1921年，王性尧由亲戚介绍，到北京泉通银行当练习生，并进修英语。1924年回到上海荧昌火柴公司当文书。他留心火柴生产，不久之后，就熟悉火柴行情，人称之为“火柴状元”。不数年，他略有积蓄，由公司经理朱子谦介绍，投资于大华仪表厂，后被选为该厂董事。1930年，火柴生产过剩，外货又大量倾销，为应付这种状况，荧昌公司与鸿生、中华火柴厂三家于7月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王性尧升任公司总务科副主任。他为人信实可靠，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经常代表公司外出联系生产业务，在公司内外俱获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日货充斥我国市场，民族工业受到很大打击^①。为了打开国货销路，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中国银行

总经理张嘉璈，邀集生产国货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美亚织绸厂蔡声白等人成立了“星五聚餐会”，研讨如何提倡和推销国货。王性尧作为大中华的代表，于1932年3月参加了聚餐会。同年8月，“星五聚餐会”成立正式团体“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张嘉璈任理事长，王被推选为理事之一。“产销协会”在上海开设国货介绍所，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开设了分所。次年2月，又在上海开办了中国国货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国货推销业务，“产销协会”于1934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张嘉璈认为需要有一个得力的人员主持业务，遂向新式管理卓著成效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物色联办处主任。经与大中华经理刘鸿生协商，重金礼聘王性尧任国货联办处主任。

王性尧主持国货联办处后，首先制订了一份筹设各地国货公司的计划，将筹设计划编印成册分发各工厂，向社会作广泛宣传。他联络各国货工厂，接洽银行贷款，筹划在全国各地开设国货公司。国货联办处初创时，在经济、人事、业务上都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在王的擘划指导下，业务发展颇快，到1935年已有郑州、长沙、镇江、温州、济南、徐州、福州、重庆、广州、西安、昆明国货公司十一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1935年3月张嘉璈被国民党要员排挤出中国银行，国货联办处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王性尧只得紧缩业务，等待时机。不久，吴鼎昌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在上海几个国货团体欢迎吴的一次宴会上，王性尧向吴陈述国货联办处在打开国货销路方面所起的作用和目前面临的困难，请求

给予帮助，并面交了他草拟的发展国货公司的意见书。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高唱“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业部决定成立一个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简称联营公司），吴鼎昌于1936年10月通知王性尧参加共同筹办。王被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和联营公司筹备委员。联营公司筹备委员会在上海的办事处设于国货联办处。王性尧看到自己提出的意见书大部分都被采纳，国货联办处又活跃了起来，一时兴高采烈，四出奔走。1937年4月，联营公司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声白为总经理，王性尧任副经理；国货联办处遂告结束。联营公司的总公司仍设在上海，于5月开幕，由王性尧主持业务。嗣后又在南京、武汉筹办国货公司，并计划对先前国货联办处所设的十一处国货公司投资改组，还打算组织“国货银团”。

四个月后，“八一三”战事爆发，大片国土沦丧，联营公司的发展计划受挫。王性尧于同年11月离开上海去汉口，在武汉主持国货公司开幕后，即往重庆改组重庆国货公司，并与四川宝元通合作成立了成都中国国货公司，旋又往贵阳筹设国货公司。1938年9月，香港中国国货公司成立，同年桂林、广州、新加坡等三处中国国货公司成立。联营总公司于1939年1月迁至重庆，王性尧往返于渝沪之间，维持公司业务。

1940年底，由于国民党政府内的派系之争，王性尧和经济部（即原实业部）所属几个机构的负责人在重庆被拘禁了两天。释放后，王性尧便决心改组联营公司，脱离官府。经过王的努力，次年5月，联营公司的官股全部退出，中国、交通、新华三家银行承接了这些股份，联营公司改为私商经营。8月，

王因病到上海休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亦为日军所侵占，联营公司在沪办事机构受到威胁，王收起招牌，改用其他商号名称搞秘密运输，向内地输送布匹、日用百货等紧缺物资。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他的声望，几次派人拉他出来主事，他设法拒绝。从此杜门谢客，在家写字、画画、学唱昆曲，并劝告朋友同事不要为日本人效力，保持了一个爱国工商业者应有的民族气节。不久，联营公司的活动为日方发觉，王的寓所被搜查，大弟被逮捕，他自己住进疗养院躲避。

抗战胜利后，联营总公司自重庆迁回上海，王性尧仍任公司协理。在美国货泛滥于市场的情况下，国货生产和销售都受到冲击；加以通货恶性膨胀，市场行情不稳定，营业十分艰难。王性尧为了保住联营公司，从推进各地国货销售业务转而从运销业务，在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各地成立办事处，运销机制品及土产；同时又代理中国纺建公司棉纱棉布运销香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联营公司获得了新的发展，王性尧任副经理，1951年任总经理。以后王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致力于上海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王并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常务委员等职，被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1968年6月17日，王性尧在上海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王性尧:《参加“提倡国货”工作二十二年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
- ② 《联营公司简史》(原联办处副主任陆乾惕口述,上海工商联档案室存)。
- ③ 王性尧“文革”期间所写“交待”材料三份。
- ④ 访问原大中华火柴公司襄理戚福铭、原联办处职员施新元、原联营公司职员刘励杰及王性尧之女王逸秀等人的记录。

滕 虎 忱

王家鼎

滕虎忱，原名景云，字虎忱，一作虎臣，以字行。山东潍县滕家庄（今属安丘县）人，1883年8月7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初五）生。其父滕福建，耕种土地六、七亩，兼营打铁或补锅修旧。滕虎忱七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三年后因家境困窘而辍学。稍长，跟随父亲务农学艺，常至潍县城东李家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乐道院”，为教会及其附设医院、学校作零杂活计，父子遂相继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翌年9月破土兴建胶济铁路。滕虎忱跟随父亲前往青岛修铁路，靠打制铺路石子为生。1902年考入青岛德国水师工务局船坞工艺厂，在该厂机械科热炉部当学徒。他在四年学徒期间，白天做工，晚间随班上课学习机械知识，逐渐对机器制造发生浓厚兴趣。满师后按厂规留厂作无偿“效力”两年，后以精通锻工手艺被提升为带班工头兼作车间统计，在该厂前后达十三年。他在工休日常与一二同事共同切磋琢磨技艺，因而技艺精进，能够全面掌握镟工和钳工手艺。1912年8月，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后，视察华北、华中铁路时，于9月28日到达青岛作两天逗留。滕虎忱参加了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在三江会馆和德华大学两次聆听孙中山演说，深为其发展实业、振兴中国的思想所感动，萌生

了要创办机器厂，制造国产机器以代替“舶来品”的愿望。

1914年11月，日本借口参加协约国攻占胶州湾，接收了原德属各工厂。滕虎忱仍留原厂，转而为日本厂主雇佣。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滕虎忱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他觉得国家将亡于日本，若再继续为日本做工，“在良心上受不住”，宁可回原籍务农，也不愿屈辱地为日本制造军备武器被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遂坚决要求辞职。日本厂主因他是这个厂年资最长、技术最为熟练的工人之一，提出种种优厚的条件加以挽留，均为他所拒绝。滕回到潍县故里后，恰遇严重虫灾，秋粮失收，为生计所迫，于同年冬天出走济南谋生，又经友人介绍赴北京做工，一年后重返故里。

1917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潍县“乐道院”办的文华中学，成立了一个小型庶务修理工厂“理化制造所”。滕虎忱因其父早年与“乐道院”美国传教士狄乐波相识，遂得以进入该所任主任，负责管理、维修“乐道院”设置的发电机、内燃机、锅炉以及水塔等机械设备。因此机缘，滕结识了许多基督教友，并以其刻苦耐劳和娴于技艺而得到他们的好感和信任。滕虽为主任，但薪水较少，不敷养家糊口。为谋求生活出路和实现多年来振兴实业的夙愿，他勃发了创办机器厂的愿望，并得到了文华中学教员尹焕斋的支持和鼓励。1919年底，滕虎忱为筹集建厂股金，变卖了故里三间祖传旧屋，将所得款项五百银元全数入股，又由尹出面联络基督教会华籍牧师、教员和医生多人共同集股，筹得三千元。1920年1月，滕虎忱邀约当年在青岛学徒时的同事丁执庸，正式发起成立“潍县华丰机器厂”，滕

为经理，丁为副理，继聘张仲元总管帐房。

华丰厂初创，滕虎忱在潍县东关大街租赁了数间破旧民房，仅有一部红炉、二部小镗床以及手摇钻等简单工具。他招收徒工二、三人，亲手教他们打铁锻造，自任掌钳，其妻帮助拉风箱。因股金短少，设备简陋，仅能为烟潍公路打制桥梁道钉，为济南电灯公司加工螺丝等，入不敷出。

这时，潍县东乡农户自天津购买织布机从事织布业的迅速增加，滕虎忱眼看当地对织布机的需求将与日俱增，乃于同年10月在尹焕斋等人资助下，扩大增资至一万元，从上海购进机器设备，增收徒工十余人，开始仿照日本“石丸式”织布机，制成铁轮木架结构的脚踏织布机。又鉴于北方气候常常干旱，农村需用灌溉设备，遂将农村通常使用的固定式木斗水车研究改进为转动式铁斗水车，制成畜力灌田机。滕每天提前到厂，指导徒工们精心研究制造工艺。由于他锐意经营，讲究产品质量，注意向农民宣传，并作示范操作表演，还采用订购、赊销办法，很快为织布机、灌田机打开了销路，获利甚厚。

1921年秋，滕虎忱在潍县东关购置三亩多地皮兴建厂房，招收徒工进厂学艺。以后逐年招收徒工培训，渐次形成该厂的技术骨干。1923年，随着潍县民间织布业逐渐由东乡向四乡扩展，华丰厂生产的织布机供不应求；又陆续制造弹花机、榨油机、轧花机等品种。1928年，复扩大厂房面积达四十亩，增添机器设备，扩建木工、铸工、锻工、金工、白铁、装配等车间，职工增至一百五十余人，产品亦逐渐销往昌邑、掖县、寿光、益都、安丘等地。1929年，设立黄县营业部。华丰厂的发展和成就，使滕虎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随之提高，被当地教会推选

为长老，参预管理教会事务。1930年，滕发起创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出资赎回潍县城内和南关两处教堂，脱离美国长老会，由中国人自办^①。1931年3月，潍县文华中学、文美女中和培基小学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成立广文中学，滕应聘为该校校董。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滕虎忱仍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将企业发展的重点转向生产动力机械方面。为试制柴油机，他于同年冬扩大增资至五万元，从上海购进英国制车床、气锤、大摇臂钻、龙门刨等大型设备。他专程赴青岛延聘青年技工王宏茂来厂，以厂内原有的一部英国制十五马力“狄塞尔”卧式低速柴油机作样品，多方鼓励王研究仿制。经反复拆装试验，绘出了图纸，又用手工操作制出推、研、磨、刨、铣等专用工具，终于在1932年秋先后试制成十五马力、八马力、二十马力和四十马力等四种类型的柴油机并批量投产。华丰厂从此一跃而成为能够独立生产柴油机的主要厂家。这一年，滕虎忱主持该厂再次增资至十二万元，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推选尹焕斋为董事长。1932至1935年间，先后在徐州、济南、郑州、青岛等地设立营业部，派遣专人主持各地推销业务。

1934年5月，冯玉祥从泰安出发游历胶东地区，沿途发表讲演、谈话，宣传抗日主张。16日抵潍县，滕虎忱陪同他冒雨参观华丰机器厂。冯看到该厂产品制作精细，在了解工厂创建历史后极受感动，热情称誉滕说：“全国如有二百人能象您这样有血性、能奋斗，国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②

华丰机器厂于是年再度招股增资，股东扩大到潍县绅商

各界近三百户，资本总额达四十万元。1935年，滕虎忱在潍县南关筹建第二厂，于翌年建成投产后，原第一厂则专业生产柴油机。1937年初，在第二厂内增设电气车间和铆工车间，从事电动机和锅炉生产。至此，两厂总资产为一百五十万元，职工总数达六百余人。当时潍县地区民间拥有近十万部织布机，由华丰厂生产的约占十分之七。该厂各类机器产品运销华北、东北、西北和云贵等十八个省区，经营盛极一时。滕虎忱还计划发展黄河、小清河水运交通事业，准备制造用以装备轮船的立式柴油机和挖泥船等，所需机器图纸和部分机器零、部件均已备齐，终因“七七”事变爆发，计划未能实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占平、津。滕虎忱预感潍县沦陷势将难免，表示决不与日本“合作”，决心将该厂内迁汉口。他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三次呈文请求调拨车皮协助运输机器设备，但韩复榘政府一再敷衍拖延。滕虎忱等候到12月，当胶济铁路濒于中断时，见内迁无望，乃被迫向董事会辞职，只身搭乘货车赶到济南，携眷撤往西安。

1938年夏，滕虎忱由西安移居汉中，半年后举家迁往成都。1939年冬赴重庆，任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总会顾问等职，曾参与财政部烟叶复烤厂筹建工作。他提出建厂设计图纸后，由于重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财政部拒绝支付追加投资，该厂筹建流产。1940年，滕奉命转赴昆明任烟叶复烤厂副厂长。1942年辞职回成都，与同乡集资购置电磨一台，创办小型“利丰磨坊”，借以维持生活。同年，冯玉祥在重庆发起“中国基督教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滕热诚捐款。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滕虎忱满怀兴奋，匆匆收束

“利丰磨坊”业务，急欲返回潍县重整华丰厂旧业。他于1946年2月回到济南。先是，华丰厂于潍县沦陷后被查封，全部设备被日军拆迁至济南改建为“历山铁工厂”，专为日伪修造军械武器。抗战胜利后，该厂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改名为“国防部兵工署第44兵工厂”。滕虎忱回到济南后，幻想国民党政府能够发还该厂产业，立即呈文省政府当局申请发还，接着与国民党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财产处理局不断交涉。1947年1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承认“应发还民营”，但又要求适应其反共反人民内战需要，按“借用”或“租用”办法处理^③。2月，第44兵工厂负责人借口无国防部命令，拒绝会商。滕虎忱在失望中继续交涉。8月，他赴南京辗转托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防部兵工署、敌伪财产处理局、中央信托局、联勤总部等军政部门申述发还理由。经交涉月余，最后仅得到“照前批发还”一纸空文。10月，滕回济南再与第44兵工厂交涉，该厂竟以“总动员期间”为理由，拒不发还。滕虎忱前后奔波二年多而毫无结果，曾愤然说道：“我到崂山当和尚去！”^④反映他在幻想破灭后的绝望和苦闷。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扶持下，华丰机器厂利用原东关营业部残存设备恢复生产和营业。9月济南解放，滕虎忱应邀回潍县担任该厂经理。1952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滕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滕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华丰厂公私合营，滕继续任经理。

1958年12月28日，滕虎忱病逝于潍坊市。

注:

- ① 王振纶整理:《基督教在潍坊的传入与传播》,《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2—163页。
- ② 张功常述:《冯玉祥胶东游记》,上海军学社印,第9页。
- ③ 《山东青岛区处理敌产审议会济南分会第44次会议记录》,济南市档案局存。
- ④ 《新潍坊报》1948年6月11日。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刘冰:《记华丰机器厂创办发展过程及创始人》,《新潍坊报》1948年6月10日。
-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4年12月初版。
- ③ 访问滕怀礼、张蓝田、王宏茂、王宏遇记录。

高 星 桥

熊尚厚

高星桥名文奎，字星桥，以字行，1875年8月24日（清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天津。高家世代以铁匠为业，先在南京，后迁天津开设“高记三挺刀”铁匠铺，给武场练功的人制造各种武器。其中三挺刀被清政府指为武场专用，因而营业鼎盛。

高星桥七岁入塾，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后考文昌阁童子试不中，父亲就叫他入了自家的铁匠铺学艺。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内地，反帝斗争连绵不绝。1900年春兴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满清皇室令高星桥的大哥高文祥赶制金眼毛瑟枪五十支以备急用。制成后曾受到载漪嘉奖。接着又让高家移至北京炮厂制炮。高星桥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协助他大哥仿制成功了转轮六轮手枪和快炮，技术日益增进。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高文祥遇难死去，他父亲相继病故，年青的高星桥担起了一家九口的生计。因在北京生活困难，遂搬回天津，靠外出作零活养家糊口，生活艰难。1904年底，他给英商济安自来水厂制造铁罐水箱的铆钉，生活略有好转。1907年，他与衙门小吏及脚行头目等结拜把兄弟，合伙用大车到火车站偷煤。后铁路管理制度渐严，他另谋出路，与人合伙开设毓记煤球厂，

但未及一年即亏累歇业。嗣后，高入天津煤栈为推销员，一年后因煤栈待遇菲薄而辞职。随后他又设法凑集资本开设坤记煤球厂，未几又把资本蚀光。

1908年，津浦铁路北段开工，高星桥经人介绍，为铁路加工枕木、铆钉，后改任火车司炉。他见外国司机、司炉瞧不起中国人，心里很不服气。当时开长途火车的司机、司炉全是外国人，他怂恿中国司机开长途，自任司炉。他们的车也能正点安全到达终点，外国人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不久，经德商德义洋行走街尹献亭介绍，他入德商泰来洋行任走街。

1910年，高星桥从泰来洋行转到井陉矿务局任司磅，收发煤炭，工作中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业余时间还向矿上的德人学会了一些德语。次年夏，一次因煤炭差了一百吨，该局洋总办德人汉纳根前来查问，高以半通不通的德语作了回答，汉纳根十分高兴，又见他精明能干，就调他到华帐房工作。那时，井陉煤炭销路不好，汉纳根很想找个推销员。他亲自主持考试后，发现高不但熟悉各种煤的性能，而且对如何打开井陉煤的销路也有一些办法，便决心加以重用。但高职位低，拿不出大笔保证金，起用受到障碍。汉纳根决心既定，便通过自己的岳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曜琳之妻）出面担保十万银两保证金，于1911年9月指派高担任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

高星桥当上总经理后，于天津、上海、汉口分设经理处，北京、保定、石家庄设分销处。他亲自前往山西矿区了解情况，对技术管理及交通运输提出改进意见；还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及租界电灯房去实验井陉煤的耐火力，证明超过开滦煤两倍。从此，他到处宣传，为井陉煤打开了销路。1912年，他把井陉

煤推销到了上海。数年间，高从推销井陘煤中发了财，与上海的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齐名。

1914年，高星桥在汉纳根支持下，接办了石家庄小型焦炭窑十余座。除加以扩充外，又新建焦炭窑二百余座，所出清水焦炭经天津运销日本，获利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感情上亲德，认购德国“爱国公债”一百五十万马克，并给德军代办军需，赶制冬季御寒高统毛皮马靴两万双，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嘉许，赏赐他以德国贵族“冯(von)”的称号。之后，德皇又赐给他中国全国铁路待筑计划蓝图，以示德国在大战胜后将委他包建中国铁路。然而，1917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根据农商部《处置敌国矿商条例》，收回了井陘煤矿产权；次年汉纳根被遣回国，井陘矿务局改归直隶省长督办，高亦随之离去。

1919年，高星桥开始投资经营房地产业，以四十多万银两在天津河东建筑平房千余间出租或出售，又在北戴河增建一座占地十二亩的别墅，专供结交社会闻人。1920年他以三万余元在天津北马路买下大观察院旧址，兴建天津商场，次年正式开业，经营百货业务；并在商场的屋顶辟“天晴茶园”（后改名大观楼）出租。这时，高星桥加入了天津行商分所，成了天津闻名的殷商名流。

1922年9月中德再订契约，合营井陘矿务局。汉纳根重来中国，授意高星桥建筑从娘子关到井陘矿的铁路支线。次年6月，正当高着手筹备之际，直隶省长王承斌在直系支持下，利用外交途径接收了井陘矿局，并以武力没收了高所经营的三百多座焦炭窑，还下令通缉高星桥，高被迫逃往上海。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赶下台，王承斌去职，高回到天津，盖了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楼度其享乐生活。1925年汉纳根在天津病死，高送十万两银子丧仪。

高星桥脱离买办职业后，继续以其资财在天津经营房地产业，兴建大量房屋出租。1926年他出资筹建规模宏大的百货大楼，以及旅馆、澡堂等。次年百货大楼建成，取名“劝业场”。除将商场出租外，他并在此开设茶园、戏院、影院等六、七处。1928年正式开业，营业一直很好，每年获利数十万元。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但高星桥的商场、房产地处租界，十分得利。1938年天津周围发生大水灾，住进租界的人很多，商业畸形繁荣，高获利更多。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占领租界，多次迫使高出面为其效劳，邀他出任新民会长，又叫他去塘沽承建新港，高均虚与委蛇，推卸未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星桥经营的劝业场、戏院及旅馆等曾兴盛一时。但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通货不断膨胀，贪官污吏横行。高星桥极为不满，常发牢骚。1947年某天，他在澡堂洗澡，与人议论国民党政府官吏敲榨勒索时，大声嚷着说：“国民党这些三十六友真可恼！我愿把全部财产送给共产党也不给这些龟孙子！”^①正巧被国民党特务听见，天津警备司令白时伟即派人把高抓去关打。高家托人行贿，花了五百两黄金才把高救出。高被迫南下，寓居上海，所营事业由其子高渤海主管。1949年2月3日，高星桥在上海病逝。

注:

- ① 高渤海:《谈高星桥生平》(访问记录稿)。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高渤海:《天津买办高星桥发家史》,《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② 大凡:《天津高星桥轶事》,[日]《太平洋经济月刊》第14卷第10期。见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
③ 张高荣:《劝业场一带的变迁》,《天津文史资料》第16辑。
④ 《河北省井陘矿务局改办第十四届年报》(1935年10月)。

康 心 如

周本渊 熊尚厚

康心如名宝恕，字心如，以字行，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1月生于四川绵阳。祖籍陕西城固县，祖辈世代做官。父亲康寿桐历任四川彭山、梓潼、什邡等县知事。

康心如从小攻读经书，十一、二岁起，他父亲就让他阅读新书新报。他的长兄康心孚因钦佩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时常向他讲述康、梁的事迹，介绍《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给他看。康心如不仅仔细阅读这些报刊，就是谈话和作文都模仿《新民丛报》的语调。1906年康心如到成都入中学堂，这时康心孚留学日本，已摆脱康、梁影响，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经常给他寄《民报》、《浙江潮》和《中国秘史》等书报。是年，康心孚从日本回国探亲，又向他介绍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谓中国要自强，非推翻满清政府不可。康心如受其长兄的影响，不再读《新民丛报》，转而热心阅读《民报》和《国粹学报》，思想开始倾向革命。1907年，康心孚从日本寄回《民报》、《革命军》、《黄帝魂》及《三十三年落花梦》等宣传革命的书报叫他推销。康心如就退学在成都鼓楼北街开办了一家书铺，取名粹记书庄，后又于重庆设了分庄，在宣传革命思想及秘密联络革命党人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1911年春，康心如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经康心孚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去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科。

他在课余编辑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参与革命活动。同年夏因父亲病故回成都奔丧。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初,康心如前往重庆联络蜀军政府,途中听说成都巡防军在赵尔丰等支持下哗变抢劫,即又折回成都准备反赵。旋兵变由各路同志军及大汉四川军政府平定,他便在成都留下。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宋教仁、章太炎派康心如和同盟会员李哲夫、饶伯泰等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次年春,康等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公论日报》;同时又与友人汪象孙、李澄波及胞弟康心之等在成都创刊《国民公报》,宣传新合并成立的国民党的主张。不久,他被《公论日报》派任京、沪特派访员,是为四川报界第一个专电访员。他在上海先后任民立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及上海浚川源银行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康心如接受其长兄建议,于1913年12月在上海创办《雅言》半月刊。初先刊载学术性文章,以取得邮递行销内地的许可;出至十一期,刊登了四川张铮写的一篇抨击袁世凯擅改《约法》、“违宪叛国”的文章,《雅言》便被迫停刊。

1915年春,袁世凯为了收买革命党人及其舆论工具,托人函邀康心如来北京,欲利用他将于右任骗来北京。康到北京后虚与委蛇,随即很快回到上海。12月,他在于右任指导下,约集张季鸾、曾通一、朱镜宇等创办了《民信日报》,自任经理,公开进行反袁斗争。袁世凯败亡后,1916年8月该报迁往北京继续出刊,康心如也随之到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侨务局任金事,同时给上海《新闻报》投寄特约通讯,又任重庆《新蜀

报》访员。是年9月，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在北京发刊《中华新报》，康心如应邀任经理兼编辑，此报成为政学会在旧国会复会后的一个言论阵地。1918年9月，《中华新报》转载北京新闻社所发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一文，揭露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的满蒙五路大借款，被北京京师警察厅封闭，康心如和张季鸾一起被捕。康心如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正式判处拘役二十日、缓期三年而释放。

康心如经过此次挫折，又因康心孚于1919年病逝，家庭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便产生了“不做官，不入党，不办报”的所谓超政治思想，决心弃文经商，寻求发财致富之道。1921年，他为重庆大盐商邓芝如奔走，与美商上海美丰银行总理雷文(F. J. Raven)协议，创办四川美丰银行，资本额二十五万银元，美股占百分之五十二，华股占百分之四十八，于次年4月在重庆正式开业，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通称“美丰券”）。邓芝如借一万二千元给康心如作股本，康担任协理。开业后，初因搬用美国银行的经营方式，营业清淡。1923年春，康向雷文建议采用北京中外合营银行的经营方法加以改革整顿，营业大有起色。同时，康大力扩大美丰券的发行，由重庆几家钱庄代销，大获厚利。美丰券发行额最高时达一百五十万元，超过资本额五倍。

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四川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外国商人纷纷离开重庆，雷文调走了美丰银行的大量资金。眼见四川美丰银行行将垮台，康心如乃请四川军阀刘湘出面，筹集银元十三万元将全部美股买下，又由重庆盐商认股五万元。次年3月，四川美丰银行改组完成，康任总经理。

从此，康心如紧紧依靠刘湘的庇护，发展美丰银行。经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会衔布告，美丰券受到特别保护，在刘湘军威所达之处通行无阻。四川美丰银行几年间扩充分支机构达三十四处，并参与申汇和公债的投机买卖，大获其利。1935年8月，在重庆建成价值五十万元的美丰大楼。抗战前夕，美丰银行资本额扩充至三百万元，较创办时增长了十一倍。同时，康心如尽力支持刘湘的“枪杆子与洋钱合作”政策，参加二十一军的各种金融活动，积极支持、经营各种地方债券。他曾任二十一军顾问兼财政设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军整理重庆金融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四川地方银行理事、地方银行发行准备库委员等职。

随着四川美丰银行的迅速发展，康心如抗战前已成为四川金融和工商业界的显赫人物。美丰银行资本先后投资重庆电力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渝新纱厂、重庆国货公司等企业，康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常务董事。1931年9月他任重庆银行公会常务委员，1937年秋任该会主席，并任重庆银行、钱业联合同业公会联合公库常委。

康心如经营银行和工商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象他说的那样“不办报”，而仍然兼及新闻事业。“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其弟康心之在重庆复刊《国民公报》，先后聘杜协民、姜公伟分任正副总经理。该报日销一万份，为当时重庆工商、金融界的民营报纸。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国民政府迁重庆，重庆顿时成了全国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康心如以其拥有的经济

实力和社会地位，利用他与当时重庆市市长贺国光及一些国民党元老旧交关系，于翌年10月当上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和国民党大官密切往还，十分得势。

康心如根据战时交通梗阻，货币贬值的情况，组设“丰字”号子公司扩展业务。从1939年起，陆续开设了德丰、华丰、宝丰、新丰、群丰、兆丰等公司，分别经营进出口、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并扩大对工矿、交通、金融、保险等业的投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营企业多达八、九十家，形成“美丰银行”资本系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康心如为了谋取美丰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积极开拓市场，在长江南北各大中城市扩充分支机构达四十五处。他还前往美国、加拿大考察银行业务。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民生凋敝，百业萧条，金融紊乱，社会经济日渐崩溃。美丰银行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迭遭挫折，每况愈下。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借此收去美丰存金三千多两。同时，军阀退股，特务敲榨，明抢暗夺，使美丰损失惨重。次年7月康心如虽大做银元存放、汇兑，希图挽回损失，但仍遭失败，美丰摇摇欲坠。重庆解放前夕，在康心如面前摆有三条路：一去香港、二去美国、三留重庆。他鉴于背离祖国寄人篱下之苦，乃决心留在重庆。

重庆解放后，康心如继续经营美丰银行。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被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还任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公私合营重庆投资公司经理。

1969年11月16日,康心如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康心如:《我与报》(未刊稿)。
- ② 康心如:《忆心孚兄》(未刊稿)。
- ③ 《重庆第三届第九次工商联扩大联席会议汇刊》第44—46页。

华 之 鸿

周春元 林国忠

华之鸿，字延仪，又作延宜，号延厘，1871年7月31日（清同治十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贵阳一个盐商家庭。其先祖系江西临川“江右望族”，清康熙末年以行医来到贵州，卜居遵义南乡团溪，咸丰、同治年间为躲避黔北号军起义，迁至贵阳。父华联辉，举人出身，以经营盐业致富，为贵阳巨商，曾任四川运盐局总办。

华之鸿幼年在家读书。十四岁丧父，受叔父华健庵训诲，刻苦好学，名列附贡生。华健庵为贵阳著名盐商，任四川运盐局总办时，华之鸿辍学管家，经营贵阳盐业。时虽年少，但“心思细密，事理通达，已有老成气度”^①。1896年华之鸿弃商离家，出任仁怀厅（驻赤水）儒学训导。在职六年，很受学生爱戴。

1902年，华之鸿因叔父年老，回到贵阳，接管永隆裕盐号。由于他家早先取得仁怀口岸盐业专卖权，盐号发展非常快，家产达百万。每年端午、中秋、腊月底三个关期缴纳盐税时，银两少则几十挑，多则几百挑，沿途挑夫绵延数里。当时，“华百万”传遍川黔两省，华之鸿曾说：“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众人皆贫而我独富，夫何快哉。”^②他在商界颇有声望，1907年被推举为本省商务总会会

长。

早在1905年,华之鸿在兴学校、办报纸潮流影响下,为继承其父“亦商亦读”遗志,与唐尔镛、任可澄等创办了贵州最早的中学——贵阳通省公立中学堂,华兼任学校副监督。1907年他资助创办了贵州最早的报纸——《黔报》。同年还捐资创办遵义地区最早的中学——遵义中学堂、遵义最早的公立小学——团溪两等小学堂,以及息烽底寨文昌阁小学、贵阳优级师范、法政学堂,并兼任师范副监督。1909年兴办《贵州公报》,并创办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清政府赏他为“分部郎中”。

随着立宪运动兴起,华之鸿也参与了当时的政界活动。1906年12月,贵州谘议局筹备处成立,华之鸿兼任议绅。1909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徐天叙等,成立贵州宪政预备会。他所办的《黔报》隶属该会,鼓吹立宪。在宪政预备会与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的斗争中,华经常出钱支持宪政会活动,被会众尊称为“四先生”。宪政预备会会长任可澄曾夸“四先生之力伟矣”^③。

辛亥武昌首义后,云南起义对贵州震动很大。宪政预备会上层分子,建议贵州巡抚沈瑜庆急电西路巡防二营管带刘显世,率防军入贵阳镇压革命。华之鸿见防军未到,革命党人准备发动,乃于1911年11月3日,即贵州独立的前一天,积极出面与任可澄等商议,组织保安营,名为“保卫地方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实则准备对抗贵州革命。保安营缺款,华又捐数千金,作士兵购置服装和军饷费用。当晚,保安营参与了围攻贵州革命党人的反革命活动。11月4日贵州独立,成立

军政府，华之鸿被举为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当时库空如洗，市面金融恐慌，挤兑成风。为稳定金融市场，他出资五万银两，挑至官钱局，让民众兑换。华之鸿任副部长职四个月间，协助财政部长蔡岳，整顿贵州财政，使军政府收入八十三万元，支撑了贵州革命政权的军政费用。1912年3月初唐继尧入黔后，华之鸿与任可澄等出面，拥戴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唐委任华为贵州都督府政务厅财政司司长、预算决算处处长兼贵州银行总理。后唐经费困难，华又为唐发行银元票三百万元，在经济上为唐效力。

清末民初，华之鸿将先辈创办的成义茅台酒厂扩大兴办，提高质量。1915年通过政府将酒送交美国政府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览，被评为世界第二名酒，荣获金质奖章一枚、奖状一张。

茅台酒为贵州特产之一。产地在仁怀县茅台村，因而得名。前清时茅台是川盐入黔集散地，盐商多为陕西、山西一带人。他们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仿汾酒酿造方法，设成义酒坊酿酒，用以自奉，并不外销。咸丰年间，秦晋商人歇业还乡，将所设盐号及酒坊售与华之鸿的祖父华桢坞。华家沿用成义酒坊名称，所酿之酒称华茅。光绪年间，茅台和贵阳、遵义、平越县相继建造茅台酒厂，所酿之酒称赖茅、金茅、越茅、丁家醇茅等。各家酿造技术保密，互不传授；加以茅台泉水为他处所无，故茅台酒的质量不一。“以华茅居首，赖茅及荣和烧坊茅酒次之，金茅与越茅及丁家醇茅又次之。”④

在此期间，华之鸿为发展文化印刷事业，在贵阳创设永丰造纸厂，投资银六十万两。又筹银五万两，请省长刘显世派兵

护送至上海,汇兑日本购买造纸机。结果被刘以借用为名,将银抢走。华只好第二次再筹巨款,派人东渡日本,学习造纸技术,购买大型造纸机器,并聘请日本技师。永丰造纸厂于1919年建成投产,是为贵州第一家造纸厂。

1916年以后,华之鸿离开政界,研求佛典,诵读儒书,“自朝至暮,屹坐案前”^①。所营企业,逐渐交其子华永源经营。他在贵阳东门修造大觉精舍,拟陈列佛经。又购获城西狮子山一带山地,招徕佃客数家,雇用几十名工人,兴办农场,名曰“自力”。场内种植果树、药材、苗圃,植树约二十万株。

华之鸿对于地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颇为热心。四川赈灾,他捐银六万两;皖北赈灾,捐款六千两。华洋义赈、全黔义赈,也予捐资。平时修桥补路,少则数十两,多则数千两。间或也施衣舍米,退还债券,组织义渡、义仓等。

1934年3月7日华之鸿病逝于贵阳。

注:

- ① 杨恩元:《华君延仪墓表》。
- ② 华树仁:《贵阳文通书局概述》(未刊稿)。
- ③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6)第462页。
- ④ 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第98页。
- ⑤ 华永源、华怀仁:《先府君行述》。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故绅华之鸿事实清册》,贵州档案馆藏。
- ② 《华向渠档案材料》。

黄 焕 南

汪仁泽

黄焕南又名珠，1856年3月28日（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父亲是私塾教师，子女众多，收入菲薄，家境贫困。黄焕南十六岁时在当地一家米铺当学徒，次年随乡亲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谋生，在新南威尔士州悉尼（旧译雪梨）苏兴隆杂货店当勤杂工，业余补习文化。黄工作勤劳，生活俭朴，十二年后积得少许资金，与人合伙开设广生和杂货店。由于经营得法，营业蒸蒸日上，广生和逐步扩展成为一百货商店，他在该地也逐渐成为一有名的侨商。1900年秋，梁启超等人因自立军勤王运动失败逃亡澳洲，为保皇会从事募款活动，黄曾予以资助。

1913年，久居海外的黄焕南思念故土，抱着回国投资实业的愿望，变卖了在澳洲的产业，携款回国。其时正值澳洲归国华侨马应彪等人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先施百货公司，马与黄在澳洲时即已相识，且知黄善于经营百货业，熟悉市场，遂邀黄投资参加先施公司任为董事，并聘任为广州先施公司司理^①，与原司理马祖金共同负责经营。在黄、马共同筹划下，1914年广州先施公司增设设备华丽的东亚酒楼，附有旅社和中西餐厅。1915年又陆续兴办机器、五金、皮革、玻璃、木器、肥皂、制鞋、汽水、化妆品等十个工厂，均附属于先施公司，雇

有职工千余人。广州先施公司1912年创办时资金四十万元，至1915年结算，获利已超过资金两倍。后又在广州十八甫和惠爱街等处增设分行。

先施公司既在港粤两地经营得手并取得信誉，马应彪、黄焕南等人遂谋在全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开设沪行。1914年黄焕南两次到沪进行调查和筹备，先由港行拨款占股^②，继而募集股金共六十万元，租定闹市区南京路地基十亩余，建造五层钢筋水泥大楼。由于工程规模甚大，资金不敷应用，因此在1915年决定再行增股六十万元，消息传出不久即认股满额，而后继者仍纷至沓来。黄焕南与马应彪等商议，与其拒而不纳，不如再增股额至二百万元。经招股足额后，成立沪行董事会，推定马应彪为董事长兼监督，黄焕南为董事兼首任正司理。

1917年10月20日上海先施公司正式开张，黄焕南针对当时沪地商业讨价还价的习气，规定划一不二的营业方针，拟就广告“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招徕顾客。由于资力雄厚，备货齐全充足，品种繁多。黄焕南重视进货质量，必求货真价实。百货营业部共分五层十九部，他选派干练职员担任各部部长，并亲自拟订了健全的销货记录表册和会计制度。与百货营业部同时开张的尚有设备完善并辟有中西菜楼的东亚旅馆和百戏杂陈的先施屋顶乐园^③。其时沪上已开设有专销洋货的外商惠罗、福利、泰兴三大百货商店，先施则为国人创办的首家大型百货公司，兼售中外百货，并仿效欧美资本主义企业，订有一套新式管理制度，服务质量远胜旧式商店，因此招徕顾客如云，营业兴盛。不久黄焕南又在闸北觅址开设先施附属工厂，下分铁工、木工、家俱、油漆工程四部。

此时,先施公司港、粤、沪三行虽牌号相同,但各自集资独立经营,互不相关。为谋求事权统一,人才相互调用,商品相互调剂,经马应彪、黄焕南等倡议,三方股东大会同意,自1919年1月16日起实行统一,合订资本额为港币七百万元,以香港为总行,沪、粤两地为分行,向香港当局登记注册。马应彪任董事长兼总监督,黄焕南仍任董事兼沪行正司理。1922年起黄升任先施公司沪行监督。

随着先施沪行业务的扩展,黄焕南于1923年拨出资金十万余元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购置厂基二十余亩,自建厂房,扩大附属工厂的生产规模,雇有职工三百余人。产品计有车床、钻床、银箱、保险柜、火炉、中西家俱等,并承接定制大小机器及零件。附属工厂附设夜校,聘有教员,为职工业余补习文化;并雇用基督教牧师,每星期日上午举行宗教仪式,向职工传教。业余举办青年会(职工俱乐部),开展粤剧、京剧、话剧、围棋、球类等文体活动。

先施公司在黄焕南筹划下,于1924年在百货大楼加筑两层楼,成为七层大厦。是年先施保险公司在沪设分公司,黄焕南原是该公司董事,此时兼任上海分公司参事^④。在此前后又开设沪行支店两处。

1925年5月,上海南京路发生“五卅惨案”,先施公司参加全市罢市斗争,停业近一月。此后,黄焕南在时局的影响下逐步增加了国产商品在进货中的份额。

先施业务发展,但职工工资菲薄。1926年年关将届,职工因生活困难,多次推派代表,向黄焕南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组织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1927年初全体职工团结一致,

进行罢工斗争，持续六天六夜，终于迫使黄焕南让步，接受各项要求^⑤。

1929年黄焕南应先施总监督马应彪所召，与广州先施监督马永灿三人共同商议，并经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历年结余加派红股，每十股分派红股三股，另募新股九十万元，增资合计股本一千万元。

1932年先施沪行受到“一二八”战事影响，营业骤降，一度陷于困境，黄焕南苦心筹划，在公司职工的支持下，节约开支，想方设法增加营业额^⑥，始得渡过难关。此时黄焕南虽年逾古稀，但仍精神矍铄，专心先施的经营管理。他二十余年如一日，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公司办公，习以为常。黄并兼任香港国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进出口行、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先施化妆品厂、广东旅沪同乡会、广东平民医院、粤东中学等处董事，广肇公所理事等职。

1936年8月24日黄焕南在沪病逝。

注：

- ① 司理即经理。按先施公司的制度，其上尚设有掌握实权的监督，直接控制企业。当时的监督是马应彪。
- ② 上海先施公司创设时系独立招股，但香港先施公司先行拨款占股，作为倡办；然后再在沪、港、粤三地公开招募股款。
- ③ 当时沪上名流陈蝶仙（别号天虚我生）曾为先施乐园题诗称：“上界瑶台辟九层，云梯（指电梯）无级自然升，琼楼玉宇知多少，如此高寒得未曾。园亭台榭恰凌空，恍在璇玑织女宫，入夜华灯灿如锦，管弦声在半空中。”
- ④ 该公司在总公司设董事会，分公司设参事会，参事会秉承董事会的授权，辅助经理管理企业。

- ⑥ 李华明、高蝶珍整理：《大革命时期先施职工运动片断情况》，1982年2月油印稿。
- ⑦ 如与上海联合广告公司合办购货赠奖办法，凡购货满十元得一抽奖号码，每月初当众开奖，赠给奖品；又如购货附赠品，购热水瓶一只赠茶叶一包等等。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先施公司编印，1925年版。
- ② 《先施公司七十五周年特刊》，香港先施公司编印，1975年香港版。
- ③ 张子英：《先施公司职工运动史料》（讨论稿），1982年3月。
- ④ 孙鸣岐主编：《现代实业家·黄焕南》，《商报》1934年版，第23页。
- ⑤ 黄祖康：《黄焕南传略》（未刊稿）。

谈 荔 孙

汪仁泽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寄籍江苏山阳（今淮安），1880年12月13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祖父谈静山曾在山阳县作幕友，后入蜀任夔州知府，归里后在山阳定居，对官场灰心，嘱子孙不入仕途。1891年捐资创办谈氏东文学堂，延聘日籍教员授课。父亲谈亚蘧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少时在私塾读书，1892年入东文学堂学习文理科和日文，1896年初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

1900年谈荔孙在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专科。由于谈曾在东文学堂学过日文，加以学习勤奋，因此学业优异。毕业后在日本银行界实习。谈的同学除吴鼎昌、钱永铭、王治昌等外，尚有日本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阀当时在日本创办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公司企业，设有注重实务的大仓商业学校，并侵入我国东北，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大仓的经营思想给年轻的谈荔孙留下深刻印象。

1906年谈荔孙应张謇之聘，回国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他在教学中，采用大仓商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开办银行实践室，培养了一

批我国早期的银行、会计人才。

1908年8月谈荔孙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以成绩优等，得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但谈仍“不入仕途”，坚请调离。适值清政府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遂调谈任大清银行稽核。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任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和流通事宜。1912年2月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另组中国银行，谈奉派赴北京接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长，主持建立全行的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等。

中国银行为了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掌握该地区的财政权，选派谈荔孙赴南京筹建分行。1914年南京分行成立，谈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徐州、苏州、常熟、杭州、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是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称字样、限在各该省内使用的中国银行纸币。

1916年3月袁世凯废除洪宪帝制后，为筹措军饷，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以致京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5月北洋政府明令停兑，致使风潮扩大，造成市面混乱，不久波及南方。为了维持银行信誉，谈荔孙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拒不执行总行的“停兑”命令；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洋政府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收兑当地印有省名的中、交两行纸币，不久挤兑风潮在南方即告平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职

位，于次年调谈荔孙为北京中国银行行长。此时冯国璋意欲另组金融机构，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谈亦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难以施展其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抱负，渴望创办商业银行又缺乏资金。双方的意愿为江苏省会警务厅长王桂林所悉。王是冯的亲信，亦是谈的挚友，经王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李纯、齐燮元等人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等，凑得股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筹建商业银行，定名为“大陆”，股本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由于冯国璋的关系，验资等手续十分顺利，不久颁发执照。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分行于北京，谈荔孙被推选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为董监事。1920年4月，安福国会开会时，有人指摘谈荔孙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任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与法制不合，有公私不分之嫌。谈闻讯后，决然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国银行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

谈荔孙久欲仿效大仓经营思想以施展才能，任职中国银行时，因与政局浮沉息息相关而难展所长，如今专心经营大陆银行，得以实现其抱负。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视储蓄业务，吸收社会游资，通过调剂金融，输送给工商企业，逐步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做一个大仓式的实业家。在谈的筹划下，大陆银行于1920年3月在上海设立分行。翌年春，天津总行迁入新厦。大陆银行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国内外汇兑业务外，由于与黎元洪等人的关系，故能吸收军阀和官僚的大量存款。又大力开展银行的信托、储蓄业务，在京、津、沪三行分

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建有水泥保管库，首创出租保险箱，接受露封保管和信托业务（代管点明数额的有价证券、股票、契约等，并代办取息、转期、投资经营等）。1922年夏，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设计多种名目的储蓄，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一次存入一百七十一元五角一分，十五年到期后可得本息一千元。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颇能吸引一些储户，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储户即达一千一百余户，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多户。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各种存款总额常在二千万以上。

谈荔孙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1922年指示天津总行在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处分设支行六处，开同业的先例。此后北京、上海以及陆续设立的汉口、南京等分行也纷起仿效，在市内以及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多处设立支行。

在谈荔孙的主持下，大陆银行参加了和盐业、金城、中南共同组成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准备库”，联合担保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并合办“四行储蓄会”，建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上海国际饭店。

由于银行放款多需以实物作抵押，以存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因此谈荔孙以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投放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为与在天津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除在万国桥堍自建仓库外，另又租得两处。规定客户以该行仓库所出栈单做抵押时，贷款利息可受优待，押款金额也可放宽至货价的八折，因此深受欢迎，业务逐渐发展，每年押款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

丈，最后不得不将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沪行亦在谈荔孙的倡议下，自建仓库于北苏州路，1928年押款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联系的是保险业务，1931年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四银行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谈任该公司董事。此外，从大陆银行拨出部分资金，在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与外商进出口行相竞争。

1931年春，谈荔孙去黑龙江调查大豆的产销情况，并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日产一千五百担的全套榨油设备，积极在该地筹建大型榨油厂。后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略战争，被迫中止筹备事宜，赔偿西门子洋行损失一万五千美元。他痛感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下，要实现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抱负是极为困难的。

1932年春，谈荔孙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以财力支持傅在绥筹建毛纺织厂。该厂建成后利用当地羊毛，织出毛毯、呢绒，行销华北、西北各地，为当地毛纺工业奠定了基础。

谈荔孙曾于1929年春在大陆银行董事会上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金融和工商业管理方面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才，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多数董事系旧军阀、官僚的代表人物，鼠目寸光，惟求眼前利益，认为选用新人进行改革，势必增加开支；且人事一经变动，原有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入行的人员有被淘汰之虞。因此会上虽表示原则同意，但力言以缓行为宜，使谈的打算受到阻遏。但谈并不气馁，其后又制订了具体计划，在总经理处增设顾问室，拟延请学者、名流和富有经验的人士，指导全行工作，进行内部整顿。但谈荔孙初愿未

遂，突因脑溢血症于 1933 年 2 月 25 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的兴衰纪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
- ② 《锡金谈丹崖先生年谱》，见《谈丹崖先生纪念册》。
- ③ 谈公远：《谈荔孙传略》（未刊稿）。
- ④ 《中华今代名人传》，1925 版。
- ⑤ 谈公远：《大陆商场的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
- ⑥ 《大仓喜八郎》，日本《大人名事典》卷 1 第 466 页，东京平凡社昭和三十七年版。

孙 衡 甫

冯伯准 宋紫云

孙衡甫，又名遵法，1875年3月28日（清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幼年入塾读书，时读时辍。1906年在宁波一家鸦片烟行学徒满师后，进上海老余钱庄做帐房，1909年转入升大钱庄当信房^①，1910年又转入浙江银行^②上海分行任营业主任，工作勤奋，后提升经理。1911年4月，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改组，孙衡甫应邀任总经理。

四明银行自1908年创办以来，因不善经营，历年亏损，股息无着，濒临破产。孙衡甫接任总经理后，先从内部整顿入手，健全组织；继而开展存放业务，经常亲自外出招揽，辛勤经营，元气渐苏，历年稍有盈余，陆续抵偿积亏。1917年四明开始发给股息三厘，以后逐年皆有增加，1922年至1927年每年发给股息一分；1927年春又从积存的余利项下，拨出规银七十五万两，分发给各股东。四明银行经过孙的悉心经营，稳步发展，面貌一新，1931年5月董事会改选，一致推选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年，四明银行向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分别注册领照，进一步刷新行务。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四明银行已取得钞票发行权，为开展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孙衡甫声言“银行决不能因一时需要

而增加钞票发行”；又说“争取存款，不在存款利率高低，而在银行信用厚薄”，力求该行经营作风稳健。当时，在上海经商的宁绍帮、广东帮及印度商人纷纷把款存进四明银行，四明1930年拥有的存款总额由1926年的二千余万元增加到四千余万元。由于存款总额迅猛上升，四明信誉越发提高，以致该行开出的本票，可得到洋商仓库同意提货。孙衡甫把四明银行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挽救出来，获得蓬勃发展，他自己也一跃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

孙衡甫对于四明银行资金的运用，侧重购买公债票和购置房地产。四明银行在上海除拥有四明别墅（在今愚园路）、四明村（在今延安路）、四明里（在今淮海路）、长兴里（在今天目路）、元吉里（在今唐山路）外，林森路（今淮海路）支行、民国路（今人民路）南市支行、南京路西区支行以及北京路总行的行屋，均属自产。房地产是四明银行的主要资产，据该行1931年的营业报告称，房地产和营业用房地共值二百七十余万元。四明银行还投资四明保险公司，占该公司股款总额百分之二十，孙衡甫兼任该公司董事长。

孙衡甫与上海许多钱庄关系密切。1931年四明银行对钱庄存放款总额达三百余万元。为了防止钞票挤兑风潮的袭击，孙预先与通商银行及一部分钱庄约定，在头寸调拨方面，遇到紧迫之时相互支持。1935年上海工商业因营业凋敝，无力归还银行借款，谣言纷起，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柜面挤兑现象。通商银行立即出面支持，大庭广众之下把银元木箱源源抬进四明银行，敞开兑现，壮大声势；同时又有一些钱庄贴出通告，代理四明银行兑现业务。四明银行本身，则星期日照常营业，

便利客户前来兑现。客户认为四明银行资金实力雄厚，挤兑现象很快消除。

孙衡甫主持四明银行，独揽大权，总分行人事安排，多重用亲信，他儿子孙祥簋是宁波分行经理。四明银行设有宁波、汉口、南京三个分行，他放手让分行发展业务，指示分行经理“开支大些好”，认为业务发展，开支必大。他还对分行经理说：“放款快些好”，认为只要确实掌握情况，危险不大，可以先放后报，必要的大宗放款，可用长途电话与总行联系，以简化放款手续，争取较多的放款利息。

由于孙衡甫急功近利，放款过多而不慎，以致四明银行后来吃了不少倒帐，对三北轮船公司放款一百多万元就未能收回，对不少钱庄同业存放款也收不回来。又因孙衡甫在九六公债^③上投机取巧，使四明银行受到亏损。在上海经济不景气时，公债票和房地产一时都不能兑现，遂使四明银行形成外强中干的局面。孙为了对外缓和空气，避免四大家族对四明银行的觊觎，于1935年5月托病辞职，挽出曾任工部局华董的叶琢堂代理该行总经理，自己仍任董事长。叶辛劳逾年，无法挽回困局，旋接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职务，四明总经理一职仍交还孙衡甫。孙衡甫一筹莫展，四明银行从此每况愈下。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孙衡甫曾让蜚居上海的蒋介石住在极司斐路（今万航渡路）自己寓所三个月，两人无话不谈，结为至交。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军次南昌，曾拟任命孙衡甫为北伐军经理部长，但孙婉谢，说自己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官。孙从事金融业，始终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宋子文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时，曾邀请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酝酿国民党政

府中央银行理事会名单，孙借故不到，招致宋子文的不满。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由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原已发行钞票之各银行限期收回本行钞票。财政部通知四明银行须根据发行钞票总额，提出十足准备，其中现金百分之六十，房地产债券等百分之四十，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孙衡甫力不从心，不得已亲往南京见蒋介石，以期获得转圜余地。但财长孔祥熙不肯收回成命，并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法，不断吸进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继而放出空气，造成四明银行柜面发生挤兑现象，形势严重。孙无力招架，官僚资本趁虚而入，四明银行股东会无奈，于1936年冬决定增资减值^④，将旧股按一五折减值，计折合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元，合共四百万元。四明银行自此成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由财政部派吴启鼎为董事长，李嘉隆为总经理。孙衡甫从此退出四明银行，成为一个失意寓公。

孙衡甫对地方公益事业颇为热心，曾在家乡独资兴建半浦小学的校舍，独资修筑半浦乡七华里长的石板路及其沿线的桥梁，并为重建宁波市的老江桥捐款五万元。

孙衡甫除四明银行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成丰钱庄、益昌钱庄、恒隆钱庄、恒赉钱庄、信裕钱庄、童涵春国药号、穿山轮船公司、长兴煤矿、苏州电灯厂、宁波永耀电灯厂、泰州泰来面粉厂及汉口元泰五金号等十余家。

1944年1月24日孙衡甫在上海病卒。

注:

- ① 信房, 钱庄职工的一种职称, 专司各种文书信件往来, 及接洽客路的收解。
- ② 浙江银行, 创办于 1909 年, 官商合办, 总行设于杭州, 分行设于上海, 经理库款, 发行纸币, 实具浙江省立银行性质。辛亥革命后改行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 经理国省库款, 1914 年金库移交中国银行。1915 年 7 月改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 年 3 月官股与商股分家, 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 总管理处设在杭州; 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 总管理处设上海。
- ③ 九六公债: 北洋政府 1922 年 7 月发行, 因发行总额为九千六百万两, 故称。发行后, 基金虚悬, 利息欠发, 票面价格逐步下跌。1924 年, 孙衡甫得知“九六公债”有付息消息, 四明银行乘机大量吃进, 接着票面价格趋涨。但不久苏浙发生战争, 财长李思浩下台, “九六公债”没有付息, 公债价格猛跌, 投机者遭到失败。见上海《银行周报》第 592 号。
- ④ 《全国银行年鉴》(1937 年)。

陈 朵 如

郑叔屏

陈朵如，名选珍，浙江肖山县人，1888年10月16日（清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二日）生。父陈子祥，有祖遗田产三百余亩，并在肖山临浦镇开设乾余钱庄、乾泰米行、乾元电厂及义号什货店，这些厂店后来都在“八一三”炮火中被毁。

陈朵如幼年就读于表兄钟宾文家，后又从李禹九学。1907年，与堂兄陈允如相偕东渡日本，先习日文一年，然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银行等科。在东京，陈结识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习银行学的李铭，志同道合，引为知交。

1912年9月，陈朵如奉父命辍学归国，旋进杭州“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任协理。翌年，陈朵如受聘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教银行学、银行簿记、银行实践及商业算术等课程。1916年离开商校，任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行长。

1917年3月，陈朵如应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邀请，回杭州任该行总管理处总书记职，兼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其业务方向、经营方法以及组织制度、账务核算等，全是钱庄格式，十分落后，连年终年初送迎财神习俗亦未革除。官商董事有鉴于此，邀陈朵如来整顿改革，不久之后，该行面目一新。与此同时，陈提出一种“零存整付”的储蓄方法。客户每月存入一

元，十五年到期可支取本息五百零四元六角六分。这一种每月节约一元的储蓄方法，一般人都易办到，因此受到各界人士欢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创办这种存款方法，吸收了不少社会闲散资金，其他银行亦竞相仿效，“零存整付”风靡一时。

1923年3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由于增资意见不一，协议官商股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原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海门分行、兰溪分行划归官股。浙江实业银行以李铭为总经理，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另设杭州分行。陈朵如在拆股分家及建行过程中，为浙江实业银行悉心规划，颇多建树。在杭州建行初期，陈并以上海分行副经理身份暂兼杭州分行经理。1927年陈升任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3月参加浙江实业银行董事会任常务董事。陈与李铭配合，相处无间。李着重于外面活动，陈着重在内部筹划，共同决策。1936年，浙江实业银行计划买进一笔地产，李颇属意于上海南京路德义大楼，陈不以为然，未成事实。后来李听取陈的主张，向西班牙天主教会买进了上海旧跑马厅对面大光明一带房地产，连同大光明、国泰、卡尔登三家电影院的营业权在内，因而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声誉大增。

陈朵如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章乃器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期间，曾创办《新评论》杂志，鞭挞时政，鼓吹民主政治，后又参加救国会活动，奔走呼号，日以为常。陈朵如对章乃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情和赞许，一面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一面有意识地安排他的工作，使他有充分时间进行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朵如对国民党政府不能抵御外来侵略，十分愤懑，眼看一些党国要人依然热衷于谋求个

人发财致富，夺利争权，常自感叹：“国之不存，何来个人幸福！”翌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复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抗击，陈大为感奋，连夜聚集家人赶制棉背心慰劳前线爱国将士。浙江实业银行往来客商中颇多日商，如东华纱厂、裕繁公司、山下株式会社、多田洋行等，都与它关系密切，收付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发展成为全国抗战以后，陈朵如即收缩银行业务，与日商疏远，以至停止往来。1941年3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出国，将行务托付于陈，陈紧缩业务，谨慎行事。11月陈在归家途中，汉奸特务突予绑架，除勒索巨款外，还图诱陈担任伪职。陈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匝月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势力侵入租界，陈更加紧缩业务，消极抵制。当时，汪伪储备银行行长戴嵩庐为了笼络商业银行，宴请部分商业银行经理，陈拒不赴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实业银行业务逐渐恢复正常，翌年，将原来的总管理处制改为总行制，以上海分行为总行，设业务、储蓄、信托、国外汇兑四部及稽核、总务二处，各部、处设专人负责，李铭任董事长，陈朵如为总经理。陈以他一贯稳重踏实的作风扩展业务，开创了该行的全盛时期。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陈朵如经营浙江实业银行，善于用人，每一职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情况，他均了如指掌。对能力较强、工作勤奋的职工，陈及时鼓励，予以提升重用；对能力较差的职工，则妥善安排适当的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并鼓励上进。他认为必须使每一职工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安心工作。1937年冬至1941年冬的四年间，上海租界形同孤岛，很多职工生活困难，陈拨出专

款，办理行员贷金及子女教育费贷金。随后通货膨胀，物价昂腾，职工生活更趋困难，他通过劳资协商，再次拨出资金让工会举办职工消费合作社，以减轻物价上涨对职工生活的威胁。

陈朵如早在抗战以前就参加徐锡襄（徐锡麟的胞弟）主持的聚餐会。他在聚餐会活动中，受到陈叔通、叶揆初的启发、影响和推动，曾在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里，几次从浙江实业银行暗账中拨出款项，通过陈叔通捐献给中共地下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决策人曾商议是否去港的问题，陈坚决主张留在上海，并且决意要把已开工兴建的大厦建筑工程加速进行。他说：“这也是我身上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它做好，房屋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私营银钱业由联营逐步走向合并，为金融业改造准备条件。陈朵如开始时对此不无疑虑，但很快就认识到集中经营是必然趋势，并积极说服李铭。当时李旅居香港，对大陆情况十分隔阂。陈与李多次通信，讲明形势，晓以大义，劝李不可迟疑。1950年11月，陈又亲自去港见李进行劝说。回上海后陈决定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于1951年11月1日参加十一行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4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陈朵如任副董事长、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和董事会上海办事处主任。1957年2月，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交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暗账资金美金五百万元。

陈朵如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陈平素生活不尚奢华，不讲排场。1948年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庆祝建行四十周年时，董事会决议买一所花园住宅给他居住，陈坚辞不受。

1961年8月31日陈朵如患癌症在上海去世。

关 伟 林

汪仁泽

关伟林字崇昌，广东开平人，生于1872年3月16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八）。家境贫困，十八岁时随叔父去美国谋生。初时在纽约学做裁缝，二十五岁时在纽约唐人街开设小饭馆。

二十世纪初，美国盛行自来水钢笔(Fountain-pen)，但华侨中不少商人、手工业者，习惯使用毛笔记帐、写字，而毛笔在美国不易买到。关伟林偶然同亲友谈起此事，得到启发，设想从国内购得毛笔笔头，装上自来水笔杆，必会受消费者欢迎。1924年关将小饭馆出盘，在华侨亲友中募集了一笔资金，正式创设生产自来水毛笔的工场，用他的儿子关勒铭的名字命名为“关勒铭自来水毛笔光滑墨汁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厂长。除从国内邮购狼毫毛笔笔头，制成自来水毛笔外，还兼售用美国原料配制的专用墨汁。1925年向美国政府注册，取得专利权。初时生意尚好，但不久因华侨中使用毛笔的人毕竟不多，且买后一时也不易用坏，因此销路逐渐呆滞。在亲友们的劝说和鼓励下，他决心回国设厂。

1928年年满五十六岁的关伟林，携眷及全套制笔设备、原材料等，迁到上海，租得房屋数间，聘请刚从复旦大学商科毕业的同乡甘翰辉为助手，雇用职工三十余人，仍用原名，开始

生产关勒铭自来水毛笔。但不久从美国带回的墨汁原料用罄，使用中国传统烟灰墨汁后，因胶质太多，笔头容易胶结，出水不畅，影响书写，因此不受国内消费者的欢迎，销售发生困难，资金亏蚀得所余无几。这时市上自来水钢笔销路日畅，只有外国进口货而无国产品。关感到如能改产自来水钢笔，设备现成，可望成功，遂于1929年再度去美国集资，又在沪招股，得资金数万元，商请广东银行总经理梁冠榴任董事长，大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陈已生以及甘翰辉等任董事，改产自来水钢笔及少量金笔，笔尖向英国、日本进口，装上笔杆出售。

这时，上海各大百货公司和文具商店，大都经销美国“华脱门”、“犀飞利”、“派克”、“爱弗释”等名牌高档自来水金笔。关勒铭厂上门推销时，受到冷遇，有的干脆回绝；有的只允寄售代销，卖出付款。而一般的文具店架上则摆满了日商低价劣质的自来水钢笔，每支只售五、六角，甚至二、三角，关勒铭自来水钢笔成本每支在五角左右，再加上零售店的销售费用（当时关勒铭笔的批发价是零售价的七折双九扣，即厂方收入仅是零售价的百分之五十七），售价须定在一元以上，因此很难与日货竞争。销路不畅，亏损累累，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后来只能降低售价。在中国国货公司的九九商场里，以一支关勒铭钢笔和一瓶国产墨水作为一组商品，合售九角九分。幸亏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一再展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关勒铭厂由此受益，终于勉强维持下来。为了降低成本，关勒铭厂向德国购买不锈钢笔尖自制。点铍工艺，起初请日本技师来厂辟专室秘密加工，后来甘翰辉学到了这项技术，降低了成本；并应用了笔尖镀黄工艺，增

加了美观。1936年关伟林派甘翰辉秘密去日本考察制笔技术，甘在日商笔厂车间参加实际操作，又学到了用赛璐珞原料热模压制笔杆的技术，回国后制成50号自来水钢笔，销路逐渐打开。

关伟林平时生活俭朴，不善对外交际，因此对外业务全由当时已任厂长的甘翰辉负责联系。关办厂时用他儿子命名，原想传之后代，为子孙创基立业。但其子勒铭毫无事业心，不善经营，使关十分痛心，后来就把厂里的一切业务都交给甘翰辉经管。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上海市面萧条，关勒铭厂曾经一度停业。不久战事内移，沪地与内地逐步恢复货运，内地人口增多，工业品匮乏，文教用品大多需向上海采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对自来水笔的需要量甚大，全向沪地购办。因此1938年起关勒铭厂开始复工，生产迅速发展。1939年雇用工人增加到五十多人，月产自来水笔约二百罗（每罗十二打共一百四十四支），其中少数是彩杆金笔。日、美商人曾一再要投资“合作”，都为关伟林所拒绝。此时自来水笔笔尖、笔胆等零件进口困难，该厂又自行生产。关勒铭厂产品运销内地时，也标榜“完全国货”、“采用国产原料制造”，以迎合群众爱国心理，争取扩大销路。但实际上笔杆的原料不论是胶木粉还是赛璐珞，仍是向日本进口。为了避免被外人察觉和本厂职工的反对，进料时不敢直接送到厂里，而是经过另设的收货处，进行改装后再送到厂里应用。

1941年底日军进驻租界后，加紧对上海的控制，上海与内地的交通日趋困难；加上抗战后期，敌伪穷途末路，滥发伪中

储券，物价飞涨，工厂售出产品后，补不进原材料，关勒铭厂又陷入困境。1945年关伟林因其子勒铭患病去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健康也大受影响。

抗战胜利后不久，关勒铭厂董事陈已生介绍美德文具公司宁思宏参加投资，同时还吸收一些实业界人士参加。1946年完成增资后改组董事会，梁冠榴仍任董事长，陈已生、宁思宏、甘翰辉等为董事，并分任经理、厂长等职，负责关勒铭厂的经营管理。关伟林因年老多病不大管事，未安排具体职务。次年关回广东原籍休养。

新中国成立后，关勒铭厂于1950年成为上海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关伟林被聘为该厂顾问。

1953年10月28日关在家乡因病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宁思宏、徐正元：《关勒铭金笔厂史料》，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
- ② 宁思宏、甘翰辉提供之有关史料。
- ③ 关中爱：《关于先父关伟林生卒年、月、日期的订正》。

沙彦楷

汪仁泽 陈光贻

沙彦楷字武曾，一字伯躬，晚年更名脊，回族。1875年7月1日（清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祖籍原在西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镇压西北陕甘回民军时，沙的祖父沙燮和携家迁居内地，定居宜兴行医为业，曾因参加科举考试寄姓吴氏。沙彦楷自幼就读私塾，勤学好问。父亲沙安节，教子严，常亲自课读至深夜。1900年沙彦楷考取秀才，翌年又参加清政府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

1907年9月，沙彦楷考取京师法律学堂，三年毕业后，捐得候补浙江盐使职衔。辛亥革命后，在司法界任职：1913年2月任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分厅推事兼民事庭庭长；1914年2月调任北京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1916年4月兼署民事庭庭长；1918年2月调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1920年1月升任厅长。1922年发生“金佛郎案”，法国政府要我国以金佛郎的价值偿付“庚子赔款”余额，以其中部分抵付“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的欠款。当时投机政客乘隙活动，企图于从中挹注取利，大理院院长董康等亦参预其事，沙彦楷站在爱国立场上坚决反对，并向国会提议，得以立案。后愤于司法界之腐败，于是年7月辞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职务。8月，被递补为国会议员。1923

年曹錕贿选总统，沙毅然抛弃议员职务，挂冠离京赴沪。

1924年沙彦楷在宜兴筹款创办宜兴中学，担任校董，经常往来沪宜间，处理办学事宜，直至1931年该校改为省立农业学校。

1925年2月起，沙彦楷与知友沈钧儒在沪合设律师事务所，执行开业律师事务，积极保障人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的沈钧儒一度被捕，沙到处奔波营救，沈不久获释，继续共同执行律师业务。此后沙与沈多次参与营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1936年蒋介石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发生“七君子事件”。沙坚决声援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他亲往监狱探望被捕的救国会领袖，积极参加营救活动。

1937年抗战军兴，不久上海沦成孤岛，沙不愿事敌，结束律师业务，回宜兴故乡，闭门读书从事著作。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甘处清贫的隐居生活。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沙著文痛斥汉奸卖国罪行。1944年沙彦楷更名沅，作七十自述诗，有“岁寒共抱冬心在，何恨何求更愠穷”句。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仍回沪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沪谈判期间，曾多次与他会晤。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本质，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曾加入民社党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为反对该党主席张君勱投靠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而斗争。不久沙等另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先后被推为副主席、主席，坚持爱国民主立场，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前夕，与各爱

国民党派发表共同声明，声讨蒋介石。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彦楷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等职。他在团结伊斯兰教界爱国人士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58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亲赴太湖，考察南江入湖故道。晚年专心研究水利，著有《三江五考》、《南江入太湖故道考》等专论。

沙彦楷擅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曾被推为武进县志的总纂。另著有《陶渊明集注补证》、《洪亮吉传》、《杂忆曹锟贿选》等文。沙还精于书法，作品曾选送日本展览，著有《迟翁论书》十篇、《霜鸣室金石考跋》等。

1970年1月27日沙彦楷在上海病故，终年九十五岁。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沙彦楷：《自书履历表》。
- ② 张惟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10。
- ③ 陈曾亮：《金佛郎案痛史》。

唐 拾 义

汪仁泽

唐拾义名振之，字拾义，以字行。1874年7月26日（清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于广东三水白泥埗。父亲在家乡卢包镇经营商业。

唐拾义青年时在广州博济医院学习西医，1912年起在广州华林街开设医馆。当时西医、西药刚在我国兴起，他挂牌专治喘咳症，医名日渐传扬。医务之余，兼制久咳丸、哮喘丸发售。该两种药丸，服用方便，易藏易带，对咳嗽有一定缓解作用，销路渐广。唐善于宣传，常在报端刊登大幅广告。又善于猎名，药名前皆冠以“唐拾义”三字，出诊时乘坐的肩舆，也饰有“唐拾义大医师”标志，以收广告之效。初期他上午在家中前屋设医馆诊病；下午或出诊，或在后屋监制药丸。不雇职工，由家庭成员利用简单的工具，手工操作，揉搓制成丸药销售。不久销量渐增，原址不敷应用，遂迁至下九路扩展诊所及制药工场，添雇亲友及临时工、童工，自任药厂经理，由其长子、开业医师唐太平为副经理，称“唐拾义父子制药厂”。

1919年，唐拾义赴沪设立诊所。初时人地生疏，为扬名起见，在报端刊一广告，诡称来沪途中走失爱犬一头，悬重赏一百元寻找，籍此自抬身价。1924年起，唐拾义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开设沪厂。初时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后因

沪地交通便利，商贾四集，销路逐渐打开，营业额超过了粤厂。此后，唐又陆续在天津、香港、汉口等地设立分厂，在上海成立了总管理机构，并在广州增设旁支机构“增寿堂”药房，经销产品。

唐拾义经营制药业日益发展，乃逐步革新生产设备，沪、粤两厂从1931年起开始使用新式制药丸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产量随之激增。是年粤厂另迁新址，翻造新式楼房，雇用职工增至一、二百人。由于久咳丸和哮喘丸的销路在秋冬为旺季，春夏为淡季，为求药厂生产均衡和扩大营业范围，唐先后又研制新药疟疾丸、疳积散，也都冠以“唐拾义”为记，以老药带销新药，销路也逐步打开。疟疾丸因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远销西北、西南、东北各地，销售额不断上升，沪厂仅该药一种，旺销时一年约可获利二十万元。唐拾义为保持其高额利润，对制剂配方严格保密，非亲信人员不得过问。

唐拾义药厂的产品主要销往农村。他以“名医处方监制”、“货真价实”、“疗效显著”相招徕，根据各地邮局所征集到的药店、药房、代销店的街道门牌和字号名称，寄发各种宣传品，然后通过邮寄，委托代售。唐厂联系的字号，遍及穷乡僻壤，数以万计。他还在车站、码头树立广告牌，在各大城镇粉刷墙头广告。随时令季节，又赠送扇子、日历、年画。在久咳丸、哮喘丸的药盒内附有“验真券”，集满若干张，可向代售店换取赠品等等。当时国内同类成药竞争者甚多，但唐厂产品由于药效较好，宣传得法，因此始终保持畅销地位，销路远及东南亚一带。唐厂的药丸还同同类的进口西药竞销，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止咳药如日货重松药房的止咳药水、欧

美的科发白松糖浆、屈臣氏咳嗽药水等，但都是药水，西药味重，携带不便，仅治一般伤风咳嗽。疟疾丸同类进口药品有疟涤平、百乐君、扑疟母星等，但价格较高，且无中文说明，不易为农村所接受，仅供西医处方使用。爪哇的糖衣奎宁丸和唐家疟疾丸同样是奎宁制剂，前者价格较疟疾丸便宜，销路也已打开，但后来有大量赝品在市上混售，真假难分，以致影响该药信誉，反有利于唐拾义疟疾丸的竞销。

唐拾义鉴于药丸的某些主药如盐酸麻黄素、山道年等，需仰赖国外进口，曾设厂沪西，试行提炼麻黄素及驱虫中药使君子有效成分，以替代进口原料，后因战争影响而中断。

唐拾义素以“良药济世、半慈善性质”为标榜，实则所售药品本轻利重，获利甚巨。即以疟疾丸而论，毛利率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久咳丸及哮喘丸则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三十年代后期唐拾义已积资成为百万巨富，购进沪地北海路吴宫饭店，以及爱多亚路、虞洽卿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西北角一带、广西路、牛庄路沿街门面等房地产多处。他还投资大三元粤菜馆，为大股东并任董事。

唐厂职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以上，星期日和节假日亦不放假，而于每年年终一次补发星期、节假日期间的工资。全年全勤职工另加发十天工资。为使职工能长期在唐厂安心工作，唐拾义规定职工工作每满十年，加发工资一年，以资鼓励。每逢年关，唐对得力职工另以私人名义发给红包年终奖，金额不等。

1939年9月20日，唐拾义因脑溢血病在沪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郑世农：《关于唐拾义药厂的几点回忆》。
- ② 黄中业：《唐拾义药厂简史》，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 ③ 访问唐志寿先生记录稿。

黄锡滋 黄明安

张钧陶

黄锡滋名大福，原籍湖北黄陂，其祖上迁到四川，世居重庆。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父亲黄道南；二伯黄道和无出，黄锡滋兼桃两房。黄道和经营匹头，家资富有。

黄锡滋幼入私塾，曾学国画。1895年黄道和去世，黄锡滋获遗产十多万两。他将钱财先存放在岳父杨文光的商号生息，后自营商业，但颇有亏损。1911年他开设商号，以陈丽生为掌柜，集正副股本三万六千两，并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为天锡生。嗣后扩充业务，以天锡生为母号，在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天锡永、天锡公、天锡福、天厚祥、福兴玉等子号，经营匹头、棉纱、油糖、山货等。天锡生、福兴玉后以运销川盐为主，是重庆“四大盐商”中的两家。

1915年，黄锡滋的岳父家杨氏兄弟开办聚兴诚银行，黄锡滋投资，并任监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抬头，生丝外销增长，黄锡滋集资买进天福丝厂，又设立天诚丝厂，从商业资本逐渐移向工业资本，谋取更多的利润。

黄锡滋的“天字号”做的是上下货，当时靠川江水运。为了掌握交通工具，实现自购、自运、自销，1920年他投资三十

万两从事航运事业，创设了福记航业部。为保证轮船燃料的自给，1921年黄又投资开办了三才生煤矿。1924年起，相继开办复兴钱庄、裕泰钱庄，还投资于三元祥钱庄，以便周转资金，调动头寸。

黄锡滋的经营活动，遍及工矿、航运、金融和商业，获利甚丰。天锡生、福兴玉一向经销楚岸；1927年春宁汉分裂，淮盐不能运鄂，盐价暴涨，天锡生、福兴玉运去的川盐，赚到银元四十多万，为其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黄锡滋的“天字号”亦受到影响。特别是日本蚕丝冲击，川丝一落千丈。黄锡滋被迫关闭了天福、天诚两家丝厂。陈丽生经营的丽华丝厂亦有亏空，波及天锡生。兼以四川军阀恣意加提盐税，阻碍了川盐外销，使天锡生、福兴玉处于困境。1931年至1932年赔出近百万元，黄锡滋被迫先后结束了天锡生和福兴玉，并收束了“天字号”各店。尔后，黄全力从事于航运和煤矿的经营。

早在1907年，黄锡滋便已投资川江轮船公司。1920年他创办的福记航业部，初购一艘旧轮“嘉定号”，行驶川江上游的叙泸一线；旋即卖去旧轮，以五十几万两银子，先后购买“福源”、“福来”、“福同”三轮，航行川江下游，获利丰厚，到1928年底盈利达三十一万多两。黄为了对付军人强派兵差，1929年6月改组福记航业部，独资经营挂上“法商”名义的聚福洋行。该行表面上由法商吉利洋行投资三分之一，以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声称是“中法合资”的公司；实则黄锡滋与吉利洋行暗签“密约”，订明中法合资是假的，只由聚福每年送给挂旗费三万两，并付给沙礼等人若干钱。遇有军人干扰或其

他事件，由法国人出面交涉，小则由沙礼出面处理，大则把法国领事搬出来应付，动辄以“要惹动外交”相恫吓。聚福凭借外人势力庇护，十多年中，船未搭过兵差，也不完纳捐税，获取了难得的厚利。至抗战初期，聚福积累现金已逾三百万元。1939年，巴黎吉利洋行总行派吕丹来华，矢口否认“密约”，强要虚设的三分之一股权。黄锡滋生怕揭穿聚福的内幕，只好委屈求全，几经磋商，接受法商补交十三万元股本，而被夺去十倍于其投资的利权。

黄锡滋还经营三才生煤矿，在重庆江北静观场代家沟，1925年正式出煤。但一直是以土法开采，设备简陋，而且受地址邻接、同属一股炭脉的天府煤矿的排挤，无多大开展。

黄锡滋经商近三十年，拥有企业十几家，资金积累到四、五百万银元，成了重庆的一大富商。他精通生意，工于心计，善于选择有才干的人负责经营各个企业。每逢年终结算后，在家宴请众伙友，总以盈利最多者居首席，以盈利少或无盈利的赔末座。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国，黄锡滋赞助抗日。1938年9月，他献寒衣捐二万元，获得国民政府银质奖章和“见义勇为”的匾额。1940年5月8日黄锡滋因病在重庆去世。

黄明安是黄锡滋的长子，1907年11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生。十岁入学，1927年夏入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因惧遭绑票，不久回重庆。先入聚兴诚银行作练习生，约半年，转入天锡生商号监督内账。1931年天锡生结束后，黄明安在父亲资助下，办怡怡公司，开怡丰钱庄。1934年春，他随舅父杨粲三赴欧美考察实业。抗战初起，黄明安经营

复华漂鬃公司，任董事长。1940年投资开办光华制革厂。是年其父去世，黄明安拟通过改组三才生煤矿，加以整顿。鉴于运输上以往仰仗天府煤矿代运受卡，亦拟自筑铁路以解决运煤的困难，然申请购买铁轨受阻，未能实现。复欲与天府煤矿合并，亦未达成协议。适逢孔祥熙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矿业部急于抓矿，黄明安为获得官僚资本的“保护”，同中国兴业公司达成协议，于1940年4月底签订合约，正式成立三才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黄明安以常务董事兼任协理。

三才生改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充、改建，产量有所提高，但运输更不能适应。1941年3月，乃开工兴建代黄铁路，翌年5月筑成。但设计欠周，管理不善，通车之后，仍未完全摆脱依靠天府煤矿代运的局面。

当时法币不断贬值，又由于兴修铁路所费不貲，三才生改组不久，资金即陷于困境，不得不一再增资，四处贷款。初改组时，额定资本法币二百万元，原三才生与中国兴业公司各占一半；1941年春增为总额四百万元，1942年再增为八百万元，都各按原股额比例增加。但资金仍有困难，乃由黄明安签字承兑，向各商业银行贷款，到1943年下半年，信贷高达两、三千万，债台越筑越高。在此危机下，黄明安走通了孔祥熙的门路，再演一场增资改组的把戏。孔祥熙派陈行为董事长，徐堪、郭景琨为常务董事，改组了三才生的董事会，定股本总额为二千万元，以原股本（八百万元）升值百分之五十为一千二百万元，其余八百万都是假名虚股，以便应付场面。当年12月，三才生即编造一套虚假表报，申请贷款。孔祥熙批交四联总处，不到一月，就获得六千万元长期低利贷款。孔祥熙还亲

到天府煤矿视察，要两矿“很好合作”。但天府总经理孙越崎属经济部系统，不卖孔的帐。三才生得到这一大笔贷款后，照理应易于转圜，但1944年开始，法币贬值越发加快，大后方整个工业陷于停滞状态，而煤的限价又影响生产，三才生仍然难以支撑，月月亏累。到下半年三才生已是日暮途穷，成瘫痪状态。黄明安无可奈何，从当年9月起，将三才生委托董事陈叔敬全权负责，利用陈和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的关系，去和天府商洽合并。天府乃清偿其债务，把三才生合并过去。黄明安经营三才生赔蚀二、三百万银元的巨款，受到惨重的损失。

1945年复兴钱庄改为复兴义银行，黄明安任董事长。重庆解放前夕，黄又任强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解放后，黄明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强华公司与华中、合众两家轮船公司合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黄明安被任命为副经理，1955年任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副局长。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选第四、五、六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他业余喜好书法，工于摄影。1968年3月11日黄明安在重庆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黄明安：《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经过》，《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2辑。
- ② 黄瑾莹：《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经过》，《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辑。

潘 昌 猷

肖宇柱

潘昌猷名文义，四川仁寿县人，1901年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父潘在田，去世较早。潘昌猷童年时家境清寒，曾随其母到地主向兰亭家做活。其兄潘文华先在成都当学徒，后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向兰亭的胞兄向奇峰当过团总，还会“算命”，他认为潘文华命相上有发展前途，潘昌猷的“八字”也很好，因而对潘氏母子多方照顾。数年后，潘文华当了营长，汇款回家，潘母回到本乡买田地，潘昌猷也在乡就读私塾。家境渐趋富裕，潘昌猷竟变得游手好闲，酷嗜赌博。

1924年潘昌猷到成都去见杨森求职。时潘文华已升任师长，驻节重庆。杨森和潘文华是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时任四川督理，遂委潘昌猷为成都东外统捐分局局长。不久杨森垮台，潘昌猷失却依附，回到仁寿老家。1925年潘昌猷到重庆，在潘文华师部当军需，后又接任军需处长。潘昌猷既有钱有势，更加挥霍无度，放肆嫖赌。其妻以死苦谏，潘母与潘文华亦严厉斥责，潘昌猷方有所改悔。

1928年潘文华任重庆市长，潘昌猷为市金库主任，兼任市奖券所所长。奖券所发行“市政公益奖券”，他从中挪用资金，与人合伙开设中孚钱庄，开始进入金融界。1931年潘文

华下令开设重庆市民银行，官商合办。潘昌猷在其兄扶持下被推为总经理，代表官股，市商会会长温少鹤任董事会主席，代表商股。潘昌猷并不懂银行业务，但他能延揽人才分别担任襄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等；又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底，并亲自到校听课，学习银行业务知识，还向行家学习经营管理经验。经过一番努力，市民银行业务逐渐开展，连年获利，在重庆金融界站住了脚。特别是市民银行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更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潘昌猷声望大增，1934年当选为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接着被选为市商会主席，还兼任重庆市立中学校长。

潘昌猷为了加速攫取财富，亟谋将官商合股的重庆市民银行化为己有，用尽心机，扩大自己的股权。市民银行开办时，资本额为银元五十万元，实际上只收足二十万元，其中潘昌猷只有二千五百元；其余三十万元虚悬在他名下。后来市民银行架面大了，头寸比较活动，他采取透支方式，用市民银行的钱为自己买下这三十万元的股票，所占的股额便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后银行增资，他如法炮制，遂至拥有股额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后他寻找借口得到潘文华的支持，改组了市民银行，收买了官股，另行注册立案，于1934年8月29日将“重庆市民银行”改为“重庆商业银行”。

重庆商业银行刚成立时，资力并不雄厚，而潘昌猷发财心切，想在公债上投机。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统一公债”，按票面额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交易，行情时高时低，潘以为有机可乘，大量贪进。1937年“七七”事变后，“统一公债”价格惨跌，重庆商业银行亏累甚巨，陷入严重危

机。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的刘航琛，素不满潘倚仗乃兄之势与己争衡，此时不但卡住省银行不贷款予重庆商业银行，还向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提出关闭重庆商业银行等三家投机惨败的银行，以平息金融风潮。潘昌猷闻讯，往见顾、关，声称购买公债是拥护国家的金融政策，并声明重庆商业银行只是一时周转不灵，并非资不抵债。顾祝同考虑到其兄潘文华是四川实力派军人，乃允许重庆商业银行所差款项可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重庆商业银行旋又得到聚兴诚银行杨粲三相助，才渡过难关。

潘昌猷遭此失败，心情沉重，在重庆商业银行下了一道“罪己诏”，自免总经理之职，以常务董事名义负责全行事务。潘素信佛，迷信“风水”，请来一个堪舆先生到重庆商业银行新厦找“来龙”查“去脉”，特把大厦铁门向左偏二度重新安装，端正“字向”；并用高价把对门巷道挡了“风水”的巴壁滩收买过来，拆除去“煞”；又请西藏喇嘛来银行念经九天，在大厦底层深处理了几颗“舍利子”，以避盗防火，逢凶化吉。但重庆商业银行并未因此而有起色，只不过勉强维持。

1938年1月刘湘去世，潘文华支持王缙绪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为酬谢潘文华，于是年6月委派潘昌猷当上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于是潘昌猷利用省行低利贷款，把重庆商业银行的业务搞活起来。但王缙绪眼红，同年11月又派他的军需处长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并改行董事长责任制。潘昌猷成了一个有名无权的总经理。为时不久，王缙绪于1939年9月下台，蒋介石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要财政部长孔祥熙拉

拢四川实力派军人。孔与潘文华换帖订为兰交，潘昌猷由此得到孔的垂青和照顾。1940年6月，财政部投资二百万元，改组四川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从此潘再度掌握省行的实权。

潘昌猷控制四川省银行后，以“同业借款”名目，从省行套取大量资金转入重庆商业银行运用，数额逐年上升。同时他还凭借孔祥熙的关系，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局的贷款。在币制日趋贬值的情况下，他用这些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和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大发其财。到1949年，净赚得黄金七千五百二十两，美金（包括美汇、美金储蓄、美金公债）一百七十万元，房地产银元一百二十万元。

潘昌猷主持重庆商业银行，采用高利率的办法吸收存款。它开办的“比期存款”，利率高于一般银行，与黑市利息接近或相等，因而吸收了大量的社会游资。不少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军需、财务人员将公款挪来存入“比期存款”，从中赚取利息。所以，重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数额之巨，在重庆各家银行中首屈一指。

潘昌猷又开办“川北汇兑”。抗战中米商将川北一带食米运至合川再转运重庆销售。运商在各地买米时，卖出为期十五天的一种期票，称为“合票”。卖票得款，支付购米价款，米出售后再买回“合票”。在卖出与买回之间有折扣。重庆商业银行在川北各地设立办事处，专门办理米商“合票”汇兑，从中获取了厚利。

此外，潘昌猷还注意到开办“小商贷款”。重庆的小商户甚多，从来没有一个银行把他们作为放款对象。重庆商业银行

兴创小商贷放业务，贷给每户的数额虽不大，但投放比较普遍，整个贷放总额也就可观了。重庆商业银行的这类往来户，经常保持近三百家左右，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对活跃市场也起到相当作用。

潘昌猷也经营工商企业和投资一些新兴企业。他所经营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专营猪鬃出口，与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康心如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刘航琛的和沅实业公司，并列为重庆的“四大公司”。重庆盐号也是他经营的重点企业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将总号迁往上海，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把经营范围由川盐扩大到海盐、淮盐。为开办植华纱厂，他选派人员到美国学习纺织技术和经营管理，并向美国、英国、香港订购生产设备。据统计，潘昌猷所经营与投资的公司、厂矿，包括重庆比较著名的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共有一百五十二家。其中有五十三家在1949年以前陆续结束，其余各家总投资额达银元二百七十四万五千一百三十六元。上述各家，均由潘昌猷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或总经理等职。

潘昌猷以其在工商、金融界的地位，担任了重庆市参议员、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潘昌猷鉴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日趋崩溃，1948年起就逐步把资金向外转移。1949年秋初，潘去香港。先是，潘昌猷在渝时，曾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李济深、章伯钧和郭沫若等有所往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9月17日在桂园举行茶会，潘昌猷曾被邀参

加。潘对李济深、张澜等人的民主活动以及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活动，均有所资助。

解放以后，潘昌猷1950年1月一度回到北京。同年冬，托辞清理外汇赴港。1953年复由香港远去南美，在巴西定居。1981年1月2日在巴西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石体元、刘迭琛、赵世厚：《重庆银行的兴起与衰落》（未刊稿）。
- ② 刘仁耀、赵世厚：《我们所知道的潘昌猷》（未刊稿）。

刘 航 琛

伍志安

刘航琛，四川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其父刘子休系天主教徒，在泸县经营“爱仁堂”酒厂，酿造大曲酒。以教会关系，向法国人学得“花酒”酿造技术，取名“路酒”，并改罐装为玻璃瓶装。刘航琛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沉缅于赌博，生活放荡。1922年毕业后回泸县任泸县中学校长。

1926年四川烟酒税征收局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课以重税。为此，刘航琛到重庆申诉，在呈文中讥诮局长王用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大怒，要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逮捕刘航琛，后以说情送礼了事。刘航琛受此刺激，发誓要进入仕途。

1927年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因亏累不堪，束手无策。刘航琛由北大同学陈学池（时任王陵基所办《大中华日报》负责人）推荐，任铜元局事务所所长。刘到职后，把流通的二百文值铜元改铸为所谓“新二百文”，缩小体积和重量，并勾结上海巨商汤壶峤，由汤垫款在沪购铜，铸成铜元后交汤经营的字号包销，付还垫款。从而迅即扭转了铜元局的亏损局面，大获其利。刘因此深得

王陵基的赏识。此时，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军费，经办财政的人员一筹莫展。王陵基乃以刘航琛推荐给军长刘湘，充任二十一军财政处的科长，不久升为副处长、处长。

刘航琛承办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军阀强索硬派的办法，从捐税、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广为搜括。他以“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计，成立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总办，使二十一军各部属不敢恣意截留税款。又把当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做到他所谓的“苛而不扰”。四川盐税稳当可靠，向为军阀所垂涎。而川盐的产区与销区，时由二十四军和二十一军分别割据，两军为向两区轮流提取盐税，争论多寡，时生矛盾。1928年成立两军财务统筹处，刘航琛代表二十一军担任副处长，两军以“产运结合”的办法瓜分盐税。刘航琛所谓整顿特税，是以“寓禁于征”为名，广行搜括之实。对鸦片烟产区固然大抽烟税，对不产烟的地区，也一律派以烟苗捐。他还在各地成立禁烟查缉处或稽征所，名曰收缴税捐，实则办理烟土的外运内销。1930年刘航琛建议成立了二十一军总金库，自任收支官，以金库名义发行粮契税券，规定纳粮必用，实际上是变相的发行钞票，至1934年发行额达数百万元。金库还大量发行各种库券、公债，交由金融业推销。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发行债券高达四千一百余万元。以上措施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使他得以打败二十四军刘文辉，独霸全川。

刘航琛为了取悦于刘湘，早在1928年即从财政处按月拨出十万元存入刘湘帐上，供其自由支用，既为刘湘提供了方

便，又杜绝了二十一军将官借刘湘名义向财政处任意索取。刘航琛又将购买武器所得回扣二十余万元，全数交帐，不入私囊，以求取信刘湘。刘湘对刘航琛聚敛有方，十分赞赏；但又认为他居心叵测，难以驾驭。1933年刘湘受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主任，在筹组四川省政府时，财政厅长一席，没有提刘航琛。这时，刘航琛担任二十一军的驻南京代表，他千方百计结交南京政府的达官显贵，取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赏识，在宋的支持下，1935年2月他终于当上了四川财政厅长。

刘航琛就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后，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为整顿四川财政，他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一批亲信，派往省内各地财税机关。他亟力整顿田赋，当时各县的钱粮，全川每年共有七百多万元。加以从“统一田地买卖和典当税率”中的收益，征收验换契纸费，加重屠宰税附加，继续征收禁烟税等等，一年共搜刮四、五千万。从1936年起，又征收营业税，按照各企业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三为省地方收入。其时，国民党已推行法币政策，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但刘航琛仍以四川省银行名义发行大量辅币，到1937年10月，实际发行额已近一千万元。从省政府成立到抗战开始，还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称的公债达一亿四千五百余万元。刘航琛多方搜括，扭转了四川财政的困难局面，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刘航琛主张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和扩张他的经济实力。他初进二十一军即对刘湘献策：搞财政不能不同金融业和商帮打交道，要利用他们的实力。1930年9月，他请准刘湘创立川康殖业银行，宣称资本

额为四百万元，实则只是从禁烟款下拿出六十万，另加一点商股，不过一百万元。从此刘亦官亦商，在金融界扩展实力。他利用刘湘交付的军火款，在川康殖业银行经销公债，发行无息存票，攫取一般商业银行所不易得到的厚利。抗战爆发后，他又趁势合并了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改组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集股三百五十万，资本额冠于川帮银行。他对重庆盐商组织的川盐银行早存觊觎之心；通过他与该行董事长吴受彤的关系而入股为董事。1937年吴受彤病危，力荐刘航琛继任。刘如愿以偿，担任了该行董事长，逐步攫取了该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权。刘从此控制了川康、川盐两行，俨然成为重庆金融界的大亨，声势烜赫。

1935年，聚兴诚银行发生存户向财政厅控告该行舞弊事。刘也早想插手聚兴诚，借此事件即以财政厅长名义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提走聚行帐簿，迫使该行总经理杨燊三接纳刘航琛入股，担任了该行常务董事。1937年，重庆商业银行因赌公债失败，发生挤兑风潮，向川康、川盐告急。刘不但拒不借款应急，并要求有关当局下令关闭重庆商业银行。

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金，大量投资工商企业，几年中攫取了重庆金融工商界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七十多个头衔，控制了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和沅猪鬃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重要经济事业，还掌握着《商务日报》、《益世报》、《新民报》等新闻机构。

1938年1月刘湘死去，王缙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对刘航琛素有恶感，下令彻查财政厅帐目，并拟逮捕刘航琛。刘闻风逃往香港。次年王缙绪下台，刘航琛在杜月笙、顾嘉棠

支持下，回到重庆。他大力整顿川康、川盐两行人事，大搞黄金、棉纱、药材等投机买卖，不断扩大自己经济实力。

1941年，重庆粮食供应出现危机。粮食部长徐堪委刘航琛为粮食部特派员，去四川各地催调粮食。刘带领川康、川盐两行亲信，分路巡视各县，利用过去分布在各地的“财训班”人员和封建袍哥势力，筹集到了一批粮食，从而当上了陪都民食供应处长。1942年升任粮食部常务次长。但不久又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排挤而下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航琛认为今后上海是金融业的前线，重庆是后方。他立即将川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沅、电力公司等单位联合办事处。为了使“业务日臻现代化”，又在重庆以川康、川盐两行联合宝沅、沱江、华西、电力等十八家银行、厂矿、公司，设立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拨资两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

1946年下半年，刘航琛到上海，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杜月笙、顾嘉棠，筹组利济轮船公司，希图开办海运事业。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的一部分海船交给他。李宗仁也表示愿意把正在筹办的一家海运公司交与他经营。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刘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耗费颇巨。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6月，刘航琛当上了经济部部长。他见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金五、六百万元，遂见财起意，一面诱使该所所长郭子勋出国“考察”，一面组织商号，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没。该所员工识破骗局，成立保

护矿产品委员会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移交给了新中国。

不久，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利济轮船公司两艘旧船糜费甚多，而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不兑现。公司尚未组成，即告破产。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太大，特别是大量资金被抽到利济轮船公司，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二百万汇渝解救，亦无济于事。

南京解放前夕，刘航琛逃至广州，后又去重庆，10月中旬携眷逃往香港，以后又跑到台湾。蒋介石借口刘航琛对经济部事务交待不清，下令逮捕惩办。经何应钦、张群等人说情，取保释放。1975年9月28日刘航琛在台北因病死去。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
- ② 《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

王 伯 元

董建侯 宋紫云

王伯元，字怀忠，1893年6月4日（清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江苏吴县（今苏州），祖籍浙江慈溪。父亲王清芬曾在江苏海门、苏州一带经商，后任苏州恒孚银楼经理，定居苏州。王伯元六岁起延师课读，十七岁到上海震丰永金号当学徒，三年后被留用跑外勤。在学徒期间，王已加入上海金业公会，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916年，应涵恒金号资方徐伯熊邀请，任该金号经理^①，1918年改任天昌祥金号经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市面金价时涨时落，王窥察行情变化，常能不失时机地为天昌祥金号买卖标金，从中牟得暴利，受到资方赏识。

1921年，王伯元辞去天昌祥职务，自筹资金开设裕发永金号，任经理，同时做金业交易所的经纪人，在金业界渐露头角，不久被推选为上海金业交易所理事。他在金业交易所任事，掌握标金行情；遇到赤金行情^②比外汇汇票行情低时，他就卖出汇票买进赤金，从中套利，逐渐积有巨资。1923年王又独资开设元发证券号，买卖各项有价证券，从中谋利。王不过数年便从一个普通商人一跃而为百万富翁，在慈溪长石桥广置田产，兴建住宅。

王伯元深知从事黄金投机买卖风险极大，遂转而投资金

融事业。1929年他联合上海金融界领袖秦润卿、徐寄庠、李铭等人，通过交通银行总行副理梁晨岚的联系，接办中国垦业银行，进行投资改组，资本总额一次收足二百五十万元，王伯元独自投资一百四十万元，占百分之五十八。该行原创于1926年，经改组后，总行由天津迁到上海（天津设分行），成立董事会，推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伯元为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掌握实际权力。秦润卿作风正派，办事稳健，素为上海金融界所敬重，在答应出任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时，有言在先：一是垦业银行不做买卖外汇业务，二是垦业银行的股东和负责人不准向本行借款宕帐。王完全赞同。

王伯元主持垦业银行总行，积极推进业务。他首先向董事会建议拨出基金十万元成立储蓄处，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的储蓄存款第一年为六十余万元，第二年达七百余万元。1933年储蓄处在南市文庙公园设立一个储蓄所，吸收的储蓄存款以零星细数居多，为广大市民所欢迎。

王伯元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地产委员会委员，熟悉地产业务情况。他于1931年在垦业银行总行添设地产部，办理房地产押款业务，代收房租，但不直接经营地产买卖。他私人拥有四处房地产，面积五十余亩，每月可收房租九千元，为了使房租能及时入帐，也交由地产部经收。同年，垦业银行上海总行新建八层钢骨水泥大楼，内设保管库及银库，于1933年10月初落成，其二楼以上房屋全部出租，每年收入租金三、四万元。

当时，上海浦东一带的农民，多以植棉为业，新棉上市时，花价往往被商人压低，棉农多愿以棉花向私营仓库作质，待价

而沽。王伯元针对这一情况，于1934年由垦业银行与浦东恒大新记纱厂、恒源兴记轧花厂合作，设仓库十一座，对棉农办理棉花抵押放款。棉农以籽花或花衣作质，垦业银行凭仓单放款，每年投放贷款五十余万元，为银行资金谋得出路。

王伯元对民族工业抵押放款，肯于放手。亚浦耳电器厂的产品与舶来品竞争，垦业银行不断贷款给予支持。1935年市面萧条，银根吃紧，民族工业岌岌可危，垦业银行仍继续投放资金，对振华纱厂、经纬纱厂、章华毛纺厂、亚浦耳电器厂等均先后承做数额较大的抵押放款。

王伯元对于代客买卖有价证券，富有经验。1940年，他建议董事会拨出资金五十万元设立信托部，办理信托业务，兼收各种定期活期信托款项。对外商发行的股票如橡树种植股票及其他实业股票均有投资，但坚持不做买卖外汇业务。

王伯元能与秦润卿和衷共济，一贯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以抵押放款为主，坚持做“多单”不做“缺单”^③；储蓄业务发达，则运用储蓄存款资金购置房地产，收租作息，保证资金运用稳妥。1943年底，秦润卿因年事已高，辞去垦业银行总经理兼职，仍任董事长。1944年初王伯元接任总经理。

垦业银行原以放款于垦牧农林等事业、辅助实业发达为宗旨，而实际上经营业务与一般商业银行相类似。1948年国民党政府颁行银行法，规定“银行之种类应在其名称中表示之”。秦润卿、王伯元等人反复商讨，为求与银行法不相违谬，决定取勤恳乃业之意，改“垦业”为“垦业”，名“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中国垦业银行”。

王伯元除主持经营垦业银行外，私人投资的企业尚有同

庆钱庄、同润钱庄、元大钱庄、绸业银行、国泰银行、贻成面粉厂、天一保险公司等多家。

王伯元成为巨富后，曾为疏浚慈溪长石桥至樟桥大河、重建宁波市的老江桥、兴办长石桥植本小学捐资，并在长石桥附近买下荒丘为义冢。王还在南洋中学和复旦大学设置奖学金，先后资助几十名家境贫寒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

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王伯元竟先后出任了伪上海市保甲委员会副联保长、伪上海市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他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慑于清议，避地离沪。1948年底，他赴美国侨居。

1977年9月28日王伯元在美病故。

注：

- ① 当时资本家开设金号，根据金业公会会章规定，必须聘请金业公会会员担任经理，即资本代理人。
- ② 上海黄金市场的价格，是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决定的，当时每天看汇丰银行外汇行情为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按英镑计算，欧战后按日元计算。
- ③ 银行经常有余款存放同业者称“多单”；反之经常依靠同业借入款经营投放者称“缺单”。

袁 履 登

汪仁泽

袁履登原名贤安,后改名礼敦,字履登,以字行。1879年9月3日(清光绪五年七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祖籍绍兴,其父袁燮元,因避战乱迁宁波定居,以小商贩为业,家境贫寒。袁履登十岁时进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宁波开明桥教堂附设的开明小学堂免费就学。一年后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获得英国伦敦教会礼敦路主日学校的奖学金,每年六英镑。他以半数充膳宿费,半数贴补家用。为表示感恩不忘,改名为礼敦。小学毕业后,升入该堂增设的斐迪中学。十九岁时由斐迪中学保送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先读备馆(预科),后升正馆(本科)学习,兼任该校化学助理员。二十六岁毕业后,回宁波任斐迪中学教务长兼教会牧师。为了增加收入,又在益智中学及浙江第四中学等校兼任英语教师。此时各地教案屡起^①,宁波知府夏孙桐深感棘手,因袁懂外文,又受过西方教育,遂于1905年聘他任外交顾问。1908年,在全国收回利权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下,袁曾受浙江宁绍道员桑铁珊的委托,与英国领事交涉,收回了宁波江北岸的警察权。他的名声因而随之传开,担任当地多处慈善、文教机关的董事等职。

辛亥革命起,宁波光复,11月5日成立军政府,袁履登被

推为外交次长兼交通次长。袁并创办《方闻报》，宣传三民主义，成为当时宁波销路最好的刊物之一。1913年军政府改组，袁去职赴沪。他应汉粤川铁路总办岑春煊之邀，至汉口任督办公署译员。半年后回沪，受聘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经理室襄理，两年后辞职。1916年协助其结义兄弟谢衡牕经营江西鄱阳（今波阳）乐平间的鄱乐煤矿，以及顺昌轮船公司、裕昌煤号等企业。1917年曾受煤矿委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工商业。此后他曾任黄楚九所创设大昌烟公司的汉口分公司经理，后又与教友骆怀白合做德商科发药房华经理，不久又与沈燮臣合做美商茂生洋行买办。此时他收入丰厚，举止阔绰，雇用保镖，俨然成为买办富商，并组织“申商俱乐部”，自任会长。

1920年上海交易所盛行，袁履登与黄楚九合办“夜市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不久拆伙。是年他继虞洽卿、石运乾之后，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达十六年。他还兼任上海国民银行、恒宣轮船公司、远东体育场、恒茂产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等企业的董事，以及上海总商会会董、副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上海青年会干事兼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等职。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袁出任上海各界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代表商界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参加该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但是后来袁又与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人策划商界单独退出“三罢”斗争，于6月26日开市复业。此后，袁就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副理事长、工部局华顾问、华董等职。1936年任美国烟叶公司华经理。因其交游甚广，被许多工商企业、公益慈善团体争相聘为董、监、理事。袁并设堂号“卧雪楼”，招

收生徒，成为沪上“闻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袁履登担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秘书长，募集捐款，办理难民救济工作。此时日本侵略者谋组沪地傀儡政权，由于袁的社会地位及“闻人”身份，成为当时日伪物色汉奸伪职的重要对象，一度被日本军方羁押。在威胁利诱下，袁不顾民族气节，甘愿受敌利用。1941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改组，袁在董事会上提议由日人任总董，实行后，日方提袁为副总董。是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1942年2月起实行“连坐互保”的保甲制度，成立“保甲筹备委员会”，袁被指定为“会长”，着手主办保甲的编组工作，为虎作伥。7月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理事长。此时汪伪头目邵式军等筹组大华银行，控制沪地金融，袁出任该行总经理。9月日方为了筹措军粮、禁止粮食出境，成立“米粮统制委员会”，袁出任该会主任委员暨南京伪物资审议会委员。由于粮食资敌，居民的户口米不仅量少质差，且时告不继，上海出现争购户口米的悲惨场面。袁遂成为众矢之的，声名狼藉，在一片詈骂声中被迫住进医院，向敌伪乞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到沪后忙于“劫收”，迟迟未对汉奸进行处理。由于人民群众身受敌伪八年统治的茶毒，对于汉奸袁履登之流恨之入骨，纷纷加以揭发检举，集会控诉。1946年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袁逮捕法办，判处无期徒刑，后又改判为七年。囚禁一年八个月后，因病重保外执行。1948年2月，蒋介石当伪总统，袁获“大赦”释放，不久离沪去香港。

1950年5月,袁履登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寓居,1954年12月24日在沪病死。

注:

- ①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清廷对帝国主义者承担严厉镇压各地反教会、反传教士活动的条款,但各地反教会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减弱。1903年浙江宁海发生群众千余人焚毁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作战的宁海教案。事后清廷屠杀无辜群众六人,文武官员均受惩处,并赔款十一万两。宁波府属境内亦相继发生教案数起。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马崖琴:《关于海上三老之一袁履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323号)。
② 严渭声:《沦陷时期袁履登的动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734号)。
③ 《公审袁履登起诉书》。
④ 《访问袁森斋记录稿》(1983年11月2日)。

茅 盾

林 印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桐乡县。父亲沈永锡，晚清秀才。母亲陈爱珠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

1905年茅盾在故乡乌镇入小学。1909年先考入浙江省第三中学，后转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入本科，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同时开始了他早年的文学活动。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注意阅读、研究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选译一些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外国小说。1920年冬，茅盾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十二人发起成立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商务印书馆原出版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主持的刊物，专门登载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请茅盾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专门介绍外国文学。1920年11月，又决定请他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成为一个进步文艺刊物。这引起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怨恨和攻

击，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表示反对。在内外夹击之下，1922年10月茅盾辞主编职，改由郑振铎接编。

1922年到1924年，茅盾和郑振铎等人一道，曾经和文艺界的三个方面展开论战：一是鸳鸯蝴蝶派；二是创造社；三是南京的学衡派。其中，除与创造社的论战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外，对其他两派是对旧文学营垒的冲击与批判。

从1920年开始，茅盾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茅盾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为中央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茅盾被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茅盾根据大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1925年12月，恽代英和茅盾组织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1926年1月他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工作，编辑《政治周报》。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上海，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主持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的各种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并派观察员去各省考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同年冬，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茅盾到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翌年4月初，他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个报社的社长是董必武，这份报纸实际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在《民国日报》上，他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反共面目，武汉的政局十分动荡。6月底，茅盾为应付突然事变，把快要生产的妻子孔德沚先送回上海。7月8日，他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辞掉《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在武汉法租界一家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7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去九江，在九江见到董必武和谭平山，被告知即去南昌。这时他（住在牯岭）得了一场急病，失去了去南昌的机会，遂于8月中旬绕道回上海。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在抓人，茅盾亦名列其中。大革命的失败使他痛心，也使他悲观。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为了暂避蒋介石的迫害，他隐居了十个月，除了和同住在一弄堂里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几乎不和外界接触。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有一段自叙：“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的十个月中，茅盾用“追忆”的手法写了三个连续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他的意图是写大革命时代青年所经

过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高昂兴奋和革命遇到挫折后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三篇小说于1928年用笔名“茅盾”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由于它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一举成名。同时它也在当时进步文艺界引起某些非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去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人指出小说反映作者悲观失望情绪太浓厚。1929年这三个中篇被合印成一卷小说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8年7月初，茅盾离开上海去日本。16日他在日本东京写了散文《从牯岭到东京》，借以回答当时上海文艺界某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他表明《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时代描写，算不得是革命小说。同时他对有些人把文艺视为狭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不赞成的。在这之后，他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

茅盾在东京住了五个月，写有短篇小说《创造》、《自杀》、《一个女性》。12月，他移住日本京都，又写了一些短篇和散文。1929年写了长篇小说《虹》。除此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写有《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同年底，他写了《关于高尔基》，说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象高尔基那样写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

1930年4月，茅盾结束亡命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他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头半年，他取材于历史传说写成《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个短篇小说。1930

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判后，左联工作有了新的气象。1931年4月，茅盾开始和鲁迅、冯雪峰合编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5月，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和鲁迅、瞿秋白结成革命的战友，向国民党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当时，他曾经通过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但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回答。这年10月，茅盾为要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子夜》，辞掉了左联领导职务，但仍坚持左翼文艺的旗帜。1932年到1936年他和鲁迅合作创办了《文学》和《译文》杂志。1934年2月，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逆流，茅盾和鲁迅都积极写文章反击。1935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茅盾和鲁迅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祝贺胜利。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成于1932年底，但酝酿与构思则早在1930年冬。1930年夏秋之交，他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并发，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他每天访亲问友搜集素材。他在上海的朋友有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人，有自由职业者，也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他又不止一次地到交易所、丝厂、火柴厂去，这很有助于他对社会的观察。

《子夜》中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以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抱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雄心的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为主角，刻划了复杂的斗争场面。吴荪甫为了自保，一方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最后走上了绝路，从而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子夜》形象地驳斥了当时托派叫嚷的所谓中国要走向资本主义的谬论，也打破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希望振兴中国民族工业

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子夜》是我国五四以来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的文学巨著。《子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英、美、苏联等国家出版，为世界文坛所重视。

茅盾在创作《子夜》的同时，还写有《林家铺子》。它的主题反映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小市镇的小商人不论如何会做生意，终归只有破产倒闭这一条路。同期和稍后他又写成《春蚕》、《秋收》和《残冬》三个短篇，刻划了三十年代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掠夺的江浙蚕农的贫困，和农民开始觉醒、反抗的斗争场面。从1933年到1936年，茅盾还写有许多杂文、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到汉口，主编生活书店出的《文艺阵地》。1937年11月他偕同妻子离开上海经过香港到长沙，然后到九龙。他在九龙住了九个月，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并为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1938年底，他应杜重远的邀约，带领全家去新疆学院教书，于1939年春天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除教书外，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不久，由于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日趋反动，使他无法工作。他一家只得于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回到西安。5月他随朱德的车队去延安访问，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同年初冬，他把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留在延安学习，自己和夫人离开延安到重庆。他写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出色的散文，歌颂延安的革命精神。

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离重庆经桂林去香港，创办《笔谈》，又参加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任编委，在《大众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他在这部小说里通过女特务赵惠明被腐蚀和逐步堕落的经过，揭露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的血腥罪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茅盾和叶以群、廖沫沙等人一起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十分动荡不安的惊险生活。后来，由于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他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桂林，找到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小屋棲身。他在那里写了描述香港生活片段的《劫后拾遗》，和描写民国初年城市士绅生活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

从1943年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茅盾定居重庆近郊。他追忆东江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抢救流亡香港的一千多文化人的经过，写成《归途杂拾》、《过封锁线》等文章。1945年，写成了以揭露黄金舞弊案为主题的《清明前后》，曾在重庆公演。

抗战胜利，1946年4月茅盾离重庆回上海。是年底，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杂谈苏联》与《苏联见闻录》。1947年尾，他再次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这个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锻炼》，在《文汇报》上发表。

1948年底，茅盾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由香港乘轮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北乎和平解放后，茅盾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直到1964年夏。他曾任全国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茅盾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因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五岁。他死后,中共中央根据他逝世前的请求于3月31日作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茅盾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② 《茅盾散文速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③ 《茅盾评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④ 茅盾:《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⑤ 《茅盾论创作》,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 ⑥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 衡

汪仁泽

马衡，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1881年6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鄞县。父亲马渔珊历任上海、宝山等县知县。马衡少时随父在沪就读私塾，后进上海南洋公学，1901年毕业。因病在家长期休养，但手不释卷，钻研经史、金石、篆刻、碑帖，能诗、善书、工篆刻。他与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家境富裕，广集文物、古籍，并与沪上名流吴昌硕、吴石潜、丁辅之、陆廉夫等人交游，切磋学问，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的专业学识。

1917年，马衡受聘至北京清史馆任纂修。次年轻其兄、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介绍，任该校新设的金石学讲师。1922年以后又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考古学教授。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研究、搜集、整理、保管、展览，以及文物图录的刊印等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和钱玄同、王国维等结为知友，交往甚密。他继承了乾嘉学派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朴学传统^①，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②。

1923年马衡发表了授课讲义《中国金石学概要》，在古器文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扩大了宋朝以来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兼及甲骨、竹木、陶玉、砖瓦等方面，对古代金石学作了系统的

总结，从而导向专业考古学，“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③。《概要》发表后，日本、美国等专业杂志相继转载^④。马还发表论文《石鼓为秦刻石考》，对石鼓作了考证。石鼓之制作年代与国别，历来众说纷纭，马衡经多方引证，就其文字演变和秦刻遗文互证，判定为东周时秦刻，为我国石刻中最古者，受到学术界和许多专家的确认。1929年春，马衡应西湖博览会之请，就石鼓原物摄象十帧，连同该文制版付梓，分发中外学术界，受到国际考古界的普遍重视，影响甚广。沈尹默称该文“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马衡治学谨严，不满足于仅在书斋中对古物拓片的研究，而重视野外的实物勘察和科学的考古发掘。每闻新发现文物古器，常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参加发掘整理工作，以亲睹为快。马于1923年9月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委托，赴河南新郑青铜器出土地点调查，随后发表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1924年赴洛阳朱圪档村汉魏石经出土之太学遗址调查；又率领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学员赴北京西郊大觉寺、大宫山、碧云寺、圆明园文源阁等处遗址调查。他主张“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⑤。同年11月北洋政府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马衡参与其事。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古物馆由马衡主持。1926年，马衡研究了近世出土的汉代简牍及有关古代书籍资料，发表了《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对我国历代书籍材质、形式和装帧的演变，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次年他又发表了《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一文，推算出唐以前十五种古尺的实际长度，连同其他有关论文，提供了关于

度量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1927年初，马衡应日本学术界的邀请，东渡讲学半年，曾在东京帝国、九州、庆应等大学作《中国之铜器时代》等专题讲演。

同年6月，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有遗稿，生前为其师罗振玉搜去。王死后，马衡赴天津向罗振玉索回王的遗稿，交还王的遗属，后来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出版。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1927年10月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为古物馆副馆长。是年马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并于11月发表发掘报告。

1928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驻防河北蓟县一带，悍然盗掘遵化清东陵的乾隆和慈禧陵墓，掠去大批珍宝文物，一时中外轰动。马衡闻讯，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严惩盗宝者。后来国民党当局枪毙了孙的两名部下敷衍了事，但马衡却因此遭到孙殿英的忌恨。1930年夏，孙指使其部属借故缉捕马衡，这时马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幸得当时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的报讯，连夜经天津到上海暂避。此期间他曾至杭州小住，因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已经去世，马被推继任该社社长。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宁夏额济纳河东岸两汉烽燧遗址中掘得竹木简牍万余枚，次年夏马衡、刘复、傅振伦等开始整理研究。后马衡、向达等作释文成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刊印，惜未及印就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原稿下落不明。

1933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涉嫌盗宝被撤

职^⑥，次年9月马衡继任院长。此时日本侵华势力逐渐南犯，华北形势日趋严重，在马衡组织下，故宫所藏珍贵文物二万箱陆续从北平南运上海。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存储南运文物，1935年4月马衡主持保存库的监造工作，并在该地基上发掘得古迹两处。是年6月为筹集建库经费，将南运文物由沪起运至英国伦敦，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次年6月又在南京展出。1936年该库建成后，即将文物入库存储。

1937年抗战爆发，马衡赴西南寻觅储藏文物的安全处所，筹建仓库。11月沪地守军撤退后，南京吃紧，在运输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南京当局抢运了精品文物一万七千箱。运抵武汉后，由马衡组织人力分两路全部安全运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峨嵋、乐山三处山洞仓库中储藏。直到抗战胜利后，再由马衡筹组力量全部运回南京。郭沫若称马衡“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⑦

1948年末，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曾邀集一批学者名流座谈，征询和战意见。马衡继徐悲鸿诸人之后在会上发言，强烈希望以北平人民的安全为重，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务使文化古城免遭战火摧毁。此后他又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动员他“应变南迁”。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兼任全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曾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与王冶秋同赴广州鉴定和收购流失在香港的王献之手迹《中秋

帖》。

1953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马衡因病在家休养，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他平生对汉魏石经的研究用力最深，曾发表《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等论文十余篇。他抱病每天工作至深夜，将东汉以来先后发现的汉石经遗字，分别各经，依其篇章汇录成多卷，制就影印图版，并作《汉石经集存原序》，付梓印行。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五岁。所遗文稿数十万言，以及历年所藏万余册图书、古董文物等，全部由其子马太龙、马彦祥捐献给国家。其遗稿由王冶秋、夏鼐、唐兰、胡厚宣、傅振伦等人整理、编辑，分金石学概要、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和书籍形制等八卷，定名《凡将斋金石丛稿》，于1965年出版，反映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郭沫若为之作序，文末曰：“凡德业之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⑧

注：

- ① 清乾隆年间(1736—1820年)，某些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形成所谓“朴学”。
- ② 郭沫若：《〈凡将斋金石丛稿〉序》(1963年8月25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10月版。
- ③ 同②。
- ④ 《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部分章节，曾由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作注，转载于日本《东洋史研究》卷3、4。
- ⑤ 马衡：《考古与迷信》，转引自《凡将斋金石丛稿》编辑后记。
- ⑥ 易培基由于不避嫌疑，任意出卖古董、衣物，使人生疑，又因得罪国民党

元老张继之妻崔氏，被控盗宝。“崔氏向法院起诉状并未举出具体证据，但谓清宫古物中发现许多伪造之品，既有伪品，即反证系易盗窃。其实清宫中物伪造品本来甚多，即如乾隆本人，即不能辨别古董真伪，大员进呈之品有真有伪，一经盖用御印，即伪亦真，同样保存，如此而已。”（江庸：《故宫盗宝案》）该案国民党当局因张继的关系，交检察院立案，并派张的亲信郑烈为检察长，于1933年12月30日通令严缉易培基。易变姓改名避匿津、沪租界及香港等地，数年后病死上海。轰动一时的盗宝案随之不了了之。

⑦ 同②。

⑧ 同②。

王 造 时

江绍贞

王造时原名雄生，江西安福县人，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八岁入塾，后入安福县高等小学。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的反日风潮发生，使他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7年，王造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学生演说、编写传单等工作。6月3日，他率领同学在东安市场演讲，遭军警逮捕，后获释。8月，为支援天津、济南学生抗议山东军阀马良枪杀爱国回民事件，曾往总统府请愿，被军警驱至天安门内禁闭，后逃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发表反封建主义的文章，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又有组织领导能力，曾连续担任清华学生评议会主席及干事会主席。

1923年10月10日，清华举行国庆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梁启超登台演讲，说中华民国之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国民党要负重大责任。王造时听了不以为然，即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驳梁的文章，他针锋相对，指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乱七八糟，梁和他领导的研究系要负重大责任。此文由北京《时言报》作了转载。梁启超得知后十分气恼，向清华要求辞去教职。校长曹云祥找王谈话，要他写悔过书并向梁道歉，否则以侮辱师

长论，将其开除。王据理反驳，表示无过可悔，如被开除，则诉之法院并向社会公开，曹只得不了了之。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沪案后援会，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随后被沪案后援会派往武汉，调查武汉发生的惨案。

同年8月，王造时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学政治学。他感到五四以来参加政治活动太多，在留学期间应埋头读几年书。1927年国民革命被蒋介石破坏而失败，他对国事前途感到渺茫，愈加发愤读书。

1929年6月他在威斯康辛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同年8月到英国，入伦敦经济学院，随拉斯基研究国际政治。拉斯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受其影响，认为中国工人人数少，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他当时还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实行的即是社会主义革命。

1930年秋天，王造时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同时在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课。他在学生中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他要求民主法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1931年8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意在影射蒋介石，但对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活动，也还认识不清，竟认为是“流寇政策”^①。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出于爱国热忱，立即撰写了《救

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新月书店1931年10月出版),主张对内取消一党专政,对外与日寇拼命到底。同时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并代表该会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1932年1月,国民党政府聘任他为国难会议会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他受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的推派,往北平要求张学良出兵东北,以解上海之危,但后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与日本妥协,国难会议也被当局用种种方法改变了它原来“共赴国难”的宗旨。因此王造时和一些国难会议会员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而在沪发起组织民宪协进会。5月,他在上海各大报上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驳汪精卫等人不同意结束训政的言论。他指出:“象国民党近几年来干的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②11月,他与彭文应、潘大逵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自任主编。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指责越来越激昂了,该刊仅出三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1933年1月他又在上海创办《自由言论》半月刊,在创刊号上,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发表《安内必先攘外》一文,痛论非对外抗战,不足以安内,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亡。他逐渐改变了往昔对共产党的看法,说共产党“乃是有组织,有主张的政党”^③,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1933年1月,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他被选为宣传委员;3月又被选为执行委员。4月,同盟全国临时执委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他为委员

之一，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人士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提出民权保障运动“须有广大的民众做基础，分子应该加多，组织应该推广，不应该限于党派的关系，更不应该限于名流的集团”^④。他的意见切中同盟的主要弱点，受到重视。

由于王造时不断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对他的忌恨逐步升级。始则想用高官厚禄为饵，诱其到南京作官，王不为所动。接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寄以将予暗杀的匿名信，附寄子弹相威吓。上海教育当局下令光华大学撤掉他的职务，并密令各大学不得聘他任教。他不得已，只好挂牌当律师。11月福建事变发生，他应陈铭枢邀约前往福州，准备参预其事。不几天因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回到上海。接着他在《自由言论》上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一文，要求国民党政府“乘机痛悔，与民更始”^⑤。12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的罪名将《自由言论》查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他采取了缄默的态度，但他的爱国热忱并未稍减，仍积极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1935年4月，他将自“九一八”起至1933年底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题名《荒谬集》，作为对国民党当局的回击。

正当王造时处于苦闷之际，是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这使王造时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他不再缄默，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要求收复失地，保护群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接着上海文化界成立救国会，他被

选为执行委员、常务理事。1936年初他参加发起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王造时出席并当选为常务委员。他满腔热情地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极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们勾通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于当年11月22日深夜，将包括王造时在内的七位救国会领袖非法逮捕，不久解往苏州，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王造时等七人被捕后，国民党当局诱逼他们承认“犯罪”，迫其放弃救国主张。王造时和其他几位难友一样“自信没有犯罪”^⑥，他们从容不迫、团结一致地向反动当局作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条件，但对“七君子”的迫害并未立即停止。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仍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他们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讯。王造时等七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驳斥对他们强加之罪。国民党法官虽然窘态毕露，但仍然不予无罪释放，并声言要判刑。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王造时等七人才于7月31日获释。

8月13日王造时回到上海，正碰上淞沪抗战爆发，他立即投入抗敌后援活动。11月上海沦陷后，他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延聘，到南昌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处长。1938年7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春，王造时到吉安，汇集一部分文化人士及流亡学生组织前方文化社，创办生活书店，发行进步书刊。同年5月，他把吉安《日新日报》

改名《前方日报》，自任社长。他亲自写过不少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汪精卫投敌后，他连写文章揭露和谴责汪伪集团的罪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撰文反复阐明坚持持久战，中国必然会胜利的道理，并强调结成世界各国反侵略阵线的重要性。他的文章切中时弊，常被别报转载。

1942年国民参政会改组，王造时与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被排斥；但在1943年底，国民党当局迫于要求实行宪政的舆论，设立了一个宪政实施协进会，又聘王造时为会员。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回到上海，为《前方日报》迁沪作筹备，但《前方日报》迁沪许可证迟迟未能领到。他在苦闷的心情下，与生活书店合股在上海办起了一个自由出版社，自任社长。

1947年1月，国民党政府为分化拉拢民主党派人士，再次发表王造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但他仍然想尽最大努力，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曾奔走于张群、陈诚、陈立夫等人之间呼吁和平，当然毫无结果。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代总统李宗仁派人拉他为和平运动奔走，这时王造时回答是：“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⑦予以拒绝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造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及上海法学会理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8月5日去世。1980年8月20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为他补行追悼会，宣布政治上予以平反，

并赞扬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作的贡献。

注:

- ① 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新月》第3卷第11期(1931年8月)。
- ②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荒唐集》第38页。
- ③ 王造时:《五月十五日的主张》,《荒唐集》第185页。
- ④ 王造时:《自由之战争》,《荒唐集》第133页。
- ⑤ 王造时:《为国变忠告当局》,《自由言论》第1卷第21期(1933年12月1日)。
- ⑥ 王造时:《荒唐集》自序。
- ⑦ 《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潘 光 旦

全慰天

潘光旦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八）生。父名潘鸿鼎，曾任清翰林院编修。

潘光旦1905年入私塾读书。1913至1922年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经常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和年报、学报、周刊等编写工作。1915年右腿因参加体育运动受伤致残，依靠双拐走路，但仍然爱好活动，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罢课游行。1921年曾携带同学捐款到河北唐县赈济旱灾。

1922年，潘光旦去美国留学。开始在达茂大学学生物学，1924年毕业，得学士学位及成绩优异金牌。1925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1926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同时期还先后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其他研究机构参加有关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成绩优秀。1925至1926年，在纽约与清华校友闻一多、罗隆基等发起组织大江学会，并发行《大江季刊》，兼任学会理事，为季刊写稿。潘还曾兼任纽约中国留美学生季刊（中文）总编辑、月报（英文）编辑。这几个刊物主要宣传科学、民主的救国主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潘参加中国学生在纽约召开的追悼会，并将《总理遗嘱》译成英文，又与人合作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译为

英文。

潘光旦 1926 至 1934 年间在上海地区的大学工作，先后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预科主任、光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他先后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书报春秋》、《优生月刊》、《华年周刊》，1928 至 1934 年兼任《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编辑。这些刊物宣传科学、民主等救国主张，更多地讨论人口、劳工、家庭、妇女、优生等社会问题。当时，潘光旦还参加学术团体平社、中国社会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等。平社的社员多是留美学生，经常聚餐，宣读和讨论文稿，然后送《新月月刊》等处发表。

1934 年潘光旦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系教授，除主讲优生学、家庭问题外，先后开设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中国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1935 至 1937 年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长沙，合办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再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在这烽火连天的八年间，潘光旦一直随同清华辗转南方各地，坚持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部主任、社会系主任等。他一直在社会系讲课；一度在云南大学社会系、昆明译员训练班、云南留美学生预备班兼课。

1946 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复校，潘光旦随同回到北平，继续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等课程。

潘光旦在解放前先后完成的著作有：《冯小青——一件影

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读书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等。译著有：葛理士著《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学》、赫胥黎著《自由教育论》等。

当时潘光旦在优生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不但要求个人进步、社会进步，而且要求种族进步。他认为，种族进步更为根本，离开它，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是不可能长久的。在潘光旦看来，只有种族进步，在先天遗传方面比较优秀的人才能倍出，社会、经济、文化等才会不断繁荣昌盛，源远流长。种族的演变，首先是通过生物现象中的繁殖、变异、遗传、竞争、选择、淘汰、死亡等因素进行的。如果优良人种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在数量上得到增加，便是种族进步，否则便是退步。其次，人种的这种演变，还同时受到社会现象中婚姻、家庭、战争、宗教、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很大的，必定造成人口中不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从而引起种族的进步或退步。潘光旦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审判下被杀害的多是优秀人才，这不能不影响种族进步。他认为，欧洲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很快衰落了，而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这不是没有种族方面的原因的。

潘光旦在社会学方面的中心思想是：力求建立一种健全的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包括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两方面，这两方面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就个人方面说，又总有通性、个性、性别三方面。通性是人人

相同之处，个性是因人而异之性，性别是男女之分。就社会方面说，即就人群方面说，又总有社会秩序、文化进步、民族绵延三个方面。社会秩序与通性一致，文化进步与个性一致，民族绵延与性别一致。只有使这两大方面、六小方面都得到照顾，才是比较健全的社会。潘光旦说：“在温暖的情绪与清明的理智之下，试问哪一壁的哪一方面我们愿意捐弃的呢？我们谁不知道，缺一壁或缺一壁的任何一方面，多少总是不健全的表现呢？”^①他认为几十年间先后传入中国的，最先是英美式的个人自由主义，接着是苏联式的阶级集体主义，最后是德意式的种族集体主义，各有偏蔽，都不可生搬硬套。他又认为：个人生活的健全发展，通性、个性、性别不偏废，主要依靠自由教育；社会生活的健全发展，秩序、进步、绵延不偏废，主要依靠民主政治。健全社会必须以自由教育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潘的这种社会理想，显然还脱不出改良主义的窠臼。

潘光旦在政治上很早就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1926至1927年间，他在上海与张君勱等经常往来，商谈时局，1936年加入张君勱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7至1948年，还一度参加在北平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任理事及该会所办《新路》周刊编委，宣传改良主义思想。他在国共两大党的政治斗争中，日益明显地反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和措施，而同意共产党的若干经济政策，但他同时留恋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想走第三条道路，后来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趋反动腐化，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

下,潘光旦的政治态度日益发生变化。他经常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抨击。1939年他反对大学设训导长,认为把训育从教育里划分出来,在理论上很有问题,并且没有人当得起这训导长。1940年,他发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由于昆明《中央日报》一篇社论的反对,他又发表了《再论宣传不是教育》。后篇说:“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②同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重庆《中央日报》与昆明《每周专论》上撰文,指责大学教师的思想不纯正,潘光旦便发表《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说:“作者厕身大学环境且二十年,所见和公展先生的很有不同,又忝为教师的一人,责任有归,未敢缄默。”^③1943年,潘光旦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和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更正,并说:“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的更分明。”^④1944年,他公开主张学人论政,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真的广开言路,说:“试想,大家,特别是一般学人、艺人和有专门技术的人,对于国家大事,既连口都不能开,还敢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贡献么?”^⑤1942至1945年,他和闻一多、吴晗等联大教授一起,创办《自由论坛》月刊和周刊,大力呼吁自由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他在解放前的论文集,有一本就叫做《政学罪言》。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潘光旦参加。他自1941年起至解放一直担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曾兼任民盟昆明支部委员、主任委员,负责创办和编辑民盟在昆明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他在昆

明经常和闻一多、吴晗、费孝通、曾昭伦等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华岗、尚钺、楚图南等人在唐家花园秘密召开的小型座谈会，讨论政治形势。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涨过程中，尤其在1945年底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后，西南联大不少民主教授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潘光旦和其他民主人士一度往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嗣后回到北平，他继续兼任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光旦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总部宣传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北京市支部委员和文教委员，民盟清华大学区分部主任委员。

1949至1952年间，潘光旦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担任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长，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家庭进化史、马列名著选读等课程，译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1年春，前往上海、苏州、吴江、无锡、常熟等地视察土改运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谁说江南无封建？》等多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收编为《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出版。1952年，潘光旦到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调查研究湘西土家族，写出了调查报告和有关文章。他还研究景颇族史、畲族史，并整理中印边界有关资料。

1957年反右斗争中，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十年，他通读二十五史，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史料约达一百六十万字，同时翻译了达尔文巨著《人类的由来》。1967年6月10日

病逝。遗书万册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遗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以及《人类的由来》均已出版。

注：

- ① 潘光旦：《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76 页。
- ② 同①，第 229 页。
- ③ 同①，第 101 页。
- ④ 同①，第 14 页。
- ⑤ 同①，第 359 页。

柯 劭 忞

姜献阁

柯劭忞，字凤荪，又字凤笙，晚号蓼园。山东胶州（今胶县）人，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父柯蘅是清末名儒，多年任教，通经史，长于诗。母李氏亦能诗文。

柯劭忞幼从父读，七岁会诗，稍长广学经史、算术、天文、地理等常识。十六岁为生员，由于成绩优异，不久又被选入济南尚志书院学习。

1870年，柯劭忞得中乡举，受到名儒朱肯甫的赏识。不久，朱视学四川，柯随行并襄助科举事。此后他往来晋、粤、辽东等地，受聘担任书院主讲。

柯劭忞曾六次会试未中，仍刻苦攻读，1886年终于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受职编修。从此长期居住北京，潜心学术。他曾与郑东父共同研究《春秋谷梁传》，又为吴汝纶订正《尚书故》四册，并着手广泛搜集元史材料。这期间，柯同国子监祭酒盛昱经常诗酒往还，和袁昶、沈曾植等亦有交谊。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柯劭忞追随到西安，同徐世昌一起被派为政务处行走。1901年，柯出任湖南学政。1904年离湘回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和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撰文侍讲转侍读。1906年，他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任贵州提学使。1908年，柯再次

调回北京，在学部任丞参上行走，一度署右参议并左丞；又由学部奏派充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

1910年，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要求宪政的舆论，成立资政院，柯为钦选各部院议员之一。同年，莱阳发生民变，他作为议员和乡绅，极力调解官民矛盾。翌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廷垂死挣扎，除起用袁世凯外，还派某些“声望夙著”的大员赴各省进行所谓宣抚，柯被派往山东，任宣慰使兼督办团练大臣。他带领同僚驻节兖州，在兖沂曹属各县活动。不久仍调回北京，为典礼院学士，派懋勤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被迫退位。面对清王朝的灭亡，柯劭忞痛哭流涕，此后一直“以孤忠自鸣”^①，隐居不仕。1914年他被任命为约法会议议员及参议院参政，但均未就职。袁世凯曾几次劝其出山，柯甘为亡清遗老，不肯为官。后徐世昌做总统，柯和徐本是同年进士，关系较密，一时常出入总统府，并参加了由徐出面设立的“晚晴簃诗社”，但仍不愿问政。

1914年，清史馆成立，赵尔巽任馆长，柯应聘为总纂。他撰写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又总纂纪稿；赵尔巽去世后，柯兼代馆长，主持馆务。柯与一百多人参加编写《清史稿》，到1927年大体完成，翌年印行，共五百三十六卷。该书内容、文字均有错误，但它比较系统地汇集了清史素材，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柯劭忞更致力于重修《元史》的工作，被人推崇为著名的元史学家。明初宋濂等编撰的《元史》，仓促成书，且

出于众手，芜杂疏漏，谬误百出，一直为后人所诟病。明清两代六百年间，试图重修元史者不乏其人，有关的书也出过多种，但均未能令人满意。柯继诸家之后，积三十余年之力，从《永乐大典》、金石文字和外籍、秘集中广搜博采，细心研究，又吸取了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成果，“熔裁钩贯，校异订讹，衡其情事，按之时地，以定从违，补遗阙”^②，对宋著《元史》作了大量的修订增删，于1922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撰工作。全书共二百五十七卷，一百五十多万字，受到不少学者的好评，一时被认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洽’之二种长处”^③；但也有人指出其体例陈旧，有事实不确、取舍失当、无序跋索引等缺点。徐世昌曾以大总统名义令将柯的《新元史》列入正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尤赞赏该书，特赠他以文学博士学位。

1925年5月，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柯劭忞出任委员长。他并主持撰修《四库全书提要》，自己整理编撰经部易经类提要一百五十二则。

柯劭忞晚年继续研读古籍，并以著述为职志。他希望用“春秋大义”针砭动乱的社会现实，精心纂注《谷梁传》，于1927年出版《春秋谷梁传注》十五卷，曾被人揄扬“足与左传杜注、公羊何解方驾矣”^④。柯还努力校注其他经史书籍，出版的有《新元史考证》、《译史补》等，还有《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后汉书注》、《说经札记》、《蓼园文集》等，均未刊印。1931年，他搜采经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的《十三经考证》，打算存于曲阜孔庙，但未及完成。1933年8月31日因病在北平故去。

柯劭忞除治经史外,诗亦有名,但多已失传,今存者有《蓼园诗钞》五卷。

注:

- ① 王森然:《柯劭忞先生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杏岩书屋 1934年初版,第 53 页。
- ② 柳诒徵:《柯劭忞》,《国史馆馆刊》第 1 卷第 2 号第 89 页。
- ③ 李思纯:《元史学》,上海中华书局 1931 年第 3 版,第 76 页。
- ④ 牟润孙:《柯凤荪先生遗著三种》,《图书季刊》第 2 卷第 4 期第 237 页。

丁 福 保

陆柏年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居士，别署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1874年8月4日（清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父亲丁承祥是个塾师。丁福保六岁入私塾，十三岁以后听哥哥丁宝书讲解经史诗赋，学业大进。

1895年丁福保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成绩优异，次年考取秀才。1897年秋，他去南京应乡试未中，次年再入南菁书院，跟随近代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学习数学，肄业后在无锡谟实学堂担任算学教习。

丁福保自幼体弱，任教习后又患肺病，经华蘅芳介绍其表弟赵元益诊治。丁福保由此广泛阅读医学书籍，并向赵元益求教。1901年丁福保辞去谟实学堂算学教习的职务，往上海住在赵元益家中养病、学医。这时西医输入中国日盛，赵乃当时名医，曾译述过一些西方医学著作。丁福保认为通过日译医书学习西医，更易奏效，遂于同年考入盛宣怀在虹口创设的东文学堂，精心学习日语，课余曾编写《日本文典译释》等书，为以后编译日文医书打下良好的基础。

1903年夏，丁福保赴北京，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及生理学教习。两年后他不愿继续任教，乃于1905年暑假辞去教职，回到无锡。他在无锡与友人共同组织译书公会，原

计划刊印医书，未能如愿，只编印了《代数备旨》等数学教科书。后因亏损过巨而结束。

丁于1908年春前往上海，先在自新医院任监院，同年秋开始为人治病，但求医者不多。次年6月，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举行“南洋医科考试”，丁往应试，取得最优等开业证书，遂即受派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同时盛宣怀也要他调查日本办理医科学校、孤儿养育院的情况，并购买医药图书。7月，丁东渡日本，参观了千叶医学校、帝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东京小石川养育院等处，了解日本在医药方面的先进技术。8月回国后，继续行医，名声日盛。

丁福保行医已采用近代西方医学的诊断方法，运用理化检验、X光、显微镜等器械，以确诊病因，对症下药。他认为中国古代医学在生理解剖、诊断、药物等方面，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干扰，“谬钟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他主张借鉴西医改良中国医学，又主张“假道日本，较欧美为便”。日本古代医学，深受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输入西方医学，吸取与传播，发展显著。丁依据日文的医药图书，先后编译出版七、八十种医疗基础理论、内外诸科、诊断护理、药物等书籍，合称为《丁氏医学丛书》，后来在南京及罗马等国内外展览获奖。在此之前，近代西方医书汉译本在我国仅二十余种，丁福保大量转译日文西方医书，在我国介绍近代西方医药科学上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丁福保发起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开展医药学术的探讨，有会员数百人，出版发行了《中西医学报》。他配制的“精制补血丸”、“半夏消痰丸”，曾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奖。1913年他在上海开设了丁氏医

院。

丁福保原有国学基础，热心收集整理古籍。早在南菁书院时，他就立志广罗图书；辞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的动机，也有想实现他编印古籍的志向在其中。经过多年行医之后，他有了丰裕的收入，陆续购藏了各类图书，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他创办了医学书局，除刊印医书外，先后编辑印行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书。

丁福保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时，曾读过一些佛教书籍，深受影响。1916年起，他开始信奉佛教，吃斋茹素，宣扬佛学，编写了《佛学指南》、《佛学初阶》等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多种佛教典籍。他又参考日本出版的几种佛教辞典，编成《佛学大辞典》于1921年出版。丁早年在日本曾购得国内已经失传的《一切经音义》（唐释慧琳编）和《续一切经音义》（辽释希麟编），这时乃以笔划为序，将此两书另行编排，出版了《一切经音义汇编》。他在浏览道教图书后，见道教典籍浩繁，信徒难以通读，于是选辑道教经籍一百种，1922年编为《道藏精华录》出版，以带有道教色彩的“守一子”署名。后来他又撰写了《老子道德经笺注》于1927年印行。

丁福保认为他编印的医学、算学书籍虽有几十种，但都时过境迁，不足流传；所刊佛书，稍有可存的价值。他还专心致力于钻研《说文解字》一书，汇集了一百八十二种注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以许慎的原书次序为纲，编辑成《说文解字诂林》，俾查阅一字而各家论说齐备，使用方便，于1928年出版，获得各界好评。次年，他翻造上海大通路瑞德里的旧

居后，取名“诂林精舍”，用以读书著述。他继续汇集有关《说文解字》的其他四十六种论述，于1932年又编印了《说文解字诂林补遗》。此外，他又编写了《六书正义》、《说文钥》等数种文字学的著作。丁福保收藏了不少古代钱币，1938年编印了《古钱大辞典》，同时出版了《古泉学纲要》等有关古钱的著作。丁福保整理古籍二十余年，印行多种大型图书，使他的名声在学术文化界比医药界更为人所知晓。

为了集中精力编书，丁福保1931年起曾停止行医，但不时仍有病人求诊。几年后他又恢复行医，每天上午为人治病。同时他又编译了《民众新医学丛书》二十余种，宣传医药卫生知识。他发起组织了中国肺病学会，并支持儿子创立上海虹桥肺病疗养院。他晚年信佛更笃，迷信于轮回报应之说，宣扬戒杀放生。由于他的社会声望，曾先后在上海佛教医院、上海福幼院、世界提倡素食会、上海卫生教育社、中国医学杂志社、古钱学会等慈善机关、学术团体担任过职务。

丁福保于1952年11月28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他自1926年起就主持编辑《四部总录》，广辑经史子集，是一部备载前人序跋、解题的书目，编成而未及出版。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周云青整理其遗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医药编”、“天文编”、“算学编”、“艺术编”四种。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畴隐居士自订年谱》，1925年无锡丁氏印。
- ② 《畴隐居士自传》，1948年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印。
- ③ 《畴隐居士学术史》，1949年上海诂林精舍出版社印。

傅 斯 年

熊尚厚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山东聊城。父亲傅旭安晚清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傅六岁入塾，九岁失怙，1905年春转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

1908年冬，傅斯年随同乡进士侯延壤（雪舫）去天津。侯原为傅旭安的学生，傅斯年得侯的帮助，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于1913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①，1916年秋升入文科国文门。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中新旧各流派并存，傅先服膺章太炎学说，后转向胡适。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傅斯年读后十分钦慕，即撰写《文学革新申义》投刊《新青年》以响应。同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传播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傅对之颇为心折，从而逐渐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等人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请胡适任顾问。《新潮》月刊在筹办中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傅任主任编辑。该刊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是当时全国

主张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之一，影响颇广。傅在该刊连续发表了《新潮发刊趣旨书》、《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以及《怎样做白话文》等论文，同时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学术，赞扬西方学术思想，声称愿引中国学术“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②；甚至一度认为“将来无穷的希望”，都要靠“俄国式的革命”“做引子”，“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③。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人物之一。5月4日那天，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游行总指挥。傅和段锡朋“细心策划”，力求使这一行动成为“有纪律的抗议”^④。他随同学生队伍前往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递交了声明书，当愤怒的群众高呼着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欲前往外交部和赵家楼之后，他认为群众行动“过急”，竟出面进行劝阻^⑤。群众不顾他的阻拦，直奔外交部，并火烧了赵家楼，他感到无法控制，愈加快不快。随后，他不断受到激进同学的反对，因之就不再进北大学生会了。5月底，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见学生们仍在坚持罢课，即对傅斯年、罗家伦说：“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⑥，希望傅斯年等在同学中发生影响，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与罗家伦等遂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运动，主张将北大迁往上海，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制止北大学子的爱国活动^⑦，结果无效。从此，傅斯年便回到书斋，专心准备毕业考试去了。

同年夏天，傅斯年在北大毕业后，返回山东参加官费的留

学考试。9月，他于出国留学的前夕，在《新潮》月刊发表了《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唱起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样的调子，鼓吹新潮社员应专心读书，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⑧。

1920年1月，傅斯年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习数学、物理等课程，以求获得科学方法的训练。1923年秋转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著作，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了兴趣。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翌年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4月，又接替鲁迅兼中文系主任。他在历史系和中文系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等课。同年秋，该校创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他兼所长及《周刊》主编。傅提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⑨他在《周刊》上发表了《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傅斯年与朱家骅联名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赞扬他们的“清党”反共^⑩。

翌年春，蔡元培奉派筹办中央研究院，邀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11月，该所在广州成立，傅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他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

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延揽了一批国内第一流人材,一时称盛。在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中,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等口号^⑩,主张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傅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定的任务是:“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⑪他的这些治学观点与方法,是承袭德国流行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传统,认定“历史学就是史料处置学”,引导治史者专注史料的发现与考订。这期间,他发表了《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等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抵平。是年秋,他兼北大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同时,还多次前往安阳指导和视察殷墟的发掘工作。安阳殷墟经过十年的发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傅斯年在“国事讨论会”上,主张借编著史书以唤起国际的重视。他和蒋廷黻、萧一山、方壮猷、徐中舒共同编写了《东北史纲》,用历史材料证明东北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曾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参考^⑫。

1932年,胡适组织独立评论社,傅斯年、蒋廷黻被邀参加。5月《独立评论》周刊出版,傅在该刊发表的政论文章是拥蒋反共的。但在“拥蒋反共”的前提之下,在对日侵华问题上,他却与胡适有某些差别,表示赞成抗日。1933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对国民党政

府的屈辱投降曲予掩饰，无异在客观上主张放弃东北^⑭。傅对胡适此文不满，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⑮。1935年冬，亲日分子萧振瀛召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开会，兜售对日妥协投降的主张，傅在会上斥责萧间接替日本招降，严正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他先后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了《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睡觉与外交》、《中日亲善??》、《一夕杂谈》、《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加以揭露；也批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当局“应当严定不可再让的界线以对国家”^⑯。对汪精卫实行的“对日经济提携”，他指责“乃是中国灭亡的速路”，要求认清“日本的广田外交，不要再上大当”^⑰。

历史语言研究所先于1933年南迁，但傅斯年仍留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并照顾其它兼职，时常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1936年春，他辞去北大及其它兼职，举家移居南京，全力支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西安事变”发生时，傅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对张、杨进行讨伐，其拥蒋立场始终未变。翌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傅斯年应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和国防参议会，对和战问题提出了一份《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书》^⑱，主张坚决抗战。翌年4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他被聘任参政员。其后，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期间，他写成《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论述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特性，强调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在“政治有方，领导得人”^⑲。同年，傅斯年上书蒋

介石，抨击孔祥熙等人生活奢侈，任用亲信，身兼多职，皆不胜任^②。

1940年以后，傅一再表示要“遁入学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但他仍时时跳出书斋表示政见。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苦衷，曾在参政会上多次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并就财政问题质询财政部长孔祥熙，建议蒋介石整刷政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大成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不久，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傅往南京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复员工作。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美反苏、拥蒋反共是一贯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曾经著文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并在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诬蔑延安“专制愚民”^③。1948年，他又在美国进行反共游说，同时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叫嚷：“非将共产党打垮不可。”^④是年8月，傅从美国回到南京，眼见蒋介石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陈布雷、段锡朋相继服毒自杀，自己也悲观绝望，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⑤同年，他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图书文物迁台，他自己也撤退到台北，旋即兼任了台湾大学校长。这期间，傅致书李宗仁反对和谈，还配合陈诚压迫台大学生运动。翌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对麦克阿瑟寄予希望。但是，在当年的12月20日他就病死在台北了。

注:

- ① 当时北大的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偏重文史。
- ② 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
- ③ 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号。
-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香港明报出版社版,上册第168页。
- ⑤ 周予同:《火烧赵家楼》,《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第74页。
- ⑥ 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希望》,《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
- ⑦ 马叙伦:《五四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281—282页。
- ⑧ 傅斯年:《新潮的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
- ⑨ 傅斯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周刊》第1集第1期。
- ⑩ 李宗侗:《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6期。
- ⑪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份。
- ⑫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十七年度报告书》,转引自傅乐成著《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第26页。
- ⑬ 傅斯年:《东北史纲初稿》引语,《东北史纲初稿》第1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10月版。
- ⑭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
- ⑮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24页。
- ⑯ 傅斯年:《一夕杂谈》,《大公报》1935年8月11日星期论文。
- ⑰ 傅斯年:《中日亲善??》,《独立评论》第140号(1935年3月)。
- ⑱ 见《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4册。
- ⑲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下),台湾《传记文学》第2卷第6期第27页。
- ⑳ 傅斯年等:《上蒋介石书(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4至613页。
- ㉑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1期。
- ㉒ 陈文运:《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
- ㉓ 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13日。

荀 慧 生

文 曦

荀慧生本名秉超，又名词，别号留香。1900年1月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生。原籍河南洛阳，姓笏，其祖迁居直隶（今河北）东光县后，改姓荀。父亲荀凤鸣务农，家境贫困，1906年带领全家到天津谋生，制作“线儿香”出售，但仍难维持生活，不得已将荀慧生及其兄慧荣以五十块银元卖给河北梆子班学戏。班主庞启发是著名的老十三旦侯俊山的嫡传弟子。他教徒严厉，生活上虐待徒众，绰号“庞剥皮”。荀进梆子班不久，庞就要他练“蹯工”。“蹯工”是旦角必练的基本功之一，要将木制铜箍的硬蹯绑在两脚上，靠墙而立，以一枝香燃尽为准。荀年幼体弱，站立不稳，疼痛得有时晕倒在地。他几次想逃，甚至想死，都被好心的人悄悄地劝阻了。庞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索兴要他成天踩着蹯走来走去。但经过这番苦练，他的“蹯工”打下了根基。

1908年冬天，不到九岁的荀慧生随着庞启发第一次在天津登台演出。庞给他取了个艺名叫“白牡丹”。此后，他们跑遍天津、保定一带的农村，搭野台或是赶庙会，随处演唱。1910年他随庞到了北京，搭入鸿顺和科班。北京人才荟萃，他在这里向不少名家学戏，《辛安驿》、《花田错》、《小放牛》等戏，都受过老十三旦侯俊山亲自指点。他还与一些著名梆子演员同台

演出,大大提高了技艺。这时,他喜爱上了京剧,常常背着庞启发暗自去看、去学。

1911年,荀慧生随庞启发加入北京三乐班(翌年改名正乐班),当时尚小云、赵桐珊(艺名芙蓉草)都在这个班,他们三人被誉为“正乐三艳”。这时荀慧生已开始学唱京剧的西皮、二黄,有时京、梆混演,称为“两下锅”。荀慧生敏而好学,勤而好问。他成天埋头学艺,反复琢磨,经过这一段苦练,技艺有更大长进。

两年后,荀慧生“倒仓”(即变声期,嗓音变哑),暂时停演养嗓。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名流,如画家胡佩衡、王雪涛、于非闇等人,关系颇好,交往甚密。这些名人纷纷出面跟他师父庞启发商量,建议让他正式改唱皮黄。庞无法逼迫“倒仓”的荀慧生登台,只好听从众议。于是荀得以聘请陈桐云为师,学唱昆曲和皮黄。不久,他的嗓音恢复得比以前更为清脆、响亮、柔和圆润,能演一些重头的青衣戏了。到1915年,荀慧生在庞启发这里应当满师出科,但因契约上没有注明起迄年月,庞启发不许他自立,仍只能继续为庞赚钱。直到1917年他才获得人身和经济上的独立自由。从此,他专门演出京剧,经常同台演出的有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

1919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到北京聘请杨小楼组班“长胜社”赴沪演出。老生为谭小培,青衣为尚小云;刀马旦一角,杨指聘“白牡丹”荀慧生。荀功底深厚,扮演花旦、刀马旦都能把梆子和京剧旦角的表演融于一体,使上海京剧爱好者耳目一新。一时,“三小一白”誉满沪上。荀慧生演出之余投师访友,博采众芳,丰富了自己的上演剧目。三个月后合同期满,

杨小楼等北返时，天蟾舞台坚决挽留荀慧生，每月包银高至五千元。他在上海一演再演，历数年不衰，直至1924年始北返。在沪期间，他和沈少安、谢香玉、李桂春、盖叫天等海上名角，合演了许多老戏和新戏。他还结交了不少文化界名流，曾拜著名画家吴昌硕为师，习山水画。后来他演《丹青引》时，能在八句慢板唱腔的同时，几分钟挥就一张条幅，观众赞叹不绝。

荀慧生回到北京后，声誉翹起。他崇尚革新，无论唱腔和表演艺术，乃至化妆、舞台布景，都进行了改革。在唱腔上，他发展和丰富了旦角“南梆子”、“四平调”、“汉调”等声腔艺术，说白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在表演艺术上，他赞同王瑶卿熔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的主张。他还吸收了小生、武生的表演技巧，甚至外国舞蹈的步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妇女的艺术形象，从而逐步建立起荀派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太真外传》、程砚秋《红拂传》、荀慧生《丹青引》、尚小云《摩登伽女》获选为前四名。从此，“四大名旦”之称蜚声中外。三十年代初，荀派逐渐形成。

荀慧生在京剧上的建树还表现在下列几方面。首先，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与剧作家陈墨香、舒舍予、陈水钟等合作，创作、改编、整理昆、梆、皮黄，以至地方剧、时装戏等共二百多出戏，都是能发挥自己特长的。至今广为流传的有荀派六大喜剧、六大悲剧、六大武剧、六大传统剧、六大移植剧、六大跌扑剧。其中《红娘》、《钗头凤》、《红楼二尤》、《杜十娘》、《玉堂春》等，尤为他的拿手好戏。其次，他在化妆上的创新，如改革旦角的发式化装、戏装等等。他创造了“坠马式偏凤

髻”、“弯月蛾眉”，设计了绣花大坎肩、蝶形大云肩、二道裙、三道裙等，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艺术形象。荀以扮演天真、活泼、热情的少女见长。他扮演的红娘，脍炙人口，提起“红娘”几乎与他的名字分不开了。

“九一八”事变后，荀慧生激于民族义愤，多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义演，筹措经费，慰劳抗日义勇军。1934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敌伪派人到北平重金礼聘名伶去长春演出，荀慧生毅然拒绝，避往天津。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平。当时，他为了身边一群人的生活，不得不继续演出，但受尽日伪汉奸的欺侮。他气愤之余，1942年耗尽所有开了一家留香饭店，想离开舞台，靠经商谋生。但他不善经营，不久即宣告歇业。

全国解放后，荀慧生多次带领剧团到全国各地为工农兵演出。他每到一地，注意观摩富有地方色彩的戏曲，吸取其精华。1950年他对《红娘》一剧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琴心》一场。这是从汉剧及京韵大鼓中吸取的营养，创造了《听琴吟》，从而使主要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1959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重新整理了《荀灌娘》一剧，表演上兼有花旦、刀马旦和小生的特点，刻划了一个少年有为、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

荀慧生一生收徒弟甚多。1957年以前举行过正式拜师仪式的弟子有三十六名，其中著名的有童芷苓、李玉茹、吴素秋、赵燕侠、毛世来等。这些人全是带艺投师，各有自己的师承和艺术成就，再经过荀慧生指点，因而兼有了荀派艺术的特色。1963年荀慧生前往辽宁省教徒演戏，适逢周恩来到沈阳，看了他们两场演出，一场是以荀慧生为主演出的，另一场

全是他的弟子演出。周看后对荀说：“慧生同志，你要多培养一些学生，让荀派艺术发扬光大。青年们演的不错，可是与老将比起来，就差的远了，主要是基本功不过硬。”荀在周的勉励下，更加用力培养教授艺坛新人。他晚年对京剧现代戏曾给予支持与关注。对京剧《祥林嫂》、《白毛女》、《刘胡兰》提过不少改进意见。在他写的《艺事日记》里，留有这方面的感想记述。

荀慧生于解放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又任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京剧二团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荀慧生京剧团团长等职。

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他的论著已出版的有：《荀慧生演剧散论》、《二红表演体系》、《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荀慧生唱腔选集》，《艺事日记》也将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荀慧生演剧散论》。
- ② 《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
- ③ 《荀慧生艺事日记》（未刊稿）。

张 石 川

陈 野

张石川，原名伟通，字蚀川，经商后改为石川。1890年1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蚕茧商人家庭。他自幼聪颖，性格豪放，争胜好强。十六岁丧父，跟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经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派他当“小写”。

张石川崇拜舅父，梦想将来也当上大买办，便在工作之余上夜校攻读英语。两年后，他当上了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买办。

清末民初，上海文明新戏盛行，张石川的另一个在洋行当买办的舅父经营三，其时办了一个文明戏班“民鸣社”。张亦醉心于文明戏，常与当时的著名演员来往，并结识了著名的戏剧活动家郑正秋。1913年，美商依什尔和萨弗见张石川机警灵活，又与文明戏班有联系，便聘请他作“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公司拍片事务。张石川原来对电影事业完全无知，他与郑正秋、经营三商量后，竟毅然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

“亚细亚”的第一部影片是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①，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遭遇。这是我国摄制的第一部

故事片。从此，张对电影发生了浓厚兴趣，干得更起劲了。当时，美国笑片在上海很吃香，他照猫画虎，连续拍了《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等十余部短片，大多是庸俗无聊或滑稽打闹之类的影片。参加拍片的多是演文明戏的演员。新民公司和演员订有拍片合同，对演员有极为繁琐的规定，如“角色轻重悉依公司指派”，“不准半途中止”等，如有违背，“重则罚洋，轻则记过”^②等等。这种合约，反映了张石川和经营三主持的新民公司对演员的苛刻剥削，具有很大的封建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关闭，张石川改替经营三掌管民鸣社。不久，又给经润三筹办的新世界游艺场赚了一笔钱。

1916年，美国胶片输入上海，张石川凭他在“亚细亚”拍片的经验，凑了一笔款子，办起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在舞台上轰动一时的文明戏《黑籍冤魂》。这部影片揭露鸦片的毒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幻仙”资金太少，终因周转不灵而停业。

这时，经润三去世，其妻汪国贞让张石川帮助经营新世界游艺场，并委派他作经理。张学着经润三的手腕，到处耍噱头，后又帮汪国贞办起了一个“‘新新世界’，除了戏曲杂耍，溜冰场，弹子房……，还开‘花榜’，选举上海名妓作‘花国总统’”^③以招徕顾客。后因他异想天开的花样过多，摊子铺得过大，又斗不过黄楚九经营的“大世界”，结果把汪国贞的两个游艺场都赔出去了。

1920年后，张石川又在富商何泳昌（以后成为张的岳父）

的推荐下，充当“瑞慎洋行”买办。不久，再度与郑正秋合作，约周剑云、郑鹧鸪等人参加，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张石川把电影当成游艺场一样来经营，专以投机牟利为目的。初创时期，他提出拍片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④，坚持要明星拍笑片、闹剧，不采纳郑正秋主张应摄“教化社会”的正剧长片的意见。因此，明星最早的四部影片，都是表现一些滑稽打闹或以惨无人道的杀人场面来刺激观众的低劣噱头。这些影片不受观众欢迎，以致营业失败。

但是，张石川决心终身从事电影事业，开始钻研电影艺术。他本来既不懂编剧，也不懂导演，只会模仿抄袭美国影片的情节和技巧。后得知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教授格雷格雷来中国旅游，张立即请他到刚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讲学，传授编、导、演和摄影、洗印等方面的经验。他还从格雷格雷那里获得一批电影方面的书籍，日夜苦读，把精通本行技能当作生财之道，从此懂得了一些搞电影艺术的门路，开始同意郑正秋拍摄正剧长片的主张。于是，在1923年底，明星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宣扬“惩恶”、“劝学”，故事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颇能引人入胜。此片在艺术处理上也有新的突破，从剧本的取材、服装到布景，都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表演上也摆脱了一些文明戏的夸张动作，使银幕形象的真实性和生活化方面都有提高。影片公映后，大为轰动，从经济上挽救了明星公司拍笑片带来的危机，使张石川尝到了拍“正剧长片”的甜头。同时，他也认识到，要继续拍摄正剧长片，必须有好的电影脚本和导演。为

此，他聘请了在美国学过戏剧的洪深任编导，加强了明星公司的阵容。

从1924年到1928年，张石川和郑正秋连续合作编导了《玉梨魂》、《盲孤女》、《最后之良心》等二十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揭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妇女被压迫被凌辱的处境，描写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但张并不考虑这些影片的社会意义，而仍是以追求票房价值为目的，总以大团圆为影片的结局，来调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他认为：“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⑤他为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又物色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给明星公司编写言情剧本，如包天笑写的《空谷兰》、《可怜的闺女》等。他自己也编剧本，常找人来说故事编戏，或翻看那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对哪一个情节感到有兴趣，便如痴如狂地编起戏来。

1927年后，正当一些投机商人纷纷成立影片公司，粗制滥造一些爱情风波的影片，以牟厚利的时候，张石川又花样翻新，抛出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运用电影特技手法，以刀光剑影、飞檐走壁来刺激小市民的好奇心。影片一出，远近轰动。《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十八集，张从中捞到一大笔钱。经张石川煽起的这种武侠神怪片妖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恶浪。一时间，上海拍出的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余部，有的观众受到影响甚至误入上山修道的歧途。接着，美国有声影片输入中国。1930年，张又抢先导演了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

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盈利甚厚。以后，他又亲自改编并导演了《啼笑姻缘》，先后拍成六集。这些背离时代要求的影片，在“九一八”、“一二八”全民抗日的怒潮中，被人唾弃。

1932年夏，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郑正秋等感到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迫切要求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合作，通过洪深聘请夏衍等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并组成编剧委员会。夏衍等人创作出《狂流》、《春蚕》、《前程》、《脂粉市场》等一批表现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这时，作为明星公司总经理的张石川，看到进步影片映出后，观众热烈欢迎，舆论大加赞扬，营业蒸蒸日上，既有名，又有利，甚为满意，认为非跟时代走不可。他支持左翼电影艺术家在明星公司拍摄了一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明星公司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拍片阵地。

1933年10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监视、威胁、逮捕乃至杀害等手段迫害左翼文艺工作者，夏衍等退出明星公司，但暗中仍继续与明星的进步导演合作，拍出一批进步影片。可是，张石川看到左倾有风险，不是生意经，又向右转了。他吸收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到明星公司充当编剧，拍摄出鼓吹封建家教的《妇道》、污蔑和掩盖农村阶级斗争的《重婚》等反动影片。这一年，他还到江西去替蒋介石拍了一部纪录片《剿匪纪实》，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

1936年后，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明星公司在进步电影工作者支持下又恢复了编剧委员会，聘欧阳予倩主持，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拍摄出《生死同心》、《压

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电影史上璀璨的珍品。张石川为了谋求既能赚钱、又不担风险的两全之策，他既走“进步”这条道，又不放弃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做法，仍抱着鸳鸯蝴蝶派或恐怖杀人的作品不放，甚至反动文人刘呐鸥编的歌颂国民党反动法律的《永远的微笑》也出笼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占据明星总厂为兵营，经营了十五年的明星公司被迫停歇。张石川以从明星总厂抢出的机器和底片作价，加入柳中亮、柳中浩兄弟的国华影片公司。这一时期，张石川投机钻营，以图重整“明星”家业。他窥测影片市场的行情，拍摄出不少宣传恐怖、色情或有封建毒素的影片。为了和“艺华”、“华新”、“春明”三家公司抢生意，争夺《三笑》、《碧玉簪》和《孟丽君》的拍摄权，他在同时间内主持三个戏的摄制工作。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架穿梭不停的机器，也把演员变成了终日转动不歇的机器，演员们随着他的吆喝，在摄影机前团团转。这样，创造了七天完成一部《三笑》的影坛奇闻，其粗制滥造也就可想而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上海的十二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先后担任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张石川曾被指控为汉奸。他吓出了一场大病，从此一蹶不振，病卧不起，于1953年7月8日去世。

张石川一生编导了近一百五十部长短故事片，其中虽有揭露社会黑暗的若干部进步影片，但绝大部分是迎合小市民趣味，低级粗劣，甚至反动有害的影片。他四十年的电影生涯，既反映了他个人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本性，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旧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

注：

- ① 据钱化佛口述：《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中国电影》创刊号（1956年10月28日）。
- ② 据北京中国艺术博物馆所藏合同原件。
- ③ 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化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 ④ 见张石川：《敬告读者》，《晨星》创刊号（1922年），上海晨社版。
- ⑤ 同③。

汪 逢 春

寿祝衡

汪逢春名朝甲，字风椿，逢春是他行医用的名字。1884年6月13日（清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生于江苏吴县。父亲是从事丝绸业的小商。汪逢春十余岁时，在吴中名医艾步蟾的门下学医，勤奋刻苦，博览群籍，虚怀探求，因而医学基础相当扎实。

1908年，汪逢春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为求进一步加深造诣，他一面担任“法医”，一面求教于名医厉轩举；公余常为患者诊治，疗效显著，就诊者日众。1913年辞去法医职务，正式悬壶行医。由于治愈不少疑难大症，名声日起，与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

汪逢春讲究辩证施治。他主张“尊古师古而不泥古”，也不存门户之见。他诊疾疗病，一面对循规前贤，一面对气候、方土以及病人的体质认真参酌。在诊治一些重症时，往往在医方中写明“备候高明政定”，非常尊重同行，决不固执己见。在诊治内伤症方面，他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主张着重护理脾胃，力求早日自行纳吞，依靠自身之支持，俾能早日复原。他常说：“药以治病，不能持以补虚，病后体虚可以药补，如体质素弱，徒以药补不如食补。”在治疗外感方面，则认为“肺主皮毛，风寒首先犯肺”，着力于“由皮毛宣达，使外邪早出，免内传为

患”。

汪以擅长于治湿温病著称。湿温病一般多见于夏秋之交，由于暑热与湿气侵入人体，破坏了人体内的正常生理机能，引起了病理变化。这种病理变化，特别表现为既有热象，又有胃肠机能障碍。汪逢春在治疗时，首先认定此症由于“气郁不得宣畅，以致肠胃秘结不通”，分清主次矛盾，然后根据轻重缓急分三个步骤进行治疗：“第一步先投以辛香宣化为主、通腑为佐的药剂；一俟头痛止而仍昏晕，形寒解而身热未净之际，再采取第二步，投以清湿解热、兼通肠胃的药剂；及至身热已退，舌苔渐化，胸闷已舒，小溲渐淡，其湿温化而未净之际，再采取第三步，投以泄化余热兼治肠胃之剂”。如此，则湿温得化，余邪得解，肠胃得通，湿温病自然痊愈。

在用药方面，汪逢春还常常采用将药末装入胶囊中，随药汁吞送的“少而精”的办法。这种办法，既能节约药物，又能达到收效“大而快”的目的。诸如治疗温病，初起时“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此外，还常用“沉香末一分，洋芦荟末二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分两次以药汁送下”的办法以达到和络通导的作用。

他对待患者认真负责，满腔热忱，在处方上往往记入护理注意事项，诸如“病虽小效尚在紧要之际宜乎避风慎口”，“千万少劳不可动气至嘱千万”，“深虑由泄转痢幸勿轻视”等等。他对求治患者中无力购药者，往往签名盖章于处方，嘱患者持赴指定药店免费取药若干剂，其药款则由他本人于月底统结付款。其救世治人的医风，一时多为传诵。

汪虽业中医,但对西医学说及诊断方法也认真参酌。在诊治重大疑难病症时,往往主动建议延聘西医到患者家会诊,共作治疗方案,以期收综合治疗之效。

汪逢春重视培养医药业传人。他收录门人很是严格,需要详知底细并具有相当的文学书法等基础,更需要经过一段认真的考察,方肯收纳。门人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半日侍诊,半日在家学习指定书籍。然后开始抄录方底,熟习老师的处方,包括诊断,药味,书写方式等等。再则根据学习程度提出问题,请教老师,达到明确的理解。为使高年级的门人得到实习的机会,他在医室中另设施诊部,由门人先拟定诊断处方底稿,经他本人检阅修定后再正式处方。1936年冬他还组织门人成立了“同砚小集”,以期相互钻研共同提高。在门诊休息之日,他与门人聚集在公园,就平日门诊中疑难病例,循经典或先贤之遗著作深入的探讨。他在京前后共收入室弟子二十余人,造就了一批中医。他的弟子辑录了一批他的门诊医案,于1941年編集《泊庐医案》出版。

汪逢春主张业药者也应知医,1942年在天安门西侧廊为国药业公会主办了中药讲习班,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前辈瞿文楼、杨叔澄等为主讲教师。

汪逢春于1949年8月2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泊庐医案》,文内所引资料,均出于此。
- ② 冯仰曾:《介绍汪逢春医案数例》,《中医杂志》1958年第8号549页。
- ③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民国人物传》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民国人物传》;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人物传记》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一)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二)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三)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四)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五)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六)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七)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

长最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八)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十)国民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十一)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十二)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十三)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十四)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十五)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十六)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十七)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四、只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现在还在世的,一律不写传,只积累材料。

五、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完后,一律按笔画顺序排列。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